



宪章

Charter 08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与

中国变革

中国信息中心 编

《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Charter 08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中国信息中心 编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9

《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

责任编辑/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声明]由于《零八宪章》运动情况诡吊，出版此书目的是为扩大影响，营救刘晓波于难。同时亦以此书为“六四”二十周年祭。时间仓促，为安全故，不便事先知会文章作者，敬请见谅。此书出版后将寄赠每位作者二册，若获赢利，将作为支援因宪章签名受到牵连的联署者。

Charter 08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9

电话: 1-202-408-8300

email:laogai@laogai.org

www.laogai.org

www.observechina.net

ISBN 10: 1-931550-29-8

ISBN-13: 978-1-931550-29-1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美元 32 港币 80

目 录

《零八宪章》全文及签名名单（第一批）	1
《零八宪章》 朝霞现象（序） 吴弘达	11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瓦茨拉夫·哈维尔）	15
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	17
捷克人权奖颁奖词	21
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讲话（瓦茨拉夫·哈维尔）	23
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词（徐友渔）	24
达赖喇嘛的声明	27
国际各界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释放刘晓波	28
世界各国三百多位作家联署要求释放刘晓波	39
就刘晓波被捕递交德国联邦政府和议会的呼吁书及回馈信件	47
刘霞获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的公告（21世纪中国基金会）	53
美国笔会颁发自由写作奖给刘晓波——我的答谢辞（刘霞）	55
关于中共无端拘押刘晓波的声明(中国信息中心/劳改基金会).....	57
支持《零八宪章》，必须以法治国 ——香港基督徒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	59
《零八宪章》签名人荣膺票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孟乡）.....	61
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徐友渔）	64
《零八宪章》：公民十年（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	68
《零八宪章》——一个普世理念（乔纳森·亚当斯）	70
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崔卫平）	75
我为什么要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梁文道）	79
我为成为《零八宪章》签署人而深感荣幸（谢福林）	81

与美国外交官谈《零八宪章》（沙叶新）	84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胡平）	90
第二卷 《零八宪章》与中国社会转型	
《零八宪章》与和平转型（一平）	95
当宪政钟声响起	
——新年献词（陈奎德）	100
《零八宪章》	
——中国又一次叩响人类大门（北明）	105
梁启超之国会请愿运动与《零八宪章》（林文希）	109
治道变革的官道与民道	
——琐记《零八宪章》与三农改革八大纲领（农学孟）	121
政治文明才是一切文明的基础	
——也谈《零八宪章》（何于）	124
《零八宪章》横空出世	
——当代中国宪章派群体揭幕（牟传珩）	127
传承常识，解困当下	
——《零八宪章》的历史担当（易明）	135
社会群体心理与《零八宪章》（浦世稼）	140
扩大经济内需，也要扩大政治内需	
——关于中国的经济危机与《零八宪章》（杨光）	155
道义之上的宪政启蒙	
——我读《零八宪章》（文强）	159
《零八宪章》签名后对中国人权的追思（铁流）	164
公民运动的理性力量必定战胜强权	
——写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李贵仁）	166
第三卷 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	
呼吁释放我的丈夫刘晓波（刘霞）	171

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	
——《零八宪章》的签名者的公开信	173
昨天与今天，奴隶与公民	
——为了你的孩子，请在《零八宪章》上签名（齐家贞）	175
公民刘晓波（高瑜）	180
致温家宝总理公开信请求释放刘晓波（昝爱宗）	188
坚毅前行是对晓波最好的声援（江棋生）	190
新的一年献给晓波（廖天琪）	193
她是“中国人的犹太人”	
——写给刘霞（余杰）	197
声援刘晓波兄（冉云飞）	203
在冬夜中想念我的良师刘晓波先生（欧阳小戎）	206
写给为宪章受难的晓波（小乔）	210
致公民刘晓波（康波）	215
我也拒绝漂浮	
——春节前给刘霞的诗（张鹤慈）	217
在中国，谁支持《零八宪章》？（施化）	221
第四卷 《零八宪章》与当局的反应	
《零八宪章》何罪？	
——不得不说的话（鲍彤）	229
北京开动镇压机器扼杀 08 宪章（纽约时报）	231
尊重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停止打压《零八宪章》公民运动	235
执政当局应该开放讨论《零八宪章》（文尧山）	243
《零八宪章》宣称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访签名者戴晴（纪硕鸣）	250
为《零八宪章》坐牢感到自豪（刘正有）	255
论《零八宪章》签署风险（王仲夏）	259
应对警方打压 保卫《零八宪章》（刘沙沙）	262
我万分拥护“社会主义民主”	
——竖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李昌玉）	269

今天国安找我谈话（陆文）	273
《零八宪章》构筑共同政治话语平台的努力（杨宽兴）	276
答国保有关《零八宪章》的签名问（曾伯炎）	281
“喝茶”第一回	
——被警察约谈《零八宪章》的经历（波斯小昭）	283
晚期威权的序幕：从七七宪章到《零八宪章》（吴强）	301
在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重申宪政理想	
——论《零八宪章》的意义（许允仁）	314
紧张的对峙和躁动的期待（蒋宣文）	333
 第五卷 《零八宪章》的争论与前景	
后极权中国的转型选择与刘晓波的坚守意义（彭小凯）	339
关于《零八宪章》的忧思（萧瀚）	345
《零八宪章》与中共角色	
——和萧瀚商榷（徐世明）	349
《零八宪章》的技术细节（王容芬）	352
《零八宪章》：一份迟到的历史文献（李劫）	360
谈《零八宪章》（秦晖）	363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	
——《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余杰）	369
台湾反对运动从“党外”到建党的两个经验	
——兼议《零八宪章》（吴仁华）	377
《零八宪章》缺原住民自决（林保华）	380
我为诗人辩护，诗人为谁辩护？	
——写在《零八宪章》发表与《今天》30年纪念之间(孟浪).....	382
左翼也应该践行《零八宪章》（刘逸明）	385
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我看《零八宪章》（刘荻）	388
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福音单张（王怡）	391
香港团体闹市宣传《零八宪章》(自由亚洲电台心语).....	401

零八宪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民主墙”诞生 30 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 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 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 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 2000 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

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 1997 年、1998 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 2004 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抗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

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

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

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流沙河（四川，诗人）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吴茂华（四川，作家）

杜光（北京，政治学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李普（北京，老记者）

孙文广（山东，教授）

- 鲍 彤 (北京, 公民)
丁子霖 (北京, 教授)
张先玲 (北京, 工程师)
徐 珺 (北京, 研究员)
蒋培坤 (北京, 教授)
刘晓波 (北京, 作家)
张祖桦 (北京, 宪政学者)
高 瑜 (北京, 记者)
戴 晴 (北京, 作家)
江棋生 (北京, 学者)
艾晓明 (广东, 教授)
刘军宁 (北京, 政治学家)
张旭昆 (浙江, 教授)
徐友渔 (北京, 哲学家)
贺卫方 (北京, 法学家)
莫少平 (北京, 律师)
陈子明 (北京, 学者)
张博树 (北京, 政治学家)
崔卫平 (北京, 学者)
何光沪 (宗教学专家)
郝 建 (北京, 学者)
沈敏骅 (浙江, 教授)
李大同 (北京, 记者)
栗宪庭 (北京, 艺术评论家)
张 鸣 (北京, 教授)
余 杰 (北京, 作家)
余世存 (北京, 作家)
秦 耕 (海南, 作家)
周 舷 (北京, 学者)
浦志强 (北京, 律师)
赵达功 (深圳, 作家)
姚立法 (湖北, 选举专家)
冯正虎 (上海, 学者)
周 劾 (北京, 作家)
杨恒均 (广州, 作家)
滕 虹 (北京, 法学博士)
蒋 壱文 (上海, 作家)
唯 色 (西藏, 作家)
马 波 (北京, 作家)
查建英 (北京, 作家)
胡发云 (湖北, 作家)
焦国标 (北京, 学者)
李公明 (广东, 教授)
赵 晖 (北京, 评论家)
- 李柏光 (北京, 法学博士)
傅国涌 (浙江, 作家)
马少方 (广东, 商人)
张 阖 (上海, 教授)
夏业良 (北京, 经济学家)
冉云飞 (四川, 学者)
廖亦武 (四川, 作家)
王 怡 (四川, 学者)
王晓渔 (上海, 学者)
苏元真 (浙江, 教授)
强剑衷 (南京, 老报人)
欧阳小戎 (云南, 诗人)
刘 荻 (北京, 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 (浙江, 记者)
周鸿陵 (北京, 社会活动家)
冯 刚 (浙江 教授)
陈 林 (广州 学者)
尹 贤 (甘肃, 诗人)
周 明 (浙江, 教授)
凌沧州 (北京, 新闻人)
铁 流 (北京, 作家)
陈奉孝 (山东, 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 (北京, 评论家)
张津郡 (广东, 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 (上海, 作家)
张善光 (湖南, 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 (湖南, 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 (湖南, 教师)
王小山 (北京, 媒体人)
范亚峰 (北京, 法学博士)
周明初 (浙江, 教授)
梁晓燕 (北京, 环保志愿者)
徐 晓 (北京, 作家)
陈 西 (贵州, 人权捍卫者)
赵 诚 (山西, 学者)
李元龙 (贵州, 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 (贵州, 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 (北京, 工程师)
陆中明 (陕西, 学者)
孟 煌 (北京, 画家)
林福武 (福建, 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 (贵州, 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 (吉林, 教师)
郭玉闪 (北京, 学者)

-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建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焯（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 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广州，编辑）
戚惠民（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零八宪章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豪（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签名规则：

- 1，本宪章为开放签名。
- 2，请用真名或常用笔名签名，并注明所在地和职业。
- 3、签名格式：姓名、当前所在省份、职业。如：张 XX（北京，作家）
- 4，签名信箱：
2008xianzhang@gmail.com
2008xianzhang2008@gmail.com

[注] 《零八宪章》被译成多种文字，英文版：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2210;>

<http://www.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press?revision%5fid=89851&item%5fid=85717>

德文版：

http://eu-china.net/web/cms/upload/pdf/materialien/rudolph_2009_charta_08.pdf

意大利文版：<http://www.charta77.org/08ch08cn/carta08.htm>

日文版和法文版：

[http://knol.google.com/k/-/08/3jhi1zdzvxj3f/9#08\(E6\)\(86\)\(B2\)\(E7\)\(AB\)\(A0\)\(28\)\(E6\)\(97\)\(A5\)\(E6\)\(9C\)\(AC\)\(E8\)\(AA\)\(9E\)\(E7\)\(89\)\(88\)\(29\)](http://knol.google.com/k/-/08/3jhi1zdzvxj3f/9#08(E6)(86)(B2)(E7)(AB)(A0)(28)(E6)(97)(A5)(E6)(9C)(AC)(E8)(AA)(9E)(E7)(89)(88)(29))

零八宪章 朝霞现象 (序)

吴弘达

这本书按理应该可以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因为《零八宪章》和书中所选列的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所有的文字和内容都平和而理性，应当是中共当局可以接受的。然而，这本书无法在大陆取得书号、获得印刷、出版及销售。恐怕主事人在编辑过程中，万一风声走漏，就要被国安带走，有可能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以往这类的例子太多，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逻辑推理。这本书如今在中国境外编辑出版，也许往国内邮寄都难以递达收件人手里。可以想见北京政府会说：“又是一本反华、反共的书刊。”

出版这本书是对《零八宪章》催生者和支持者的一种道义声援，中国境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被噤声，人身受到骚扰和威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被无故扣押达半年之久，至今渺无音信。他的妻子刘霞每天困守北京家中，等待被通知带领着去见她的丈夫一面。等待，这不仅是一位异议分子妻子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宿命。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免于恐惧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呢？

营救刘晓波是责无旁贷的事，无论如何，他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人，没有理由扣押他。即使今天他被释放了，我们也会出版这本书。

首先它是一份历史的记录，记录了 2008 和 2009 年之交，在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出现了这样的氛围和气势，人们摆脱了恐惧的枷锁，敢于思考和言说中国的未来。第一批就有 303 名连署人，俗话说，这些人是“豁出去”了。刘晓波先生被拘捕囚禁之后，那三百多同道人都勇敢地顶住一切威胁和骚扰。有些人甚至心中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二十一世纪

的今天，堂堂大国的公民只为了表达了自己关心国家前途的走向，就有被投入黑牢的危险，这是怎样的一种反讽性的“不和谐”？北京当局也在焦虑策划和观望之中，这好比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骨头，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不论今天“改革”的花样如何变化多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多令人惊叹，外汇存底多么丰厚，大家依然知道中共党员今天再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了，他们大都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有办法的人早把国家资产变花样弄成个人的私人资产了。今天入党的有几个是为了“革命事业”准备“牺牲”自我的？然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仍然坚持着“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这样老掉牙的教条主义。

官方还供养着一批能说会写的“食客”，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使别人相信“共产党是讲民主的，可以改革的，应该相信共产党”，还说中国的共产党自有特色，不同于苏联、东欧那些过气了的党。总之，中国共产党将通过“改革”永存于世。

就在北京政府落入意识形态不上不下的尴尬时刻，《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应运而生。官方在思想上显然落后于民间，在应变上又只能采取老一套的关、管、押的方式。不仅引得内部民怨四起，也弄得自己在国际上灰头土脸，光看刘晓波被关押以来，国际上浪潮一般的抗议和各种奖项纷来沓至，就知道北京进退维谷，喉咙里那根骨头有多令人难受。

《零八宪章》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潮流，也是当今中国知识界成熟的象征，就如朝霞一般，它是一种现象，不再是用打压和威慑的方式就能压制下去的。如果当局不能容忍，要予以封杀，这恐怕不仅是逆历史而行，也是违反自然规律，其后果必然以失败告终。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

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布拉格—1977年1月，我有幸属于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组成的团体发表了《七七宪章》。那份文件是我们对国家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呼吁。它也阐明了我们作为公民有责任通过跟政府的合作、并且通过我们的监督来保护我们的基本权利的一个信念。

我们并不想要通过《七七宪章》的公布成立一个会员组织。我们要成立的是，正如我当时写道：“一个自由的，非正式和公开的，由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信念，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这群人由一种为了尊重我国和世界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个人和集体的努力组成的意愿而团结在一起。”

三十多年后的2008年12月，一群中国公民以我们的卑微的努力为楷模，做出了对人权，对良好的政府，以及尊重公民监督政府的责任的类似诉求——来确保他们的国家按照一个现代的开放社会的规则行事。

他们发表的这份文件令人印象深刻。《零八宪章》的作者要求保护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的独立性和代议制民主。但他们没有停留在这些诉求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认识到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意味着比保护基本权利更多的内容。在这一点上，《零八宪章》的联署人明智地呼吁更好的环境保护，消除城乡差异，要求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过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和解的严肃努力。

最初的300多名联署人来自全中国的各行各业，这表明“宪章”所提出的观点有着广泛的支持度。这些最初的联署人包括中国最优秀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文化艺术家和律师等。他们决定

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行为一定没有被轻视，他们的言论也不应被粗暴地撇在一边。自从“宪章”公布之后，已经有 5000 多人加入了支持“宪章”的行列。

2008 年的中国不是 1977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许多方面，今天的中国比 30 年前的我的国家要自由和开放。但是，中国政府对《零八宪章》的反应和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的反应极为相似。

对于我们所表达的和政府对话和辩论的愿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报之以镇压。我们的政府逮捕了一些联署人，讯问和骚扰了其他的联署人，并且传播对我们的运动和目标的不实之词。

同样地，中国政府至今仍拒绝与《零八宪章》联署人进行对其观点的讨论。相反地，政府拘捕了两位联署人刘晓波和张祖桦。这两个人被政府认定为宪章的主要操作者。张已经被释放，但是，刘，一位著名的作家学者，还在被毫无理由地关押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还有其它几十人被讯问，更多的人，当他们在为他们被关的同志打电话或发邮件时被国家的安全机关严密地监视着。《七七宪章》公布之后，我以“触犯共和国的基本原则的严重罪行”被逮捕。今天，又很多人担心，刘晓波先生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个同样任意的罪名，被起诉。

我对这一事件的发展方向感到悲哀。在此，我向还没有机会见到其丈夫的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表达我的关切。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只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显示北京已经从《七七宪章》的经历中学到了教训。

注：哈维尔是前捷克共和国总统，《七七宪章》的主要发起人。

本文英文原文刊于华尔街日报 2008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unmadeinchina.org/contStd.asp?lang=en&idPag=594>

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 《零八宪章》的声明

日前，国内 300 多名各界人士发布了《零八宪章》，就中国的国事及走向作出全面的建设性宣示。我们注意到，此宪章的签署者涵盖中国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自由人士、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和草根维权人士，是近年罕见的民间政见之集合性表达，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之觉醒、勇气之提升和力量之壮大。作为海外各界华人，我们为之一振。

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于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

对此，我们深表钦佩，对宪章之各项主张深表赞同。

近三十年来，中共官方一改给中华民族带来诸多灾难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还公民以部分自由，由此造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宽慰。但在政治上，当局依旧坚持专制，垄断新闻，控制司法，各种社会利益无法正常表达，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至于腐败盛行，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环境坏毁，公正不彰，社会冲突不断，暴力事件时有所闻，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堪忧。因此，我们又深感不安。

值此世纪之初，回首百年中华现代历程，其中之歧误挫折和奋斗牺牲，我们有诸多感喟。对“宪章”所言“自由不昌，则中国距现代文明尚远矣”，深以为然。如何汲取教益，把握时机，让中华民族能在本世纪迈上现代文明的康庄之路，于内达成社会安祥，族群和睦，人民幸福；对外主持正义，于人类福祉有所贡献。这既取决于新兴的公民社会之努

力，亦有赖于执政者的远见智识，能否适时开启社会对话之门，加速制度更新；振衰起弊，清明司法，还政于民，以期化戾气为祥和，消祸乱于潜隐，为民族的良性发展奠定不倾之基趾。

在此，我们特发表声明，以示我们对国内各位公民先进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华人各界与国际社会给与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倾听社会之呼声，正视民意，从善如流，启动“宪章”所倡言的制度改革。

如此，则人民幸矣，民族幸矣，世界亦幸矣。

海外签名名单：（第一批 58 人，以姓名字母为序）

蔡咏梅（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	齐 墨（德国，报人）
陈奎德（美国，《纵览中国》主编）	邱跃首（澳洲，中国和解智库海外联络人）
陈小平（美国，《中国法律文摘》主编）	萨 冲（义大利，工程师）
陈 彦（法国，巴黎大学博士）	邵 江（英国，西敏寺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陈一咨（美国，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盛 雪（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住校作家）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司徒华（香港，支联会主席）
程晓农（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宋永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程映虹（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苏 炳（美国，耶鲁大学学者）
方励之（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苏晓康（美国，作家）
冯爱玲（香港，支联会）	孙 丰（法国，作家）
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万润南（美国，前四通公司总裁）
傅希秋（美国，宗教学者）	王 丹（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高文谦（美国，中国现代史学者）	王军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龚小夏（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王书君（旅美中国现代史学者）
郭罗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	王天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哈 金（美国，作家）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何清涟（美国，经济学者）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
胡 平（美国，《北京之春》主编）	夏 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金 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	项小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
康正果（美国，耶鲁大学学者）	萧振仪（香港，媒体工作者）
孔捷生（美国，作家）	余英时（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得主，普林斯顿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
李进进（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博士）	严家祺（美国，学者）
廖天琪（美国，劳改基金会主任，编辑）	杨建利（美国，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
刘慧卿（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副主席）	
麦燕庭（香港，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潘嘉伟（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行秘书）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杨力宇 (美国, 西东大学资深教授)	Bull Tsang Kin Shing
张 濬 (美国, 中研院院士)	KiKi Wong
张郎郎 (美国, 作家)	Joe Choi
张 炜 (英国, 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Damien Koon, IT Business
张伟国 (美国, 《动向》主编)	Development, Hong Kong
张 伦 (法国, 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	李泽敏 (香港, 工程师)
郑宇硕 (香港, 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章 段
郑 义 (美国,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梁建文 (香港工程师)
钟祖康 (挪威, 作家)	黄杰芝 (香港, 家庭主妇)
(第 2 批)	Chu Tai Wai
香港	Chiu On-Chi
李卓人 (立法会议员, 支联会副主席, 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	Yau Wai Ho David
蔡耀昌 (支联会副主席, 香港民主动力召集人)	Debby Chan
何俊仁 (立法会议员, 支联会秘书香港民主党主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	Or Yan Yan
张文光 (立法会议员, 支联会常委,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会长)	Kelvin Sit
梁耀忠 (立法会议员, 支联会常委, 街坊工友服务处执行委员)	Josephine Tsang
梁国雄 (立法会议员, 支联会常委, 社会民主连线)	Vik Vhan
郑家富 (立法会议员, 支联会常委)	Lo Wing-lok
徐汉光 (支联会常委,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组织部主任)	Bosco Wong
梁国华 (支联会常委)	Ricky Wong
李耀基 (支联会常委)	Stefan Ma
叶楚茵 (支联会常委)	Tommy Ho Chi Chung
关振邦 (支联会常委)	Hardys Kimying
黎丽霞 (支联会常委)	Eric Lai Yan Ho
黄志强 (支联会常委)	Chow Kit Wai
麦海华 (支联会常委)	Au Nok Hin
陶君行 (支联会常委, 社会民主连线)	Allen Xie
张锦雄 (支联会常委)	黄十三
朱耀明 (支联会常委)	Skyworld Natalie
吴淑美	Law Siu Hin
李锐华	Joty Mak
陈咏娟	Manyin Lai
Charles Mok	Annie Yip
Mau Chi Wang	Fredrik Fan
	Chan Yun Nam
	Timothy Wong Shing Yip
	Freeman Rebuildhk
	Tanya Lau
	Mau Chi Wang
	美国
	徐文立 (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赵晓明 (美国, 学者)
	刘洪彬 (诗人)

零八宪章 •

一 平 (诗人, 编辑)	老大卫 (自由撰稿人)
苏珠琴 (翻译员)	汪师东 (商人)
陶 君	阿 木 (自由撰稿人)
吴弘达 (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	郑 裕 (电子工程师)
K. Donahoe (Assistant Director of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林紫洪 (商人)
Nicole Kempton (Program Director of Laogai Museum)	阮 杰 (民运人士)
Magan (Program Associat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高 健 (独立知识分子)
Christie Moon (Program Associat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余世新 (民运人士)
Tom Cheong (Editor,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张伟强 (民运人士)
杨莉藜 (《观察》主编)	梁友灿 (民运人士)
孙长虹 (《观察》编辑)	齐家贞 (自由撰稿人)
殷珏华 (《观察》技术员)	张晓刚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
古 原 (《观察》编辑)	吕 易
吴仁华 (学者编辑)	李治雄
德国	赵东明
彭小明 (全德学联主席)	陈 光
潘永忠 (民阵秘书长)	陈 虹
澳大利亚	李 娟
	武博晗
	新加坡
	刘 欣 (律师)
	瑞典
	茉 莉 (教师)
	傅正明 (学者)

[注]此声明和第一批签名的 58 人名单发表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海外网站。第二批的签名有很多不同版本 (440 人/984 人)，这里收入的只是其中之一。接着还有十数批签名。至本书截稿时 (5 月 4 日)，签名人数已达 8600。

捷克人权奖颁奖词

[注] “一个世界”（one world）电影节是捷克每年春季的重要文化活动项目。它同时配合颁发一个人权奖项 Homo Homini（人与人）。2009年3月11日，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将本届的奖颁发给因《零八宪章》系狱的刘晓波，由来自北京的徐友渔、莫少平、崔卫平三位文化人代为领奖。

每年，我们（People in Need）都会将 Homo Homini 奖颁给那些为人权、民主事业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

08年度的 Homo Homini 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一位系狱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抗议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其他签署者与刘晓波先生一同获奖）。

我们将 Homo Homini 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先生，是对他30年来为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作的富有洞见力的工作，以及他以坚韧和勇气为表达自由所做的抗争的一种承认。刘晓波是组织发起《零八宪章》的几百名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是逐步成长的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式人物。在中国政府持续的政治迫害下，争取民主的活动一直以来在坚持对话和非暴力原则下运行着。

尽管刘晓波几十年来数次入狱，并长期生活在秘密警察的严格监控之中，他从未远离他的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战友们。刘晓波先生一直以来坚持自由地言说与写作，表达他对人权、非暴力解决冲突等普世价值的忠诚信仰。不仅如此，刘晓波先生在呼吁城乡居民的平等对待、更加彻底的环境保护等问题上的努力也应得到特别的赞许。

“在我国总理和部长们与他们的欧盟同事开会磋商之际，在中国政府计划于布拉格举行欧中峰会的时候，我们强烈呼吁捷克政府关注并提

出释放刘晓波的问题，”西蒙潘内克说道，潘内克先生是“People in Need”基金会创始人兼执行长官，捷克天鹅绒革命时期的学生领袖。“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欧中峰会能够计划于捷克共和国举行，我们希望这座美丽的城市能够因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带给欧盟和中国（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灵感，找到应对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办法，惠泽全球。同时，在一个我们纪念我国和东欧诸地区实现向自由和民主和平转型 20 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无法忘记那些仅仅是公开表达自己观点、以和平方式寻求与政府对话的中国政治抗议者的现实处境和命运。如果欧中峰会能够在布拉格——这座正在纪念天鹅绒革命 20 周年的城池——举行，峰会将会在一个奇妙的环境下进行，如果会议能够以释放刘晓波这个议题开始，它将取得更加富有建设性的成果。”潘内克先生下结论说。

2008 年 12 月，刘晓波被逮捕并被中国警方转移到一个不明地点关押，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合法程序可言。他的被逮捕发生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普世人权公约》60 周年纪念日两天前。纪念日那一天，一群中国政治抗议者发布了一个叫做《零八宪章》的文件，这个文件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有着同样的精神诉求。就像《七七宪章》那样，《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权力当局遵守法律，要求现行政治制度和中国宪法作出改变以确保基本人权和民主。在捷克共和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将 Homo Homini 奖授予一位清晰诠释《七七宪章》运动精神的个人，此事的深远影响与重要意义定会在曾经以及正在生活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中间传播。

《零八宪章》所要求的宪法和制度上的变革可能会影响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上千的《零八宪章》签署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遭到了中国当局的迫害和骚扰，他们发现自己的遭遇和 30 年前的捷克宪章派何其相似。因此，本年度 Homo Homini 奖的获奖人选也应该被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选择，即对那些展示了极大勇气、愿意承担很大个人风险去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们的支持。

在人权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瓦茨拉夫·哈维尔 (Vaclav Havel)

(布拉格, 2009年3月11日)

恭贺今年 Homo Homini 奖的获得者, 我很高兴他们来自中国。在此, 请允许我讲几句话。

首先, 我要代表大多数七七宪章的签署者表示, 我们大家都对七七宪章除能激励中国的《零八宪章》深感高兴和荣幸。

其次, 我想再次指出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中国朋友似应尝试采取此或彼的种种方式。经验表明, 採取一种方式绝无可能成功, 可能无法应对明天、后天或十年后变化的情势。或许就永远不能。如果这就是你所面对并处理的情势, 你将走不了很远。然而, 依我们的经验, 其实最终并不需要付出如此代价。我们发现, 这种状况的是有可能改变的。虽然, 素被嘲笑的唐·吉柯德, 不改初衷, 坚持到底, 其努力也终身未果。然而我相信事情绝不会如此。特别地, 绝望与希望其实都是存在的。一方面, 我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终结, 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事实上会有一个好的终结。

第三, 这是我们的经验——也许更进一步, 是对我们队伍的呼吁——国际团结非常重要、极富价值。它帮助我们, 即使仅仅是鼓励, 也比单单是论证更有说服力。我们都具有在极权制度和独裁统治下的第一手经历, 因而我们有责任去帮助那些还未曾享有自由的人。

最后, 我想表达个人的谢忱, 获奖者的光临以及我的发言稿的翻译、分发, 以使他们得以分享, 都令我深为感动。谢谢!

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徐友渔

尊敬的 People in Need 的代表先生，
尊敬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
尊敬的外交部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部长，
女士们、先生们，
朋友们：

我们感谢 People in Need 把 2008 年度的“人与人”(Homo Homini) 奖授予《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这对于因为签署宪章而受到压制的人，对于一切坚持合法权利的中国人，对于因为参与征集签名活动而被警察拘押至今的刘晓波博士，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刘晓波博士长期坚持自己的人权、民主信念，为此付出多次入狱的代价，我们现在代他来领奖，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光荣。

不同的人对于《零八宪章》的含义和意义的理解会有差异，对于宪章的签署者而言，最基本的共识是：宪章重申了我们关于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其实，这些价值和目标在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在中国签字、批准的一系列联合国公约和宣言中也得到了明确的宣示。我们所呼吁和要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它们，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

人们注意到了《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在基本精神方面的一致。是的，我们从上世纪 7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激励和启示。两个宪章的一致之处来源于两个国家处于相同类型的专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

相似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也来源于相同的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义务和压力。

和《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在后极权时代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我们坚持，保障公民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是政府的首要责任，如果政府没有尽到这种责任，甚至一贯地、制度性地侵犯和损害公民的自由、尊严和权利，那么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保和自利。

和《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不是政治反对派的宣言，我们既有批判精神，更有建设性态度，我们关注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我们摈弃传统政治思维中着眼于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做法。我们极尽全力争取与政府对话，在这方面，等待和劝戒是必要的，我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耐心。

发表《零八宪章》的意图和目的是寻求和解与共识，而不是制造对抗。中国的无权者在争取权利的时候，并不把掌权者的任何失败和挫折都当成自己的胜利，宪章签署者的道德感和责任心远远高于现在的掌权者、过去的革命者。自古以来，中国想掌权的人都把对社会的损害当成对现存政权的削弱和损害，他们以制造动乱、冲突和仇恨来到达自己的目的。签署宪章表明我们与那种做法格格不入，因为损害社会就是损害我们自己。尽管宪章的签署者受到了骚扰、威胁和压制，但我们决不会放弃理性与和平的行为方式。

中国人从 100 多年前就开始追求宪政民主的目标，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缺乏自由元素，由于内忧外患不断，由于主要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力量习惯于以武力而不是协商和妥协解决问题，我们的成就少于挫折、失败与倒退。现在，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面临新的、复杂的局势。斯大林主义没有寿终正寝，它企图利用市场经济来延续生命，二者的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一个怪胎，全世界的资本都在为它输血。不少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把 GDP 数字等同于政治权力的

合法性。如果说，30 多年前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压迫的主要形式表现在政治方面，那么，现在中国的无权者既要争取政治权利，又要争取社会公正，争取各种社会和经济权利。《零八宪章》的核心诉求是人权，它涵盖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权利，涵盖了不同地位、职业、民族、性别，具有不同信仰和不同遭遇的人的合法要求。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我们对于中国的人权和宪政民主仍然充满信心。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宪政民主事业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但是，它同时也是当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就像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与扩张一样，信息和新的理念也在跨越国界快速传播。《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和全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关注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处于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中的我们对来自捷克人民的关注与支持将永远铭记于心，我们也以同等的热情关注你们的进步。

谢谢大家！

2009 年 3 月 11 日

达赖喇嘛的声明

在世界人权宣言届满 60 周年之际，中国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农民和律师共同发起了《零八宪章》，表达了他们渴望政治、法律和宪政改良的愿望。这让我深受感动与鼓舞。

我个人认为，胡锦涛主席提倡的和谐社会，是值得称赞的，能够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足够的空间，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理念。和谐社会建立的唯一条件，就是相信民众，使他们不再恐惧，真正地实现言论自由，法治和平等。

我愿敦促中国领导人，以文明的方式，去考虑努力建立社会的统一和稳定。

我也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维权人士，包括胡佳在内的，因为表达言论自由而被拘捕的良心犯。

达赖喇嘛

2008 年 12 月 12 日

国际各界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要求释放刘晓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
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我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法律界人士和人权工作者。我们特此给您写信，是为了表达我们对遭受任意羁押的文学批评家、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先生的极度关切。

刘晓波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位倍受尊崇的学者文人。12月8日晚，他被警察从北京的家中带走。警察随后对他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搜查，抄走了他的电脑、手机、书籍和他的大部分作品。

至今为止，警方还没有给出羁押刘先生的任何法律依据。警察机关未能在中国法律规定的时限内通知刘先生的家属或律师他被羁押的地点和理由。这是明显的违法执法。

由于刘先生的被羁押发生在《零八宪章》公布前夜，又由于警方在羁押刘先生的同时，也传唤或训问了其他几位《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我们推测刘先生被羁押仅仅是因为他行使了中国宪法及国际法所保障的表达言论的自由，因为《零八宪章》不外乎倡导和平推动中国的人权保护和民主进程。

刘先生的活动从来都是和平和依法的。尽管他曾经两度因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被任意关押数年，但他从来没有被判定为有罪。近年来，刘先生针砭中国时弊、推动人权民主的文章广泛传播，刘先生的声誉也由

此日渐增长。刘先生历来反对诉诸暴力。在他的文章中，刘先生赞扬过修改中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以保护和尊重人权和财产权，他也多次认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您自己经常承诺要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最近，您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因此，我们敦促您信守自己对保障中国公民表达他们对公共事务意见的权利的承诺。

要让国际社会认真看待中国经常提到的对人权和法治的承诺，要让中国公民相信中国的司法机关能合理地伸张他们的冤屈、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没有人仅仅因为他们和平地表达观点而被关押和骚扰。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各级司法机关要停止使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律条款来迫害像刘晓波这样的通过和平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异见者，并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Edoardo Albinati

Writer

Italy

Elisabeth Allès

Director, 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France

Vincenzo Balzan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Geremie R. Barmé

Federation Fellow, College of Asian &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Robbie Barnett

Professor of Tibetan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Richard Baum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USA

Jean-Philippe Béja

Senior Researcher, CNRS/CERI Paris,

CEFC

Hong Kong

Robert Benewick

Emeritus Professor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Sussex, UK

Gregor Benton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Archeology
Cardiff University
Wales
UK

Bernard Bernie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Canada

Robert Bernstein
Founding Chair, Human Rights Watch
USA

Thomas P. Bernstein
Professor Emeritus,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Igor Blazevic
Director, One World Human Rights
Film Festival
Czech Republic
Board of International Pen

Jiri Grusa,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PEN

Eugene Schoulgin,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International PEN

Cecilia Balcazar, Board Member

Mike Butscher, Board Member

Takeaki Hori, Board Member
Eric Lax, Board Member

Yang Lian, Board Member
Mohamed Magani, Board Member

Kristin Schnider, Board Member

Karin Clark, Chair International PEN's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UK

Michel Bonnin
Professor, 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France

Anna Bravo
Historian
Turin University
Italy

Alessandra Brezzi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Urbino
Italy

Vincent Brossel
Head of Asia-Pacific Desk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Jean-Pierre Cabestan
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Claude Cadart
Researcher (Retired)
CNRS/CERI Sciences-Po, Paris
France

William A. Callahan
Chai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Co-Director, 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La Sapienza University, Rome Italy
Anita Chan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Jerome A. Cohen NYU School of Law USA
Gordon G. Chang Writer USA	Patrizia Dad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La Sapienza University, Rome Italy
Kristen Cheney Assistant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Dayton USA	Gloria Davies Convenor of Chinese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Joseph Che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Hong Kong	Michael C. Davis Professor of Law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eng Yingxiang Researcher (Retired) CNRS/CERI Sciences-Po, Paris France	Sara L.M. Davis Executive director Asia Catalyst USA
Leïla Choukroun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aw HEC Paris School of Management France	Bob Dietz Asia Program Coordinator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USA
Martin Chung Lecturer, School of Arts, Letters and Sciences Macao Inter-University Institute Macao	Jean-Luc Domenach Senior Researcher CERI-Sciences-Po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s), Paris France
Marcello Cini Physicist Professor Emeritus	Michael W. Dowdle Faculty of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ami USA	Marcello Flores Professor, Comparative History University of Siena Italy
Ryan Dunch Associate Professor, History and Classics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Christine Fréchette Coordonnatrice Chaire d'étud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américaines (CÉPÉA) Montréal, Canada
Umberto Eco Professor of Semiology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Edward Friedman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USA
Richard Louis Edmonds Visiting Professor in the Committee on Geographical Studies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Matilde Callari Galli Department Chair, Education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Fang Lizhi Professor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Anna Maria Gentil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History Alma Mater Studiorum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Feng Chongyi Deputy Director, Chin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	Carlo Ginzburg Professor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of Pisa Italy
Ernesto Ferrero Writer,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of Turin Italy	Andre Glucksmann Philosopher France
Eric Florence Researcher, Centre for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iege, Belgium	Merle Goldman Professor Emerita Boston University USA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Richard J. Goldstone Former Justi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South Africa. Learned Hand Visiting ProfessorHarvard Law School USA	Sociales Paris France
Nadine Gordimer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South Africa	Marie Holzman Writer and sinologist France
Lars Grahn Book publisher, retired Sweden	Sharon Hom Executive Direct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USA
Andrea Graziosi Professor, Contemporary History Federico II University, Naples Italy	Jean-François Huchet Director French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Hong Kong
Giles Gunn Professor and Chair,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Bruce Jacobs Professor Asian Languages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Tyrell Haberkorn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Program Colgate University USA	Jean-François Julliard Secretary General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France
Carol Hayman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ustin Community College USA	Lucina Kathmann International Vice-President, International PEN Novelist and essayist Mexico
Seamus Heaney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Ireland	Willem E.C. Van Kemenade Visiting Senior Fellow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Donald Holzman Professor Emeritu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Wendy Keys Filmmaker, USA Hari Kunzru

Writer, U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Jeri Laber Consultant to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USA	Lin Xiling Former Rightist France
Andre Laliber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Perry Link Chancellorial Chair for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Willy Lam Professor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apan	Dimon Liu Woodrow Wilson Visiting Fellow, The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USA
Alessandra Lavagnino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lan Italy	Stanley Lubman Lecturer in Resid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chool of Law USA
Marc Lazar Professor Sciences-Po 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Paris Luiss University, Rome Italy	Richard Madse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Joanne Leedom-Ackerman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PEN USA	Alessandro Marzo Magno Writer Italy
Steven I. Levine Associate Director,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Center University of Montana USA	Victor H. Mair Professor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Xiaorong Li Senior researcher,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 and Public Policy	James Mann Author-in-residenc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SA Barrett L. McCormick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Marquette University, USA

Françoise Mengin
Senior Researcher
CERI-Sciences-Po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s), Paris
France

Alice Lyman Miller
Research fellow,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Andrew Miller
Senior Editor, Alfred A. Knopf
USA

Marina Miranda
Associate Professor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La Sapienza University, Rome
Italy

Olivier Mongin
Directeur de la revue Esprit
France

Marc-Olivier Padis
Rédacteur en chef de la revue Esprit
France

Ronald N. Montaperto
Consultant on Asian Affairs
North Carolina, USA

Robin Munro
Research Associate, Law Dept, SOAS
UK

Andrew J. Nathan
Class of 1919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Barry Naughton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Valerie Niquet
Director, Asia Centr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FRI)
France

Giorgio Parisi
Professor of Theoretical Physics
La Sapienza University, Rome
Foreign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Italy

Enrico Parlato
Associate Professor
La Tuscia University
Italy

Pia Pera
Writer
Italy

Martyne Perrot
Researcher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France

Roberta Pierobon
Attorney
Italy

Eva Pils
Assistant Professor, Hong Kong

Anemone Platz
Associate Professor, Asian Section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Karoline Postel-Vinay
Senior Researcher
CERI-Sciences-PO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s), Paris
France

Benjamin L. Read
Assistant Professor
Polit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Maria Rita Masci,
Literary translator
Italy

Arthur Rosenbaum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USA

Kenneth Roth
Executive Director
Human Rights Watch
USA

Elisa Rotino
Lecturer i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Far East
Università L'Orientale, Naples
Italy

Salman Rushdie
Author
USA

Victoria Sanfor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Lehman College and The Graduate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Éric Sautedé
Lecturer
School of Management, Leadership
and Government
Macao Inter-University Institute
Macao

Patricia Scott Schroeder
President and CEO,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USA

Jonathan Schwartz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Director of Asian Studi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Paltz
USA

James C. Scott
Sterli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USA

Jacques Seurre
Sinologist
Agence France Presse
France

James Seymour
Honorary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sering Shakya
Canadian Research Chair on Relig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Asia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Canada
Satoru Shinomiya
Professor of Law
Waseda Law School
Japan

Susan L. Shi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Joel Simon
Executive Director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USA

Gianni Sofri
Professor
Università di Bologna
Italy

Dorothy J. Solinger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Yongyi Song
Associate Professor/Libraria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Wole Soyinka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Nigeria

Elliot Sperling
Indiana University, USA

Leslie E. Spensel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

Christine Stufferin
President, Alex Langer Foundation

Italy
Su Xiaokang
Chinese writer in exile
USA

Frederick C. Teiwes
Emeritus Professor of Chinese Politics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Stig Thøgersen
Professor of China Studies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Emilie Tran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Steve Tsang
Reader i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UK

Toshiro Ueyanagi
Professor of Law
Waseda Law School
Japan

Jonathan Unger
Professor and Head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Peter Van Ness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零八宪章 •

Sebastian Veg Researcher CEFC (French Centre of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Hong Kong	Richard A. Wilson Gladstein Distinguished Chair in Human Rights Director Human Right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USA
Sandro Veronesi Writer Italy	Wendy Wolf Editorial director, nonfiction Viking Penguin USA
Wan Yanhai Director Beijing Aizhixing Institute China	Dr. Guoguang Wu Chair in China and Asia-Pacific Relations Centre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Jeffrey Wasserstrom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Yu Maochun Professor of East Asia and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USA
Martin K. Whyt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Francesco Zamponi Researcher CNRS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 France
Calla Wiemer Visiting Schola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Sam Zarifi Director, Asia-Pacific Regi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UK
Leon Wieseltier Literary editor, The New Republic USA	Kate Zho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Hawaii USA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USA	

2008 年 12 月 23 日

<http://www.canyu.org/n4695c6.aspx>

世界各国三百多作家联署要求释放刘晓波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世界各地笔会的三百多位作家签名抗议继续关押著名异议作家、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呼吁书及签名名单将公布在国际笔会网站，并通过“紧急行动网络”发给各笔会。如果可能的话，请各笔会将呼吁书的副本寄送给各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并向自己国家的新闻界告急。签名名单将一直添加到1月23日星期五之前——未签而希望签名的笔会成员请寄 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使用中文者寄到 wipc@comhem.se）。请不要忘记写上自己所属的笔会，否则无法确认身份。晚于1月23日的名单将不添入国际笔会网，当然可以被录入各笔会自己的网络或所属国的新闻媒体上。

推荐行动

向中国大使馆发出呼吁：

如果可能的话，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推荐你将呼吁请愿书寄、或亲自递交给你所属国的中国大使馆，要求他们转交给中国当局并欢迎任何评论。

写信给新闻界：

强烈要求笔会成员写信给各自所属国的报纸，表达对于中国事件的警讯，围绕刘晓波的案例说明该国多年来的打压情况。

文宣：

鼓励各笔会在各自的国家里发表请愿书、通过自己的网络或寄给当地新闻界，大量散布信息，也许因此可以扩大、修改签名名单。

文件附录

声明和签名名单：

请知各笔会，国际笔会已努力把对新闻媒体或有吸引力的最著名作家名字放在名单前列，当然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学、以及各地区的签名情况，因此鼓励各笔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审定、修改名单。

新闻发布：

鼓励各笔会依据所属国的需要编写新闻稿。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 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以下为新闻发布稿

国际笔会三百多作家联署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2009 年 1 月 20 日讯) 国际笔会于昨日发布新闻稿和一份世界各地笔会三百多作家联署的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继续关押著名异议作家、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要求立即释

放他及所有因言获罪者。联署者包括世界著名作家索因卡、库切、拉什迪、埃科、爱特伍德、麦克尤恩、纳菲西、斯托帕德、阿尔比、阿里德吉斯、奥斯特、艾克鹏、德里罗、达菲、法西、哈伍德、弗雷恩、翁达杰、韦斯特贝里、张戎、哈金等，以国际笔会会长格鲁沙为首的理事会全体成员，副会长、前任会长，以及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英国笔会、日本笔会、澳洲悉尼笔会等 17 个各国笔会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副会长江棋生和巫一毛等 80 多位会员参加了联署。世界各地更多笔会的作家将加入联署，以继续表达国际笔会会员中国当局继续公然打压对《零八宪章》赞同者的，敦促保护所有签署者不再遭到骚扰。

国际笔会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说：“刘晓波作为呼吁更大言论自由和民主的《零八宪章》最初签署者之一被捕和继续关押，显示了对中国人民继续加以限制的程度。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

新闻稿表示，国际笔会多年来一直极为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那里有大量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因呼吁改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遭骚扰、拘押和监禁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仍无改观。笔会也严重关注监狱状况、疾病、医疗及家人探访。2008 年北京奥运会突显了中国人权及言论自由的继续受害，尽管中国当局曾承诺改善这些状况，并遵守它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奥运会结束五个月后，国际注意力转向别处，笔会仍继续致力为那些行使言论权而正遭受迫害的作家呼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有 40 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正在监狱中，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作家监禁者。徒刑从 3 年到 20 年不等，多数案子刑期超过八年。笔会特别网络作家被关押的案例上升，一般以颠覆和国家秘密的法律加以监禁——著名的有师涛因电邮一份有关政府简报会的笔记就以“泄露国家秘密”正在服十年徒刑。少数民族问题是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关键关注，那里的分离主义斗争将作家置于危险境地。

国际笔会对刘晓波的最初支持起于 20 年前的 1989 年，当时他是被政府贴上“北京黑手”标签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因他们天安门广场抗议中的角色而被捕。由那时起，他在监狱中总共度过了五年，包括在

1996 年结束的三年劳教，并且经常遭到短期拘捕、骚扰和监控。刘晓波目前被“监视居住”关押在北京不明之处，罪名不知。

国际笔会抗议继续监禁杰出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

2009 年 1 月 19 日

我们以下签名者支持国际笔会——成员遍布 100 多个国家的作家世界联合体的呼吁，要求释放著名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和现任理事刘晓波，他因签署一份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宣言《零八宪章》自 2008 年 12 月 8 日被拘押至今。刘晓波以“监视居住”的待审方式被关押在北京不明之处，罪名不知。

在发布一封要求全国人大会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启动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宣言《零八宪章》后，刘晓波是大量遭拘押或骚扰的异议人士之一。这些活动构成纪念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周年的一部分，而目前已有一千多位学者、新闻工作者、自由作家和活动人士联署了《零八宪章》。国际笔会担忧对《零八宪章》赞同者的公然打压，敦促保护所有签署者不再遭到骚扰。

国际笔会认为，刘晓波被关押仅由于和平行使自由表达权，因此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第 35 条。国际笔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以及所有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在中国遭拘押的人。

联署人：

阿尔比（Edward Albee, 美国笔会）
阿里德吉斯（Homero Aridjis, 国际笔会名誉会长）
爱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国际笔会副会长）
奥斯特（Paul Auster, 美国笔会）
艾克鹏勋爵（Alan Ayckbourn, CBE,

国际笔会顾问）
张戎（Jung Chang, 独立中文笔会）
库切（J. M. Coetzee, 国际笔会副会长）
德里罗（Don DeLillo, 美国笔会）
达菲勋爵（Carol Ann Duffy OBE, CBE, 国际笔会顾问）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埃科 (Umberto Eco, 美国笔会)
麦克尤恩勋爵 (Ian McEwan CBE, 国际笔会顾问)
法西勋爵 (Moris Farhi MBE, 国际笔会副会长)
弗雷恩 (Michael Frayn, 英国笔会)
黑尔爵士 (Sir David Hare, 国际笔会顾问)
哈伍德勋爵 (Ronald Harwood CBE, 国际笔会副会长)
哈金 (Ha Jin, 美国笔会)
马建 (Ma Jian, 独立中文笔会)
纳菲西 (Azar Nafisi, 国际笔会顾问)
翁达杰 (Michael Ondatje, 加拿大笔会)
索因卡 (Wole Soyinka, 美国笔会)
斯托帕德爵士 (Sir Tom Stoppard OM, CBE, 国际笔会顾问)
拉什迪勋爵 (Salman Rushdie, CBE, 美国笔会)
韦斯特贝里 (Per Wästberg, 国际笔会名誉会长)
郑义 (Zheng Yi, 独立中文笔会)

国际笔会理事会

伊利·格鲁沙 (Jiří Gruša, 会长)
尤金·舒尔金 (Eugene Schoulgren, 秘书长)
埃立克·拉克斯 (Eric Lax, 司库)
卡琳·克拉克 (Karin Clark, 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迈克·布彻 (Mike Butscher)
塞西莉娅·巴尔卡萨 (Cecilia Balcazar)
杨炼 (Yang Lian)
穆罕默德·麦格尼 (Mohamed Magani)
克里丝汀·舒尼 德 (Kristin T. Schnider)
哈隆·斯迪奎 (Haroon Siddiqui)
崛武昭 (Hori Takeaki)

名誉会长

特瑞·卡尔伯姆 (Terry Carlstrom)

国际笔会副会长

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 (Joanne Leedom-Ackerman)
卢西娜·卡斯曼 (Lucina Kathmann)
鲍里斯·诺瓦克 (Boris A. Novak)
葛洛莉亚·瓜迪亚 (Gloria Guardia)

阿德莱德笔会

Miriel Lenore
Dominique Wilson

美国笔会

Siri Hustvedt
Ron Chernow
K. Anthony Appiah
Francine Prose
Rick Moody

奥地利笔会

顾彬 (Wolfgang Kubin)

加拿大笔会

Alison Gordon
Marian Botsford Fraser
Camilla Gibb
Reza Beraheni
Charles Foran
Sandra Martin
Martha Butterfield
Susan Coyne
Graeme Gibson
Louise Dennys
Katherine Govier
Brenda Carr Vellino
Kathryn E Langley Hope
Kevin McLoughlin
Pamela Porter
John Eerkes-Medrano
David Williams
Jack E.G. Dixon
Lola Tostevin
Mark Frutkin
Sheila Whyte
Joseph Simons
Talia Zajac

Ruth Bradley-St-Cyr
Maurice Breslow
Linda Spaulding
Bruce MacDougall
David Bergen
Hank Bulmash
Phil Jenkins
Michael Helm
Jay Macpherson
Vera Frenkel
Oscar Goodman
Murray Melville
Dahlia Liwsze
Nino Ricci
Ellen Seligman
Ron Graham
John Ralston Saul

卡塔兰笔会

Carme Arenas
David Figueres Felip
Rosa Fabregat
Daniel Nomen i Recio
Valentí Gómez i Oliver
Carme Ramilo Martínez
Margarita Ballester Figueras
Joan Buades
Helena Porteros Liroz
Guillem-Jordi Graells
Assumpta Cantalozella
Tònia Passola
Gabriel de la S. T. Sampol
August Bover Font
Helena Vidal
Manel Ollé Rodríguez
Miquel Berga
Miquel Cardell Santandeu
Vicent Pitarch i Almela
Raffaella Salierno
Ramon N. Prats
Carme Riera
Jaume Cabré
Adrià Chavarria
Josep Maria Fonalleras

Joan Guasp Vidal
Antònia Vicens
Pep Coll
Helena Pol
Miquel Desclot
Emili Olcina Aya
Carmen Borja
Iolanda Bonet
Maria Teresa Pous
Josep-Ramon Bach
Ainara Munt Ojanguren
Joan Rendé i Masdéu
Teresa Colom Pich
Jordi Vintró
Assumpció Forcata
Antoni Puigverd
Ramon Pla i Arxé
Alex Broch
Mercè Otero Vidal
Ponç Pons
Josep Lozano
Bartomeu Fiol
Antoni Vidal Ferrando
Pilar Garriga
Patrícia Gabancho
Francesc Parcerisas Vázquez
Miquel M. Gibert
Maria Mercè Roca
Oriol Izquierdo
Joaquim Carbó Masllorens
Sebastià Perelló
Quim Monzó
Maria-Antònia Oliver
Jordi Valls Pozo
Arnau Pons
Núria Cabré Castellví
Lluís Urpinell-i-Jovani
Maria Barbal Farré

古巴流亡作家笔会

Luis Ignacio Larcada

英国笔会

Julian Evans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Martin Goodman
Eric Clark
Rosemary Friedman
Christopher Southgate
Wendy Mulford
Tom Cheesman
Carole Seymour-Jones
Marilyn Malin
Xandra Bingley
Barry Kerton
Paul Levy
Ros Schwartz
Amanda Craig
Liu Hongbin
Frances Spalding
Jonathan Prichard
Elizabeth Maslen
Lynne Reid Banks
Anne Louise Fisher
Nicholas Murray
Cat Lucas
Ivan Jones
Ruth Fainlight
Miriam Moss
Penelope Bennett
Paul Griffiths
Nouritzia Matossian

独立中文笔会

江棋生 巫一毛 蔡 楚 余 杰
廖天琪 赵达功 齐家贞 张小刚
蒋宣文 孟 浪 张 裕 阿 木
阿 森 阿 钟 艾 可 槟 榴
蔡咏梅 丁 抒 高 瑜 管 党 生
汉 心 贺 兴 彤 胡 平 黄 大 川
黄河清 姜 福 楷 京 不 特 井 蛙
陈 奎 德 老 戴 维 李 昌 玉 李 元 龙
廖 亦 武 林 茂 春 李 剑 虹 刘 荻
刘 建 永 刘 京 生 刘 柠 流 涛
刘 逸 明 陆 文 卢 慕 昭 马 兰
莫 建 刚 潘 嘉 伟 穆 彦 臣 丘 岳 首
申 有 连 宋 永 毅 舒 阳 孙 立 勇
孙 文 广 滕 彪 田 奇 庄 王 德 邦
王 建 波 王 巨 王 小 山 王 一 梁

温克坚 武宜三 徐文立 徐 祥
玄 圭 杨 光 野 渡 野 火
颜敏如 一 平 友 友 余樟法
余志坚 智 爱 宗 张 慈 张 郎 郎
张 朴 张 显 扬 周 劼 朱 欣 欣
周 洪 夏

日本笔会

若松城太郎 (Wakamatsu Jotaro)
近藤 (Shokan Kondo)
谷本多美子 (Tamiko Tanimoto)
早川和男 (Hayakawa Kazuo)
岩渊清子 (Kiyoko Iwabuti)
草叶 たつや (Tatsuya Kusaba)
宫本英子 (Eiko Miyamoto)
秦恒平 (Hata Kouhei)
池内ひろ美 (Hiromi Ikeuchi)
鷺塚貞長 (Sadanaga Washizuka)
神山明美 (Akemi Kamiyama)
島崎保彦 (Yasuhiko Simazaki)
脇田直枝 (Naohi Wakita)
林 祐介 (Yusuke Hayashi)
田口ランディ (Randy Taguchi)
川口健一 (Kenichi Kawaguchi)
永島章雄 (Yukio Nagashima)
茅野裕城子 (Yukiko Chino)
藤井省三 (Fujii Shozo)
菊池道人 (Kikuchi Michito)
今野敏 (Bin Konno)
田村聰子 (Satoko Tamura)
夫馬基彦 (Motohiko Fuma)
淀野隆 (Takashi Yodono)
泉亜由子 (Ayuko Izumi)
船木俱子 (Tomoko Funaki)
小中陽太郎 (Yotaro Konaka)
新海均 (Shinkai Hitoshi)
天童大人 (Tendo Taijin)
田才益夫 (Masuo Tasai)

列支敦士登笔会

Mathias Ospelt

尼泊尔笔会

Greta Rana

零八宪章 •

挪威笔会

Trine Kleven

魁北克笔会

Maya Khankhoje

Émile Martel

Roger Paul Gilbert

Gary Klang

瑞士德语笔会

Egidius Aebli

rigitta Klaas Meilier

Rafaël Newman

瑞士意大利语笔会

Chiara Macconi

瑞士法语笔会

Nguyên Hoàng Bao Việt

Fawzia Assaad

Zeki Ergas

苏格兰笔会

Iseabail Macleod

Zoë Strachan

Robin Lloyd-Jones

Drew Campbell

Bashabi Fraser

悉尼笔会

Gaby Naher

Margot Morris

Susan Sheridan

Virginia Lloyd

Carole Cogdon

Gaby Naher

Jane Camens

Sylvia Lawson

Annamaria Weldon

Caroline Lurie

Nicholas Jose

Chip Rolley

Barbara Brooks

Kyra Giorgi

Bridget McKern

Sylvia Petter

Gillian Rubinstein

Lian Hearn

Frank Moorhouse

Carol Dettmann

Dr Carolyn van Langenberg

Joan Dugdale

Tony Brooks

Ray Tyndale

Julie Marcus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gjbhdt/200901/Article_20090121153230.shtml

ml

就刘晓波被捕 递交德国联邦政府和议会的呼吁书

廖天琪

[编者按] 呼吁书 2008 年 12 月 19 日已递交德国政府并发表在德国媒体。包括有诺贝尔奖得主为会员的德国联邦共和国作家协会也以团体的名义参加了签名。

303 位中国公民，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律师和曾经是体制内的官员，打算于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这天，公开发表《零八宪章》，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行政改、直接选举、分权制衡、恢复受迫害的公民之名誉，保障人权与民主，允许公民行使基本权利和发起公众行动的权利。

《零八宪章》提出：“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

这份文件从名称和精神上是 1977 年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们所发起的《七七宪章》的衍生，以前者作为榜样，《零八宪章》回顾了中国现代的历史，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权力的泛滥，挺身起而反抗，一如 1898 年百日维新中的先贤反对腐败的清政府一样。

正如国际社会所周知，作为《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之一的著名异议分子作家刘晓波博士，于宪章公开发布的前夕，跟其他的异议人士一同被警方带走。现在其他人被释放，而刘晓波依然在警方假其名为“嫌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借口之下被拘禁着。

刘晓波博士长期以来为中国的人权、言论和新闻自由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因而遭受当局不断的骚扰，经常在形同软禁的警方监视下生活，并且数度进出监狱。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它本身签署了的国际人权协定，也跟自己所大力宣传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刘晓波恰恰是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人权日的前夕，在联合国人选宣言发布六十周年之际被逮捕。2008 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一百年之前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了。十年之前，中国也签署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刘晓波博士被逮捕了。这显现中国政府窘迫无策的状况。这种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基本人权，对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强烈抗议中国政府的行为，并要求德国联邦政府和德国议会为刘晓波先生的立即无罪释放做出努力，让中国人能有言论自由和自由讨论的空间。

签名者：

廖天琪 Tienchi Martin-Liao, 劳改基金会主任, 美国华盛顿/德国科隆
联邦共和国作家协会, 文学与政治论坛, 58 名会员 (Autorenkreis der
Bundesrepublik, Forum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德国柏林
汤玛士·魏豪赫博士 Dr. Thomas Weyrauch, 法律学者, 德国基森
福来德·普旭博士 Dr. Fred Pusch, 出版家, 德国波鸿
海嘉·森内坎普 Hajjia Sennenkamp, 教师, 美国新泽西
沙比那·佩雪尔 Sabine Peschel, 记者, 德国科隆
西维亚·希安 Silvia Sian, 波鸿大学学术助理, 德国波鸿
罗瑟尔·梅丁格 Rosl Merdinger, 奥地利笔会负责人, 奥地利维也纳
文生特·魏斯巴赫 Vinzenz Weissbacher, 项目主管, 奥地利维也纳
比吉塔·何恩里德博士 Dr. Brigitte Hoehenrieder, 学者、翻译家, 德国图宾根
比德·何夫曼教授 Prof. Dr. Peter Hoffmann, 汉学教授、作家、翻译家, 德国图宾根
卡塞林·奴吉布塔 Catherine Nurjipta, 书商, 德国汉堡
芭芭拉·布克哈德 Barbara Burckhardt, 记者、剧评家, 德国柏林
乌里希·德里欧斯 Ulrich Delius, 受威胁族群协会亚洲部负责人, 德国歌廷根
比尔特·福格尔 Birte Vogel, 作家、翻译家, 德国威尼森
汉斯·库勒教授 Prof. Dr. Hans Kühner, 汉学家, 柏林宏堡大学, 德国柏林
爱丽丝·格林菲尔德 Alice Grünfelder, 汉学家, 文学出版和编辑, 瑞士苏黎世
卡林·威斯勒 Karin Weisener, 设计师, 瑞士苏黎世
依姆克·梅斯硕士 Imke Mees, M.A., 汉学家, 德国许尔特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汤玛士·卡斯丁 Thomas Kastning, 学生, 德国图宾根
芙利达·恩南 Frieda Ennen, 德国图宾根
米歇尔·瑞菲尔 Michael Raffel, 德国图宾根
约格·希尔席 Jörg Hirsch, 作家, 德国图宾根
赫尔穆特·斯特科尔 Helmut Steckel, 教育督学, 德国汉堡
谢志伟教授 Prof. Dr. SHIEH, Jhy-Wey, 东吴大学德文系, 台湾台北
阿德海德·东阁斯 Adelheid Dönges, 翻译家, 德国慕尼黑
鲁丝·克恩 Ruth Keen, 文学翻译家, 德国柏林, 德国笔会会员
克丽斯塔·福罗姆克莱西特 Christa Frommknecht, 家庭主妇, 德国多特蒙特
约阿亨·瑟豪斯 Joachim Seehaus, 建筑师, 德国科隆
卡提亚·兰普 Katja Lampe, 经济师, 德国科隆
约格·洛根坎普 Jörg Roggenkämper, 税务师, 德国维腾
钱跃君博士 Dr. Yuejun QIAN, 工程师, 德国法兰克福
钱红 Hong QIAN, 家庭主妇, 德国法兰克福
提利·切维尔 Thierry Chervel, 编辑, 德国柏林
克利斯朵夫·穆勒·何夫斯特德硕士 Christoph Müller-Hofstede, M.A., 汉学家, 德国科隆
安娜·格尔斯特拉赫 Anna Gerstlacher, 汉学家、旅游策划, 德国柏林
乌里克·菲弗 Ulrike Pfeil, 记者, 德国图宾根
芮虎 Hu Rui, 编辑, 德国斯图加特
克丽斯田·贝克 Christiane Beck, 房产经纪人, 德国柏林
潘永忠 Pan Yong Zhong, 商人, 德国额肯兰兹
飞利普·蓝普 Philipp Lampe, 公司经理, 德国科隆
芭芭拉·马丁 Barbara Martin, 学术档案, 德国柏林
加比·冯·西弗斯萨特勒硕士 Gabriele von Sivers-Sattler, M.A., 汉学家, 德国海德堡
克劳斯·加勃尔特 Klaus Gabbert, 编辑, 德国法兰克福
伊娜·马丁 Ina Martin, 按摩师, 德国汉诺威
曼菲德·马丁力斯林 Manfred Martin-Riessling, 出租车司机, 德国汉诺威
彭小明 Peng xiaoming, 德国学联主席, 德国西格堡
马伦·埃克哈特 Maren Eckhardt, 汉学者, 德国埃森
萨比娜·潘佩林博士 Dr. Sabine Pamperrien, 作家、记者, 德国柏林
比吉特·艾格 Dr. Brigitte Erge, 医生, 德国哈莱恩
曼努尔·亨利希思 Manuel Hinrichs, 厨长, 德国路得维西菲尔德
沃尔夫冈·温德豪森 Wolfgang Windhausen 作家, 德语瑞士笔会/狱委协作, 德国达姆斯达特
英格伯·史耐泽 Ingeborg Schnetzer, 政治助理, 德国杜塞尔多夫
伊梅拉·克希勒莱特教授 Prof. Dr. Irmela Hijiya-Kirschnereit, 柏林自由大学日文系, 柏林
马丁·撒特勒教授 Professor Dr. Martin Sattler, 联邦公共行政专业大学, 德国海德堡
李静云 Li Jingyun, 家庭主妇, 德国许尔赫斯特
米歇尔·贝尔德 Michael Belde, 学生, 德国阿亨
迪克·普莱特博士 Dr. Dirk Pleiter, 物理学家, 柏林

零八宪章 ·

苏珊娜·希林 Susanne Schilling, 教学长, 波鸿
艾伯哈德·库尔勒教授 Prof. Dr. med. Eberhard Kurle, 医生, 德国戈平根
贝恩德·费雪 Bernd Fischer, 汉学者, 德国普尔兹海姆
彼得·穆勒 Peter E. Mueller, 人权活动家, 德国布莱登贝克
丽塔·埃特格斯 Rita Etges, 翻译家, 德国柏林
赫尔斯·伏特勒尔 Horst Furtner, 社会教育工作者, 德国波茨坦
岩斯·福来贝格 Jens Freiberg, 商人, 德国波茨坦
尤塔·福来贝格 Jutta Freiberg, 商人, 德国波茨坦
卡林·薛尔提瑟克 Katrin Scholtyssek, 建筑师, 德国波茨坦
法兰克·梅恩斯豪森 Frank Meinshausen, 汉学者, 德国慕尼黑
莉安娜·葛莱奈尔 Liane Greiner, 护士, 德国波茨坦
安德烈斯·韩德尔 Andreas Händel, 职业专校教师, 德国凯曾
维特海默教授 Prof Dr.J. Wertheimer, 图宾根大学, 德国图宾根
胡伯特·莫斯曼 Hubert Moßmann, 医生, 德国曼海姆
迪特·海恩泽格 Dr. Dieter Heinzig, 历史学者, 德国额尔福特城
哈爵·马特恩 Dipl.-Ing. Hajo Mattern, 建筑师, 德国柏林
约阿亨·冯·斯托许 Joachim von Stosch, 媒体策划, 德国慕尼黑
布利吉特·冯·斯托许 Brigitte von Stosch, 外语新闻记者, 德国慕尼黑
卡罗琳·斯德歌曼·瑞内耳特 Caroline Stegmann-Rennert, 汉学者, 德国科隆
克丽斯丁·施尼德 Kristin T. Schnider, 作家, 瑞士瓦森
柯内莉亚·特坡尔曼博士 Dr. Cornelia Töpelmann, 日尔曼学者, 德国慕尼黑
伊娃·奎伊斯托尔普 Eva Quistorp, 前欧洲议会议员, 神学者, 作家, 德国柏林
苏珊娜·史坦因 Susanne Stein, 汉学者, 德国图宾根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5051>

[编者按]以上的呼吁信于 2009 年 1 月间以书面形式邮寄给德国政府, 以下是部分反馈

附录一:

德国联邦议会议长诺贝尔特· 兰梅尔特 (Prof. Dr.Norbert Lammert)
给廖天琪的回信

尊敬的廖女士,

感谢您 2009 年 1 月 9 日的来信。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到维腾市府

上造访受到亲切接待的情形。

我跟您一样对于中国当局对刘晓波博士和零八宪章签署者的做法感到忧心，这种做法违背了法治国家的基本法律，并侵犯了言论自由的权利。我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柏林的大使表达了我对这样的迫害行为的不理解，并且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零八宪章的签署者的审讯，已经逮捕了、或被监视居住的人立即释放。

致友好的问候

诺伯特•兰梅尔特

柏林，2009年1月28日

附录二：

德国外交部就廖天琪女士 2008 年 12 月 19 日因中国人权问题向联邦议会申诉委员会提交的呼吁书（Pet 3-16-05-104-046913）的回复

2008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六十周年的前夕，大约三百名被称为“零八宪章”联署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提出要求更多的政治上的自由。可能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教授于 12 月 8 日被逮捕了。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是被关在北京的一家旅社里。新年的时候，他的妻子被允许跟他见了一次面。

联邦外交部长法兰克•瓦特•施坦因梅尔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纪念人权宣言发布六十周年的集会上，曾发言批评刘晓波遭到逮捕之事。部长就此事而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不会沉默，更不会对中国两天前逮捕了传播了《零八宪章》的刘晓波的做法保持沉默。这件事格外能突显中国令人不满的人权状况…我们应当支持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那些在为改善人权作出努力的力量。这种努力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政治精英群体里，我们也应当去争取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的人往往会经历失望和挫折，还必须去克服一些令人气愤的障碍，这并不只在中国如此。重要的是要保持坚定、明确和按常理出牌。做到这

样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路数不仅是正确的，也是唯一可以走得通的。”

人权方面的缺失是德国联邦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在双边正式的人权对话框架中经常提出来谈论的主题。在双边的人权对话过程中，有时候甚至是在高阶层的接触上，如 2008 年 10 月 24 日联邦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时，个别的案例也都被提到台面上。

欧盟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对于这个事件特别发表了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事作出解释，并且要求维护刘晓波先生的基本权利。

德国联邦政府将继续为刘晓波的释放进行努力。

致以友好的问候

东亚部主任福里斯尼克 (VLR I Wriessnig)

柏林，2009 年 2 月 9 日

关于刘霞获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的公告

美国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同仁们决定将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授予刘霞女士之际，都有一种名之所归、奖之所归的叹惜和欣慰的交织之情。在中国，当代政治良心犯家属数以千万计的不尽行列里，刘霞女士或许是经历了最多次的在漫长的探监路上踽踽独行和苦苦等待的女性之一。在她的丈夫、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博士以前数次的牢狱生涯中，她不仅毫无怨言地奔波于探监的两地之行，用自己日紧月拙的收入给狱中的亲人送去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的精神食粮；还噙含着坚强的泪水守候在破碎的家中，艰难地支撑着家庭和爱情的至高价值。在两周前刘晓波博士因为《零八宪章》的起草被中共当局又一次羁押的突发事件中，我们再一次震撼和感动于这位不凡女性吐出的平静心声：她做好了又一次长期探监的准备……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为了向普天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良心犯的妻子和家人表达由衷的敬意，于 2005 年 6 月 4 日设立“受难者家人奖”，通过基金会理事们的个人的捐助及其它筹款渠道，将适度的奖金及这一荣誉颁给良心犯的妻子或家人。我们深深地觉得：在人类用良知抵抗暴政的漫长历史中，政治良心犯的妻子和家人是养育人类良心的第一家园。我们认为，向这样一种苦难表达同情，向这样一种坚韧表达敬意，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责任。我们的努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表明：我们正竭尽全力与无辜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从而也和人类应有的基本人权和良知站在一起。人们常常用把中国政治良心犯出色的妻子们比作俄国十二月党人高贵的爱人，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文学和历史

的 比喻。然而，我们还觉得：在刘霞、张青、曾金燕、袁伟静、贾建英、路坤、陈明先这些历届“受难者家人奖”得主的身上，又有着更为珍贵的、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品格。她们都没有十二月党人的爱人们的显赫家世和贵族教育；她们都是生活在最低层的普通的工人、中小学教师、社会工作者；她们还都生活在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中国当代社会。然而，正是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黑暗的闸门，构筑起一道二十一世纪最为瑰丽的抵抗文明和道德衰落的风景线。她们在默默无闻中用自己冰冷的眼泪、颤抖的悲伤、孤独的守望和对自己亲人的无所不在母性的爱和包容，为任何一种倡导人类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正义、爱情……的辉煌文件做出了最早、最有力的见证。我们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她们远比书面的文字更代表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刘霞女士不仅是刘晓波博士和他信念的忠贞妻子，更是一位才情并茂的女诗人。她从二十岁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她曾经是出版社的编辑和国家税务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是一位从事摄影和写作的自由职业者。她曾经在过去的探监路上以彻心的痛楚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河上会布满河灯/却招不回你的灵魂……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现在她正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和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的对抗。

鉴于此，我们很荣幸地将这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颁给刘霞女士。我们也在此呼吁中国政府给予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以基本人道待遇，并尽快释放刘晓波博士等政治犯。我们也再一次敦请国际社会和更多的中国人关注中国政治良心犯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使中国大陆的任何政治、学术的异见者和他们的家人，都能享有基本的免除恐惧的自由。

2008年12月22日

<http://cdp1998.org/details.asp?detailsid=11500>

美国笔会颁发自由写作奖给刘晓波 ——我的答谢辞

刘 霞

[编者按]美国笔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将美国笔会年度的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 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颁发给尚系狱中的刘晓波。他的妻子刘霞女士不克前来纽约为丈夫领奖，但是她辗转传来的答谢词在颁奖的晚会上得以宣读。下面是答谢词的全文：

先生们，女士们：

很遗憾，刘晓波和我都不能到场领奖。

26 年前，我们都写现代诗，并以诗为媒介，相识相知相爱，直至发生 20 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学潮和屠杀。刘晓波义无反顾地置身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六四黑手。他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数次入狱，在家的时间也多半不自由。作为妻子，我别无选择地成了丈夫不幸命运的一部分。

但是，我不是刘晓波的附庸，我酷爱诗歌和绘画，同时，我也没把刘晓波仅仅看作一个政治人物。他始终是笨拙而勤奋的诗人，即使在狱中，他也没放弃写诗，狱卒搜走纸笔，他就凭空构思着。这 20 年来，他和我的这种用于心灵对话的爱情诗，已经积累了几百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另一位中国诗人廖亦武这样评论刘晓波的诗：他背负着六四亡灵在爱、在恨、在祈祷。这样的作品同样可以写于纳粹集中营或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流放途中，就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适合八九后的中国国情。

然而，我明白，这个奖在名义上，不是鼓励诗人刘晓波，而是鼓励《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政论家刘晓波。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两个身份之间的联系。我觉得刘晓波正是以诗人的激情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以诗人的激情一再对独裁者说不！不！不！

在私底下，他却以诗人的温情，对六四至今得不到安息的冤魂们，对我，对他亲爱的朋友们一再说是。是。是。

感谢美国笔会。感谢独立中文笔会。感谢在场的每一位先生和女士。

刘霞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不自由的北京家中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在北京家中

(摄于 2002 年 10 月 22 日 © 法新社)

关于中共无端拘押独立作家刘晓波的声明

中国信息中心 / 劳改基金会

12月8日，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无端逮捕了著名政治评论家、作家、《观察》资深作者刘晓波先生。据传言，逮捕的理由是刘先生参与主持了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的起草。现在48小时已经过去，刘晓波先生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对于中共当局肆意践踏人权，无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

中共当局迄今没有公开透露拘押刘晓波先生的原因。网络传言有的认为刘晓波博士签名支持《零八宪章》，也有的认为刘先生主持起草了《零八宪章》。由三百多位中国公民签署的《零八宪章》温和、理性、务实，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探索出一条走出困境，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的可行路径。不论是文件的起草者或是签署者，刘晓波先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合法的，都是在行使中国宪法和法律所赋予、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刘晓波先生由于参加1989年的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20个月。出狱后，刘先生持续关注中国的民生与人权，筚路蓝缕，笔耕不辍。尽管中共当局在刘先生的住处长期设防，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但他针砭时弊的言论时常可以见诸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独立声音的存在，已经成为当局标榜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刘晓波先生被无端羁押，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当局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要撤下了？这值得人们认真关注。

中共当局一向不失时机地自夸近三十年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良性发展。日前，中共国务院官员还告诉媒体，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权

事业已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共的监狱里关押着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人权活动人士和其它良心犯，中共的精神病院、法教班等准监狱里拘禁着越来越多的上访者、维权者。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推进社会改革的刘晓波先生被无端拘押，再次证明了中共诩诩自夸的政治改革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空话。

中共虽然极少按国际通行规范行事，但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利用却日臻成熟。中共对多年来和现政权相安无事的刘晓波先生悍然动手，其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是他们有所忌惮的美国正处于两届政府的交替之中（总统易人，国会新旧交接等），无暇顾及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将充分发挥在美国的影响力，敦促美国政界和人权组织关注刘晓波案，打破中共当局的如意算盘。

我们再次呼吁中共当局遵守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立即释放无辜被拘押的刘晓波博士，并立即停止对其它《零八宪章》签署者的骚扰。

中国信息中心

劳改基金会

2008年12月10日

支持《零八宪章》必须以法治国 基督徒致中国政府公开信

我们是一群长期关注中国言论自由的基督徒，深信言论自由及资讯发放是维持社会进步必须的元素。对于中国当局无理扣押异见人士，我们表达强烈不满。

相对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日前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时，提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预期新中国成立 100 年（即 2049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次对异见人士的拘捕，显然是对迈向民主、文明及和谐社会的一大打击。改革开放无疑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之余，令社会更开放。然而，三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容许民主、人权及言论自由同步发展及改革，反而令贫富悬殊不断加深、贪污腐败严重、新闻自由受践踏、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扩大、食品安全问题令国家蒙羞。在这情况下，中国政府不但没有从善如流，听取民间社会人士的意见，集思广益，为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努力，反而不断打压异见人士。

此际，国内三百多位学者、作家、律师、维权人士和基层人士发起《零八宪章》联署行动，反映了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落实民主、法治及保障人权。他们提出对中国大陆在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发展上的渴求及建议，正好回应了中国大陆目前所潜藏的社会弊病及制度性问题。《零八宪章》所列举的理念及价值，如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等，是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亦是文明社会早已承认及正在实践的价值。我们期望这些普世价值能在中国大陆生根发展，并义无反顾地支持《零八宪章》联署发起者这种关怀社会及人民福祉的举动。

他们的和平、理性及爱国行为，却无情地遭受当局“以言入罪”。中国政府对宪章的联署发起者进行拘捕、抄家及骚扰迫害等一系列行动，当中包括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无理拘留北京作家刘晓波。此等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宪法》，亦违背了中国政府强调要建立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承诺。我们对此感到强烈不满！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

- 1.立即释放刘晓波及一众异见人士；
- 2.停止骚扰、迫害《零八宪章》联署人士；
- 3.必须落实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让国内民众可以自由及公开地讨论、交流对《零八宪章》的意见；
- 4.对《零八宪章》所提出的建议，作出公开的回应。

发起团体：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

联署团体及个人：

香港基督徒学会 民族发展亚洲中心 香港融乐会

香港天主教团体支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甘浩望神父 柯欣欣 陈丽娜 黃奕清 陈兴邦 叶宝琳

孔令瑜 堵建伟 陈伟杰 趙善榮 林洁紅 王华曦 潘嘉伟

陈诗韵 陈维理 张燕萍 曾志忠 蔡利沙 曾 涵 曾 嶸

許美宁 陈诗蓓 徐嘉琳 陈清奎 施能局 张宝珊 何志佳

朱炳权 朱港荣 钟金胜 鍾李衍琉 李穎妍 伍国雄 谭伟強

張思敏 刘韵仪 林瑞琪 尹凯荣 黃美凤 阮美贤 王惠芬

叶丽珊 陶家宝 陶家明 Katherine Chan Jen Mak

[注]此声明发表于 2009 年 1 月 2 日

<http://www.cfhks.org.hk/forum/viewthread.php?tid=319&fpage=1>

《零八宪章》签名人大赛 “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

孟 乡

采用“网络民主”(e-Democracy)方式，通过互联网投票选出时代周刊“2009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的网络选举，历经将近两个月时间，于4月27日最终闭幕。《时代周刊》于当天发表文章《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是……》(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Person Is ...)宣告了选举活动的终结和本年度荣膺“时代百人”的获胜者，以刘晓波为首的303个《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荣膺“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之一。

根据《时代周刊》网站所揭示的投票数据结果，《零八宪章》签名人群共获得557671投票，排名第77位，比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排名第78位)高了一个位次，顺利挤入“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时代周刊编辑和专家所选取的泛中国概念其他候选人胡锦涛、达赖喇嘛和马英九，分别名列“时代百人”的第16、61和67名，同列“2009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

时代周刊在文章《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是……》(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Person Is ...)中，就本年度获得投票总数第一名、投票总数颇受争议的Moot(世界第二大论坛网站4chan.org的创办人，21岁的大学生)，报道了Moot本人否认任何追随者协商好的影响投票的计划，但时代周刊网站的技术团队的确侦测到了对网站投票的黑客攻击，并扑灭了此项黑客攻击(Moot denies knowing about any concerted plan by his followers to influence the poll, though TIME.com's technical team did detect

and extinguish several attempts to hack the vote)。

尽管时代的这篇文章没有进一步指明试图劫持投票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但却昭告了网络民主投票遭到黑客劫持的事实，而这正印证了我在《胡锦涛暗战“零八宪章”》文章中所指责的，中国官方利用金盾工程、甚至黑客，压制《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的投票，同时为胡锦涛进行虚假投票的事实。

作为这场网络民主投票的观察者，近两个月来，我时常追踪、浏览《时代周刊》网站的投票情况。在网络媒体 4 月 12 日刊发新闻《时代百人投票，胡锦涛不敌马英九、达赖》后 48 小时之内，胡锦涛的排名和投票总数从第 110 名、45 万投票，跃进到 14 日的第 16 名、70 万投票，名次提升幅度 94 个名次，两天投票总数暴涨了 25 万，日投票量达到了 12.5 万，比之前 3 周总计 45 万投票总量、日投票量 2.25 万，整整放大了 5 倍还多。

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巨量变化，导致《时代周刊》网络技术团队在 4 月 14 日之后，对所有投票网页增加了“验证码”程序，以防止黑客使用软件进行大批量投票，影响网络投票的真实和信用。此后，胡锦涛的名次稳定在前 20 名之内，投票总量，则从 4 月 14 日的 70 稳步增长到投票结束期 4 月 26 或 27 日的 92 万，其每日投票量（1.8 万/日），与 4 月 12 日之前 3 周的 2.25 万/日，尽管有所降低，但相差幅度并不大。

因此我认为，有 90% 可能，中国官方采取了两个手段，来影响“时代百人”的网络投票：

1、利用“金盾工程”封杀时代周刊网络上的《零八宪章》签名投票网页，限制《零八宪章》的国内支持者投票支持；同时放开胡锦涛的投票网页，允许并发动国内特定人员或爱国愤青，投票支持胡锦涛。

2、出动黑客/红客，利用软件，在时代周刊的网络上，进行虚假投票，推高胡锦涛的投票总量和名次。我认为这正是发生在 4 月 12 日至 14 日之间，胡锦涛在“时代百人”排名中出现暴涨的幕后真相。当然我也相信，在观察网站发表《胡锦涛暗战“零八宪章”》文章后，尤其是被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时代周刊》网络技术团队发现并增加“验证码”程序之后，中国官方有所忌惮，深恐胡锦涛名誉受损，而不得不停止了黑客手段。

在中国金盾工程网络封锁的艰难处境下，《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的投票量，从4月14日的46万，仍然持续增长到投票截止的55万，排名第77位，并最终入选“时代百人”，表明了《零八宪章》确实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真心欢迎和支持；毋庸置疑，这种被压制之下仍然迸发出来的强大民意，代表了中国人的民心所向。而这，正是本次《零八宪章》签名人群体经受网络民主投票的洗礼，而最终成为“2009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的历史意义。

而中国官方，在本次网络投票中的卑鄙伎俩，一旦有一天，被《时代周刊》技术团队或者黑客本人揭穿的话，胡锦涛2009年排名第16位的“时代百人”称号，将不再是一个荣耀，而是一场耻辱了，连带他之前赢得的4次“时代百人”称号，都将永远遭人怀疑、令人鄙视。

原载：民主中国

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徐友渔

12月29日下午，我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谈《零八宪章》的事。他首先问我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在上面签名，我回答说，我看了宪章的内容，觉得不错，符合现行宪法精神，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公约一致，我签名是在履行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他说，《零八宪章》违反了现行宪法和法律，我直截了当地呵斥：“胡说八道！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人辩论这个问题。”我问他看过这个宪章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应该先看看再作自己的判断，不要跟着上面瞎说。他要求，不能在宪章上签名，如果已经签了，要声明退出，我说绝无可能退出。

过了两天，有朋友告诉我，上面已经对《零八宪章》作出定性，说是国内敌对势力勾结海外民运的活动，图谋颠覆政权。这些天来，不断有消息称，全国各地都有签名者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传唤。

这样的定性和罪名是荒谬的，但在中国并不新鲜。虽然这种指控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不值一驳，但考虑到当局已经用这种口实对签名者施压，极有可能用这样的罪名对刘晓波定罪，我还是要从法理的角度说明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为什么签名是合法的，而威胁、阻止和镇压是非法的。

当我面临一份《零八宪章》的草案并被请求签名支持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阅读文本，我以下列标准衡量、判断：一、它是否符合我的价值观，即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文明的公认准则；二、它是否

与中国现行宪法的精神和条文一致，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公约一致，与中国已经承诺的国际义务一致；三、它是否有即刻提倡的当下必要性。

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这是一个公民理性的、负责的决定，这个决定一旦作出，任何威胁、警告、惩罚都不能改变，不论它们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还是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

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合法性无可质疑地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以《零八宪章》这样的言说形式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建言、对未来的期盼，正是在运用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利。

在中国，历来有一种违宪地剥夺公民间言论自由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如果在言论、文本中挑不出毛病，就说背后另有图谋和用心，毛泽东“反右”时“天下大乱、取而代之”的说法就是典型例证，但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主观臆想或蓄意诬陷缺乏法律上有效的证据。

显而易见，判断人们在宪章、宣言、呼吁、公开信等等文件上签名是否合法的唯一根据是文本的内容，签名者必须，也只需要对文本负责。从言论自由的原则出发可知，这类签名天然就是合法的，言论涉嫌犯罪只发生在极少数例外情况，即言论涉及煽动以暴力推翻现存的政府或社会制度，危及国家或公共安全等，必须注意，这样的危害必须是直接的、清晰可见的，而不是七弯八拐、间接又见接地“分析”和“推论”出来的。

只对文本负责，意味着签名是否合法与签名组织者和其他签名者的身份、背景无关，与他们在其他场合表明的观点、活动无关，也与掌权者是否喜欢无关。而我们历来熟悉的做法是，先把签名活动的组织者或其他一些签名者抹黑，从而把整个签名活动抹黑，达到吓退其他人的目的。通常的口实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海外背景”，但拿不出证据。

其实，从法理上严格说来，“有组织”、“有预谋”、“有海外背景”等等只是政治宣传的说辞，它们并不等同于非法，需要其他过硬的证据，才能证实“有组织”、“有预谋”、“有海外背景”的活动也是非法活动。法治社会中，不能靠虚声恫吓定罪。

很长时间以来，一种吓唬人的方法是，任何事情只要弄得和国内或海外“民运分子”沾边，似乎其非法性就不证自明。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看，这种靠名称或标签定罪的手法极其可笑。我们不必说海外呼应《零八宪章》的人士以余英时先生领衔，而余先生是享誉全球的华人学者。我们需要辨析的是，不论“民运分子”是带褒义还是贬义的称谓，他们是不是合法公民，他们有没有权利与其他公民一道表达共同的观点？在我的心目中，刘晓波是文学博士、学者，如果他本人不反对，称他为“民运分子”也可以，但是，“民运分子”并不天然就是“敌对势力”。再说了，把格外关注中国民主前途的人说成是敌对势力，除了说明自己的立场是反民主的以外，不说明任何问题。

在一个法治国家，判断合法还是非法，唯一的根据是宪法和法律，以及该国认可的国际公约，撇开这些标准，另行发明一个“民运分子”的标签作为是否合法的根据，这本身就是一种违宪行为。

最后，聚焦到核心问题，称《零八宪章》的签名者“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有什么法理上的根据？《零八宪章》的哪一条、哪一款，哪一段文字包含有图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零八宪章》的哪一条、哪一款，哪一段文字的内容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可以等同于“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

《零八宪章》在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诉求之后，在结语中总结自己的意图和要求时说，“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请问，这是非法的吗，这是在煽动在“颠覆国家政权”吗？这是在和执政党不时许诺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着干吗？

我要问那些滥加罪名的人：重申宪法、《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载明的人权和公民权，就是“涉嫌颠覆国

家政权”，你们把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看成是什么，这就是你们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吗？

因为《零八宪章》而拘押刘晓波是非法的，传讯和恐吓众多签名者是非法的，一经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其非法性显而易见。而诬称或定性《零八宪章》非法，则找不到任何法理依据。目前严重的、大规模的非法行为不会因为行动由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员实施，不会由于使用了国家的名义而改变性质。

这是一场合法与非法的较量，有人在明目张胆地侵犯、践踏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而违反宪法。

这是一场真正的爱国者与反对国家的人的较量，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

《零八宪章》的合法性不言而喻，其遭遇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和意义。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120/2009129152454.htm>

《零八宪章》：公民十年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 (Joanne Leedom-Ackerman)

华盛顿到处搭起大看台。美国正准备为一位新总统就职做准备，其竞选调动了创纪录的公民人数，并注重希望和改变的主题。

在环球一半路的那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群人数相对少的公民正为他们国家建议着彻底改变，在很大部分反映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理想。然而，建议这种改变者已被传讯和拘捕。

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300多位杰出的中国大陆公民——作家、经济学家、政治学者、退休党官、前报纸编辑，法界人士和维权人士发表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规划了一个基于公民而非基于党的民主中国远景，要有一个基于人权、民主和法治的政府。《零八宪章》不止于提供现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是要终结一党专制等功能。自发表以来，中国各地超过5000公民联署了《零八宪章》。

在该文告发表前，中国当局就拘留了两位主要作家刘晓波和张祖桦，此后又传讯了数十位签署者。其中大多数已获释，尽管继续受监视。然而，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重要作家刘晓波仍被拘禁在未知地点，人们担忧他将被控以“违反国家基本原则的严重罪行”。中国政府还封锁或删除刊载《零八宪章》的网站和博客。

《零八宪章》的灵感来自苏联高峰期的一个类似行动，那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于1977年1月发表了《七七宪章》。《七七宪章》呼吁国家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瓦茨拉夫·哈维尔是签署者之一，因此被监禁，但他继续坚持，到苏联终结后成为捷克共和国总统。

世界各地的公民，包括哈维尔、诺贝尔奖得主、人权捍卫者、作家、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经济学家、律师、学者，群起支持《零八宪章》签署者。欧盟已对拘捕刘晓波等表示了严重关切。支持《零八宪章》和抗议拘捕刘晓波的请愿书在世界各地流传。

拘捕刘晓波发生在人权日暨《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前夕。2008 年也是中国戊戌变法 110 周年，中国首部宪法 100 周年，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周年，不久将是镇压学生的六四 20 周年。

《零八宪章》很值得一读。它在前言中描述了中国政治史，然后提出了政府应该遵循基本原则——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这份文件提出具体主张——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真相与和解。

《零八宪章》规划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将使中国政治气候和政府结构革命化，但它倡导改变并非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公民参与。这是天真？有勇无谋？或者这是作为中国激励和增强其公民性的远景？

“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宪章签署者们宣示，“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当美国人准备一个新总统——首位非裔美国总统就任时，美国并不像在其选举过程中体认 200 多年前提出的那些理想那样，那么体认改变。

理念可能被压制一段时间，其作者可能会受到迫害，但理念和文字关系重大。它们终究是推进改变的燃料。那些有勇气将它们记载下来发表者，可能将成为其肩膀为一代代人所站立的奠基之父。

*作者阿克曼为美国作家兼记者，美国笔会理事，国际笔会副会长、前秘书长、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主席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forum/forum081210005.htm>

《零八宪章》——一个普世理念

乔纳森·亚当斯 (Jonathan Adams)

2008 年 12 月上旬发布在网络上的《零八宪章》是一份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炫目的起诉状，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详细的远景，一个遵循法治，多党选举和分权制衡下的新的中国。

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目前依然被中国警方拘留，面临“煽动颠覆”或者更糟糕的指控。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调查了至少数十名宪章签署人，钳制了媒体，封锁了那些提到宪章的网站。

到现在，最初引发的有关《零八宪章》的言论热潮渐渐平息，但是一些评论仍在继续。在宋以朗管理的“东西南北”博客中最近更新的条目中，发表的文章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对宪章几乎没有兴趣。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在她的网站上也发了很长的一篇关于《零八宪章》的文章。

我在 2008 年 12 月 26 日采访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张祖桦先生。在这个采访中，张先生明确指出，《零八宪章》的目的只是描述一种政治蓝图，这一变革进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我们不指望一夜之间改变，”他说。

张先生本人的经历也表明，人一生时光中，各种事件有可能迅速逆转。今天 53 岁的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和其他许多享受特权的青年人一起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结果他在四川的一个做军用飞机零配件的山洞工厂里呆了 8 年。

随着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他是第一批返回学校的，他就读于四川的一所师范大学，在那里他侧重对西方宪政的学习。后来，

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晋升，在 80 年代他曾经和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先生一起共事过。

张先生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支持 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而终止。自此以后，他经常被监视，最近则因为参与《零八宪章》，而在 2008 年 12 月 8 日被警察审问了 12 小时。

下面记录的对话是张先生对《零八宪章》和中国未来的思考。

乔纳森亚当斯：有些批评人士说，《零八宪章》是一些“西方”的思想，而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那些西方的思想并不适用。

张祖桦：首先，对于这些意见和批评，我们抱持一个谦卑和开放的立场，我们欢迎人们对宪章文本进行各种评论和批评，以便我们从中学学习。

我是这份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当警察讯问我的时候，我承认《零八宪章》里的大部分思想发源于西方。宪章的思想不仅来自美国的人权法案，也来自 1215 年英国的大宪章，来自法国的人权宣言，来自捷克的《七七宪章》。（1977 年共产党统治下，要求政治改革的活动人士的一份政治呼吁）。但我们也有本土资源：那就是台湾。1986 年以前，台湾党外时期许多活动分子急取民主和人权，并且经常出版和发表这类要求（台湾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化）。

乔纳森亚当斯：许多中国人说，中国最需要的是稳定，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增长上，而政治改革可以等待。

张祖桦：我个人并不反对这一点。中国的发展需要时间。今年是 1989 年天安门惨剧 20 周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走向民主和法治。我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这一转型。

乔纳森亚当斯：哪些情况才能促使中国改变？

张祖桦：我在以前的文章曾使用“三加一”的分析方法。归纳所有影响中国未来的主要几个因素，我提出了三个政治因素加一个经济因素分析模型。三个政治因素是执政党，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共产党是目

前的执政党，其未来选择对中国社会而言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仅有执政党本身的努力是不够的。没有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参与，中国很难走上正确的道路。当然，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对政治转型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乔纳森亚当斯：您认为多久时间内，会发生变化？

张祖桦：我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不会太困难，我提到的所有四个因素都在趋于成熟，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间，这种变化可能会大体完成。然而，巩固和完善民主，将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期望在一夜之间实现这一转变。

乔纳森亚当斯：我采访过的一些分析家就此事表示，中国政府担心《零八宪章》背后有海外势力，并认为外国势力想破坏中国的稳定。

张祖桦：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同意那种绝对反对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观念，我认为这是违背公民社会的世界化潮流的。在《零八宪章》中，我们的立场是基于全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它不是美国人的，也不是欧洲人的，也不是非洲人的，它是所有人的。但是，中共并不同意这种普世价值，他们批评它。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乔纳森亚当斯：《零八宪章》发布后，你个人收到了哪些反应？

张祖桦：当我们起草《零八宪章》的时候，我们有些担忧是人们会认为这是精英化的呼吁，普通老百姓并不会接受它。但是根据互联网上的反应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人其中包括农民和工人，同意《零八宪章》。它将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中流行。《零八宪章》要求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和废除不平等的社会政策，普通老百姓都认同这些建议。

其实，在《零八宪章》中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之一就是废除对农民的歧视，取消城乡之间人为的差别。许多农民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农民的电话，他们表示支持《零八宪章》。

乔纳森亚当斯：还有什么能解释宪章的广泛吸引力？

张祖桦：我认为《零八宪章》文本本身是非常温和、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零八宪章》阐明了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首先很多人不

敢站出来说话；第二，没有地方让他们出来说话，因为没有媒体供民众表达意见。《零八宪章》的 303 名签署群体中有许多非常著名的学者。比如主张修改宪法的于浩成先生，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张思之先生，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倡导司法改革的贺卫方教授等等。当然，政府抓捕刘晓波先生（的行为），吸引了更多的注意。

乔纳森亚当斯：在何种程度上政府就《零八宪章》的反应和即将到来的天安门事件 20 周年纪念日有关系？

张祖桦：政府公开承认他们有两个主要关注。一个是 1989 事件 20 周年。另一是非常糟糕的经济形势。他们害怕失业问题引发的混乱和问题。……事实上，当警察审讯我的时候也提到中共高层今年特别的担忧，他们担心社会形势会相当严重。

乔纳森亚当斯：在《零八宪章》的传播中，技术有多么重要？

张祖桦：31 年前的捷克七七宪章，当时没有网络，因此文件传播相当困难。昨天，我 Google 了《零八宪章》，有超过三十万个相关网页。许多年轻人使用博客或 QQ 来广交朋友，他们也传播了这个新宪章，英文版的《零八宪章》也四处蔓延。因此，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当局已经不可能阻止社会获取信息了。

乔纳森亚当斯：您现在的状况如何？你还是受到监视吗？最近有没有被警方询问？

张祖桦：自 12 月 9 日以后，他们还没有直接骚扰过我。然而，有警察在我家大楼下“站岗”，他们也窃听我的家庭电话和手机。他们从晚上 11 时至上午九时切断我家的电话线。我还开玩笑说我要抗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很敬业——他们想休息，不想在晚上工作。

乔纳森亚当斯：您担心会被判入狱吗？

张祖桦：我并不担心，但我的家人和妻子很担心。当我开始进行《零八宪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预计到政府会有所反应，我可能会被拘押。因此我有思想准备。警察在审问我的时候也说，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他们将进一步调查，可能还要找我谈话。因此，我依旧面临被拘押的风

险。

乔纳森亚当斯：你为什么愿意站出来说话？

张祖桦：当我在警察局的时候，我告诉审讯我的警察，“在每一个国家，情况都是相同的。那些率先站出来争取人权和自由的人往往首先失去这些东西，为了其他人的民主和自由，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我真的不想被监禁，但我可能别无选择。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它不允许人们反对他们，不允许人们不认可这个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争取民主和人权，这是我们的责任。”

原文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

<http://my.opera.com/zhouxuenai/blog/2009/02/18/08>

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

崔卫平

这或许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那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面签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同胞、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请允许我将这其中的道理慢慢说来。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是可耻的；而如果自己愿意接受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也是令人羞愧的。

这份宪章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完美，包括宪章的签署者，也有人对于其中某些条款持有保留态度，这并不奇怪。在不能够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签署者都能够对此充分发表意见；某位签署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不能够马上征得其他人的同意，直接变成宪章的一部分。而明明知道这是一份并不十分完美的文本，为什么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签署者的角度来说，当这份文本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首先想到的是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认同我们的民族早晚会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一直在走）；尽管多年来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运用不同的方式，为这样的事业添砖加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之间手拉手、肩并肩的感觉，需要与朋友一道分享我们的思想，分享我们的风险，分享我们的责任和命运。

五月散人（姚博）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他本人的两次签名（另一次是声援刘晓波），都是在没有见到文本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这样的坦白令人拊掌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糊涂虫”！一道签名的人们当中，竟有此等不动脑筋的人！但是想想，其实自己的心态也与这位哥们差不

多：都是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是对于站在朋友身后的思想和信念的认同。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分离和孤独状态，我们不善于与周围的同胞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不善于与同事、朋友吐露我们心里最想说的。其实一个人藏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东西，而可能是这个人最好的东西，他的理想，他对于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他人有多么需要，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热爱。

大多数我们身上美好的思想感情，都被我们自己轻轻地压下去了，让它们像冻伤的手指一样，被牢牢地藏在身后。剩下来只见到我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胡吹海夸，云山雾罩，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都采取一种“打游击”的态度：“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绕来绕去，反正要把内心里“那点感觉”全部埋葬掉。有的时候，那点“感觉”，无非也就是热爱朋友了，想念朋友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

那是因为我们压抑下去的事情太多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将一件事情压抑下去，那么他就能够将另外一件事情也压抑下去，接着将更多的事情压抑下去。这种自我压抑与他人压抑一样，也是一种现成的机制。在今天，我们压抑得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依靠。

也许有人认为，切断普通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人们互相分离，是一种最为可靠的治理途径。但其实这样做危险性最大，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一个在思想上孤独隔绝的人，一个头脑密封、心灵关闭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会丧失对于事情的基本判断，丧失对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评价。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是往往拿不准，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恰当、中肯，因此需要向别人求证。如果别人肯定了我们的看法，自己便会觉得有某种成就感。哪怕不被肯定，但是有人耐心听了自己的表达，也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是那么遭人嫌弃，而是可以接受、得到接纳的。

然而假如他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始终不能讲它们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重要，是无所谓的，属于“无可无可”的，不会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听见，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无效的、无用的，慢慢地，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模棱两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连几岁小孩子都能够辨认的基本常识，也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一个丧失了常识的人，不是更加危险吗？一个不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他就不受任何限制，做什么也就可以了。在丧失常识感的同时，这个人还失去了自己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无足轻重的，无家可归的，因而他做事情便会有那么一种随意、任意乃至任性，这样的人下一步作出什么事情来，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的，这样脱离了社会脉络的个人，不是更加危险吗？

所谓公民，最低限度来说，就是与他人一道生活、互相投以关注、互相倾听的人们。他不是被迫远离人群的孤独者，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在身边周围人当中，在亮起来的公开场合，他的行为被人们所看见，他的声音被人们所听见，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他人评判，反之亦然——他对于别人的所作作为，也不会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意见看法，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不想遭受轻蔑侮辱，因此也不想蔑视侮辱他人。在他看来，轻蔑、侮辱和践踏他人，是一件最为丑陋的事情。

行文至此，有兴趣来回答网上看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金与他的黑人在一起，甘地与他的贱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与谁在一起呢？

首先要说，我们这些在签章上签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正好想当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的，我们并不构成与任何他人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恰恰就是“黑人”（借用你的语言来说）中的一员，就是“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与周围的“黑人”之间、“贱民”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拒绝人云亦云、发出不同声音时，就从任何接受“庇护”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这种跌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二，放眼望去，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民群众的整体”，不存在某个工人的或者农民的整体，现成地存在于某处，让某些个人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当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忍受孤独、因为孤独而感受自身的无效、无意义的时候，工人、农民们同样如此，只有更甚。所谓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依靠，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并非远离人群——而当我们互相团结依靠时，也是呼吁更多人们之间产生这种团结依靠；当我们互相在一起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人才走到一起的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之间的互相结合，而是与更大的整体相结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签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手机上有一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来短信，表达他（她）们的支持，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因为批评电影《集结号》而饱受网友们的密集炮轰。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强调我们是少数人的立场——即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法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

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我们都是一些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是要与学生讲道理的；我们当作者，是要与读者讲道理的；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是要与孩子讲道理的，作为公民，我们也是一直与政府讲道理的。

也就是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

2008年12月18日

http://debatechina.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8.html

我为什么要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梁文道

我在香港，有什么好怕的呢？

有。我怕丢了工作，怕今天的香港没有传媒敢再请我。我怕在大陆被封杀，再也无法在内地的传媒上发表言论。

可是身为一个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我时常感到惭愧和内疚。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凭什么我要比内地的同行能够享受更大的空间？为什么他们要比我冒更大的风险？

再看一眼这份宪章，它又说错了什么？它犯法了吗？有人认为它不切实际，但这世上又有哪一份理念性、规范性与指导性的文件是立即可行的呢？再温和的渐进改革也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还没有完全实践出来吧。

身为相当左倾的自由主义者，我不能理解当前各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和谜思，例如“普世价值”。不要忘记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普选权的扩大、女性的参政权、每日工作八小时的常规、一直到种族歧视的废止；有哪一次少了左派的声音和参与？在这个世界上，左派才该是最坚定的“普世价值”拥护者。什么叫做“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什么叫做“第一国际”？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共产党还会出现？起源於德国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说得通吗？在我看来，这份宪章背后的精神是任何真诚的左派都不能否定的（除了其“基本主张”第14条，我有所保留）。

身为一个佛教徒，我应当学习没有人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认为一个不好的制度不仅会有损众生，使他们受苦；还会令他们生起嗔心，仇恨所有在上位的人。相反地，这个制度虽然会令少数人得益；但却也会

零八宪章 ·

助长他们的贪念与痴心，甚至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更是一种值得同情的苦。所以，出于慈悲，我们应该不带愤怒，满怀法喜，去平静地谋求一个令彼此双方都得解脱于贪嗔痴三毒的方法。这份宪章也许就指向了这么一条出路。

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谓恐惧，往往有一部份是心理的幻觉，只要你走了过去，你也就自由了。更何况，这条路上不只你一人；如果有百人、千人、万人，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http://blog.pchome.com.tw/news/zygc/3/1311519978/20081215220137>

我为成为《零八宪章》签署人而深感荣幸

谢福林

《零八宪章》是绝处逢生的绝文章。于无声处听惊雷。由于抽象地看来，《零八宪章》是个中性、中庸、中立的文件，因此，该文件一发表，海外就出现了批评性文章。有的文章的中心思想，以没有主张“暴力革命的言词”而批评其是无效的“奏折”；有的文章的中心思想，以辛亥革命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交换清王朝退出政治中心的史事而批评《零八宪章》是过度的“通牒”。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零八宪章》是持中之论，既不鼓吹激烈的革命，也不提倡无条件的宽容。绝地反击，不能不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一条路”来，故谓之“绝文章”。

《零八宪章》是妙趣横生的妙文章。是的，《零八宪章》既放弃了“立德、立功、立言”这样永垂不朽的功利目的，也摒弃了革命、改良、禅让这些政治变更路径的探讨。《零八宪章》仅仅把对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社会的“模式”以“宪章”的名义广而告之，其不是暴力革命的宣言，也不是改良主义的方案，也并没有一厢情愿地递交一份请当局禅让的请愿书。《零八宪章》提供的是一个符合天文、地理、人心的中国政治的“路线图”，一份执政者不能回避的“政治道德的天平”。《零八宪章》既不是纯粹自由主义的，也不是纯粹保守主义的，既非左也，也非右也。因此，《零八宪章》不是党派的产物，不是民粹主义的梦想，她仅仅是占领了一个治国方案的“道德高地”。这个道德高地，体制内的人，甚至是这个政权中的高层人士，可向往之、仰望之、驱同之，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践踏之，也许当他们扪心自问时，会因其良心而首肯。匠心独运，运思巧妙，岂不妙哉？故谓之“妙文章”。

《零八宪章》是好文章。满腹经纶，织成锦绣文章。从文章看，这篇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很普通、很通俗的，正如海外有的文章所说，说的没有新鲜的东西，基本上是关心民主政治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早就设想过、表达过的“常识”。是的，《零八宪章》没有标新立异，也不想惊世骇俗，绝对没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狂妄。《零八宪章》说的是常人可理解、可接受的话语，仅仅是把沉默的大多数的共识“宣言”而已。正因为其争取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其放弃了学究式的文风、学霸式的口吻、学术式的演绎。字里行间，无一句不谨慎，无一字未推敲。以小小篇幅，写“中国”这篇大文章，老生怎能不拍手叫好？故谓之好文章。

绝也，妙也，好也！《零八宪章》并没有意图把这篇文章写成一篇檄文，也不是最后通牒，更不是宣战书。激进的话语，撰写者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革命的舆论，撰写者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造反的号召，撰写者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不是粗心大意，也不是饥不择食，而是深思熟虑也。不是胆小怕事，不是怕逮捕判刑，而是以心平气和的文风，以公允持中的条文，让久经“恐怖主义”与“神秘主义”统治 60 年的中国人，可以不心惊肉跳地读一读、想一想、传一传。其或许有妥协的嫌疑、有软弱的迹象、有点到即止的大意，而这正是撰写者的深入浅出。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名家手笔，反璞归真。真理是简约的、直捷的、清洁的。简洁、平和，目的是让大众理解，让大众同意，让大众传播，让大众努力。因此，假如这不是由于网络时代的“无纸化”，《零八宪章》必将“洛阳纸贵”，其风行天下的魅力，就因为其不须偷偷摸摸地在狭窄的人群中不无恐惧地观看，是的，《零八宪章》已经在广泛地公开地传阅。以其平实的文风与妥善的要求，让读者远离恐怖，诉诸普天下的大多数人的认识与良心，招呼“公民社会”的到来。

叫绝！叫妙！叫好！《零八宪章》的附署，将获得中国政治文件“之最”，这是有把握、可期望的事件。其词之和，其理之公，其义之正，浩浩荡荡，如春风回到大地，如甘霖降临旱土，迅速暖和了国人的心。无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分海内外、党内外，也勿区别朝野、贵贱、贫富的界限，不排斥任何族群、宗教、信仰、文化、职业者。《零八宪章》矗立了中国政治的道义标准、合格标准、审判标准。人人如果以其获拘留、起诉、审判，人人可以信誓旦旦、义正辞严地宣称合法合理。因此，这个大进若退、大刚若柔、大得若失、大智若愚的文件，必将载入史册。《零八宪章》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撰写者，不属于签名者，其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中国人民，属于太平洋两岸、亚洲东部这 960 万平方公里、5000 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政治文明史上新鲜的一朵瑰丽的奇葩。《零八宪章》的宗旨是求和谐、和平、和睦，和其大同，其文贵“和”，故行之远、行之久也。

2008 年，国际人权日，有幸拜读《零八宪章》，不能不为之叫绝、叫妙、叫好！绝文章、妙文章、好文章，绝美妙文章！请让我们为《零八宪章》干杯！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1/20090106221657_12900.html

与美国外交官谈《零八宪章》

沙叶新

戒备森严与退休的乡村教师

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发函，邀请我参加 1 月 16 日为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所举行的午宴，于是我准时前往。行前，女儿提醒我，说这不是一般餐会，而是正式午宴，要着正装。我因大病一场，特瘦，所有西服大得无法穿，只得着平时的便装，在衬衫上系了根领带就出席了。

当天我准时抵达领馆门前，警戒线后的有一位武警小战士，单纯而稚气，我礼貌地问他：“请问，这是美领馆吗？”

这位小战士警惕地把下巴微微一扬：“干嘛的？”

我惊讶得后退一步，怎么这般的口气和眼神？我虽没穿正装，也还不至于像恐怖分子呀？

我回答说：“我是来参加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的午宴的。”

“请柬！”语气仍然很冲。

我递上了请柬。但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样的语气和眼色，忍不住地但很和善地提醒这个不太和善的小战士：“我对您说话都用‘请’字，您能不能对我说话也用‘请’字？”

他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此时一个似是班长的武警过来客气地说：“先生，您提的意见很对。”

“谢谢。”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

我取出身份证件。班长接过，交给另一战士去值班室登记，然后对我

说：“请您稍等！”

门口已陆续到了另三位客人，也都出示了请柬和递交了身份证件。这时我才注意到领馆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早已集聚了一排公安、武警，戒备甚严。

登记身份证件，几乎用了 10 分钟！登记完毕，始能进入警戒线。可进入领馆前，还要经过领馆的一个窗口，还要再次出示请柬和身份证件，交给领馆的人员核查。进入领馆后，也还没完，又必须通过安全检查，将你的手机、提包等物放在安检机的传送带上通过……如此繁琐，令人厌烦，我恨不得趴在传送带上一块儿通过安检机得了。

后来我问一位美领馆的前商务参赞，我说，我以前常来美领馆，没有这么多的罗嗦嘛。她说，这是 9·11 之后，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驻在各国的使领馆加强警戒，以防万一。尤其最近几年，某些地区的美国使领馆频频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因此防范得比以前严紧。但尽管如此，美国对前总统的安全保卫，也要比中国对前主席的安全保卫要宽松多，至少是无需封路，也无需动用众多的警力。当年独裁国家的元首希特勒出行，警卫数千人，而民主国家的首相丘吉尔出行，警卫仅寥寥几个人。如今依然如此，我释然了。

进入领馆，一位美国女士，笑容可掬，迎上前来，将我和其他中国客人引领到主楼。在一楼的会客厅，我看见了卡特，满头银发，面有光泽，目光柔和，神态安详，上身灰色西服，下身浅色西裤，西服里边羊毛背心套着黑色衬衫，领口敞开，未戴领带。他或坐或立地和周围的人轻声地说着话。这就是今日的午宴主角？昔日的美国总统？毫无威仪，亦不作态，自然和寻常得像是早已退休的乡村教师。

未受传讯却受到美领馆的关注

朋友要把我介绍给卡特，并问我要不要向卡特介绍我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我说不要，只要介绍我是剧作家就行。《零八宪章》一事极为

敏感，在《零八宪章》公布前夕，签署人之一的刘晓波即遭拘禁，至今还未释放。其他一些签署者也陆续被国保或国安传讯。我本人有点例外，未受到传讯，却受到美领馆的关注。那是在我签署《零八宪章》之后的第二天，即 08 年 12 月 11 日的上午，我接到美领馆政治经济处处长莫雷先生的电话，我并不认识他，他自我介绍后，便问：

“我们很关心你签署了《零八宪章》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我说：“暂时没有。”

他说：“那就好。”

我说：“上海可能会好一些。”

他也说：“是的，但愿你平安无事。”

我说：“谢谢！”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除了在 08 年 12 月 17 日下午，我单位的领导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来我家非常友好地“关心”了一下之外，我也基本上“平安无事”；但这不等于今后无事，永远无事。因为此事还在发展中，签署者的人数在重重阻隔中仍然越来越多，而官方的压力在国内外的抗议声中也不见丝毫放松，双方还在对峙，还在博弈；我要做好万一的筹算，最坏的准备，但我绝不畏惧！

其实在我自从签署《宪章》的那一天起，我就深知此举之风险，就一直准备着被传讯甚至被拘禁。我郑重地签署了这个《宪章》，我就要理所当然地承担一切可能由此而引起的责任和后果，而不能期望任何人为我承担或分担。所以我签署《宪章》之事没告诉妻子和孩子，也没告诉我最亲近的朋友，为的就是我要独自担当。对亲朋好友我尚且如此，在一个外国的前总统面前我更会如此；国际友人在道义上的支持我当然感谢，但我绝不会请求保护。这倒不是担心“里通外国”，而是独立性是我恪守的做人的尊严。

况且我毫无畏惧，何需保护！如需保护，也只能是我的国人、我的同胞、我的同志、我的盟友才能真正保护我。他们与我感同身受，同舟共济，唇齿相依，血肉相连；他们才是我的坚强后盾，才是我的坚实靠

山。我宁愿卧倒在同胞的怀里，也不希望庇护在异族的背后。这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并非怀疑国际友人的诚意，而是自己民族的苦难，只有本民族承担；自己脖子上的枷锁，只有同胞才能解放。

卡特对《零八宪章》的态度

筵席是张长桌，卡特和他的夫人分别坐在两边的中央。我正好和莫雷先生邻坐。他向我介绍说，这次请了 15 位中国客人，都是上海各界他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名单早在一个月以前就由总领馆的政治经济处和文化处共同商定，最后还请卡特看过。聊天时，莫雷谈起卡特的北京之行，我问莫雷，卡特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有没有说起《零八宪章》。莫雷说：

“没有。卡特这次访华主要是为中美建交 30 周年而来，他虽然没和中国领导人谈《零八宪章》，但他非常重视人权。这次邀请你来参加今天的午宴，也表明美国政府和卡特本人对人权以及对《零八宪章》的一种态度。”我当然领悟这种态度。

其实《零八宪章》，是温和的、理智的，富有建设性的一个政治文本，它的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早已是先进国家普遍认同的政治常识，也是当局一直反对，而今又不得不有选择地加以承认，甚至还宣称那些被迫承认的理念居然是自己的一贯宗旨。《零八宪章》中的 19 项基本主张，也是在现行宪法框架内所提出的友好的政治协商，真是一片爱国之心，满腔爱民之意，何曾“越过底线”？哪里“推翻政府”？更没“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也希望有点“新词”，不要总是那顶戴破了的老“帽子”。当局如此反应过度，只能说明他们的脆弱和紧张。《零八宪章》没那么可怕，它只是谨慎地、和平地试图以最小的成本来赢得政体改革的善良试验，只是期望在民主问题上能够推动当局将花俏的嘴上功夫——“好东西”，尽快转为实在的脚步步伐——“真东西”。但《零八宪章》又是伟

大的，因为它是 1949 年以来，精英和草根的首次大联合，是各阶层民众、各专业人士的大联合！

《零八宪章》缺少世界和平主张

08 年曾是多灾多难的年头，09 年将是多忧多虑的岁月，几乎每一个月都很敏感，也许每一日都有危机。我诚恳期望当局不要作政治庸人，而要拿出政治大智慧、大魄力，以民族为念，以政改为导，以民主为务，以《宪章》为鉴，那么 09 年难以估计后果的种种危机将会一一化解为转机。

想到《零八宪章》，我竟在餐桌上走神，卡特正说起他上个月的大马士革之行，他希望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之后，美叙两国的关系能恢复正常，互派大使。座中有宾客问卡特，此行是否是奥巴马对他的授意？卡特笑着否认了，应该相信卡特所有为停止冲突、消解战争所做的努力都是出于他本人酷爱和平的本能。

美国另一前总统尼克松曾感慨地说：“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做卸任美国总统。”其实并非都如此。克林顿卸任后，就自得其乐，他善于聚财，环球演说，报酬甚丰。而卡特擅长调解，为世界和平奔波，也是乐在其中。他在任内曾促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达成首个和平协议而享誉世界，因此 2002 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而眼下他已 83 岁高龄，居然还一年两度地前往中东，为巴以和平继续努力，为世界和平献身。

我望着正在说话的卡特这位和平老人，很为《零八宪章》中没有世界和平这一主张而深感遗憾。我又在想，两国之间都可以化解冲突、通过对话，到达和解，以致和平，为什么一国之内，仅仅因为不同政见就视同水火，你死我活，就不能相互沟通，就不能和平共处呢？这是专爱窝里斗的国民劣根性所致，还是极权体制党同伐异的必然？我真希望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像卡特一样的和平使者，为之沟通、斡旋。当然这是我的书生之想，在目前的体制下，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 第一卷 我们支持《零八宪章》

午宴结束后，我走出美领馆大门，好像又看到刚才的那个单纯稚气的武警小战士，他那一身军装，十分威武，但我真不希望那是虎皮……

2009年2月2日晚上海善作剧楼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

胡 平

2009年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今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

2008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到了年终岁末，又出了这篇《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一发布，立即引发广泛而热烈的反响，连许多发起人事先都没料到这一纸宪章竟能造成如此轰动的效应。

说来也是，《零八宪章》所公布的理念和主张，没有一条不是以前讲过很多次的；另外，自“六四”以来的十九年间，像发布宣言（包括以宪章为名的宣言）以及征集签名这种形式的活动以前也不知搞过多少次。但没有一次比这次更有活力，更有声势，更显得有后劲。这当然不是说《零八宪章》完美无缺，更不是说以往的活动徒劳无功。应该说，《零八宪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次签名活动的巨大声势正是以往历次活动积累的产物。我们隐隐地感到，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正在向我们逼近。然而我们又都懂得，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注定要发生的，除非我们为之努力。

有人说，《零八宪章》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可持续性。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零八宪章》既有可操作性又有可持续性。那就是，不断地扩大宪章的传播，使之深入人心；不断地扩大签名，争取更多的人参与；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直到自由民主在中国胜利的那一天。

在互联网时代，《零八宪章》是谁也封锁不住的。我认为我们不必对宪章的文本过于挑剔，毕竟在现实条件下，《零八宪章》的起草和修改都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再说，《零八

宪章》并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一篇意向书，因此即便我们对其中的若干表述不满意甚至不赞成，那都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上面签上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着力点。《零八宪章》平等地面向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没有所谓精英与草根大众之分。它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集合点。事实上，在《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中，就有很多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包括农民、工人、小业主和众多的维权人士。重要的是，不论你是何种身份，只要你参与了这一活动，你就证明了你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尊严、有血性的人，你就是未来自由民主中国的奠基人。

用实名签署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用实名签署表示我们不惧怕。尽管专制者总是不厌其烦地营造万民拥戴的假象，但实际上，专制者并不指望民众对他心悦诚服。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专制者还不放心别人由于赞同而服从，因为那意味着，别人一旦不赞成了，也就很可能不再服从了。专制者要的就是，你明明已经不赞成了，但是出于恐惧而不敢公开表达，因而依旧顺从。专制者妄图改造我们的思想，其实它就是妄图消灭人性中最高贵的部分——人的自尊。什么叫改造好了？改造好了就是整怕了。是的，参与《零八宪章》活动是有风险的。但是正像一位签署者留言所说：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我们参与还有什么意义？《零八宪章》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一般人提供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表现自尊——你只要在宪章上签上你的名字就行了。在这里，风险比较小，普通人不是不能承受；意义却十分大。如果你犹豫，害怕；没关系，你可以再等一等。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签名活动必将越来越深入。它会逐渐形成一种滚雪球效应，人越多就越多越多。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零八宪章》就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运动。而伴随着签名运动的发展，将是人性的伟大苏醒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升华。到那时，中国不变也得变了。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ilan/shuwenpingjian/huping-01062009134429.html>

第二卷

《零八宪章》与中国社会转型

《零八宪章》与和平转型

一 平

—

12月9日，著名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张祖桦被北京公安局带走，并遭到家庭搜查。张祖桦被问讯12小时，之后释放；刘晓波被刑事拘留至今。张祖桦表示此次当局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起草了《零八宪章》，并发起签名。警方告诉张先生，事情还没有完。

明年是“六四”20周年、达赖流亡5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显然，中国当局的此次行径经过反复权衡，其中也必有各派的争执，但这是他们最后的抉择，下了很大的决心。这是一起重要事件，将标志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转折。

《零八宪章》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说是建立中国民主社会的纲领。它是完整的，也是成熟的，更重要的是它集中了民意，是为大多国民所期望所认同的。首批300多名签署者，包括作家、学者、律师、记者、工人、农民、企业家及共产党干部等，他们实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体现了广泛的民意。自1978年民主墙，经过30年的奋斗，自由民主已经不再只是少数知识人的意愿，而且在民众中扎下了根；其不再只是理想，而且有了改变中国现行制度的完整思考和设想。《零八宪章》体现了中国民意所期盼的中国。徐文立先生将之比喻为“捷克《七七宪章》，当代的英国《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他说：“中国在政治上似乎又进入了严冬，但正在这个艰难时刻，中国大地上响起了一声春雷，这声春雷就是中国的《零八宪章》。”

中国当局逮捕刘晓波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对《零八宪章》的签署

者进行了监控和传讯。比如，浙江的温克坚，深圳的赵达功，上海的郑恩宠，北京的江棋生、浦志强、余杰，海南的秦耕等都被当地警方传唤、约谈、跟踪、或限制行动自由。另外，全国范围内许多未签名的“敏感人士”也都遭到警方的调查，警告他们不要签名。各网站、博客凡转载《零八宪章》均被删除。显然中国当局对《零八宪章》高度紧张，以致调动全国警方调查《零八宪章》的情况，对之封杀。的确“事情没有完”，后面将由持续动作，当局对《零八宪章》的镇压正在扩展。我们为所有签署人的安全担忧！也呼吁世界各政府、人权组织及各界人士，关注他们的安全，为释放刘晓波呼吁！

当局的镇压体现了他们对《零八宪章》的恐惧和敌意。《零八宪章》是中国蕴含的希望，濒临崩溃的社会应该由此整合建设。但是当局对之实行镇压，甚不明智，这实是与民意为敌，扼杀中国的希望与前途；他们是孤立自己，加剧政权与民众的分裂敌对，使整合社会的希望更加渺茫，而且这也将使统治集团内部进一步分化。这让我们想到戊戌变法。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族权贵，弃全民全国之大义，而保满族统治之小利，“宁给外贼不给家奴”。由此，导致中国百年来之灾乱；而满族的权力最终也没能保住，全族也走向衰亡。今天，当局镇压《零八宪章》是保一党专政，而弃国家民族之未来。如此下去，中国将会重蹈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覆辙。

二

1989年，刘晓波由美国赶回北京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基于他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对极权制度坚决的憎恶和反叛，其中也包含他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六四”后，他被捕入狱。面对生死，他软弱了，做了反悔。虽然今天人们已经不会像上世纪革命年代那样看待人性的软弱，北明曾撰文写道：“刘晓波在‘六四’屠城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杀人的枪口前，与戒严部队谈判，并说服学生，组织他们撤离广场。……至于对自己写悔过书一事之忏悔，是他个人的权利，

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别人是无权指责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宽容和人道地对待那些曾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过努力，承受过苦难的人们吗？”但是刘晓波并没有原谅自己，而将之作为终生的耻辱。他说：“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

“六四”的血以及他的羞辱感，一方面促使他更坚定地批判中共的极权统治和制度，所谓知耻而勇；另一方面它也对“六四”、中国的民主运动及个人作了深入反省。“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间，他三次坐牢，其余的时间非软禁即监控，但是这没有停止他对极权的批判，为中国社会争取自由的空间，几乎在每个关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如果说，首次坐牢之前，他是一个反叛者，一鸣惊人的黑马；那么之后他逐步成为了一个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他说：“应该为六四亡灵及其难属们做点什么，……应该自责和内疚，应该坚守做人的底线，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他之所以留在中国，就是要承担“六四”留给历史的责任，为他的耻辱“赎罪”。“六四”的血改变了他。

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该文献体现了他有关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完整思想。虽然《零八宪章》的基本精神在《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七七宪章》中早即存在，但是重要的是《零八宪章》切中中国极权制度的要害，公开完整地喊出了当代中国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要求，是结束中国集权统治的宣言。二十年前，自由民主还是中国人的理想，尚缺少具体的现实内容。但今天，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已经生长于中国社会的实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晓波已经走出了“三百年殖民地”的愤世妄言，而让自由民主的精神进入中国的现实。自然，《零八宪章》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所有签名人的共识；但是他的信念在此。

近年来，刘晓波遭到许多指责，比如“投降派”、“跪着造反”、“被

收买”等等，这主要是因为他倡导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反对“以暴易暴”的革命。出于和平转型，他提出“责任伦理”、“程序正义”、“以最小的成本求取最大社会公益”、“切忌以牙还牙”、“切忌一举清除所有罪恶和实现百分之百正义”等一系列的主张。刘晓波——叛逆的黑马——原本是很极端的，不仅是他的思想，而且也是他的性格。他由极端转向“温和”，是根于“六四”那些死难者。在对残暴杀戮的愤怒与谴责之外，他也反省了自己和反对派的责任。在我们的正义、理想、高尚、英勇之外，要不要对那些普通的市民、学生的生命负责？是不是为了前者就可以牺牲他们的生命？理想、正义是为了什么？“在我理解，良知包含着勇气和责任。……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黎明，既让我体验到面临大恐怖时生命的脆弱和光辉，也让我懂得了反抗独裁的责任伦理。只有以谦卑之心仰望在天之灵，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他的痛苦和追问刻骨铭心。由此他进而反省了中国以暴易暴的历史和革命。如果没有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没有对普世众生的切实责任，自由民主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为了“正义”置千百万普通生灵而不顾，那么这种正义也就站到了屠杀者的一边。当初中共的政权就是为了“正义”用千百万人头换取得。“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坚持渐进和平转型“是为了从此结束数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历史”。

无疑，正义是人类存在的尺度。但什么是正义？正义为了什么？如何实现正义？正义的结果如何？这些则是正义的具体内容。在许多时候，正义实行的方式和结果重要于正义本身。因为正义是意识，是主观判断，而行为和结果则是实际。而且正义作为绝对精神，是无限的；而存在是有限的。以无限取代有限，就是对存在的否定和消灭。因此，正义必须要受方式和结果的制约，以广阔的人道为目的。仁以义为度，义以仁为鹄。否则正义就可能转为暴行泛滥。基于此，刘晓波提出责任伦理、程序正义，也就是要求正义、真理要对事物的结果负责，对社会民生的生命权益负责。“最让我和妻子撕心裂肺的是，（‘六四’）那些被嗜血者轻易地剥夺了的生命，都不是精英，而是平民百姓，他们只想过普通人的

生活，得到平凡的幸福。”责任伦理得于“六四”鲜血，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贡献。

“我深知，中国迈向自由国家的进程，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坚韧和清醒，理性和责任，信心和乐观，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更加珍贵。”一个古老的有深厚专制传统，且而又经有半个多世纪极权统治的民族，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异常艰难，并需要长久的时间。基于对中国清醒而深入的了解，刘晓波提出理性、非暴力、依靠民间，坚韧、持久地奋斗的道路。“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尊重民众生命权益，对之负责的“转型”道路。

《零八宪章》的结尾写道：“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道路，但是理性所能看到的，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社会公益之路。至于，这条路是否行得通，也不仅取决于民间，也要看当政者，是否给允许异议存在，是否给民间以生长的空间，是否接受政治变革，是否愿意“共同推进”。如果他们执意要向回走，比如逮捕刘晓波，镇压《零八宪章》和它的签署者，那么中国也就只有走向崩溃和暴力。不要忘记，中国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社会也聚集了足够多的仇恨。并不是说，民众没有暴力反抗和暴力推翻极权统治的权利，而是近百年来中国破坏得已经甚为惨重，人民已经流了太多的血，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是出于他们的利益，中国需要和平变革。放弃暴力革命是民间的妥协，但是权力者将怎么做？

2008年12月12-14日

当宪政钟声响起

——新年献词

陈奎德

重叠共识的凝结

上苍掷下骰子，魔幻的硝烟散去：2008 年中国，破土而出，全球瞠目结舌。年终，国际舆论对 2008 中国划下了四大惊叹号：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经济滑坡。

不过，笔者的预感是，几十年后，倘若人们回望 2008，首当其冲铭刻青史的，却是另外四字：《零八宪章》。

虽然，这份已经超过 7000 位公民签署的宪章，迄今尚未出现于中国大陆的任何正式报章杂志上，其名也未见踪影，甚至有签署者已丧失了自由。然而仔细寻思，这恐怕正是其力量之所在。

原因无他，封锁和拘押的背后，藏匿着恐惧。（自然，是不必要的恐惧。）

沉迷于音乐者都有切身体验，一个小小的乐思，在时间的进程中会神奇地展开，随乐思的自由奔流，扩大、缩小、倒影，转位，模进，如涓涓小溪汇成江河，如浩浩江河破峡穿谷，春潮汹涌，洋洋乎平川无垠，最后归于包容万象的大海——结构严谨，气势弘阔，壮丽辉煌的交响乐章。

《零八宪章》，就是中国的“乐思”——宪政之声。它给自己派定

的使命是：梳理千溪万壑，汇成公民之海。

圣经有言：“但有雾气从地上升腾，滋润遍地。” 我们看到，它来了。

对过去而言，《零八宪章》就是六十年来潜潜流淌的自由乐思汇聚成的一个总谱。仔细聆听辨认，隐隐地，我们听出了林昭，那一缕柔美的乐思，如何像种子发芽一样，被她自己殉道的血滋养成参天大树；我们听出了遇罗克，在奋笔疾书《出身论》时沙沙的运笔声；我们听出了1976年四月五日那遥远的呐喊；听出了1979民主墙下的诵读；当然更听出1989年春夏之际那动地滚滚的天安门之声；以及之后，柏林墙倒塌时沉重的混凝土着地声和捷克的天鹅之声…。

对未来而言，《零八宪章》自己又将是一缕乐思，潺潺运行，启动并展开新的乐章。

《零八宪章》诞生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氛围，恰如哈维尔回顾的捷克《七七宪章》当年：“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觉醒的迹象，当然，是在所说的少数人内部。很多人开始从历史的震荡中苏醒过来；很多人抛弃幻想，开始真正自由地思考问题了；很多人已‘厌倦了自己的惰性’，开始意识到不能老等待别人（上面的？外来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很多人已不能忍受总是被动地充当历史的客体，重新感到有必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历史的主体；很多人感到社会避难所里的沉闷空气令人窒息，从而感到为改变共同命运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过去一直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现在人们渴望冲出樊篱，走向社会。人们也感觉到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意识到了自由的整体性，懂得了对某个人自由的侵犯也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践踏。假如在某人受迫害时大家都袖手旁观，那么最后谁也不能逃脱受压迫的厄运。”

于是，起而联手行动。

对照当年捷克与当前中国的精神状况，特别是知识界的心路历程，扑面而来的历史相似性令人惊诧莫名。

是的，《零八宪章》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主张，它是当今世界的ABC，

是现代国家的天经地义。中国若不欲成为文明人类之外的孤岛，迟早得走上这条路。

人们注意到，即使如此，仍存在一些对宪章内容的质疑。的确，它需要接纳严谨的审视和批评，以完善自身。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即使是批评者，绝大多数亦声称，认同宪章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这就表明，宪章大体上是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33-168）的。事实上，在现代多元化社会，要想在所有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在基本政治问题上的一致又是社会稳定所必须的。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的概念，提供了现实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宪政架构。在现代社会，尽管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各各不同。但是，它们相互间却有其交叉重叠的部分。这重叠的部分虽然不多，却极其基本，堪称核心。《零八宪章》所欲揭示的，正是这种“重叠共识”，即“最大公约数”。罗尔斯的重叠共识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所规导的；第二，这种政治观念是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到重叠共识的核心；第三，当宪法和基本正义问题发生危机时，公共讨论是按照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进行的”。这正是《零八宪章》所力求达成的，也是即将面临的宪章运动需要竭力满足的。

有人说，《零八宪章》在此全球金融海啸时刻出手，时值自由制度时运维艰，天时不利也。对此，笔者并不以为然。老实说，此时出台，实际上正表明签署者对其信奉的基本价值的自信，一时之风浪，更凸显了签署人的气度和高远眼光。基本价值的重申，在风调雨顺时和在惊涛骇浪时，其份量是截然不同的。

更重要者在于，对当下中国，《零八宪章》的意义，主要不在其文字，而在其签署行动。把自己的真名签上去，等于出席一场公众集会，等于交托一份庄严承诺，等于投出自己神圣选票。因此，这份承载重叠共识的精神宣言，就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自然，更是一次公开负责的政治行动。

要言之，各种不同观念、思想、身份的人的实名签署，大家以自己的信誉乃至安全做担保，公开其重叠共识，凝结成沉甸甸的分量，引发更广泛的宪政共鸣，这就指向了未来。

有鉴于此，不可避免，它将面对严酷压制，将历经千锤百炼。北京当局将一如既往，精确的遵循有识之士对它的预测，走上抓人、抄家、恐吓、判刑的老路，而面对国际压力时，重施回避、撒谎、黑箱操作、底盘交易的故伎。如此，重蹈覆辙的中南海主人，势必亦步亦趋地跳起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统治者的旧式狐步舞，他们的镇压将飞快积累宪章运动的道义力量，加速社会共识的形成，催生公民社会。倘若幸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宪章运动将逐步被磨砺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创世纪”点。

我们对此怀有谨慎的期待。

外交与宪章

人或问，《零八宪章》与外交，有什么关系？众所周知，北京当局曾信誓旦旦，要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确，当局也使出浑身解数，施展各种外交技巧，借以改善自己的外交处境，从而挤入“强国俱乐部”。无奈，总是收效不彰。譬如，最近金融危机时刻，北京曾私底认为，现在该是西方朝拜自己的时候了。然而事到临头，远非如此，甚至逆向而行。譬如，中南海发现，近来中欧关系反而日益疏远。特别是过去还算乖巧的法国总统，居然不顾北京多次威吓阻扰，坦坦然然，会见了达赖喇嘛。对北京而言，情何以堪？

原因何在？中国有一句告诫诗人的老话，叫做：功夫在诗外。对中南海，倘若要从根本上改善外交环境，也得听懂类似的一句箴言：功夫在外交之外。

恰如一位法国公民所说的，那些认为为了一个达赖喇嘛不值得同中国闹翻的人们使我想起了当初有人曾经说过，为了一个索尔仁尼琴不值得同苏联对抗。法国早就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阿谀奉承以及派遣前总理拉

法兰对中国道歉的行为了。现在是所有欧盟国家协调一致共同承担责任的时候。

外交技巧云云，只有在国家定位和方向确定后，对于接轨国际社会，才有其价值；否则，雕虫小技而已。而《零八宪章》运动，从根本上看，正是意向鲜明的国际接轨行动，是跨入文明人类的通行证。同时，也是根本改善中国外交环境的方向。

改变外交处境的枢纽，是国家定位。是内政，是善待自己的国民，是走向《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与国际主流秩序的亲缘关系是毋庸讳言的。这不是其缺陷，而是其长处，是其赢得历史的重要保障。向宪章规范的过渡，就是向文明世界过渡，这是改善中国外交境遇的治本之道。舍此，没有其他捷径。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 2009 年门槛上。无需深邃的洞察力，也不难想像，新的一年，风风雨雨将不绝于途，它势将载入史书。原因无他，盖源于从民间到官方都隐匿于心的某种莫名的精神亢奋的预期，源于政治的周期性震荡，源于全球性的基本制度力量。纵观历史，实际上，上述社会性的总体精神预期，本身就会转化为社会变迁的力量。当然，坦诚地说，在中国，上下双方，对时间的感情是不同的。在上者，是恐惧，在下者，则是期待。因为对既得利益者而言，时间不属于他们。

然而，既得利益者的命运也并非铁板钉钉，无可改变。历史转折关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每个人都不得不选择。只是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而已。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上位者的一念之差。歧路在前，须审慎三思。想想古罗马智者塞涅卡的话吧：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谨以此迎候 2009 年新春，迎候二十年前那未完成的交响乐章。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54>

《零八宪章》

——中国又一次叩响人类大门

北 明

《零八宪章》之前，《七七宪章》引发过两个公民行动，“八八宪章”和“九七宪章”。前者是英国要求立宪和选举改革，后者是苏俄、波兰等东欧国家境内的贝拉卢斯（Belarus）的要求民主。不过若论背景和命运，中国今日的《零八宪章》是捷克《七七宪章》的孪生兄弟。

几乎在所有相关方面，《零八宪章》都是《七七宪章》的扩展和深化。

首先是《七七宪章》所描述的捷克人权状况和人民精神状态与中国状况如出一辙，程度有增无已，世人有目共睹。其次，《七七宪章》全部诉求是人权问题，《零八宪章》提出的则是包括人权在内的中国全面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

《七七宪章》最初以地下版本在国内流传，后在西方（西德）媒体正式公布；《零八宪章》在知识分子信箱中征集意见之后，被迫提前上网，和英文版本一起传遍世界。

《七七宪章》公布之后两年半时间，签署人增加到 1200 人，签署人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但是由于官方的封锁，很多人是从官方的批判中获悉宪章之存在的。签名人的范围和数量因此无法充分展开。《零八宪章》，由于互联网的便利，在公布之后三天之内，303 名签署人已经增

至十二倍，并仍不断上升，签署范围同样打破阶层格局，扩展到大部分社会群落。

捷克胡萨克当局给《七七宪章》冠以很多罪名：“反国家、反社会主义、蛊惑人心、陈词滥调”，它的签署者则被扣上了大大小小的臭帽子：“投敌变节者”、“帝国主义忠实奴仆”、“破产政客”、“国际投机分子”等。政治迫害随之而来，从开除公职、剥夺其子女受教育权利、吊销驾照、驱逐出境、剥夺公民身份到拘留、审讯、监禁等。不少签署人最终被迫与秘密警察合作。《零八宪章》，中国当局比前捷克当局动作迅速：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亲自拍板，以《零八宪章》第 18 款与“颠覆国家政府罪”有关为由，拘捕、传讯两位主要参与者，而且全国统一行动，骚扰、监视、传讯、“约谈”各地签署人。

面对迫害，《七七宪章》在半年之后成立了一个“抵御不法迫害委员会”，专门公布为《七七宪章》遭收迫害的人的状况，为此，这个委员会的六位领导人，包括哈维尔，均以颠覆罪被判刑。《零八宪章》公布于世几天内，已有大陆、香港、美国多个团体和组织组成“后援会”或发表声明，声援被刑事拘留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抗议当局对各地其它签署人的骚扰。

《七七宪章》方式温和，采纳合法手段推进诉求：“即便‘宪章’认为某项法律条文不合适，它也只是希望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这也就决定了它与个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行为方式。尽管当局对它的上书表面上不予理睬，不与研究，它仍不断向国家机关投书进谏。”（哈维尔：论《七七宪章》的意义）《零八宪章》运用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提出各项主张，号召公民履行职责和义务，参与和平改制。所言所倡，没有越过宪法赋予的权利。

《零八宪章》意义重大，更在于中国现状和历史。自 1949 年中国自斩来路、截断历史以来，《零八宪章》第一次将 150 年中国历史转型，追寻民主、自由、宪政、共和的历程尽收眼底，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均是历代先贤（包括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为之献身的理想，因此它涵盖八九

学运、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右派鸣放” 等中国历次改革诉求，也代表很多体制内甚至中共官员的想法，其价值理念恒为普世常识。

由于中国政治改革迟滞所带来的时间和空间，民间思想界有关民主改制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已基本完成。中国知识界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认知和接纳，已经大大超过了苏联变革前十几年的七十年代作家水平。有关前苏联社会的报道历来鲜有，但一些报道仍可证明上述论断。苏俄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知交丽季娅，七十年代被苏联作协开除时，是得到同行们广泛认同和支持的。而她的抗辩遭遇到了同行们严厉的批判，批判语言充斥个人崇拜、意识形态化、阶级斗争味道，显示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与中国文革语言如出一辙（参见兰英年《寻墓者说》）。中国民众的觉悟和政治体制改革愿望，对比《七七宪章》的捷克相应状况，也大有过之。从《零八宪章》的签名的人数和速度、释放刘晓波的呼声和范围，可以明显触摸到民间为政治改革所激涌的热血。

《零八宪章》的诉求，不唯体现民间的愿望，也必然获得中共党内、军方内部、甚至高层内部开明官员的同情。很多迹象表明，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及其亲属对历次非人道政治运动有反思能力，而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经历上山下乡，思想格局开放、知识结构比较现代，其中不乏湛思通识之人。如果不是权力相关，如果不对良心说谎，他们不会认为《零八宪章》是无端挑衅政府，阴谋颠覆国家。

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零八宪章》的理性精神所依据的环境已经非常微弱。1989 年，手无寸铁的学生严守温和方式，并不时上缴民间收缴的军方武器，只因在戒严时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肯撤离，后被批评为激进；19 年之后，杨佳为寻求个人正义，执刀杀人，数名并未当事的警察倒在血泊中，被民众誉为“我们的英雄”，他的被处决引发知识界广泛同情。这之间，社会现实所导致的人心取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脚下的山坳，已经变成火山口，随时可能爆发。面临人权状况恶化的局势，当代中国的异议运动有强烈的激进主义倾向。海内外民主活动人士不少单纯持守民主理念，炎炎大言而不计效果，行为方式上拒

绝任何的妥协，甚至将操作方式和理念诉求混为一谈。刘晓波作为自由派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重要代言人，所奉行的是温和路线。他反对激进主义，主张务实理性，具体操作上不拒绝有限妥协。另一方面，他蔑视犬儒，坚持体制外立场，奉行独立原则，民主自由理念彻底而守恒。他主持起草的《零八宪章》，政治诉求坚定彻底，操作方式温和理性，是目前中国避免暴暴相因和无政府混乱中另一强权重新挟持中国的最佳途径。纵观中国局势，民间和平变革诉求之路已经走到了极限。

苏联和平改制成功，最直接依靠的是叶利钦个人的勇气；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成功，受惠于国门之外无处不在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国一百年来几度撞响人类普世之门而不得其入，此后逆流倒行六十年，拒绝进入世界家庭。不少中共大小官员甚至被自己一家之言的宣传攻势遮蔽耳目，拒绝了解历史、蔑视现代社会常识、不屑了解和感受国际现势，愚民未成愚己有余，沦为自己宣传的受害者。现在，大道隐蔽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民间广泛认同的《零八宪章》，提供给中国又一次历史机会，中国如何选择，将成为明年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

2008年12月14日于华盛顿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forum/forum090105002.htm>

梁启超之国会请愿运动与《零八宪章》

林文希

2008年12月10日发布的《零八宪章》说：“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仅仅用“立宪”两字就把1908年简单概括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里的“立宪”可能只是指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实际上，简单的“立宪”两字掩盖了《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

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位宪政家。早在1899年4月，他就写出《各国宪法异同论》，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对宪政进行系统的论述：何为君主立宪政体？何为共和政体？何为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分立？国会有什么权利？君主或总统有何权力以及怎么制约？公民有什么权利与义务？对君主立宪政体与共和政体介绍时，以英国和法国进行比较，认为英国君主立宪政体为

“完全无缺之宪政”，而法国共和政体为“纸上之宪法”。这些宪政思想通过他首次向国人作系统介绍。

他还首次对“宪法”进行定义，“宪法者，英语为 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成为宪法。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

从梁启超的定义可以看出，由于现在中国没有议院，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都不是“议院”，所以中共政府颁布的“伪宪法”不能叫“宪法”。《零八宪章》说：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宪法”，

还谈什么“宪政”。

其后，梁启超于 1901 年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鼓吹“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矣！”根据当时中国的条件，特别是民智的程度，他认为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

这是第一次提出“预备立宪”主张。他说：“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 20 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语于此。”对于如何从事预备立宪，他提出六个步骤：

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起，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如果仔细与后来清廷所采取的立宪步骤相比较，可以看出清廷基本上还是依照梁的步骤进行立宪的。加上他后来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代拟考察报告以及一系列奏折，梁启超俨然成为清廷立宪的指导者。再加上他倡导与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可以说，他就是轰轰烈烈

的清末立宪运动背后之“看不见的手”。

在梁启超的呼吁下，人们采取行动，要求清廷立宪。1902年，美洲华侨叶恩向清廷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此后，人们纷纷呼吁进行立宪，“立宪”之声不绝于耳。1903年秋天，柳亚子写了《中国立宪问题》一文，描述当时的状况：“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苗，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于我邦人之脑膜。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且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再加上1904年发生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人们认为是“立宪”战胜“专制”。当时《大公报》说：“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而且，战败的俄国以及土耳其、波斯等国家也纷纷准备立宪，“专制政体既劣败而不适于生存，是方为天演所自然淘汰”，而立宪是“时势所趋，事有必至，固非人力所能抗争者也”。

俄国立宪运动方兴，梁启超即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续纪俄国之立宪问题》等文章，为俄国呐喊助威，并且兴奋地说：“二十世纪之国家，终无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以顽强之俄罗斯，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呜呼！举天下之恶魔，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

日胜俄败的结果，加上战后俄、土、波等国家出现的立宪热潮，这对中国之刺激不啻火上浇油。再加上革命派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更是促使“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成为巨浪。率先公开行动的是驻外大使，3月24日，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维德、驻英公使张德彝、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大臣梁诚，联名《上政务处王大臣书》，电请宣布立宪。其后清廷重臣张之洞、袁世凯也电请立宪。一时之间，立宪之声，从海外吹向内地，从江浙吹向云贵，从四面八方震撼清廷。

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出特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上谕，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宪政，后来通过熊希龄找到梁启超，请他代写

考察报告，于是梁写出《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并协助杨度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

其后，端方与戴鸿慈根据梁的方案，联合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吁请预备立宪，以 15 或 20 年为实现立宪期。1906 年 9 月 1 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先行厘清官制上谕》，宣布进行仿行宪政。

然而，清廷并没有宣布何时进行立宪。于是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开国会”号召最早由杨度提出，梁启超接受杨度的主张：“至于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接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尊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

本来“权利请愿”是梁启超最早提出来的，早在 1902 年他就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英国的权利请愿运动，“总要自己去想，自己去求”。于是梁轻易地接过“速开国会”口号，开始鼓吹。

1908 年初，由梁启超之政闻社、张謇之预备立宪公会、杨度之宪政讲习会共同在上海成立国会期成会，“其独一无二之宗旨，则在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则不已焉。其为要求之度数，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勿得勿休焉。其为本会之分子，不以地域限，不以职业限，不以团体限。合多数之同情，许正式之要求，勿得勿休焉。此本会所欲以此自誓，而当与天下同胞共见者也”。其后，各团体分别派员奔赴各省，发动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

1908 年 3 月，河南首先在省内掀起请愿签名运动，并推代表赴北京呈递请愿书。继河南之后，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陆续有代表入京上请愿书。有的请求二、三年内召集国会，有的更请一年内即开国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如河南有四千余人，安徽五千余人，有的更多，江苏有一万三千人，而山西有两万人。有些省未及选代表入京，也展开了请愿签名运动，如江西、福建、贵州等省。在请愿高潮时，湖南女界还单独上了一道请愿书，一时传为美谈。北京八旗士民也有 1500 人上书请开国会。而山西，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两万人。当其代表到京时，在京山西籍官员驱车乘轿地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声势浩大，轰动京师，震惊朝廷”。一时之间，速开国会请愿运动遍及全国，形成势不可挡之潮流。

7月2日，政闻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电文说：“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人之心，长揭竿之气……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

这场声势浩大、来势凶猛的速开国会请愿浪潮，大大超出了清廷的预料，让他们感到难于应付。8月13日，清廷以“内多名悖逆要犯”下旨查禁政闻社，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这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因此结束。

虽然清廷下旨查禁政闻社，并没有逮捕任何一个社员，可见清廷的目的在于震慑，以抑制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这比起中共对待《零八宪章》运动实在开明多了。

不过，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却推动了预备立宪的进行，迫使清廷在查禁政闻社之后第14天，即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召集国会方案。

对于九年召集国会方案，梁启超不满意。于是又在1910年发起四次即开国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即开国会请愿运动，由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头发起。1909年12月16日，先后有江苏、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6省咨议局代表55人到上海，聚集于上海跑马厅预备立宪公会会所，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先后开会六次。会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拿出徐特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会场一下子群情激愤，“殷赤淋漓，众咸感泣”。

于是，决定合谋上书“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代表们甚至表示“不请则已，请必要于成，不成不返”。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激昂宣示：“不得请，当斧锧死阙下”，以“共负国家之责任”。也正是这个孙洪伊，积极发起后来的几次请愿运动。12月27日，大会决议组织33人

代表团，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即时进京向督察院呈递请愿书。在国会请愿代表团组成前后，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原政闻社常务委员徐佛苏，在上海与咨议局各议员取得密切联系，及时将梁的意见转达给各位代表。

《国会代表请愿书》说：“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实际上，清廷为了阻止请愿，当代表在上海开会时，就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请愿书递到督察院后，没有引起载沣重视。直到 1910 年 1 月 30 日，才发下谕旨，以国民教育未普及，拒绝了速开国会要求。第一次请愿因此宣告失败。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梁启超立即给徐佛苏、孙洪伊写信：“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即开国会目的不止”。

并且，为了推动请愿，梁启超于 2 月 20 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在《国风报》上，梁发表了《国会期限问题》、《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国家命运论》、《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宪政浅议》及《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文章，来指导与推动请愿运动。

虽然第一次请愿失败了，却使要求即开国会的团体越来越多。2 月 4 日，民政部六品京官黎宗岳等人，“联合在京同志数百人”组成“国会期成会”，致书各省咨议局、教育会说：“国会一日不开，国是一日不定；国势一日不定，国困一日不甦”，要求公举代表参加请愿。于是“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与“国会期成会”联合组成“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分电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团体，要求各派代表参加第二次请愿。

5月初，各省“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的分会成立，请愿代表陆续赴京。5月9日，徐佛苏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在《国风报》发表，系统阐述速开国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吾国若能速开国会，可革一切贫弱之根源”，认为今日为速开国会的大好时机，“如任此机之逸去，则转瞬风云勃起……则不胜今昔之感矣”。可见，他们看到了时局的紧迫。

这次的请愿代表，不仅有各省咨议局，而且还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等，有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参加。6月初，进京请愿代表已达150人，号称代表30余万人。16日，请愿代表80多人前往督察院递上请愿书十份。

此次上书的言词比上次激烈，以孙洪伊领衔的各省咨议局请愿书，直接认为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这次请愿的声势浩大以及言词的激烈，使载沣及左右大臣感到害怕。权臣中有主张“严词震吓”，也有认为这样反而会导致节外生枝。载沣最后决定采取较为强硬的措辞，于6月27日发布上谕，斥责请愿代表“谓议院一开，即足以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以“财政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理由，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敬告“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试图以此阻止请愿。

然而，就在上谕发表的次日，各省即有电到京，要求代表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7月27日，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清廷上谕，“全国人兵变与全国之民变比起于一二年之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

为了鼓动舆论，各省咨议局议员筹款，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由徐佛苏负责。一面痛诋清廷鼓吹立宪，一面作为国会请愿的大本营。梁启超每三、四天就在《国民公报》发表文章，鼓吹国会请愿运动，成为推动和指导请愿的中心人物。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扩大请愿规模，继续请愿“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以至十续”。北京同志会总部改名为北京请愿同志会，要求各省设立全省同志分会，并督促各府、厅、州、县成立分会。将国会与人民的关系，编成白话印刷品，广为宣传、演说，赶办签名，又议定次年3月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派50-100名代表赴京联合请愿。同时各省咨议局、各团体呈

请各省督抚代奏。特别强调“三次签名，须普及于农工商个界，人数每省至少百万以上”。

而留日学生得知第二次请愿失败后，5月25日，千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讨论第三次请愿办法，以为北京代表团之后援，决定“联合全国军学商各界团体，结成一大团体，合力为第三次之请求，并决定先由东京留日学界分电各省，坚持勿懈”。

为了动员各阶层人员参与请愿，促进即开国会成功，梁启超除了暗中主持与鼓励外，还写了《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在《国风报》发表，对各方面（摄政王、政府诸公、各省督抚、国中有闻誉之诸君子、一般国民、农民、国中有资力之人、留学生、资政院议员、）提出忠告和要求，希望积极参加与支持第三次请愿。特别是警告摄政王，若不即开国会，“则我王虽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复得”。

第三次请愿原定于次年3月举行，后来由于资政院的召开，以及国人收到日本吞并朝鲜，与沙俄签订密约，承认沙俄控制外蒙古等事件的刺激，于是提前到1910年10月即蓬勃开展起来。

早在7月1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时就议决：一、迅速函请各省代表团代表，至迟须8月以前来京；二、日俄新协定，关系中国存亡，代表应上书政府，执问对待方法，并通告一般国民，征求意见。同时向各咨议局联合提出两项要求：一，限制民选资政院议员，在此次资政院开院后，坚持“国会不开，则停纳一切租税”，“对政府提出增加租税之案，不得议决”，若冒昧议决，“一般国民，誓不承认”；二、拟请本年咨议局常年会，即以请愿即开国会为第一案，呈请督抚代奏，若不允代奏，“全体议员，同时辞职”。

7月12日，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召开第三次即开国会请愿发起会，绅商学界各团体到会者数百人，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积极开展宣传发起签名运动。而全国各地都掀起即开国会签名运动。这次签名，原定准备征集2500万人，虽未见最后的确切统计数据，但肯定远远超过前两次。10月30日，四川

国会请愿同志会成都开会，“到会者约 5000 人，签名册有三万余”，要求宣统五年开国会。可见规模之大。

10 月，天津、四川、奉天、福建等地都召开有两千至四千人规模的会议，要求督抚代奏即开国会请愿书。10 月 14 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开会，三千人当场签名，随即同赴抚院，要求代奏即开国会，巡抚总署门前呼吁之声喧天震地，并表示“如果此次请愿无效，学则听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咨议局亦不许开会，群起以死力争”。这种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10 月 7 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 17 人代表，向监国府呈递请愿书。9 日，再到资政院呈递请愿书。在面临瓜分危局下，请愿书沉痛激愤地陈说：“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要求必须在宣统三年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这份上书，给资政院以巨大震动。10 月 22 日，资政院开始讨论国会问题，湖南议员罗杰首先发言说：“国会速开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因外患日迫，非国会担负财政，扩张国防，不足以抵制；内政腐败，非国会与责任内阁对待，不足以促其负责，……故为国家计，万不可不速开国会”，要求资政院全体通过速开国会案，并从速奏请摄政王批准。

63 岁的江西代表闵荷生在会场大呼：“何人反对？请登台说明反对之理由。若无人陈说，即是全体赞成。请付表决”。议长觉得应投票表决，不用起立表决，被广西议员吴赐龄指为“先存袒护反对者之心”，议长被迫采用起立表决。于是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议员大呼“中国万岁，国民万岁，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参加旁听的中外千余人士也山呼。《民立报》说，“欢呼声、拍掌声、声震天地”。

请愿代表上书同时，又分工拜谒王公贵族，争取他们支持速开国会。当孙洪伊等人拜谒度支部尚书载泽时，载泽表示“我本倡议立宪之人，岂有自己反对自己的道理”，并答应将要求“对监国面述，并专折奏请”。26 日，载泽手持财政预算到资政院说：“因筹备新政库款为之一空，故今日补救之法，只有速开国会而已”。当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奏稿。

这次请愿还得到绝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等17省督抚将军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这对清廷造成极大压力。

本来，摄政王载沣认为“现时局如此颠危，民情如此奋发，若再驳议，汝等能别有善策以保治安而免祸乱乎”，也主张明年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并用“投票选举”产生内阁总理。但是奕劻等人以“来年召集恐办不及”。最后清廷决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

清廷把预备立宪期从9年缩为6年，一方面说明对请愿运动做了妥协，另一方面也表明拒绝速开国会的强硬态度。

梁启超看到上谕后，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三日上谕感言》，“时局危急，极于今日……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旬日以来，举国士輶诵，农释耜，共商走于市，妇孺语于闾，咸喁喁焉翘领企踵，庶几一朝换汗大号，活邦国于九死，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治。”坚持以即开国会为目的。与此同时，他又给徐佛苏、孙洪伊写信，鼓动继续进行第四次请愿。

11月7日，当北京学生提灯庆祝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时，资政院议员又有20人主张速开国会，言词颇为激烈。《民立报》说，这是“死灰复燃的国会热”。而且，直隶、奉天、江西、湖北、四川等省的部分人士仍坚持明年即开国会。南昌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11月8日-14日，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联络党政筹备会等39个团体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澂代奏，要求明年即开国会。

这次请愿运动是以奉天学生为主体发动起来的。因为东北面临日、俄的侵略，所以奉天的青年学生异常慷慨，誓死请愿。12月3日，奉天省城学生代表30余人到咨议局，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即开国会代表进京。咨议局副议长孙百斛、袁金凯表示恐难再行要求，当即有学生金毓黻抽刀戳指，以血书“至诚感人”四字，学生李德权持刀割左股，以血书“速开国会”四字，一时血贱议席，全场哗然。

4日，三千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6日，咨议局组

织省城 8 个团体及 46 个州县代表，聚众万余人，在议长吴景廉带领下，列队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大旗。万人双膝跪地、泣不成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希望“皇上勿忘老家，若东省不存，我们即欲哭请亦苦无地”。

锡良被感动，答应三日内代奏。12月 7 日，锡良上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引用请愿书说：“东省大势……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召开国会，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今朝野上下，无不公认国会为救亡之良药。……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开国会”。对此，载沣予以拒绝。

在载沣拒绝锡良的奏请后，奉天的学生请愿运动向全国蔓延开来。12月 12 日，奉天派出张兆麟等 10 人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北京，各界民众集会，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宣传国会请愿。

与此同时，天津学生请愿运动也迅速高涨，却遭到总督陈夔龙派兵警围困学堂，使学生更激愤。当奉天代表路过时，天津学生响应，出现“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奉天学生代表则每天在天津发表演说。

17 日，天津推选进京代表 8 人，“当场立誓，决不生还，如遇险阻，即等杀头”。18 日上午，牛医学堂有学生割指写血书，这个学堂因此罢课。随后，又有北洋政法学堂学生江元吉割臂肉写血书“为国请命，泣告同胞”，当场昏晕，轰动天津学界，于是高等工业学堂与法政学堂一律罢课。他们散发《江君元吉之血肉淋漓》和《天津学界公启》等传单，“现在国会问题，非令其速开亦开，不速开亦开不可”，号召“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务达目的而后已。”

12 月 19 日，天津学界全部停课 3000 多人集会，持血书多张，联合商务总会及咨议局议员，决请直隶总督陈夔龙代奏请愿书。后来陈夔龙代奏，要求即行召开国会以救亡。

然而，清廷却命陈夔龙“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陈

即派人四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然而，学生不顾禁令，继续请愿。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要求个学堂监督予以支持。学堂监督害怕，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派总兵以武力弹压。士绅害怕学生流血，提前将学生劝散。第二天，清廷谕令陈夔龙，对请愿“开枪弹压”。学生认识到和平请愿不会达到目的，于是自动返校复课。

奉天代表到北京后，一面上书资政院，一面进行游说。21日下午，赵中鹄、张兆麟等15人至庆王府谒见奕劻，正好肃王善耆也在庆王府。善耆问“明年即开国会，一切预备恐来不及罢。”赵中鹄说：“开国会所应筹备者，不过议院法选举法耳，若能提前认真赶办，只三两月间足以成就，何至赶办不及云。王爷如不俯允此请，代表等死此不他去”。说完众人呼号哀恳，泣如雨下。奕劻答应代奏后，众人就狂呼“万岁”。

24日，清廷下令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当他们准备去拜见军机大臣徐世昌时，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察厅，宣布禁令，迫使他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25日晨，代表们被强压上车，解送回籍。于是，第四次请愿运动以失败结束。

前后多达五次的开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许，只有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才能与之相媲美。

持续时间这么长、次数这么多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最终清廷镇压了。但是，清廷却没有因此而抓捕一个人，只是最后一次才准备“开枪弹压”，最终也没有开枪。甚至清廷还进行妥协，先宣布九年立宪，后又缩短为六年。

这比起现在的中共政权，无疑是开明很多。“六四”运动开枪镇压，学生遭到屠杀。而仅仅发布《零八宪章》就导致发起人刘晓波被抓捕，至今将近100天了，仍然还在关押之中。

如果也与国会请愿运动一样，发起民众进行请愿，我想中共肯定也会与“八九”一样进行开枪镇压。但是，即使镇压，现在的中共已经日薄西山，随时都有可能垮掉，所以不久就会对其进行清算。

<http://www.men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3/20090319074253.shtml>

治道变革的官道与民道

——琐记《零八宪章》与三农改革八大纲领

农学孟

我一直在想，建立一个不仰赖于官家的民间治理中心，也许是中国走出困境的路径之一，关于官民分权，也许有多种说法，诸如多中心治理，公共权力的社会化，社会扁平化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搁咱们国家来说就是，人民真正地当自己的家，而且不必通过人大和一府两院这样的传统权力结构系统。

然而民间的力量能堪此重任吗？这也是很有疑惑的。俺们龙的传人虽然一向讲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但小农意识却在几千年里深入骨髓，人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社会常态，爱有差等，任人唯亲讲究嫡系，这是咱们骨子里的东西，至于公共事务，肉食者谋之，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操这份心，如此则也无可厚非，小富即安嘛？小国寡民嘛？

可能是因为这种成见所致，我对所谓民间力量总是心有疑虑，君不见历代农民起义，最后也没走出治乱循环？君不见一代伟人毛泽东最后也落入一己之见欲家天下而不可自拔？事情似乎也没有糟糕到这个地步，虽然中国历史上官强民弱的绝对态势至今仍未有根本扭转，市场化改革三十年却有大的转变，民间自由度增加，民间资本累积似乎让我们看到的治道变革的新道路。

《零八宪章》是早就看到了的，它的主张我觉得很一般，不过是别人说过的话，被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又汇总了一下，且纠集了一大批公共

人士其中不乏异议分子，于是乎有了规模效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但《零八宪章》的一个最大缺点，在我看来就是它对官家的期望太高，而对民间力量的汇集和建构的关注明显不足，当然，我们要知道这是在中国，能迈出第一步，有了一点点跟官家竞争的意识，已属相当不易，在此要向这些仁人志士表达一介草民的钦佩之意。

而这份收权治官还权益农的三农改革八项主张则在操作思路上有了明显进步：第一，它也是一份纲领性文件但更具体，没有走大而化之的套路；第二，这份文件的思路是明显的官民两路，正如网友评论的那般，八项主张明里是对官家敦促，暗则是给农民打气鼓劲，对官家施压与鼓励农民联合抗争相结合，这种思路暗合本人对建立民间治理中心的期待。我对当今体制内的变革已经变得极为悲观，原因是寡头和权贵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内部力量难以撼动其根基，即使有变革，权力也不过在社会上层转转手罢了，何时能轮到人民获得改革之利呢？所以俗语说的好，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不是英雄好汉，这就对了，农民的自己的事情是什么呢？以前是种好地，现在事情更多了，种好地，教育好子女，管理好村子，处理好跟官员的关系，打好工，养好身体，应对种种危机……，很多很多。既然社会都在进步，农民不可能一万年不变。这些事情靠不得别人，就要靠农民自己，靠农民的联合，靠农民的努力，靠农民的抗争。

怎样务实地推进中国的治道变革，这是本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十分惭愧，虽然鄙人也是农民出身，网上也能天天看到无数关于农村危机农民疾苦的报道，却从没有太关心，总以为农民的事情都是小事，而且也就这个样子了，关心了又能怎么样呢？我能做什么？前几天偶然在鄢烈山博客上看到收权治官还权益农的八项主张，忽然心中一动：我们对农民的忽略已经太久了！八项主张已经很系统化了，鄙人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认为很好，抓住了农村问题的要害，尤其是这里面提到农村被抽空的现状，我也有很深的体会，农民无权的情况，表面上看是局部现象，可我深知，其实是农村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真如呼吁书中所

说的，农民能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财产和行动，农村真的能自治了，农民真的平等了，也许就会有更多人才流向农村，毕竟乡村是多少人魂萦梦牵的地方啊！

依鄙人愚见，三农改革八项主张也有缺憾，比如对官家期待色彩仍显过重，比如发起人的情况没有向公众透彻交代，影响了纲领的号召力。但也许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也未可知，许是鄙人求之过于苛刻了吧。总之，从《零八宪章》到八大主张，我看了中国变革的希望在民间，力量源泉也在民间，思想源泉兴许也在民间呢？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2/200902282036.shtml>

政治文明才是一切文明的基础

——也谈《零八宪章》

何于

《零八宪章》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鼓动人心的口号，但就是这些看似熟知的名词和平凡的话语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却有着石破天惊之效——因为这一切都是全人类的历史提炼出来的精华，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

我们经常说起文明，以为自己生活在现代，自然属于文明人了，而提起文明的反义词“野蛮”，人们第一感觉可能是比较遥远，其实，专制体制就属于名副其实的野蛮政治，而且这种野蛮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的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制体制有宪法而不履行，有法律而突破不了人治，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罢工、迁徙、信仰自由等等这些基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更不要说参政权、监督权了，而且这一切无处申张，因为司法也被专制者统治了。专制体制一切以保全统治者地位为先决，一切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重（自然会伤害民众的权益），这样的体制不是野蛮政治还能算什么？野蛮政治带来的后果是狂热的、贪婪的、恶性的思想和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而不断膨胀，理性的、正义的、善意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受到压制而逐渐被泯灭。既然中国是在野蛮政治的统治之下，这个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恶瘤自然不可避免了，政府机构前所未有的庞大，贪污腐败盛行，恶官暴警横行，惊人的公款消费黑洞，明目张胆的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的巨大黑幕，大明大放的假冒伪劣，触目惊心的毒食品，丧心病狂的黑砖窑黑煤矿黑工厂，高医药费，

高学费，高税费，高房价，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社会底层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官方和资本家互为代言人而民众失去话语权，使得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总是被“国情”“特色”等名词掩盖，总是被描绘地“有理有据”“富有哲理”，而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和谐”掉了……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野蛮政治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比其它野蛮行为大的多。那句被我们重复了一万次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已经说明了一切，而统治者对《零八宪章》的疯狂打压更加印证了这一切。

文明政治才能保障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才能保障文明生活，文明生活的人才算的上文明人。政治文明是进入世界文明的一道坎，不能说秦始皇上了电影就是文明人，不能说我们办了奥运会就是文明人，也不能说GDP增长了就是文明人，我们连文明人最基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还达不到，其它教育、医疗、生老病死之类的保障更是奢想。

《零八宪章》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文明社会的标志，人权之保障，是文明社会基本的体现；思想之自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教育之平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全民保障之体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权力之均衡，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一切呢？不要跟我讲什么国情，国情就是拒绝文明？不要跟我说什么素质，中国人延绵进化了几千年还是野蛮人？不要跟我谈什么主义，马克思也说过：“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独裁者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独裁者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

只能说，一党政令如今的中国还在世界文明之侧徘徊，世界文明也在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中国这个还处于野蛮阶段的庞然大物。《零八宪章》建立起了民主思想的平台，带给我们的是世界文明的信号。我们是否能以这个平台为基础，统一根本之目标，这个信号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政治文明，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迫切而尖锐的命题。一旦跨过政治文明这道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善良和勤劳勇敢，我们一定能为世界之文明增添亮丽的风景。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wl/sj/200812/20081229101258.shtml>

《零八宪章》横空出世

——当代中国宪章派群体揭幕

牟传珩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社会危机感日趋加深，中国正处于世界现代化的政治转型时期。然而，中共当权者只是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围绕稳固一党专政与既得利益阶层的轴心展开改良，因此每当“改革”发展到涉及政治体制的深水区就陷入僵局，而执政党的政治领袖们却始终对世界民主化浪潮采取回避态度，借“稳定压倒一切”和“不争论”的托词，规避日趋强烈的宪政改革呼声。

眼下，关于要不要宪政改革和如何推进宪政改革的争论，正在成为当今中国朝野广泛关注的焦点。当此之际，今年12月9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的前一天，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呼唤宪政民主。宪章公布至今，签署人已经增加了近20倍，并仍有不断攀升之势，由此揭幕了当代中国的新一场宪章运动和一个宪政派群体的亮相。《零八宪章》一改传统中国仁人志士们“上书谏言”表达诉求模式，转而采用共同向世界发声的政治性伦理宣告，来申明他们的基本理念与主张，这便使《零八宪章》具有了划时代的韵味。

一、《零八宪章》的产生背景

追求宪政民主，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一梦。然而，中国至今也没有“宪

政”意义上的突破。这便注定了今日中国的所谓改革，非但没有克服新旧矛盾迭起造成社会危机，相反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推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将强化执政地位，而不愿接受现代权力分离与制衡体制，这就为官商集团的联姻和腐化提供了无法铲除的土壤。

眼下，官商集团已经形成联盟，正好借此“改革”之名，大行掠夺公共资源与侵犯民众权利之实。如今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严重，社会不公，两极分化已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各类社会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局势难以控制，早已越出了社会常态的范畴，民众情绪躁动、愤怒。杨佳袭警及瓮安冲突、惠州骚乱、孟连动乱、陇南抗议等群体事件，都在近期井喷式涌现，社会陷入了深重的“管治危机”。这说明今日中国正处于社会急需更新变革之前夜。

然而，今天的执政当局却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担当变革主角，而是以不痛不痒的修修补补策略忽悠百姓。如此“30年改革”的信誉已在民众中荡然无存，这不仅使得“改革”本身走向了死胡同，甚至使中共强化执政地位的目的也难以实现。这也就是说，拒绝实现“宪政民主”意义的改革，已经导致执政党陷入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便引发了社会对这个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普遍拷问。公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才授权政府管理社会，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产生的。于是，“人民同意”便成为解释国家政治正当性的基石。当政治正当性得到了“人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证明时，对政治统治的遵从就获得了正当性；当政治正当性被“人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否定时，要求变更政治统治就获得了正当性。如今，这一宪政伦理已成为普世价值，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应运而生，体现的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界对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拷问，和用“人民同意原则”建立“民主政体”变革目标的普世价值指向。因此，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与民众的愿望。只有把《零八宪章》放在它产生的这种社会背景与环

境中去认识它、把握它，才会对其意义有更符合实际的理解与升华。

二、《零八宪章》的历史传承

我曾在北京奥运闭幕之后发表的《奥运走了梦难圆——中华百年追求在宪政》一文中写道：“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从中国人民有了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晚清时代的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民主派争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问题的实质，就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基准究竟建立在哪里？是注重立宪的权威，还是权力的来源？在民主派看来，核心问题是谁掌握权力，只要人民掌权，共和就能实现，所以民主派强调国体，即国家由谁来统治；而梁启超派更重视政体，即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是共和民主，还是君主立宪是其次。立宪派们相信，只有宪政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然而，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由于政治精英们在政治正当性的问题上，更看重权力的来源，因此宪政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没有到位。这导致了民国时期虽有宪法，但无宪政，国家政局始终处于动荡状态，这便给了共产党人用暴力推动“苏维埃式的民主”以机会，在中国从此建立起一个完全排除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支票支撑起的集权于党的国家。直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又在所谓“大民主”的口号下，连形式上的宪法都被废除。中国如此漫长的现实，充分印证了没有宪政的正当性，所谓共和与民主根本无法保障。

就在中国的文革末期，同属“苏维埃式民主”国家阵营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等人发起了要求当局保护基本人权的宣言，史称《七七宪章》。从此宪章这一特定形式，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公民主张权利，呼唤“政治正当性”的载体。之后，《七七宪章》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美国总统布什 2007 年 6 月 5 日曾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民主与安全会议”上发表《历史表明，自由最终会征服恐惧》的演讲说：“虽然经过了苏联占领的漫长的黑暗时期，但这个国家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中，在七七宪章运动的吁求中，世界看到了自由的力量。”

是的，中国也看到了。中国的“民主墙运动”和“六四学运”，都深受这种“自由力量”的极大影响。“六四学运”被镇压后仅仅 4 年，1993 年 11 月武汉的秦永敏先生便与刘念春、周国强、宋书元、杨周、陈旅、李海、钱玉民、沙浴光等异见人士，就运用了宪章这一特定形式，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共同发表了《和平宪章》，呼吁中国政府与民间和解，平反“六四”，并倡导“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精神，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接着 1994 年 3 月 23 日，杨周、鲍戈等 54 人又联名向中共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具有宪章意义的《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文件，要求修改宪法、废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条款、取消“劳动教养”、开放党禁、报禁，建议军队国家化、警察中立化，推进经济私有化，废除户籍制等“十九条政纲”。上述两个具有“宪章”意义的文件的参与人数及影响力，虽远不及这次的《零八宪章》，但它们同样都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历史传承与《七七宪章》呼唤“政治正当性”的政治伦理基础之上，并直接连续着《世界人权宣言》的普世精神之源。

三、《零八宪章》的本质特征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曾提出，要理解宪章运动，不在于局部研究方法所提出的要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而是宪章派用以提出要求和进行辩论的语言。要认识宪章本质的特征，除了要从其产生的现实和历史背景的逻辑推演基础上分析，更要从其主体精神层面提炼，这就是由《零八宪章》所激发出的公民道德责任。在本文看来，尊崇人的

自由属性是实行宪政的根本依据，由此出发来认识《零八宪章》文本背后的本质特征，就会发现一种为自由、平等、责任而献身的“公民精神”。

《零八宪章》的联署，无疑是所有参加者们为履行公民责任而克服个人恐惧，发出明确目的和愿望的政治呐喊。正是由于这些目的和愿望，才诞生了《零八宪章》这一活动及其群体。宪章签名活动，就显示了这样的公民意识、良心和责任的觉醒，这便是一种新型公民运动的尝试。哈维尔在谈到《七七宪章》时认为：通过宪章的活动，人们希望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力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希望重新找回人的诚实和本色，从而恢复作为人的尊严。《零八宪章》的本质特征，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正如杨建利先生在《实名签署〈零八宪章〉的意义》一文中所言：“《零八宪章》最深层的意义不是为亟需的政治变局破题，而是启动公民意识的广泛觉醒和心灵解放。”为此，《零八宪章》用原则性的表述和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且充满技巧性的妥协用语，向社会传达了这个群体希望的未来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在这份全文约 4000 字的宪章中，提出了推动政治民主化变革的 19 项主张，而派生这些主张的内在灵魂，就是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

四、《零八宪章》的价值与启示

“文章千古事”。《零八宪章》无疑是一篇来自民间的宪政理念宣言书，因此它具有传代价值。这个宪章包括前言、基本理念、基本主张和结语四部分，旨在建设一个各种主张、思想和利益都可以合理表达，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的宪政框架。宪章指出：“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 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

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由此可见，《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观。其系统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等各个层面。而这些层面都是多少年来社会普遍关注，体制内外不断研究，异见人士反复探讨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零八宪章》表达的不仅是共识，也是一些常识。也正是因为它既是共识，也是常识，所以才更具有世俗的凝聚力。

《零八宪章》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它是通过宪章内容的传播、签名的聚集，甚至引起争议与讨论等一系列活动，启示民众借助这样一种形式，来伸张被权力压制着的权利。这便是对实现公民精神在实践意义上的肯定。这种持续性的活动，就是一种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公民参与运动”。

五、《零八宪章》派群体揭幕

1838年英国平民阶层在伯明翰举行大会，公布《人民宪章》，正式发起了宪章运动，它的拥护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宪章派群体。在中国百年立宪进程中，向来都是官方活动，有发言权的大多是政治家、军阀、党派领袖、各界精英、社会名流等，而普通民众始终都被政治边缘化，很少有机会涉足，也从未形成一种民间宪章派来推动宪政的落实。然而，立宪活动本身，正是一种全民共同参与，形成共识的过程。只有这样的过程，才具有宪章运动的意义。或者说，宪法就是由全体民众共同制定的。它应该是公民的“一致同意”，而不能由少数人主宰、垄断。没有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立宪不仅无法体现平民的意志，更无法转化为宪政实践。因为宪政要体现的根本原则，就是主权在民、有限政府和充分人权三大原则。而没有普遍的民众参与，宪政原则也根本无法实现，

宪法的精神只能停留在文本上。这也就是当今中国宪法，虽有人权保护之名，而无人权保护之实的原因。

当下，由于《零八宪章》的起草、传播与签名活动，首次在共同价值观的召唤下，积聚起那么多以民间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各社会界别参与的一个民间宪章派的群体亮相。宪章公布仅仅几天后，就有数千人签署，其中还有一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年长的是 92 岁的中共老干部李普，最年轻的还是高中生。此据《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张祖桦先生介绍：宪章的酝酿已经很久，9 月奥运会结束之后已开始草拟，11 月便在圈子内广泛收集意见。《零八宪章》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改造中国的民主化纲领，凝聚了百年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的心血与梦想。签署者除了异议者，自由职业者之外，有不少还是体制内的精英。另一位《零八宪章》签署者刘路先生说：“在宪章的酝酿过程中，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作家、记者、律师参与进来。”然而不幸的是，宪章发起者刘晓波先生与张祖桦先生分别被拘捕与传讯，且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骚扰、监视、传讯、“约谈”了不少签署人。为此，部分宪章签署者们又发出了《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声明：“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这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零八宪章》运动及其宪章派群体揭幕的悲壮性宣告。

结束语

诚然，《零八宪章》并非一个十分成熟、完美的文件，其内在逻辑、行文措辞尚有可推敲之处。为此，一些激进者们认为这个宪章用词含糊、立场妥协；而一些更温和者们则又视其太过理想，缺乏现实性考良；也不乏一些具有浓重民族主义情感的人，对宪章“联邦制”目标过于敏感，

担心其失去部分民意基础；甚至还有人对其是否又是中共“阳谋”的怀疑；更有不少毛式左派口诛笔伐，恶意攻击。而本作者无党无派，也非《零八宪章》联署人，对《零八宪章》的理解也许更客观了一些。在本文看来，《零八宪章》引起一些争议并非坏事，这些争论与中共的打压，本身就是对宪章意义的放大与影响的扩张。《零八宪章》毕竟表达的是人类社会大多数认可的普世价值，更何况这一从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社会各界联署签名事件，其形式意义远远大于了实质内容。《零八宪章》的公布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它应时代之运而生，为当代中国宪章运动揭幕，并由此塑造了中华民族首个民间宪章派群体的诞生，仅此象征性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便是可圈可点，不容置疑的。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1/200901141621.shtml>

传承常识，解困当下

——《零八宪章》的历史担当

易 明

公元 2008 年 12 月 9 日中午，中国 303 位各界人士联署发布了《零八宪章》。这份宪章正如中国著名宪政学家、《零八宪章》联署人张祖桦先生所介绍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包括律师、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认为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自然有他们的一套说辞，民间也应该提出自己的独立看法。特别是对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未来的中国的走向和发展也应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所以《零八宪章》前面一部分是我们的基本理念，主要论述了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的渴望和追求的历程；后面提出了 19 项具体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善意和理性的，确确实实是希望政府能够在认同普世价值和尊重、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尽快健全法制、推行民主，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使中国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发挥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也如著名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等人在支持《零八宪章》的签名信中所言：“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于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

然而如此一份理性、和平，凝聚着国内一批有责任心与时代使命感的专家学者的智识与心血的富有建设性的宪章文本，居然行将出来之际，就遭到了中国当局中一批顽固势力的阻止，他们企图将宪章扼杀于未发

状态。12月8日晚上11点钟左右，张祖桦与刘晓波两位先生家几乎在同时冲入了二十几名警察，对他们进行抄家，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张祖桦先生12小时；刘晓波先生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在《零八宪章》发出后，中国从南到北至12月15日止，已经知道因参加《零八宪章》联署被当地警方传唤的人数就有三十来人，并且传唤规模还在扩大。

值得深思的是，与当局这种严酷的恐吓宪章联署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网络不断以各种形式冲破封锁，通过博客与跟帖等等，广泛地传播着《零八宪章》。同时参加宪章的签名人数日益增多，到12月15日，就统计公布出3600多联署人，且还有大量名单因统计人手不够而不能及时公布。

由一份极具理性的宪章文本，遭到当局近似疯狂的打压，到在严酷打压下日益增多的签名人数，可以看出文本代表的民心，当局对此的恐惧，与公民出离恐惧下的抗争。这种理性文本—遭野蛮打压—与日益增加的签名，织成了中国今日社会的真实画卷，反映出中国今日的社情民意，由此力证出《零八宪章》表达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由来已久的心声！

正如许多评论人士所言，《零八宪章》是对社会常识的集中陈述，即“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而人类对这些常识的认识，早在三三百年前就已经达成，并且许多国家已经将这些常识变成社会进步的成果，累积起了稳步发展的阶梯，他们用自己的社会实践，来一再印证了这些常识的不可违背。而同样人类社会许多国家因为背离这些常识而遭到了惩罚，承受了灾难。三百来年的人类历史，早已经从正反两方面鲜活地注释了这些常识的真理性，昭告出人类应该遵循的正道与天条。

人类发展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的惨痛教训，人类终于在整体上达成了对这些常识的认同，从而在1948年发布了凝聚人类几千年血泪认识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共同认识社会的结晶，是人类对已有常识的总结，她宣示了人类必

须共同遵从的条规。

然而六十年来，人类虽然有着不断向此靠拢的努力，但是也不得不看到还有许多国家与民族，因为统治集团的利益阻隔与认识局限而使这些常识悬置成空，以致社会中各种侵权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整体性制度落后所导致的灾难如影随形，从而使整个民族长久挣扎于衰乱的泥淖中。

一些几百年前就为人类所认识到的常识，六十年前就为人类所汇总成的《宣言》，今天在中国一批背负社会责任者的笔下，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以理性、建言的姿态，践宪法赋予的权利，本对症下药的精神，发百年之忧思，成当代之宪章。从《零八宪章》所阐述的原则，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有评论人士名之为一份迟到的文件。这应该说是中肯的。

是的，《零八宪章》是一份迟到的文件，她不仅迟到了六十年，也可以说迟到了一百年，或者说迟到得更长。因为在中国，从戊戌变法、到晚清立宪，这都一直在追述着这些常识，就是在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宣言、文件中，也闪动着这些常识的灵光。所以今日《零八宪章》对东方这个古老的民族已并不陌生，只能说是久远话题的重提。

为什么今日中国又要重提那久远的话题，去重述那戊戌变法、预备立宪、中共民主革命所倡导的理念？显然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依然远离着这些常识，缺失着这些原则，并且因此而使我们这个民族遭受着难以挣脱的苦难煎熬。因此中华民族的百年转型，仍然是个难以回避的课题。《零八宪章》正是因应这种历史的呼求，喷薄而出。

除了历史的传承，时代的使命，促成着《零八宪章》的诞生外，激发一批良知人士联署《零八宪章》的当下直接原因，还在于近年来中国社会灾难频临，官民冲突四起，各种血腥事件频见于媒体，中国民间社会日益兴起的维权运动在官权的扼阻与民众认识的双重局限下对社会改良的推动力日益衰竭，以致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末世绝望的情绪。如何寻找激发社会的希望，展示未来的美好，使人心得以振奋、社会价值得到重构的济世良方？这已经是中国当下火烧眉毛的迫切的问题。而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提升民间的维权运动，走出中国的维权困境，就是个刻不容缓的使命。

无庸置疑，中国以 2003 年始为标志兴起的维权运动，曾一度给社会带来革新的动力，早期也曾在一些领域出现过局部的政府与民间互动，如 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在民间排山倒海般的怒吼声中，终于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再如杜导斌、孙大午等因言获罪案，虽然整体仍然是违宪侵权的判案，但在民间的呼吁下最后采取缓刑，这也似乎显露出一点人性化的萤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民间维权为主体的微弱的政民互动日益淡化，到最近几年，已经完全出现政民分道，官民扬镳。目前情况就是官府自说自话，将一切冠冕堂皇之词用尽，而民间权利持续被剥夺，广大民众求告无门。在穷尽一切社会救济无效的情况下，以杨佳式要说法的民情日益高涨。这种民间绝望下的最后搏杀是血腥时代的明显标识，也是公民最后捍卫权利与尊严不归之路。

中国社会维权从早期政民些许的互动，到近来完全陌路的敌对，这显示着民间维权希望的彻底断绝。这种权力对民间的反动，从今年重新关押杜导斌，从重判胡佳、陈道军，以及大规模抓押上访群体得到了验证。由此可见中国依法理性的维权已经步入了困境。中国社会是由此走向搏命，还是沿续理性、和平的路径？这已经是个极其紧迫的问题。

《零八宪章》也是基于当下这种紧迫的命题而向全社会发出的路径昭告。通过宪章整体性客观陈述，让世人看到中国问题的制度性症结所在，同时指出了解决这些症结就是回归常识与权利的根本。中国前几年的维权运动，由于多局限于某事某地，而缺乏全局性的诉求，由此也使维权变成一种疲于奔命，忙于救火的抢险运动、亡命运动。事实证明，中国问题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维权只能越维越多，并且越维越艰，最终走向对抗与搏命。中国民间若没有整体性对制度革新的要求，也就是维权若不能最终提升到对国家制度改革与价值重建上来，维权不仅没有积累，不仅不能最终达成权利的保护，而且早晚在强权的碾压下支离破碎。所以整体性社会价值与制度层面的诉求，是提升全社会维权

运动，使维权持续、积累而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种立足于个体权利维护，着眼于社会全局变革，通过制度与价值的重构，来达成社会在和平、理性与健康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零八宪章》的应急之用。《零八宪章》的出台，给中国日益陷入绝境的民间维权运动展示了愿景，提升了诉求，凝聚了民力，必将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注入新的动力。由此而言，《零八宪章》是将中国维权运动提升到宪章运动的标志，她必将使中国从局部、个体单向的诉求性的维权，转化到整体社会制度与价值革新的运动上来。

以《零八宪章》为标识的中国宪章运动的到来，会极大地提升中国的维权运动，同时她又很好地保全了维权运动中积累起的和平、理性与非暴力的精神，让日益在维权中绝望的民众，生发出新的希望，将社会日益充盈的暴戾毁灭之气，化解到社会变革的良性建设上来，这应该说是宪章的深远而重大的使命与意义。所以《零八宪章》是凝聚着中国当代最杰出思想者的智识，是传承人类历史常识而解决当下中国困境的良方。任何稍有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心的人，都应该体会到《零八宪章》其中对社会的深远关怀！所以宪章最后发出“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这是真诚的呼唤！是杜鹃啼血的呐喊！是呕心沥血的字句篇章！是暗夜的灯光！是时代的指南！祝愿《零八宪章》重塑中华民族的辉煌！

2008年12月15日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xsy/200812/Article_20081216150826.shtml

社会群体心理与《零八宪章》

浦世稼

一、2008

2008 年过去了，不过它带来的心理震撼并没有过去。发生在 2008 的诸多大事，让人目不暇接，紧张的透不过气。雪灾，西藏事件，火车出轨，四川大地震，瓮安民变，杨佳杀警，北京奥运，毒奶粉，乃至 12 月份的《零八宪章》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除了这些此起彼伏的事件，大部分国人还随着经济形势从沸点到冰点的危机轨道，感受了某种戏剧化的恐惧心理体验。在一个以转型为基本主题的时代，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将如何进一步影响和塑造中国的公众心理？从哪些迹象可以折射出社会群体心理的演变？这些心理演变反过来如何影响未来的转型？这些话题不会随着日历翻到 2009 年而时过境迁，这种心理发酵过程将给未来的事件发展积累必要的心理能量。

当然，要对中国社会群体心理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提供一幅全景似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显然的是，2008 年的重大事件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所造成的心灵后果是不同的，这种心理后果可以借助于一般性的推理和一些流行的话语对他们进行勾勒，进而探讨这种群体心态对未来的寓意。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群体心理的形成，演变和爆发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契机，2008 年事件催化的社会情绪完全可能在 2009 年爆发出来，或者被消解下去，或者与 2009 年的事件进行某种心理共振。唯其如此，才显出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对当下社会中界别特征比较显著的一些

群体的社会心理进行一些粗线条似的分析，然后再结合《零八宪章》的发布，探讨可能的变化轨迹。

在继续之前，需要对群体心理做一些简单的交代。根据流行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一个特定的群体心理受社会结构和各种文化规范所影响，社会结构包括职业，组织，社会关系网络。而文化规范则包括习俗，仪式，法律等集体性概念为代表的价值体系。一个群体会共享一些心理感受，比如安全，傲慢，荣耀，恐惧，偏执，非理性情绪等等。群体心理的形成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很多时候会以潜意识的方式积淀，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或者展现。比如，公务员，医生，教师等很容易获得与其社会角色相关的心理感受。当然，群体心理并不是说所有的群体成员都无差异的拥有这种心态。不过根据社会心理学大师勒庞的观点，“群体中个人的异质性便容易被群体的同质性所吞没，让无意识去占据心灵的上风，并让那些为群体所独有的心理发挥作用”。因此群体心理虽然是动态的，演变的，但是却并非是不可捉摸，无迹可寻的，并且在特定的情境下，将淹没个体心理感受，为集体性事件的形成提供心理基础。这是笔者试图分析当下社会群体心理的学理基础。当然，本文只是概要性的分析群体心理中和社会转型相关联的某些方面。

如果用这种分析框架来透视中国社会，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到，从一个时段到另外一个时段，中国社会心理还是呈现出某种相对典型的特征。以 89 年之后“求稳”的社会心理为例，由于政治发展空间被镇压，而经济空间则得到更大拓展，89 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大众，被抛入到一个狂飙突进的市场经济浪潮中，与官方“发展是硬道理”相对应的是民间赚钱为要务的物质主义哲学，在这种浪潮中，官方反复宣扬的稳定论也在民间那里以不合作的方式得到了认同，使得大部分公众哪怕反感专制统治安排，也并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同时那些真正有挑战意愿的民主斗士们也被边缘化，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在这样一种社会叙事下，尽管民间社会会有诸多不满，但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是相当确定的，官府宣传的社会稳定是可以在内化到公众心理，从而成为大多数人的默认

心理状态。

2008 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以其强度，广度，深度和高频率冲击了 89 年后延续多年的社会群体心态，片面强调稳定的群体心理结构终于彻底瓦解。异质性社会群体开始出现，对于公共，正义，暴力，稳定等关键词的理解出现分歧，对社会生活和未来演变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心理预期。人们看到，无论是政治领导人，或者受过职业训练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还是无数网民意见的表达，都在讨论着未来的不确定性，表明迷惘和不安的心理开始流行，不同的群体试图通过探索和行动来重构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认知和对未来演变轨迹的判断。

二、群体心理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笔者将试图分析中共上层，官僚集团，工商精英，弱势群体以及关注公共事务的中产阶级群体等的群体心理，然后也稍带分析《零八宪章》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寓意，这种分析注定只能是勾勒式的，素描式的，并且侧重其中可能相互共振的心理区块。读者需要明鉴的是，对于这些群体的分类是粗放的，没有严格的界限，当然熟悉中国社会情境的读者自然可以找到这种分类的对应人群。

1.中共上层集团

指的是实际掌握中共机器以及对其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生，政治局成员，中共元老院，大部分中央委员以及一些关键部门的控制人都可以归入这个群体，总共人数也许就是三四百人，但是无疑他们掌控着政治机器，主导着重要的政治决策，这个群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这个群体的主要心理状态是什么呢？有几个因素是值得分析的，一个就是政治合法性的缺失，无疑给他们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让他们缺乏必要的政治底气。第二是现在的权力结构的特点，政治强人不再，政治权威缺乏人格化的代表，而权力的无规则很容易制造政治摩擦和政治

焦虑。第三点是，2008年的大事件无疑让他们疲于奔命，而经济形势的过山车般的演变肯定让他们感到惊慌，各种抗争性事件的蔓延则让他们感觉到恐惧。作为这种心理的表现，这个群体的成员在公开场合普遍表现的非常刻板或者悲情，电视镜头前的笑容也总是显得很僵硬和做作，轻松幽默的一面几乎从来没有过。人民日报社论是他们的喉舌，不过其中经常强调的“严峻挑战，任务繁重而又艰巨”等等词汇也体现了他们的压抑和焦虑，公布出来的党内重要会议公报，几乎都会强调危机意识，一方面这有通过不断敲打“沉船”论调来对冲党内离心力的嫌疑，另外一方面的确也折射了中共上层集团的群体性恐惧。

但是由于长期的积累，这个群体受到的观念约束最多，思维模式僵化死板，历史负担最为沉重，作为一个实际操盘的政治群体，除了不得不面对和处置纷繁扰的社会事件的责任，其群体心理容易受到社会事件和冲突的反向塑造。他们不愿意对长期延续下来的“稳定论”进行调整和纠错，比如任何社会冲突都可能继续敲打他们的稳定神经。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里，老旧观念和僵化思维模式使得中共缺乏一个清晰的自身定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中共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上的那些套话可以作为证明：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因为价值混乱，所以中共统治集团拒绝正视现实，也看不清未来，这种混沌让他们焦虑；而重重危机又给中共增加了许多焦虑的压力，因此大致上，恐惧，焦虑，猜忌，犹豫等要素基本塑造了中共高层的群体心态，在这种群体心理的驱动下，中共统治集团的未来行为充满了错乱，反复，甚至会走极端。经济政策的反复，奥运安保措施的过度化，对政治异议的过度打压等等都是这种政治焦虑的反应—本文对此不展开描述，但是读者可以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事件。

2. 官僚集团

这是另外一个必须要重点分析的集团，官僚集团人员庞大，占据了大部分公共职位，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以前诸多论述，往往把这个集团和政治集团混同起来进行分析，在我看来，那样容易引发混乱，使得结论失真。因为在没有同质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官僚集团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政治集团其实大相径庭。政治集团需要面对的是政治合法性，政治决断，利益平衡等诸多议题，而官僚集团按照其本来逻辑，追求行政效率，专业能力，以及职业荣誉。政治集团决定规则的产生，而官僚集团则按照规则执行过程。但是在当下的政治架构下，政治集团某种意义上绑架了官僚集团，党政不分，专业议题和政治议题相互混杂，使得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边界和规则模糊。但是这两个集团的博弈关系一直存在，只是在现有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下，官僚集团也没有充分博弈能力，他们无力对抗来自中共上层的种种不合理的相互冲突的政治意图，经常被迫随着中共上层的政治钟摆左右摆动。形形色色的政治宣教活动，形形色色的绩效考核制度，还有各种没有公平可言，经常选择性执行的反腐败措施和问责等等制度，使得官僚集团一直处在被折腾的状态。

如果说以上描述的还是一般性状态的话，那么 2008 年有哪些特别“出彩”的地方呢？首先是 2008 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复摇摆，让地方官僚集团特别不满；与这个相关联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萧条，许多地方依靠土地出让收入维系财政支出的模式受到冲击，地方官僚所掌控的利益蛋糕变小。还有许多灾难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政治上层摈弃了一贯对官僚集团护短做法，转而通过免职和问责的方式对低层官僚集团实行责任切割，贵州瓮安事件，山西襄樊溃坝事件，深圳龙岗大火事件都都是典型。但是这种责任切割并不公平公正，因此只会激化官僚集团的不满。比如同样是特大责任事故，杭州地铁施工坍塌事故迄今没人为之承担责任。类似事件可以说比比皆是。

对于官僚集团来说，还有一个坏消息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民意

力量的崛起。在这个民意聚合的虚拟审判台上，官僚群体需要承担沉重的道德压力，对他们的各种笑话和嘲讽流传，比如城管这个职业群体在网络舆论中甚至成为现代强盗的代名词。经过不断的孕育，这种网络舆论力量已经具备点杀特定官员的能力，比如 2008 年的几个最牛官员，张志国，林嘉祥，周久耕等撞到了舆论的枪口。

在诸多社会情绪催化下，官僚集团逐步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境地，官僚群体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根据 2008 年年初重庆的一份《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据说三成抑郁，一半工作懈怠，很多接受访谈的公务员都说郁闷、想哭…有代表性的心理问题主要是抑郁、工作倦怠、人际关系紧张、职业成就期待、人格冲突等五种。

官僚集团的这种群体心理后果将会很复杂，本文不一一论述。这里仅举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隐性反抗，表现为形式主义，懈怠，职业伦理的溃败，人格分裂等等。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在私下场合，官僚集团的成员，尤其是中低级别的官员，对政治上层的不满比普通民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言论甚至比异议分子还要尖锐。另外一个是公开的反叛，对党国体制的哪怕表面忠诚也开始坍塌。“裸体做官”开始成为一种为官的规范，其中的极端者比如上海市卢湾区原副区长忻伟明赴法国考察时“失踪”，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则开始了“裸奔”。这是官僚系统反抗的一个典型信号。

当然还有一种心理压力的存在，不太看得见痕迹，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存在。那就是官僚集团对公共权力运行正当规则的压力和渴望。因为只有在这种正当规则之下，官僚集团的正当社会角色才能得到体现，他们的群体心理才能回归正常。

在未来的时间段，在经济危机的催化下，在各种灾难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催化下，官僚群体是演绎出更多的“裸奔”故事还是在群体互动中逐步成为制约中共上层集团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转型，这不但需要社会契机，也需要官僚集团的某种自觉。

3. 工商精英群体。

这个群体还有一些另外的称谓，比如经济精英，比如富裕阶层。对于这个阶层，2008年肯定也是不同寻常的年份。一个因素自然是经济危机，资本市场萎靡，股市跳水，楼市低迷，出口萎缩，使得工商精英的财富大幅缩水，很多富豪们被打回了原型。不过对于经济危机，这个群体的认知会比一般学院派经济学家理解的更深入，他们对这场经济危机的内源性因素看得清清楚楚：比如垄断行业对经济体的盘剥，不断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的改革逆转，鼓励劳资纠纷的劳动合同法以及混乱不堪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这些使得工商精英成为2008年受到伤害深重的群体之一。一些标志性的富豪落马事件，比如涌金集团魏东自杀，“公路大王”刘根山被捕，金元帝国向德洪被双规，中国首富黄光裕遭调查，都强烈的冲击着这个群体的心态。其中特别具有典型的事件一个就是首富黄光裕被神秘拘押，还有一个就是毒奶粉事件引发的乳业集体性坍塌。两个都是在畸形制度条件下，成为法律和市场的牺牲品。在中国扭曲的市场和制度环境下，大多数工商精英群体也面临一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困境，缺乏道义的力量和法律上的权利来捍卫他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虽然程度各异，但是黄光裕和牛根生等的困境都会引发某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刺激，与财富增长相伴随的保守，认同，求稳的心理结构受到了冲击。

黄光裕案件的一些操办手法尤其具有标本意义。贵为中国首富，一旦东窗事发，政治上层就通过内部批示的办法指示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他连获得基本的正当法律程序救济的权利也给践踏了。而媒体披露，他的妻子杜鹃也很快被“控制，然后又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些措施，几乎和《零八宪章》的推动者刘晓波先生所享受的待遇如出一辙，真是一种极大的冷幽默）。对工商精英群体来说，这些信号无疑像嗖嗖冷风，让他们脊背发凉，谁知道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什么落下呢？

简单的说，工商精英群体的社会心理已经受到震撼，如果原来的默认心态是求稳的话，那么这个默认值可能已经向求变位移。这种变化会

以很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资产转移，商业行为短期化，或者寻求更强大的政治保护伞等等。当然还有一种变化是，试图通过公共规则的改变，来约束政府这个庞大的列维坦，工商精英群体在求变的心态下可能会有哪些行动轨迹，这些轨迹在多大程度上能和《零八宪章》所展示的图景相互契合，这需要细致的分析。后文将会涉及一些。但是笼统的说，由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工商精英群体的求变心理将对民主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4. 中产阶级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群体像相对模糊，因为他们还处在不断发育和成长之中，他们的社会结构还没有稳定化。不过总体来看，这个群体已经日益显山露水，他们的观念，价值体系，职业特性都显著差异于其他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在文本中，将侧重于其中关注公共事务的群体，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他们的很多特质得到了展现。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内部充满着各种异质性的子群体，不过基于类似的教育背景，重合的公共偏好等因素，依旧可以把他们归入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典型成员是专业人士，公司职业，媒体人，法律人等等，他们是网络上对公共事务最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是股民中的大多数。他们感受着社会的不公，感受着自己的无力，同时又不甘心轻易接受。当然，他们的参与并不激烈，同时他们对于未来又缺乏明确的预期和共同行动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对于现存秩序的认同已经式微，他们是社会变化的活跃载体。

那么 2008 年的诸多事件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他们的群体心理呢？重要的也许有几点：一个是这个群体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因为经济危机对他们的影响是直接的，比如薪酬的降低，工作的丢失，房贷的压力等等。其中的股民群体，感受尤其鲜明，因为 2008 年让他们的大部分损失惨重。二是这个群体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反感已经接近引爆，无论是言论权利，参与权利，对公平和公正的感受，他们都感觉受

到了极大的冒犯。股民中流传的“股市有政府，入市需谨慎”和网络中对公共权力的各种揶揄嘲讽等等都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还有一点是这个群体发现，在影响公共事务的进程中，他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以媒体人，法律人，社会活动群体为代表的中产群体，已经在多个领域实质性的影响了事件的进展。这种成功的激励将强化他们的公共参与热情，并且催化出一些社会活动家。

由于这个群体的社会结构，这个群体的社会心理很容易和其他群体发生振动，或者融合，或者影响。总的来说，关注公共事务的中产阶级群体是躁动不安的，是渴望变化的，而经过几十年的启蒙，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价值已经在这个群体中有了深厚的心理基础，因此对于《零八宪章》所展示的社会图景，与他们的亲和力最强，他们最能感受到这个图景和他们的相关性。《零八宪章》一发布，正是这个群体积极参与，四处传播，使得《零八宪章》迅速的在网络世界传播。

5.弱势群体

让我们再分析下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心理。在中国的语境下，弱势群体也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低收入阶层，而是指结构性的弱势，他们承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公共话语权有限，又无法得到正当的权利救济渠道。

这个群体包括大部分的底层抗争群体，包括失地农民，城市被拆迁群体，下岗工人，城市低端收入人群，比如出租车司机。访民群体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由于长期的被剥夺和被侮辱的经历，使得这个阶层积怨深厚，并且有强烈的抗争意识。虽然他们对政治事务的思考相对有限，不过由于切身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最为强烈，愤怒和绝望等情绪笼罩在这个群体身上。

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虽然从纵向来看，弱势群体的绝对收入也有所提高，但是他们的相对被剥夺感却日益强烈。由于毛时代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而弱势群体很容易被左派对毛时代的平等假象

宣传所吸引，在民间逐渐形成一个毛崇拜。这个群体往往也是弥漫在各种民意中仇富情结的源头。

弱势群体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不过这些社会心理能量却可能因为其强烈的暴力倾向和简单化的是非观和正义观，使得社会变革更加风险重重。

杨佳杀警事件强烈的舆论激荡折射了这种群体心理。杨佳悲剧的起因无疑和上海公安部门作为失当有直接原因，而后续公检法一系列违反程序的做法则在舆论领域火上加油。但是在网络舆论中，杨佳迅速成为侠客符号的转变过程说明了社会群体心理中粗糙的是非观和对暴力复仇的群体渴望。当一个畸形的司法制度无法产生正义的时候，那么杨佳的名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就自然赢得了那些被剥夺和被压迫的赞同。弱势群体的这种社会情绪如果在更大范围内蔓延，无疑会给现有秩序带来过度的冲击，容易陷入暴力循环的历史宿命。

站在社会转型的角度，上述约略提到的社会群体心理的登场是震撼性的。这意味着从心理层面，多元化的事实已经出现，这种群体心理分化或迟或早必定要和金字塔式的专制权力结构正面冲突。站在政治集团的角度，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他们通过教育，媒体和舆论等工具进行的群体心理塑造功能开始失效，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权力结构再造，意味着他们将面对无穷尽的治理危机。异质性的群体心理已然形成，其中的碰撞和共振开始取代模式化的单一心理结构，极权主义的心理基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到了在一个新的核心共识下重建心灵秩序的时候了。

三、群体心理共振

根据我的有限阅读，分析中国社会演变的论述，往往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范式。一个是从观念或者启蒙的角度，从话语体系的演变来分析社会演变；一个是从经济自由化的角度，以国家控制经济体的消减来预测社会演变；还有的是从社会结构或者利益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描

述精英结构状态来分析社会演变。这些视角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社会现状以及未来的社会趋势，都是有价值的思考。不过如果从短期来看，或者从特定事件来看，群体心理无疑是一个更为直接更为显著的原因。像贵州瓮安和甘肃陇南之类的群体性事件就很难套用观念和利益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有些论述采用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视角来分析，我觉得不如说是群体心理共振更为恰当。在群体心理的共振下，集体行动可以爆炸性蔓延。

本文中社会心理共振指的是两类现象，一个是群内心理共振现象，往往是同质化和强化。同一个群体内部的共同感受受到情境的催化和激发，不断强化的现象。比如网络舆论中的聚集效益，参与人肉搜索而共享到的那种成就感等等。另外一种则指群际心理共振，这种群际心理共振可能是相互消解，对撞或者冲突，对一个政权软化，价值失范的社会构成强大的冲击。

根据上述分析，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群体，包含了紧张，恐惧，郁闷，不安全感，求变，无助，愤怒，绝望等等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虽然对于这种心理状况缺乏有效的测量，也很难判断这些社会心理的强烈和群际分布，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社会群体心理状态和一个稳定形态的社会心理状况所表现出的自信，乐观，幸福感，充满期待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社会情境塑造了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反过来影响社会情境的演变，中国当下的社会心理状况构成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影响着事件发展的轨迹。这里仅以一些简单的描述来进行分析。

以社会稳定而言，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符合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共同目标。不过由于政治上层对未来的恐惧，很容易转变成对稳定的过度需要，再通过官僚集团的压力系统向整个社会传递，在实际操作上，很容易增加中产阶层的压抑感，同时弱势群体正常诉求渠道被堵塞，从而导致更多的愤怒和抗争。而这些迹象反过来又强化了政治上层的恐惧感。可以说，上述群体心理的存在，使得很多政策被扭曲，完全背离了政策制定者的本意。

在这种社会群体心理下，社会冲突取代了社会粘合，每一个群体都处在某种紧张之中。中共上层没有一个基本信念，他们的说辞甚至在官僚群体中都失去了市场，中共上层和官僚群体在工商精英，中产阶层以及弱势群体中也都声誉不佳。作为工商精英阶层，也同样为恐惧不安的情绪所裹挟，行为短期化，同时他们也承担了不当的道德和舆论压力。商业规则中的讨价还价，互利互惠等规则无法在其他公共生活中得到展现。中产阶级向来是社会稳定之锚，但是在压力和多重挤压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滑向弱势群体的危机，因此缺乏保守现状的意图，反而成为催化变革的力量。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认为群体心理之间相互纠缠，甚至相互强化，滚动挟持了更多的社会进程。中国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统治集团和民间，同时被挤压在一个隧道，任何小小的纷争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出口，从而导致整个隧道的骚乱。在这么一种结构下，统治者没有安全感，往往神经过敏，把来自民间正常的权利诉求视为政治性的挑战，从而反应过度。而广大的民众则更是被恐惧笼罩，对于未来是一片茫然。这种制度性的困境就是一个压制型体制的稳定悖论，通过压制寻求稳定，越不稳定；越不稳定，越希望通过压制获得稳定。而公众也好，统治集团也好，都被这个悖论所裹挟，对于未来缺乏一个清晰的认知。从而使得焦虑，沮丧，郁闷等情绪流行，这些情绪在社会底层可能表现为暴力和高企的自杀率，在知识群体中，可以表现为犬儒主义或者对暴力革命的呼唤，而在官场，则表现为腐败，道德沦丧，或者干脆裸奔，而在中共上层，则表现为政治紊乱，失去政治远景。中国社会需要寻求新的愿景，在这个愿景的引领下，走出这种群体性的困境。或者换种说法就是，社会群体心理的冲突需要一个包含核心价值的有关公共生活的规则，依靠这种规则来设定冲突轨道，提供冲突解决方案。而这种规则本身也需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积累公信力，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穿透力和打动力，并逐步内化为不同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重叠共识。

四、《零八宪章》

在 2008 年的岁末，《零八宪章》应运而生，其推动者并不讳言这是一个基于重叠共识的面向未来的愿景努力。正如许多论者已经提及的那样，《零八宪章》内涵本身并没有新意，所阐述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常识，倡导的是现代政治框架，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零八宪章》的出台能引发那么强烈的轰动呢？这和《零八宪章》直面政治的表述模式有很大的关联。

在所有影响人类社会心理的因素中，也许有一个因素最有代表性和持久性，那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在影响未来的不确定的因素中，政治危机的影响面又往往最为广泛和惨烈，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这点尤其明显。《零八宪章》中提到的 49 年以后，反右，大跃进，文革和六四等事件就是政治权力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戕害。人类迄今为止的智慧就是以宪政规则约束公共权力，通俗的说，就是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零八宪章》代表了这个努力的理念层面。《零八宪章》通过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对政府行为的规束来提供一个确定性。应该说，几代知识人一直在做这种努力，不过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努力要么被包装成一种谎言性的话语，那么更加晦涩而难以传播。《零八宪章》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并不试图隐隐约约的说话，它试图通过符号的强化，以异乎寻常的政治性语言，提供一种清晰的指向。

另外一方面，《零八宪章》出台本身就包含了上述提到的群际心理共振的因素。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群体在最近这些年，借助网络已经进行了多轮的民意动员和操练，不过多是聚焦于特定议题和事件，比如声援某个异议人士，或者对西藏事件发表独立看法等等。但是这种动员广度和深度上从来没有到达《零八宪章》的水平，这点从《零八宪章》的初始签名人数和后续签名人数的代表性上得到印证。这种签名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在一年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从目前公开的《零八宪章》一些主导者的信息来看，他们也一度审时度势，权衡更好的发布时机，但

是只有到了经济危机深度演化的时候，才感觉到了群体心理到了一个恰当的融合点。

分析《零八宪章》的签署人群，我们看到这个群体涵盖范围其实相当广泛，从公共知识分子，知名作家，法律人，大学教授，异议群体，要在比较短暂的时间内，在无法公开讨论并且要保密的情况下，能吸引这么人异质性强烈的人员来共同参与这份政治色彩强烈的《零八宪章》的签署，那肯定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底色。而这种心理底色，其实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在聚合，对变化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同时对风险的评估也在下降，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内心的恐惧在降低。很多人觉得在一个社会面临动荡不安的前景的时候，他们反而需要站出来进行公开的表达。

《零八宪章》发布之后，其一系列的传播过程对中国社会群体心理的演变提供了某种独特的意味。一是《零八宪章》的符号效益。由于互联网时代快速传播的特点，和当局过度打压形成的舆论反弹，《零八宪章》这个符号迅速传播，同时由于这个符号所包涵的丰富内涵，在符号的传播过程中迅速形成观念的自我嬗变，可以很快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由于这些积累，《零八宪章》的符号效应必然将更深刻的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各个群体的认知，并逐步向共同的制度预期转化。这里可以引用《零八宪章》签署人杨光先生阐述文章里的一段话：毕竟，有了这份《宪章》的光芒照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个越来越心神不安的社会将获得稍许安宁；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宪政预期，我们的祖国也将会变得更加巩固——再也不用担心被一纸宣言“颠覆”，或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沦陷”，像瓮安那样。

二是《零八宪章》的去恐怖化过程。这点从无数《零八宪章》的签名者留言可以得到极大印证。从那些留言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把参与签名描述的过于恐怖，但是在其他观念的推动下，许多人还是克服了恐惧心态，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其中。

如果说恐惧是被感染的，并逐步塑造一个群体心态的话，那么去除

恐惧化则是示范化的，只有一个人不怕，那么很快就能影响一个群体。只有一人跨出一小步，在群体心理的激化下，就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去恐惧化。

而迄今为止将近 7000 人的签名则给这个符号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能，互联网时代的快速传播则让这个符号迅速的进入公众视野。根据一些朋友的分析，迄今为止应该有超过千万网民已经知晓《零八宪章》的部分消息。而《零八宪章》的本身是一个自加强的过程，更多的人参与，则它的辐射范围越广，它对未来的影响力越大。当大家拥有一个对于未来的共同预期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稳固。不管是统治者，不管是民间，都可以从一个低级的稳定悖论中突破，从而向一个多中心的社会秩序演化，像现在的恐惧，郁闷，愤怒和绝望都可以在一个积极健康的群体互动中得到逐步化解。

因此，我同意杨光先生在另外一篇阐述文章里提到的一些克制的但是不乏充满乐观的描述：《零八宪章》为我们送来了一缕信心，照亮了我们的未来前程。这信心很微弱，但它若能顺利展开，必将转化为有效增加的政治内需和经济内需。保有这份信心，中国社会将在严冬季节逐渐恢复安宁，若是政府执意消灭了这份微弱的信心，恐怕内需将离我们越来越远，内乱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xsy/200901/Article_20090115220541.shtml

扩大经济内需，也要扩大政治内需

——关于中国的经济危机与《零八宪章》

杨 光

经济严冬已经到来

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股市经过了去年的暴涨和今年的暴跌，已经基本去功能化，处于半瘫痪状态——不仅不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反而成了上市公司的拖累；商品房价格虽仍然挺着不跌，但交易极度冷清，市场极度疲弱，房地产业的资金链岌岌可危，大概也挺不住多久了；出口部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外资撤退潮、中小企业倒闭潮、民工返乡潮，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热点地区率先出现全面衰退的态势；受国外订单锐减、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全国的消费品行业已经全体陷入困顿；钢铁、有色、汽车、机械、化工、建筑、建材、运输、石油、煤炭、电力等前些年曾经迅猛扩张的行业也全面业绩下滑，大企业降价减产，小企业关停并转。到目前为止，银行、金融似乎还很“稳健”，但实体经济既已整体低落，金融杠杆行业势必加倍低落，只不过慢了半拍而已——到了大批企业还不起贷款、土地和房产大幅降价的时候，中国自己的金融危机就会如期而至。很明显，我们并不比欧美更轻松，中国经济的冬天已经到来。

中共当局显然没有预料到今年的经济局势会如此严峻。上半年，他们还有一大批人在幸灾乐祸、大言不惭，认为中国经济全球最牛、一枝独秀，似乎欧美发生金融危机倒是天大的好事，中国正好趁火打劫、顺

势“崛起”。年初，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双防”——防过热、防通胀，因为政府预计中国的高速增长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必须严控投资、紧缩货币。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宏观调控”就被迫一百八十度大反转，现在最要緊的任务成了扩大投资、扩张货币、刺激消费，要“全力保增长”。祸到临头，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们才不再那么迟钝，不再那么嚣张，終於也看到中国经济不过只是“一枝”，若世界经济的主干萎缩，这“一枝”如何“独秀”？何况，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却过度依赖出口，全国几乎所有最优质的产能都是瞄准国际市场、为外国消费者服务的，人家若要趴下了，我们哪里还有“崛起”的余地？

扩大内需是空城计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每增长百分之六，居民收入才增长百分之一。这一点点收入增长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又极度不公，到了底层社会，增加的些许收入大半都被学费、房价和医疗费的暴涨所吸纳。在绝大多数人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所谓扩大内需，完全是在唱空城计。九十年代第二波改革以来，国内消费一直增长乏力，这与GDP尤其是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极不相称。事实上，一是中国政府，二是外国消费者，主要是他们消化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巨大产出。政府占有了大部分的收入份额，囤积了大把没有多少实际用途的美元，他们大手笔花钱早已上瘾，是中国经济的头号大买家。国际市场则居其次。剩下来中国老百姓就只能节衣缩食，存粮过冬，缺钱的沒能力消费，略有节余的也不敢消费，因为泰山压顶，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

为应付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地方政府更推出二十万亿（一说十八万亿）的配套方案。当然，国库、省库里并没有这一大笔钱，除了寅吃卯粮，主要是靠明借暗挪，把老百姓放在银行里不敢花的救命钱替我们先花掉，买成钢筋混凝土之类的“优质资产”。当局虽然也三番五次强调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但是很显然，他们出

台的经济刺激方案根本就起不到扩大内需的作用，相反倒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挤压内需。总共钱就那么多，政府花光了自己的，又要把属于老百姓的份额也都提前花掉了，而且并不是花在老百姓身上。如今白领裁员、民工返乡，人人心神不安，这内需又要怎么提升呢？

财政不民主，内需起不来

当局显然是希望以庞大的政府支出来维持经济增长，达到〇九年“保八”的目标。政府官员们将高高兴兴地亲自花掉这四万亿与二十万亿，他们绝对舍不得让老百姓、让普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来共同支配这笔巨款的用途。就目前已经公布的投资计划来看，这些钱只有极少部分用於改善民生，大部分将变成锦上添花的基础设施、“先进生产力”和政绩工程。这大概是又在饮鸩止渴。说是要救经济、救民生，不如说是政府拿老百姓的钱自己救自己。无非是保银行、保央企不出事，保土地、保房产不贬值，保各级政府的钱袋子不缩水，把大项目、大订单交给自己人去做，这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有多大的关系？

可以预计，当这些庞大的投资通通完成，人民当然照样贫苦，而中国的产能又将大幅扩张，“世界工场”越来越豪华了，如果世界市场仍然低迷，谁来替我们消化这些原本就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到那个时候，贫苦居民存着救命的血汗钱已经腾笼换鸟，物化为一堆政府工程和产业资本，“先进生产力”越多，内需岂不会更加萎缩？

中国政府若是真想扩大内需，它就应该让人民来参与决定这四万亿或二十万亿的来源与用途。让民意来支配这些钱，决定谁来花、怎么花、花在哪，才有可能让这笔钱最高效率地转化为居民的真实消费能力，那么，扩大内需或许还有些希望。而像现在这样，只由官家独断、官员作主、官府操纵，最后真正扩大了的，也大不了只是官府的内需、权贵的内需、贪官污吏们的内需而已。这种事情能长久吗？

经济内需和政治内需相辅相成

财政要民主，政体得变革。在经济动荡、社会不安的当下中国，这已是当务之急。扩大经济的内需必须与扩大政治的内需同时进展，方可相辅相成。

如果说中共当局对扩大经济内需是三分真诚、七分应付，那么，他们对扩大政治内需则毫无意愿。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我们死心塌地，乖乖地吊死在一党专政这棵枯树上。2008年底，一批知识分子公布了《零八宪章》，此举充分提振了我们的政治内需，确立了全民族的宪政预期。但政府二话不说就加以暴力压制，试图绞杀我们的改良需求、灭绝我们的政治愿望，让我们对政治绝望、对政府死心。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寒冷的严冬，除了经济的温暖，人们更需要政治的慰藉？

温家宝总理说，在全球经济危机来临之际，信心比黄金更宝贵。此言言之有理。但信心从何而来？在这个人心飘摇、社会浮荡的高度不稳定的时期，底层民众的愤懣情绪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谁也无法预料，那些突然失去了工作的农民工、财产急剧缩水的“散户”股民、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入不敷出的小摊贩、小市民和出租车司机们，他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应急反应。当此紧要关头，《零八宪章》为我们送来了一缕信心，照亮了我们的未来前程。这信心很微弱，但它若能顺利展开，必将转化为有效增加的政治内需和经济内需。保有这份信心，中国社会将在严冬季节逐渐恢复安宁，若是政府执意消灭了这份微弱的信心，恐怕内需将离我们越来越远，内乱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2008年12月24日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forum/forum090221001.htm>

道义之上的宪政启蒙

——我读《零八宪章》

文 强

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被学界称之为的中国新启蒙运动）“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从那时开始笔者也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也开始走上背叛这个制度的不归之路，在这个不算太长的历史阶段，作为 60 后的一代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虽然来得有些迟，却也赶上了 89 年这趟末班车——毋庸置疑，从 80 年代开始的中国新启蒙运动给中国人播下了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一直到 89 年的彻底结束，思想解放的时代才被正式划上了句号。

自此，这个国家开始了一个政治反动而经济改良的时代（中共的“改革开放搞活”用四川话即可幽默的简称为“改开搞”），政治反动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国家思想僵化的时代，这种思想僵化当然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原因而有意造成的一——从 90 年代开始，中共开始在政治上止步不前并对异议者进行镇压，在经济上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革”，并让中共和它相关利益集团“先富了起来”，而对于“体制外”的全中国人民来说，这近 20 年可以被形象的概括为“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肉体上摧残”的时代——于是中共基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人民也被迫站在了它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公正的时代——前 10 年没有了思想，后 10 年更没有公正——在这个 20 年的“反动”期，中共一步一步的不断强化自己的统治并达致对这个国家全方位的控制，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到妓女交税公厕收费等所有方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几乎没有遗

漏。——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威权政权得以建立，在这个政权之下人民只可以沉溺于现在而不可以正视过去并展望未来。——这是一个没有了道义也没有了公正的时代，一个没有了政治启蒙的时代。

思想启蒙已成为历史（只要看看 80 后的绝大多数便可以得知中共对社会思想的阉割），政治启蒙却未被开启（如果此前的民主运动不能算做真正的开启而是铺垫的话）；一党独裁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剥夺了人们的政治权利，更是剥夺人们的经济权利，剥削农民和穷人自不在话下，最后连中产阶级和“小康人家”也在被剥夺之列，社会公正和道义岌岌可危，体制和社会的双重残忍体现为以“公有”的名义对人们权利的剥夺和侵占，使得人们只有被迫“维权”！（其实中国人的维权都是被迫的）——这样的类似剥夺还要维持多久？中国人民就甘于永远这样的被剥夺？

在一个需要政治和宪政启蒙的时代，《零八宪章》横空问世。——2008 年注定成为中国的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既是因为它众所周知的种种天灾人祸，更因为奥运后遭遇“金融海啸”和“经济萧条”这样的多重尴尬，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确实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这是一个需要权利意识更需要政治启蒙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却更需要宪政的时代，需要道义更需要责任的时代。中国确实已到实现民主宪政且不能久拖不决的新时期了。

2008 年的注定不平凡更是因为《零八宪章》，这个年末突现在中国公众面前的签名运动或公民运动。我想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是中国人民多年来不懈追求民主自由的结果，它肯定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这同样是“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事”，更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从此开始，中国的民主运动或公民运动（或者宪政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不逆之旅。在此，笔者对刘晓波、张祖桦等所有联署人致以深挚的敬意。

《零八宪章》使人想起捷克的《七七宪章》。人们诚然可以看到它们在道义和政治上的某种连续性，但笔者以为不一定《零八宪章》便是

《七七宪章》的“中国版”，这样的比拟是不恰当的，尽管人们可以认识到它们作为“异议”思想上的承继，毕竟“社会主义国家”的“宪章”不多，而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是它们的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当时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强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成为华沙条约国被苏联绑架（同其它东欧国家一样）而经济衰落，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杜布切克的“人性社会主义”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所具备的社会基础所决定了的；从布拉格之春到《七七宪章》，不到10年时间，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反政府活动的出现实际上充分体现出这个国家历史的和现实的民主诉求。

同《零八宪章》一样，《七七宪章》也明确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证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我们来说纯粹是一种幻想。成千上万的捷克公民仅仅由于他们持有和官方不同的观点而被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并受到来自当权者和社会机构的各式各样的歧视和困扰。他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手段，成为一种实质上隔离的受害者。”——在中国也同样是如此，有过之而无不及。

“宪章”内容的类似是因为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被剥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现状，申张公民的应有权利是《七七宪章》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我们相信，七七宪章将帮助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而工作和生活。”就此而言作为权利申张的宪章实际就是要恢复被剥夺了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权利。这方面《七七宪章》也和《零八宪章》同样不会有大的区别。

同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也首先是政治上的道义承担。——人们必须站出来或站起来才能成为人，中国与捷克在这方面更不会有区别——《七七宪章》之所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的最早开端，其思想基础便在于如哈维尔说的，“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

的办法。”——这个道德便是站出来的道义、责任和勇气。

《零八宪章》同样是有勇气的中国公民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担当，同样是“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的主张。同《七七宪章》相比，《零八宪章》对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达更加直接、明朗和全面。

在这个篇幅不长的高度概括的包含公民权利的宪政文件中，简明扼要的评述和总结了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乃至民主运动的历史思想经验，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明确的纲领性的宪政内容，同时秉承了中国民主运动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传统，坚持建设性对话，体现出一种包容并蓄的开放的大家风度，我想正是《零八宪章》在这方面的“性格”和意义超过了当年的《七七宪章》，它所具备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会在中国逐渐凸现。

当然，捷克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后者比前者更为残酷。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有着不同的社会基础。——尽管有哈布斯堡王朝300百年的统治，作为德语系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和文化上却在一般的东欧国家之上，在形而上的道德反省和形而下的幽默乐观中却有着制度和文化的深厚底蕴（从卡夫卡到哈维尔、米兰昆德拉等已可见一斑）。

为众所知捷克是一个曾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它是一个被民主“包围”的国家，而“亚细亚”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先天和后天的优势。这种区别人们在政治现实上不一定能直接感觉到，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存在，虽然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零八宪章》开启了一个政治和宪政启蒙的时代，而中国宪政的实现却还需要时日——中国的宪政之路注定是坎坷的。

这却反而突显出《零八宪章》的真正意义——中国开始了走向政治和宪政启蒙的新时期：这是一个践行的时代而不是理念的时代。自由主义也罢，民主主义也罢，宪政主义也罢，不去实行便只能永远留在空中或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实践的时代！就此而言，在思想上或词条上

• 第二卷 《零八宪章》与中国社会转型

批评《零八宪章》的错讹也好误漏也好是容易的，但我想都不是那么恰当，这即在于政治启蒙也无完美，因为启蒙的另一面是实践！《零八宪章》这样的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宪政实践和建立宪政的努力，最重要的不在它的理论，而在它的勇气和道义，强调并认识到这点极为重要。——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它对中共的挑战，对中国能否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民主宪政的挑战。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或中共）还将不断的面临这样的挑战，直到它实现民主宪政为止。但愿中国人民在耕耘和付出后能尽早收获到民主宪政的果实！人民不能等待太久！

http://www.chineseopen.org/Article/sxsy/200902/Article_20090202011154.shtml

1

《零八宪章》签名后对中国人权的追思

铁 流

“我为什么要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一文在网站上发表后，国内几家网站相继作了转载，网易、新浪均可搜索，并能看读，没想到当局如此宽容，竟未封杀。

近几天我不断接到支持我的电话和手机短讯，这些素昧平生的朋友十分关心地写道：“不管怎样，我等小老百姓，虽然面对国家机器，表现怯懦，但心底是支持你的”、“网上很多人曲解《零八宪章》，看到真伤心！这就是几十年来愚民政策的成果吧？但是我愿意相信更多的人是支持的，也希望国家越来越好”、“看了你的文章，太好了，说出人民心声！支持你一个北京市民”、“老先生还好吧？我敬佩你敢讲真话的勇气！”、“你那样大的年龄了，还关心国家大事，请接受我由衷的敬意！”“你还安全吗？”、“你多保重！”但也有骂我的“你这个混蛋！”“你这个老右派”。除此，还有五通越洋电话，是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瑞士的中国留学生打来的，电话的内容一是鼓励，一是关心，使我心很温暖。

关心支持我的人有五十多人，骂我的就是那么一两人，我也对他们表示感谢，人们总有不同思想与看法，怎能一致呢？在我写此文时，又接到一个越洋电话和一则长长的手机短讯：“你好，我是名大学生，在网上看到你的文章，很震撼，也很无奈，很想看一下宪章内容，但几乎所有有关的网页，都被屏蔽掉了。我是学法律的，越来越觉得法律好无用，敌不过人情，敌不过公权，认为很多事情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自己却无能为力。支持你的声音，因为我也很爱国！”

通过这些电话和手机短讯，我深有所感：国家进步了！人民勇敢了！不再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样的逆来顺受，面对不公不义

的事情不但不敢吱声，还要“认罪”作检查。上月我回故乡成都，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成都当局的为了突显政绩，加快经济增涨，竟把一个外地不要的中石油污染项目搞到成都西北面的彭州来建立。我们老百姓都反对，通过手机短讯发起“散步”的抗议活动。我问，你们不怕？他回答说：怕什么？宪法上写有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后来才知道，北京也有这样的事情。

今天早晨，我和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通了一通电话，他说，铁流，我有一个新发现，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最大进步是人权的进步。在毛泽东时代杀几千几万人轻而易举，谁敢吱一声，今天杀个杨佳就闹个天翻地覆。我十分赞同茅先生的观点。我是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只要单位领导对你稍不如意，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说你是“坏分子”就是“坏分子”，一个电话，歪个嘴巴，就可以把关进公安局，判刑杀头有的是。今天就不那么容易了，无论怎样说总还讲点法理，似乎那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时代快成为历史了！

不过这个进步不是谁的恩赐的，是人民群众抗争的结果。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人权的进步也是如此，是三十年来人民在经济腾飞和资讯发达双刃剑的鼓舞下，敢于抗争了。在这漫长抗争的年代里，有的付出了青春，有的付出了生命。今天为了一个和平理性的《零八宪章》，直到现在刘晓波先生还没有回家。我们希望当局宽容再宽容，冷静冷静再冷静，容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见解并存。只要这个声音、见解，未付诸于暴力就是合法的，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我看来，《零八宪章》就是对宪政改革的一份建议书，也是对执政中共的一个企盼，决不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胡锦涛总书记快快开释刘晓波先生，我们对你仍然是尊敬的、相信的！尊敬你，你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相信你，你能披荆斩棘，带领中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走“改革开放”的宪政民主之路！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2009 一月号

公民运动的理性力量必定战胜强权

—— 写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后

李贵仁

中国“公民群体”联署的《零八宪章》，甫一发表就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在发表之前就引起中共高层的惊恐，致使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刘晓波先生被捕，众多签署者也被警方肆意骚扰恐吓。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零八宪章》宣示了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中国各阶层人士，已经开始凝结为不可抗拒的理性力量，决心以公民运动的方式追求全人类所共有的普世价值，彻底抛弃专制政体，坚定不移地走宪政民主之路。由此产生的影响和威力，无孔不入，无远弗届，无坚不摧，比暴力革命更有成效，因而也更可怕。

在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强权蹂躏之后，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方始流入中国大地。但是，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宪政民主，中国人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最惨痛的教训是：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取代一切，主宰一切，也摧毁一切，结果是政权不断变化，专制本质却代代相传，民众始终处于被奴役和任人宰割的境地，从无人权可言，遑论当家做主？近三十年来，虽然不再提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搞了改革开放，掌握政权的中共决策者却只是在经济上做文章，根本不在政治体制上下功夫变革，依然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自外于世界民主之林，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和积累了各种严重的社会矛盾，并且不断爆发尖锐冲突。放眼中国大地，到处是贪官污吏肆虐，魑魅魍魎当道，贫富悬殊日趋严重，而且天道不彰，民主和法制都只是欺世惑众的

幌子。无数城乡人民被抢掠了土地、房屋、资产和自由，无数普通百姓被非法关押、殴打甚至剥夺生命，表面繁荣的中国，实际上仍然乱象丛生。忍无可忍之下，广大民众不得不起而抗争，奋力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所谓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无日无之，个体反抗者也层出不穷，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势，统治者明知风雨飘摇，却不愿意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策安全，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动用各种专政工具对民众的抗争实施镇压，同时堵塞言路，控制舆论，冠冕堂皇地大搞欺骗宣传。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种现状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问题在于如何改变。

各种各样的议论，各种各样的主张，各种各样的口号，都在应运而生。各有各的道理。

有些人力主再走“逼上梁山”的老路，认为只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以暴易暴，为此不惜流血牺牲。

这种主张显然是具有正义性的。然而这是一种古老的正义性，它本身也包含着无法克服的非正义性。任何暴力革命都必然伴随生灵涂炭、流血漂杵的历史悲剧，而且常常在迫使广大人民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仍归于失败。更可怕的是，任何一个阶级的革命，如果脱离宪政民主的规范和制约，即便获得成功，也多半只能为新的专制强权铺路，制造出新的独裁者。这样的历史教训数不胜数，岂能忘记？

当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革命也许是惟一可走之路。但是，历史在给我们留下无数惨痛教训之后，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走另一条道路的正确选择，这就是通过公民运动的方式坚持不懈地争取实现宪政民主。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早已提出了走这条道路的必要性，而且屡屡展示了走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和成功范例。甘地、曼德拉、哈维尔、瓦文萨等人，正是在各自国家坚持开展公民运动，终于以不可抗拒的理性力量战胜了强权，结束了专制统治，实现了宪政民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

家面貌，为人民赢得了新生。应该说，这是更值得效法的呵！

不言而喻，通过公民运动的方式争取实现宪政民主，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抗争才能见到成效，而且同样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作出牺牲。但是，这种以理性力量为武器的斗争方式，因为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就一定可以避免生灵涂炭、流血漂杵的历史悲剧，从而更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更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凝结成越来越浩大的公民运动大军。这样的公民运动大军，以《零八宪章》所体现的全人类普世价值为旗帜，理想崇高，目标明确，不动兵戈也能摧枯拉朽，必定战胜专制强权，有效地实现宪政民主，只是需要待以时日罢了。

《零八宪章》为此而诞生，其历史意义非同凡响。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它所体现的精神化为越来越雄壮的公民运动的理性力量，坚持不懈地为彻底结束专制政体、实现宪政民主而奋勇前行！

2008年12月26日于西安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243>

第三卷

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

呼吁释放我的丈夫刘晓波

刘 霞

我的丈夫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零八宪章》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为蓝本，呼吁在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包括建立民主政府，以普世公认的标准保障人权。200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这一天《零八宪章》由300多位中国公民签署发布，截至今天联署者已超过8000人。

很明显，《零八宪章》在全体华人中引起了共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局认为我的丈夫对国家政权构成了威胁。2008年12月8日，中国警方在未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我丈夫。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罪，但却长期拘押至今。

尽管由于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我丈夫遭遇了这样的对待，但我相信晓波没有后悔。他一向坚定致力于促进、保护中国人的人权，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人权。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第四次亲眼目睹他被警察从家中拖走。在此之前，他曾因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而被监禁半年。1996年，由于撰写文章呼吁民主自由，再次被判入狱三年。2006年，他又一次被北京警方拘押，持续审问12个小时后才获释放。

虽然我和丈夫深知起草并签署《零八宪章》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丈夫被拘留仍然给我们两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很早以前，我们两人就商定不生孩子，不论是男孩女孩，父亲被投入监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独身。丈夫被拘押后，我们只能靠书信联系，俩人不断地给对方写信，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信件对方也许

永远也收不到。他被绑架后将近4个月里，当局只允许我们见了两次面。我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我和丈夫一边吃饭一边谈话，狱警一刻不停地在旁边监视。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盏灯泡。我带给他的60多本书，多数都被监狱官员没收。想到他在监狱里孤苦伶仃的生活，我感到无法忍受。

现在我担心，政府正准备对他进行审判，试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决他。当局经常用这个罪名来惩处持不同政见者，一旦按这个罪名判决，刑期通常十分漫长。警方已经传唤、调查了几乎所有的原始签署者，这是在搜集“证据”以便给我丈夫“定罪”。他们这样做，也是在向所有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发出明确的信号，告诉他们当局不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

我恳求奥巴马总统能够过问我丈夫的案子，向中国政府表达让我丈夫重获自由的愿望。我丈夫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被监禁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无数和他一样渴望国家自由民主，却又没有正常表达渠道的中国人的悲剧。请奥巴马总统站在刘晓波一边，帮助我实现与丈夫团圆的梦想。

*作者为刘晓波之妻，居北京。英文由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劳改基金会翻译。

*英文原载《华盛顿邮报》

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

——《零八宪章》的签名者的公开信

2008年12月8日深夜，刘晓波先生在家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据悉，刘晓波先生是因发起和签署《零八宪章》而被拘押，对此我们深表关切和担忧，并强烈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

我们与晓波先生一同签署这份宪章，是共同分享对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所感受到的紧迫，分享我们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分享我们民族前仆后继、孜孜以求自由平等的共同理想。

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我们对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

我们每一个人签署者，也都是宪章的发起者。我们所要表达的，都体现在这份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公开文件当中，其余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以不需要刘晓波先生替我们承担责任。这件事情与以往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刘晓波先生目前的处境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每一个签署人都坚持，我们的信念不会熄灭、宪章的精神也不会熄灭。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刘晓波先生能够尽快回到家中，还他以自由，那是我们共同的自由。

沙叶新 张祖桦 徐友渔 胡发云 崔卫平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艾晓明 刘军宁 贺卫方 梁小燕 查建英 江棋生 赵 诚 李公明
郝 建 唯 色 蒋宣文 李 海 姚立法 傅国涌 余世存 卢雪松
赵达功 廖亦武 冉云飞 梁文道 秦 耕 范亚峰 马少方 王小山
李剑虹 王德邦 野 渡 田永德 张 辉 王俊秀 翁爱宗 刘 路
姚 博 滕 彪 温克坚 张大军 郭玉闪 邹 巍 刘 荻 冯 玲
王 谨 王仲夏 武文建 郑 雪 李二平 刘勇健 荆 凯 苏元真
智效民 宋翔峰 王中陵 王光泽 吴祚来 铁 流 陈奉孝 李昌玉
俞梅荪 陈 林 郭卫东 曾 泰 沈兆华 高洪明 查建国 赵 听
齐志勇 野 火 郑 裕 林紫洪 阮 杰 高 健 余世新 张伟强
梁友灿 刘欣 齐家贞 武宜三 高海兵 老戴维(顾明德) 汪师东
阿木(林明敏) 阿森(吴森成) 莫之许 马亚莲 许金凤 沈定高
陆苗龙 孙成玉 杨玲妹 范诗铭 余樟法 李金芳 许医农 杨 勇
张津郡 祝争鸣 王建玲 陈 西 李元龙 申有连 廖双元 吴玉琴
徐国庆 吴 郁 张明珍 曾 宁 全林志 王玉文 莫建刚 杜和平
李任科 董德筑 陶玉平 张重发 田祖湘 黄燕明 陈德富 萧利斌
徐 光 戚惠民 刘京生 吴孟谦 陈 平 陆 文 余 杰 杨宽兴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4818>

昨天与今天，奴隶与公民

——为了你的孩子，请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齐家贞

到澳大利亚二十一年，前八年我在工厂、餐馆打工，白天夜晚埋头苦干，与孩子不搭界。后来我开过加油站，现在又是个杂货店，十多年来亲眼目睹了那些进到店里六岁上下的孩子，他们是怎么样的开心，无论来自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人家庭。性格内向的，你看他们的眼睛，清澈的眼睛里满含羞涩、宁静与笑意；性格外露的，一进来就使劲乱蹦乱跳，不知道满心的欢喜怎样发泄。

此间报纸报导了最近在德国北部发生的一个故事。

乐娜和她的妹妹比尔同她们的妈妈一起搬进了米卡的爸爸的家里，两个家变成了一个家。

全家人新年除夕看非洲野生动物纪录片电视。就在此刻，米卡和乐娜得到了一个重大启发，深深相爱的他俩决定去非洲，在炽烈阳光的照耀下举行婚礼，狮子、斑马，说不定还有长颈鹿围绕在身边。他们要把比尔妹妹也带上，以防万一当地的居民没空找不到婚姻见证人。

三人带着墨镜、游泳衣具和一些夏天的衣服，乘父母熟睡之机跑出了家门，顺利搭上电车到了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到四十八公里外的机场坐飞机。两个警察来了，他们设法说服这对恋人，没有钱没有机票是很难去到非洲的。俩个人一头雾水，直到被告知可以享受一顿早餐和热饮料时，才冷静了下来。当然，后来便是感激涕零的父母……

警察说，他们的计划仍然可以付诸实施，只是要推迟。

乐娜七岁，米卡六岁，比尔五岁。

你会羡慕他们的童心纯粹，可爱无比，你会情不自禁地回想，我女儿六岁时是怎样的呢？

我是奴隶，她是奴隶的女儿。

六岁的她，够资格上学了，开后门帮她在达育小学报了名。我四十多年前在该校毕业，现在它身价提高，重庆市重点小学。其它考试还算顺利，最后，老师拿出一双筷子问，是不是一样长，回答是的。老师把它们摆成平行、十字形，女儿回答一样长。老师摆成了丁字形，女儿回答，它们不一样长了。夏校长宣布：“这个娃儿不能收，她智力低下。”我高中同学，后来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朱文萱，她的丈夫叶光远发表宏论，你两个女人懂不起，才送三十块钱算啥子，如果后面多个零再多个零，你看夏校长还说不说这种话。

报名时间被耽搁，附近的学校不收新生了。费尽心机托朋友在离家二十多里外的新立小学入学。每天早上六点，女儿半闭着眼睛起床穿衣，半闭着眼睛刷牙洗脸，胡乱吃点东西，小舅妈拖着她赶到车站坐 BUS。经过几内亚（挤累压）、赞比亚（站逼压）、赤道（迟到）。她到学校，舅妈上班。在半个多小时乘车时间里，女儿常常在车里继续睡觉，四周紧紧围绕着大人，她站着睡觉不摔倒。

中午休息时间和下午放学舅妈下班来接她之前，女儿无处可去，她一个人在操场上东游西逛。为了她的安全，我请求一位退休校长让女儿在她家落脚数个小时。不久，才六岁的她，说了一句把杜校长吓得厉害的话。女儿对她说，“毛主席是鬼”。我也大吃一惊，此话何来。这才想起，她两三岁时，带去动物园玩，突然，一只鹦鹉当着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女儿一脸茫然，我觉得好笑。向她解释，毛主席死了六、七年了，可是鹦鹉不知道。尽管那时候，已经不至于像我的劳改友人陆文燕和杨荣顺的两岁女儿，呼了一句惊天动地“打倒毛主席”的口号，把莫名其妙的爹妈斗了几个月，杜校长还是不愿意我女儿在她家了。

一年级孩子读书的压力是很大的。女儿回家，她说她只喜欢音乐、

美术、体育，她怎么也弄不懂妈、麻、马、骂是什么意思。“妈妈，我不想学文化，我想耍，我愿意当傻大姐。”

傻大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她不再是奴隶的女儿，她妈妈是个自由人，她也是个自由人了。

哪里想象得到，曾经的奴隶现在的自由人齐家贞，有能力让女儿读私立女中——当然，学校根据她的成绩，给了她一半学费的奖学金。高中二年级时，国会新议员帕琳汉森排斥移民，学校在周会上安排女儿上台讲话。她说，我来澳洲的时候才十一岁多，可是，这么小的年纪，在中国的时间这么短，我还是天天想念我的故乡，那里的学校、店铺，我的亲人和小朋友们，想得我的头发掉了很多很多。那些年纪已经很大才移民来这里的人，他们更加难以忘记以前居住的地方和过去的生活，他们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这里。她呼吁澳洲人要理解新移民，谢谢他们的宽容和耐心。说得老师同学眼睛都潮湿了。

被夏校长视为智力低下的孩子，高中毕业，以 99.7 的高考分考进了墨尔本大学，中文系法律系双学位，五年全额奖学金，法律系荣誉毕业生。退休校长曾经很担心的这个孩子，沿着她自己的轨迹自由走去，法律系的毕业论文是写的 Harry Wu（吴弘达）的两本英文书（Bitter Wind 和 Trouble Maker）的评论。

当了几年律师后，一次，女儿被她的顾客告上了法庭——我曾经认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自己要求我把他们的案子介绍给女儿工作的律师行。要不是拖欠的钱数目太大，我差一点就帮他们把钱先垫付了——他们不但拒付拖欠的诉讼费，还倒告律师行，要求几百小时每小时二百三十元澳币的赔偿。

作为道义支持，我和我的丈夫到法庭旁听。

女儿坐在被告席上，我欣赏着她的淡定、自信和高雅。我知道，她不会重复她奴隶母亲年轻时当反革命被告人的遭遇——在呵斥、怒骂与逼供之下的狼狈、低贱与羞耻。今天，她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的女儿，她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正义的国度里，作为律师，她执行法律，作

为公民，她受法律保护。面前放着厚厚一叠文件，女儿翻动文件，从容准确地回答法官的提问。

那对夫妻败诉了，他们必须清付所有拖欠的法律费用。

我这个母亲，一生的苦难与耻辱都得到了补偿。

今天与昨天天差地别，公民与奴隶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担心我们的女儿，担心广义上我们的女儿，广义上中国人的孩子。

且不提巫一毛《暴风雨里一羽毛》笔下五岁的小兔子，死的时候背上还背着她一岁的弟弟；且不提廖亦武《民间冤案录》里一个村庄“自然灾害”的一年里，被自己父母吃下肚里的四十八名七岁以下的女孩；且不提周云蓬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歌里，被活活烧死的三百多名克拉玛依市小学生——死到临头，还“让领导先走”，沙兰镇被水淹死的八十多个孩子——事先接到通知却无人理睬，河南艾滋病村死去的艾滋病患儿和大批艾滋病孤儿，山西黑煤窑里的小奴工……

只说去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压死了近万名孩子，八个月过去，豆腐渣工程的罪犯逍遥法外，痛断肝肠的父母到今天还讨不到一个说法，反而被打击、被监视。最近的三氯聚胺毒奶粉——有人用“唱支山歌给党听”曲子编了首“冲袋奶粉给党喝，党是人民的狼外婆”——是大头娃娃奶粉的翻版与继续，这类事情从发生发展到现今，仍然是奴隶儿女命运的写照，他们根本没把奴隶和奴隶孩子的命当命，几十年不变的一贯制。

奴隶制度是反人道反民主反历史潮流的制度，奴隶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我们中国人不情愿做奴隶，我们更不情愿中国人的孩子做奴隶。

我们等待得太久了。六十年“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我们在不绝如缕似有若无的希望里等待，我们在等待中一年一年等老了。我们经不起在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反反复循环里等下去，无限的等待吞噬我们有限的生命。

《零八宪章》能够帮助中国结束奴隶制度，解除奴隶身上的镣铐枷

锁。我的女儿和我本人从奴隶到公民身份的变化就是生活在《零八宪章》里和没有生活在《零八宪章》里的差别。我把林培瑞先生翻译的《零八宪章》英文版和它的简述版放在老公的店里，西方顾客读了说，这是人类天然应该有的权利，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政府要反对它。《零八宪章》提倡的核心观念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它不存在东方西方的差别。

《零八宪章》还需要完善。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一开始就完善完美，它需要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修正。尽善尽美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修正工作就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那些搞政治的和议员们忙得不亦乐乎的原因之一。不断呈交上来的提案，这里有漏洞，那里不公平，下面的人 push push（推动推动），上面的人 argue argue（争论争论），反反复复，费时费力……

让我们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吧。支持《零八宪章》，宣传《零八宪章》，实现《零八宪章》。

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就不再是奴隶。

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9/01/08_20.html

公民刘晓波

高 瑜

到了 2008 年，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敢于明目张胆反对普世价值？屈指可数就有经济总量已排世界第三的中国，而且是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帜，在雪灾、地震、火车相撞、毒奶粉案一个接一个举世震惊的天灾人祸中反对的，党报、党刊、社科院都充当急先锋。到了年底，303 个中国公民公开表示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且“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提出 19 条具体主张，起名为《零八宪章》。这是一个宪政框架，也是在当前经济、政治交困，官民尖锐对立，群体事件激增的国情下，实现和平开放转型的一个社会共识性程序诉求的纲领。宪政学家王军涛称赞“选择理性公正思考所不可缺少的共识性程序诉求作为宪章内容，这是政治睿智。”

可惜当局没有以对等的“政治睿智”对待《零八宪章》。就在《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以“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捕刘晓波，传讯张祖桦。随后封杀网络阻止《零八宪章》的传播，全国各地同时对联署人进行传讯和约谈。其后果使得《零八宪章》的影响迅速扩大》，成为 08 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也使得中国的公民力量在 89 民运 20 周年之际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对中国向何处去发表主张。被秘密关押的刘晓波成为当然的公民领袖。

强大与弱小

20 年前，刘晓波被民主理念驱使，终止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参

加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这个曾经被誉为“文坛黑马”的文艺学博士不是天生的英雄，在东京机场转机，听到北京紧张的局势，曾打算掉头买回程机票，恰恰此时听到飞北京的航班的登机呼叫，才被召唤继续完成了回北京的航程。6月2日，刘晓波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名人，他提议并说服周舵、高新和音乐家侯德健一起到纪念碑下绝食，他把这看成能够说服学生将民主作为长远目标最后的机会。他对三位朋友说：“我们不到广场，不和学生冒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发言权。”立刻获得“四君子”的美称。3日晚11时，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突然从高音喇叭里播出，告诉广场：“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平息北京发生的暴乱。”半个小时之内，广场几十万围观的人群就一散而尽，只剩下纪念牌下数千留守的学生和包括“四君子”在内的少数老师。4日凌晨两点半，军队包围了纪念碑下的学生，此时“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在广播里讲：“愿意走的走，愿意留下的留下。我本人要留下来。”更鼓舞了学生要用鲜血唤醒人民的意念，几千人一起在纪念牌四围坐下来，以表达决一死战的决心。此时从长安街跑来的工人告诉学生，他们的兄弟姐妹已经遭到屠杀，其中一个工人拿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刘晓波看见，立刻想到万一这支枪发出一声鸣响；这就是刘晓波的过人之处。他立刻叫几名纠察队员一同上去把枪抢过来，他首先在汉白玉的石栏上砸这支枪，震得虎口痛疼，几个人轮流砸，才把枪砸碎。在广场学生的生死关头，“四君子”的决定是他们派两个代表，广场指挥部派两名代表一同去和军队谈判，要求允许学生和平退出广场。他们到广场指挥部协商，总指挥柴玲说：“听说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学生留守广场，坚持到天亮。”刘晓波立即说：“我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任何人也没有权力拿广场几千名、上万名学生的生命做赌注！”封从德代表指挥部拒绝和解放军谈判，而且要求四位老师不得代表学生，只能代表第三方去和解放军谈判。“四君子”的两个代表侯德健和周舵是在枪口顶着的情况下和一名三星上校谈判的，上校向上级汇报之后又返回来，告诉侯和周，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学生撤离广场，并且祝四位老师成功说服学生。侯德健和周舵还有

两位医生是跑回纪念碑的，他们对学生喊话。此时荷枪实弹的军人从人民大会堂，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涌来，清场已经开始。纪念碑下正进行艰难的表决，走和留的声音一般大，最后封从德宣布撤离。5点钟，在黎明时分，几千人的队伍从戒严部队留出的东南角的通道，有序撤离。“四君子”一直在广场等到6点半钟，排在队伍最后。

一场数百万人参加的，坚持了一个半月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震动苏东波，震动全世界，却能被邓小平指挥的军队一夜之间镇压下去，人民是鸡蛋，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是石头。“四君子”当然更不在话下。他们都遭遇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刘晓波被作为伸向学潮的“黑手”抓出来，入狱20个月，开除公职。我想问：如果89年刘晓波没有从国外跳回来，没有组织四君子绝食，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会是什么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太上皇，几十万用坦克、机枪血洗北京城的军队和四个挽救了几个年轻学生的生命，自己也是年轻人的老师做比较，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

自信与暧昧

二十年后，一切还在重演。

我看到崔卫平和徐友渔两位学者先后写了《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几乎是一个题目，他们不得不在文章里不厌其烦地讲解普世价值的ABC，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哪些合法权利。

《零八宪章》提出的十九条主张，绝大部分在现行宪法中都有表述，甚至内容更详细。这正是宪章的可操作性。进入09年，又快到了修宪的时候，《零八宪章》第一条主张——“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这又有什么错吗？

中国现行宪法与民主国家宪法最大的不同在于有一个《序言》，其

其他国家都没有。正是这个《序言》给予中共的执政集团以法律之上的权力，使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践踏、被剥夺，使得军队可以变成屠杀人民的工具。使得今天多少维权的农民、工人、甚至是律师，都像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要求用宪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公民权利。现在轮到《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为刘晓波维权了。维护宪法和违反宪法比较而言，哪个又是强者？哪个又是弱者？

政治学家陈子明有这样的两段论述：“只要是思想上的强势者，有自信心的人、高尚的人、具有进取心的人，他都是普世价值的拥护者，他都认为我说的这套东西可以具有普适性，可以推广到世界上所有人。如果他一开始就说我的这些观点只有我们几个人能用，只有我们这个小群体能用，他思想上一定是个弱者。这样的思想懦夫在历史上经常是有的。”

“‘新中国道路’实际上是要反对所谓搞西化、搞三权分立等等，但是它不是在价值层面上反对，他不是说民主是坏东西，自由是坏东西，但是他讲需要有一套新制度建设。所谓新制度建设，继承的不是梁启超、孙中山，他们要继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民主’，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字，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中国特色也好，新中国道路也好，北京模式也好，肯定的是什么？肯定的就是专政。但是这个专政与毛的专政比，在思想上是没有号召力的，毛的专政能告诉你去干什么，现在的专政不能告诉你要干什么。这个专政的实质就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所以他不能说清楚要拉着中国的这列火车去哪里。所以我说，现在这个专政要跟毛挂钩也挂不上，毛还是有一个理想主义目标的，现在这个专政有什么目标？你这个专政是暧昧的专政。”

我认为暧昧专政的手段也是要制造恐惧，好让社会成员服服帖帖。2005年抓了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军医蒋彦勇，同时还有他的夫人，夫人虽然一个月后释放，但是取得了效果。很多老干部家庭，夫人管制了电话，切断老头和外界的联系，进门造访，先得获得老太太的批准。饭桌上一家老小围着老爷子，儿子说话了：“您老了，不管不顾，我们总得顾及吧。”

但是今天再抓了勇于践行公民精神的刘晓波，就难获得同样的效果了。刘晓波不但做了再坐牢的准备，就连看了9.11双子座倒塌的电视画面，当时吓得浑身战抖的刘霞，也做了再走探监路的准备。所有联署人都表现了对刘晓波和《宪章》的自信。这个自信心将成为战胜极权，重建共识的人格感召力。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哈维尔公开发表文章支持《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真不知道看到哈维尔的文章，实行暧昧专政的衮衮诸公会做何等感想。

我的老大哥姚监复先生，从不参加联署签名，他善于各自为战，而且往往取得姜是老的辣的可观战绩。一月中，他写了一篇题目为《1934年毛泽东主席中字第一号命令：组织联邦共和国!》的文章，文中还摘录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人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的。”我当然理解，这是一个体制内的老兵散勇对《宪章》的声援。

大真与大爱

90年代曾经听说经历了六四天安门广场之夜的刘晓波，在深夜被公安抓捕，塞进警车，他竟然不由自主浑身哆嗦了十五分钟。我一直不相信，以为是有意丑化他的传言。后来忘记是听他自己说的，还是看到他自己写的，总之是真事。从不想回避自己人格的弱点表现在他写六四死难者和六四母亲群体的大量文章里，刘晓波年年要写六四，是写六四最多的作家，称自己是幸存者，“我还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视，有六四难属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监狱中违心的悔罪，我曾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软弱、自恋，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忧患远甚于监狱强加给我的恐惧和孤独；人的有限和人性的

弱点太需要敬畏和谦卑，通过自我灵魂的拷问来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这与其说是面对铁窗的考验，不如说是审视自己的灵魂荒野的考验。”一个虚伪的人无法做到自我反思和不断地自我改善。刘晓波人格的最大魅力是真诚。

大概 7、8 年前，香港蔡秀霞小姐请何家栋、牧慧、包遵信、刘晓波、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吃饭，由我点菜。蔡小姐也是记者出身，现在孤身一人在北京做生意，还没成家，我一边点，一边计算着菜价，大家谈兴方隆，没人管我，只有对面坐的刘晓波冲我喊：“螃蟹！螃蟹！”而且眼镜后边闪动的目光很急切。若一人一只，菜价肯定翻倍。我要了一盘炒螃蟹，告诉服务员炒两只。刘晓波不喝酒，饭桌上除了高谈阔论，就是猛吃，他吃起来，就不挑剔了，无论对摆在他面前的那盘炒螃蟹，还是咸鱼贴饼子，一视同仁。多出来的两个海蛎子萝卜馅的包子都夹给他，只要吃得下去，也就不推让，没有丝毫的酸文假醋，只是对海鲜情有独钟，是个地道的海蛎子（大连人），也是个丝毫不掖不藏的真正的男人。

以后当我看到刘晓波《钱钟书和他的学问——评极权制下大知识分子生存之道》这样的杰作，耳边经常回响他饭桌上“螃蟹！螃蟹！”的喊声。只有无比真诚的人，才会具有揭穿自私和虚伪的良知，也才会具有反抗极权和罪恶的良知。刘晓波对毛泽东一类的大独裁者，对共产主义，对知识界堕落为媚俗帮闲者的批判、成为六四之后“停止了思想的时代”（刘晓波语）的例外，他的作品日渐积蓄成一座思想库。他的思想批判能力的透彻，不仅源于他人格的高尚和真诚，还在于他心灵拥有的对人性和自由的大爱。刘晓波具有成为伟大文学批评家的一切潜质，但是他六四之后的 20 年间，他用笔参与了中国发生的一切公共事件，成为公民的代言人。给我印象深刻的是 2001 年当局公布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之后，刘晓波公开谴责对法轮功的镇压，这是发自国内最早的谴责。后来又有他对高智晟揭露当局惨无人道迫害法轮功的声援。

2006 年 11 月我到美国访问，接触美国主流知识界，他们反对伊战，

反对布什的气氛浓厚。和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交谈，我告诉他们：“我的立场不一样，我支持布什。”她们惊奇地瞪大眼睛，不明白我这样一个坐共产党监狱的自由主义者，怎么能支持战争？我告诉他们：“中国和我同样处境。持普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支持布什的居多。”她们更惊奇了。我说：“因为我们吃够了也看够了极权政权制造的苦难，这种苦难是让人永远处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和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痛恨萨达姆和痛恨袭击你们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也是一样的。”此时她们开始点头。我告诉他们中国一个有名的作家，写过多篇支持布什发动倒萨战争正当性的文章，9.11发生时他甚至想到纽约来为伤员输血，想参加反恐部队去打仗。她们用拖长声的“噢！”表示赞叹。我告诉她们的这个作家就是刘晓波。2001年9.11发生的当天，刘晓波写下这样的文字：“悲愤，难以想象！难以言表！我想为死者献血！我想参加反恐怖部队！无论是哪里组建的，只要能够消灭恐怖主义，我都参加！我想跨过太平洋，参加全纽约市动员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当作救援的天梯，伸向从高楼中求救的人们，让那些绝望中的无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看见曼哈顿上空的蓝天！我想化为一棵常青树或一捧泥土，在坟墓上为那位52岁的飞行员守灵！世贸大厦坍塌的一瞬间，我想化作一块坚硬的石头，与大楼一起沉下来！”

刘晓波“六四”之后20年间，除了坐监狱，就是受监控，大连市公安局不给他发护照，提出只要他答应出国后不再回来马上给他护照，他拒绝这种专制的驱逐令。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病逝，当局如临大敌，公开镇压公民的悼念，刘晓波也是不准悼念的人士，把他软禁在家。刘晓波写了多篇悼念文章。“赵紫阳在六四那一场人性与兽性的斗争中，放弃最高的权力，自愿选择站在失败者一边，回归民间道义立场，成为有漫长强大专制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格奇迹。这位知名老人的亡灵属于民间。”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解决学潮问题。”已经成为他的政治遗嘱。《零八宪章》是在执行这个政治遗嘱。我想未来领导中国向政治现代化变革的政治家，一定会实现赵紫阳的政治遗嘱，也会

实现中国公民建立宪政框架的程序诉求——《零八宪章》。

刘晓波现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我更愿意以公民称呼他。现在刘晓波公民在里边，我们在外边，我们都在努力争取他和我们在一起。那一天一定是公民的节日，刘晓波一定会大喊：“螃蟹！螃蟹！”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902/Article_20090219014241.shtml

m1

致温家宝总理公开信请求释放刘晓波

昝爱宗

温家宝总理：

前不久，总理阁下在英国剑桥大学遭遇一研究生当众掷鞋的抗议，事后又专门请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传递宽容抗议者的信息，显示出一种绅士风度。或许，掷鞋是英国传统文化包容的内容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多使用另外一种温和的表达方式，比如公民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由公民自下而上地向国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可是，《零八宪章》这种和平自由的表达，却成为今天政府所不容的异类，签名人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刘晓波，自 2008 年 12 月 8 日起至今一直失去自由。刘晓波博士的签名行为只是充分行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公民权利，他所签名支持的《零八宪章》，也只是一份和平的有关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公民建议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望、期待，却不幸因此使他失去自由。如今两个多月过去，官方未批捕也不放人，不合法律程序，也不近人情，接下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律师也难以依法正常介入。这些，我想并不符合宽容及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符合中国的法治建设要求。一名文人如刘晓波博士，或者《零八宪章》首批 303 名参与签名的人员，若政府及司法部门还没有公开对《零八宪章》签名行为定性为“敌对势力”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颠覆煽动国家政权”行动，就应该先释放刘晓波博士，并停止对其他 302 人的问话或传唤，我想这也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充分体现，政府应当充分尊重和包容任何公民的任何温和、和平非暴力的建设性表达。

2009 年是中国经济难过的一年，总理阁下总是肩负重担，忍辱负重

实在难得。舆论中经常看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说法，历史上也有“好事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的规律，我相信民主自由大势和现代化之路不可逆转。即将到来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总理阁下又要面对众多国际国内媒体记者的发问，以及面对电视现场直播镜头以外的亿万双眼睛，问题总是难免刘晓波博士的现状和《零八宪章》的定性，以及对“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的看法。我不知道总理阁下如何应对，如何对这名因参与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文学博士进行评论，我只是向有权的领导人建议，当先释放刘晓波博士，让记者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让“六四”的历史包袱不再沉重一直下去。

我记得《零八宪章》签名庄道鹤先生说过，六四若不平反，他就一直支持《零八宪章》。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总是在运动、平反和运动、等待平反中度过。涉及整肃邓小平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很快平反，“文革”也被彻底否定，眼下尚有“六四”等运动正在等待平反中。平反不是运动，而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的认定，基于对真相的一个还原，基于尊重历史的决心，同时还需仰赖政治领导人如温总理的勇气、智慧和历史责任感。

温总理经常提及“仰望星空”，我毫无夸张地说，刘晓波博士就好比繁星中比较明亮的一颗明亮之星，刘晓波博士对真理的敬畏就是使他自身发光、明亮的原因。我也愿总理阁下能够充分看到这一点，善待刘晓波博士和《零八宪章》的其他签名者，使宪法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得到具体落实。

以上1300字简单建议和请求，期待温总理能够在百忙之中看到，并请给予回应，感谢您！

公民 睿爱宗

公民身份证号码：341222197109042395

2009年2月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2/200902151848.shtml>

在这新旧交替，充满危机亦充满契机的新年度里，谨将胡锦涛先生的九字诀“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借花献佛转送给已经一甲子高龄的中共政权，快快地启动政治改革、推行宪政法治，痛下决心杜绝贪腐、为人民的福祉服务，归队到现代文明的国际社会中，别再把国家的人力、金钱花在控制打压异己的无谓事情上，就从立即释放刘晓波跨出第一步，庶几于党于个人还有一线存活的生机，于国于民则是万幸。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5514>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 ——写给刘霞

余 杰

晓波北京警方带走之后，已经有十多天没有任何消息了，没有人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的妻子刘霞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执法机关的正式文件。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刘晓波下落的提问时，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中国的内政！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就这样让一个公民不知所终——而那个前来与我谈话的北京市国保部门的官员，反倒指责《零八宪政》破坏了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的“和谐”！我回答他说，你们把人抓走才是最大的不和谐！

12月20日下午，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警察的封锁与纠缠，与刘霞一起吃了一顿饭，得以了解到晓波被抓走时候的一些情况。刘霞说，八号那天晚上十一点，十多名警察冲进来将晓波带走，然后一伙人留下来抄家，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撤离。他们家早已多次承受抄家的待遇，这次再次被翻了个底朝天。那天，我还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我与美国的友人们一起从网上看到了晓波被警察带走并被抄家的消息，许多对国内情



刘霞

况不了解的朋友深受“抄家”这个词语的刺激——许多人天真地以为，这种粗暴的事件只是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才会发生，没有想到，在如今这个御用文人们吹捧的“太平盛世”里，当局居然还会对一名手无寸铁的作家“抄家”！

晓波家的存折就放在电视机旁边的一个小纸盒子里，一名抄家的警官翻开来仔细查看了半天，还有些不相信地说：“你们家的存折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放着？”刘霞说：“我们家又没有保险柜，况且一直受到你们的保护，盗贼都不敢上门来，当然就这样放着了。”这名警官又疑惑地询问道：“你们家就这么一点钱吗？”刘霞说：“这点钱在我看来已经够多了，够用好多年了。”是的，这名警官难道指望晓波像贵党的贪官污吏们那么有钱吗？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到苏州市副市长，再到深圳公安局龙岗分局副局长，哪个落马的官僚家中不是有数千万巨款的？

刘霞又将开始孤身与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对峙的生活了。我们都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希望她好好保重，要吃得下，睡得好。晓波经常说，与中共的对抗，乃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点都不不能着急，谁着急谁就失败了。89之后将近二十年间，当年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们，多半已经改旗易帜、随波逐流、鲜衣怒马，或闷声发财，或向中共献媚，或以“学术独立”为标榜，或尝试再作“帝王师”。而刘晓波在几进几出之后，仍然矢志不渝，坚持韧性的战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这个独裁政权不依不饶地“磕”上了。这是一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的战斗。晓波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有妻子刘霞的支持。

比起失去讲台和发表作品的园地，并常年受到警察监视、骚扰甚至囚禁的晓波来，这些年来，刘霞也没有少受罪。我听到过不少妻子抛弃作为政治犯的丈夫、选择新的安稳生活的故事。我充分理解人性的软弱，谁也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去谴责那些无法承受生命之沉重的妻子们，她们有权选择另外一种安稳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听说过若干异议人士在长期的高压之下心理变态，将妻子当作折磨的对象的故事。有一名异

议人士就曾经当众洋洋得意地宣告说：“以后我结婚了，就把妻子叫‘共产党’；以后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产党’；这样我天天打骂妻子和孩子，就是打骂‘共产党’！”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么可悲啊！

在一个异议人士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国家里，异议人士要保持牢固的家庭婚姻关系，比普通人艰难得多。晓波与刘霞是这个圈子里有名的恩爱夫妻。当我第一次与晓波见面的时候，刘霞也在场，她的光头打扮让我大吃一惊。那时，我私下里想，难怪晓波是学美学的，找一个如此前卫打扮的妻子！后来，当我读到那本厚厚《刘晓波刘霞诗选》，这才知道他们的爱情有多么可歌可泣。刘霞写诗的历史远远比晓波长，她曾经通过诗歌去追求梦想，但是天安门的坦克碾碎了中国所有的诗情画意。如果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个疑问，那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写诗更加不可能。刘晓波与刘霞的诗歌是这个时代最真实、最悲怆的“诗史”，诗人廖亦武评论说：“在诗歌娼妓泛滥成灾的上个世纪中国，诗圈外的刘霞是幸存下来的惟一的女诗人。”

刘霞多才多艺，除了写诗，她还画画和摄影，而晓波是她那闪光的艺术才华的欣赏者。刘霞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状，我们曾经向她推荐过好多种治疗失眠的密方，还买过据说是疗效极佳的枕头送给她用，但她尝试过之后，说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这大概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异议分子的妻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吧。这一次，当我们询问刘霞睡眠如何的时候，刘霞告诉我们说，这些天来，晓波不在身边，她反倒能够睡着觉了。她不无酸楚地说：“多年来，我就像一直在等候着天花板上掉下另一只鞋子。如今，这只鞋子终于落了下来，我这才安心了。”换言之，她对晓波被捕入狱早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老大哥”那无处不在的盯梢与威吓之下，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真正的自由的滋味。而他们正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以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早日成为“自由中国”。

几年之前，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杰出知识分子索尔孟(Guy Sorman)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访问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

国》一书。近年来，西方国家元首、商人及文人，在共产党及其畸形的经济改革的泡沫之下迷失，宁可与中共妥协并从中分得一杯羹，而不愿支持那些推动中国社会迈向民主自由的力量。此种严重短视、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仅背离了西方的基本价值，而且践踏了中国的未来。对持，索尔孟给予严厉批评，并为西方读者描述出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也描写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包括刘晓波夫妇。有意思的是，这位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采访了刘晓波夫妇之后，并没有将刘晓波作为“传主”，偏偏将刘霞当作“传主”，并留下了若干关于刘霞的栩栩如生的文字。

索尔孟将刘霞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经过二十世纪纳粹的暴行之后，“犹太人”不是暗示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荣耀，而是隐喻作为受难者的苦难。索尔孟写道：“对她而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存活。她明确指出，共产党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铲除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刘霞本来不是一名有“反骨”的女性，她出身于高干家庭，是“既得利益者”，在国家税务局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刘霞毅然辞去了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一名“无业游民”；更为要命的是，她还爱上了刘晓波，一个“不该”爱的人。既然爱上了晓波，就得承受他所承受的一切——包括被当局贬斥为“贱民”。

今天的中国依然一个实行“株连”的社会，政治犯的妻子必然“享受”与丈夫相似的“特殊待遇”。正如索尔孟所写的那样：“就跟纳粹德国一样，在中国也是依照血缘或婚姻来判定何谓‘犹太人’，刘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并无从事政治活动，也很少公开发言，只是针对自己不对外展出而仅限亲密友人观赏的摄影及绘画作品，偶发感言。当她的夫

婿，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捕入狱时，她曾藉洋洋娃娃创作，风格尖锐，拍摄囚犯遭刑求凌虐脸部变形等一系列照片。”仅仅因为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官方划入了“敌人”的行列之中。此次刘晓波被抓走之后，我和妻子前去探望刘霞，与在楼下监视她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既不准我们去晓波家探视，也不准我们将水果转交给刘霞。当我斥责这名警号为“038540”的、自称隶属海淀分局的警察“毫无人性”的时候，此人神色狰狞而毫无愧意。几天之后，北京国保的一名官员约我谈话，我正式向他提出投诉，并反问他说，难道我们去探望刘霞也触犯了法律吗？这名国保官员却说：“刘晓波刚刚出事，在这个时刻去探访他妻子，确实不妥吧。”这是一种多么荒谬的逻辑啊。

几年前，当索尔孟去刘晓波家探访的时候，刘晓波家的门口站着四名安全人员。有些在海外唱高调的人别有用心地说，晓波很会玩平衡术，怎么写“反动”文章都没有被中共当局关进监狱，所以他是共产党特意安排的一个“花瓶”。索尔孟则清晰地看到，晓波并不安全，晓波面对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是一个野蛮凶残的、无法无天的政权：“共产党可以随时决定锄掉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对待其他民运人士般，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及图谋颠覆政府即可。这是打压中国所有‘犹太人’的惯用手法。”当时，他与晓波夫妇告别的时候，对这对夫妇既敬重又担忧：“我们心情沉重地向中国这位被判缓刑的‘犹太人’及法西斯体制人质——刘霞告别。事实上，今日的中国可能比昔日的中国更为法西斯主义吧。”如今，晓波“终于”出事了，我想索尔孟并不会为他的预言成真而感到骄傲，他会加入到为晓波呼吁的人士的行列之中。而那些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民运领袖”们仍然没有闭嘴，他们说这是中共当局的“苦肉计”。是的，某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确实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

时间与品质直接相关：做一天的反对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对派难，刘晓波一直坚守在中国本土成为当局“眼中的刺”。做一天的恩爱夫妻容易，哪对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胶

似漆？但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爱夫妻难，尤其是像刘晓波和刘霞这样在逆境中风雨兼程的。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刘霞一个人奔波在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的情形，那是一段怎样痛楚的旅途啊。刘霞在一首诗中写道：“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一开始，他们只是“恋人”的关系，刘霞无法获得与晓波会面的权利。后来，他们申请结婚，他们的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为了这份结婚证书，当时还惊动了公安部，层层手续，旷日持久，最后才予以“特批”。“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刘霞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啊。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语气平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但我想，这张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既证明着他们爱情的坚贞，也是一个时代良心犯所承担的苦难的鲜活见证。

当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伴随着丈夫们踏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之旅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都被她们感动了，连暴虐的沙皇也为之掉泪。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知道刘晓波和刘霞的人并不多，人们都在为各自的“小康生活”而斤斤计较；那么多高官和警察则心如蛇蝎，他们连最后一点良心都荡然无存。同时，念叨着要吃两口“人血馒头”的同胞，在“菜市口”这样的地方熙熙攘攘地排起了长龙。即便如此，晓波和刘霞仍然选择了“中国的犹太人”的身份，他们不求报酬与名利，他们不当英雄与偶像，他们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符合他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他们亦相信“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是的，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晓波的心灵，世界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晓波与刘霞分开。这是对这个世界持悲观主义看法的我，少有的确定性的、乐观的判断之一。

2008年12月24日平安夜初稿

12月30日定稿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901/Article_20090104000415.shtml

声援刘晓波兄

冉云飞

今天是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的日子，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却有更多侵犯人权的事频繁发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当局前晚拘留了二十年来几进中国监狱的人权斗士刘晓波兄。看到这样的恶行，不仅出离愤怒，更多的是对当局色厉内荏的同情。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人之天性，只要中国人还没有死光，为自由民主、为人权而不懈奋斗的人与事，就会层出不穷。

我深知国人包括我自己懦弱麻木、胆小怕事，但决不缺活下去的勇气。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就会逐渐想得到有活得更加有尊严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延，更是一种权利上的必然发展。但问题是，如今的中国还有不少人吃不起饭，温饱尚没有解决（至少我所经历的农村地区仍有这样的人，我的家乡也不缺乏这样的人，虽然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但这都是我的亲历），剔掉没有勇气活下去的人，还是有不少人有勇气活下去的。那些能活得下去的人，必然为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尊严而不断努力。再者，如今的经济危机带来大量的人权问题（如生存等），必然激起更多的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仅深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多的是一党独裁的腐败专制制度所造成。许多人生活困窘，不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这种剥夺民众权利的制度造成的。我们不少知识分子包括晓波兄都主张非暴力的和平解决之路，主张制度变革，但是我们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样的理念，尤其是面对当下糟糕的社会现实，不少人只差揭竿而起，所谓逼上梁山，此之谓也。官方正在用尽一切高压加速社会危机，亦谓

之自掘坟墓而不自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晓波兄等起草了《零八宪章》。这《零八宪章》温和、理性、务实，充满着真相下和解的精神，以民众权利为念，以苍生利益为任，以中国平稳渡过零八诸多灾难后的艰难时刻，为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竭尽心力。我不能说这宪章十全十美，但我敢说这是我所签的诸种文本中，至今为止很重要的宪政文本。几千年来，特别是一百年来，我们的共和宪政梦付出许多人的心血与头颅，却最终收获的是更为暴戾的政权。除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充满现实悖论的土壤、文化、制度外，国人在这方面的短视，特别是有能力的人在这方面没有相当的超越性，全是过分工具主义（充满没有底线策略）和实用主义（充满没有底线的眼前利益）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争取权利的事业，有深刻的关联。这样的妥协只是一种苟且，而非一种基于长远利益的打算。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妥协（当然也应该学会妥协，妥协是一种民主自由必须之训练，但妥协即在可以接受的框架范围内）的话，也得有一些不可让渡的原则，如人的尊严与权利之必须受到保障等等。

我认为晓波兄等起草的《零八宪章》，在当下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文本。为整个乱象纷呈、利益扰攘、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在经济危机越来越深重的大背景下，做出了很好的和解的努力。但官方基于其长期以来的统治惯性，刚性和暴力管理社会的方式，不容许这样理性、温和、务实的文本出笼，不允许各界人士基于自己（包括许多人的）的利益和良知，来表达自己对时局和社会改革的意见，而是抓晓波、祖桦二兄，请众多签名者去训问喝茶，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不愿意理性解决社会问题而做出的一种强力威胁。这种威胁在权益越来越高涨，在民主自由理念深入民心的时代，不会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熄灭，只会激起更多的人用各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虽然我们不主张暴力行动，但弱者万不得已下的自卫，就像法律许可的正当防卫一样，有它不可替代的正当性。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社会上的暴力事件增加，希望能在理性和和平的

谈判中达成每个人利益都得到保护的妥协。我希望当局值此诸种危艰之际，应该善体民意，逐步将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让民众在经济受危机困境的情况下，有一点可以见到光明的盼头。人一旦有盼头，就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理性态度去做事，甚至改变自己。否则一旦对未来没有理性预期，今天活了不知明天还是否活，人的许多破坏力都会释放出来，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实非好事。如此一来，官方政权以及其中的官员自不能置身事外。换言之，不进行让所有人的权益都逐渐得到切实保护的政改，有可能不少人的好日子都到头了，不要以为自己有权有钱就可以高枕无忧，这是一种缺乏相当预期的短视。

中国人至今尚未得到自己所应该拥有的基本人权，这六十年来，中国这块大地上的人们依旧没能沐浴民主自由之光。像晓波兄这样的人，二十年来为民主自由不懈奋斗，今天我们能享受一些此前没有的权利，晓波兄们的努力，功不可没，值得敬佩，并且让我们深深铭记。我们在怀着深深的感念之心的同时，敦请当局善待并尽快释放刘晓波兄，能顺应民意进行有效而务实的、切实保障民众权利的政治体制改革。

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纪念日于成都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4714>

在冬夜中想念我的良师刘晓波先生

欧阳小戎



1989年六四民运时，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

北京的冬天和往年一样寒冷，但是还没下过一场雪。没有雪的话，冬天会显得孤单，大街上的热闹劲也消失了，不知是因为这枯燥的天气，还是因为经济危机正在蚕食着整个城市。

我的老师刘晓波先生曾经以桀骜闻名，是以在没有遇上他之前，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认为假如有机会见到他的话，有可能会被他指着鼻子一通臭骂，因为我听很多人说曾被他臭骂过。所幸的是他从未对我那样。

他略显清瘦，常年剃个小平头，脸色颇深，不似东北人。惯常卡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额头上虽然略有几丝细纹，不过看上去仍旧生气勃勃。你对他说话，他就张嘴竖起耳朵，同时微微伸头够出脖子望着你，摆出

呆头呆脑的样子，仿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你在说什么。轮到他接嘴时，偶尔还要结巴一会。如果不是敬于他的声望，你也许会忍不住笑出来。但是现在最好不要笑，因为他被警察带走了，已经好多天，除了知道被关押以外，没有一点别的消息。如果我猜得不错，他现在正再次“回味”着看守所里馊窝头的滋味。尽管很多人盼望着他能早日脱离桎梏，但是悲观的气氛渐渐占了上风，不少人觉得他将在劫难逃，如同这干枯而萧条的冬天。

1989年，军队即将进入北京城，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逃离中国大陆。时在国外的刘晓波先生却毅然回到国内，试图与市民、学生们一同为阻止屠杀而努力，直至6月4日凌晨被迫从纪念碑前撤离。以及随后不久那位如今已魂归阴曹地府的红朝第二代皇帝钦点之“黑手”云云，广为人知，不再赘述。只是二十年来，始终坚持作为一名异议知识分子或曰一位良知作家应尽之职责，出入囹圄，几进几出，作品虽丰，却无一篇可在大陆问世……其中艰辛，亦是一言难尽。

某次，我在一个饭馆里遇上他，那时已是深夜，他正在饭馆里吃宵夜，我得知地点后前去拜访他。天早就黑透了，很多商铺打了烊，街上冷冷清清没有什么行人。饭馆楼下停了两辆（或是更多）车，几条彪形大汉站在车外深夜里，我远远感到他们借着微弱光线直直盯着我，知道那是刘晓波老师的“保镖”。这些密探几乎把住了饭馆大门，目光凶悍而专注，我只好一路和他们对视，压抑住心头阵阵厌恶，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走进饭馆。

那天晚上他照例叮嘱我不可冲动，需要花长时间磨练自身，以和专制者比拼韧劲。临别时已是深夜，饭馆打烊，他看我上了车，一路跟着车走。一串“保镖”凶神恶煞地在背后如影随形。他却如同一切都不存在一般，不紧不慢。从对面驶过的车辆将灯光投射到他脸上，瞬间照亮了他挥别时脸上略显憨态的笑容。以此同时，我看不见不远处“保镖”们的车灯亮了，然后他的身影消失在车后夜色中。

我到过北京多次，也见过他多次，每次的情景都大同小异。他会先

把我稍稍“数落”一番，然后告诉我，我所做的某事或者写的某篇稿子还是不错的。密探们大摇大摆跟在他屁股后面，他也大摇大摆走在密探们的鼻子前面。这些密探大多五大三粗，估计是为了在必要时对他或者与他接触的人动用武力。

我也曾经被密探跟踪过，是明跟，暗跟的不算。跟踪我的，是一个老弱病残，我和他很熟悉，他的日常工作除了酗酒之外，剩下的便是与男女同事们编排色情段子打发时光。半路他还买水果请我吃，但是我没吃。我想他之所以买水果请我，是在寻思若是动起武来，他占不了便宜，于是只好寄希望于我不会烦他。我自然不会烦他，如果连这都值得烦恼的话，那么刘晓波老师岂不是烦死了？

有密探跟踪的日子很不自由，但较之囹圄，还是有如天堂。被强行剥夺自由的生活，我连一天也不愿去过。我想刘晓波老师自然也是同样，但他仍旧被做公的捉去了，捉他的罪名似乎是因为他参与起草了一份《零八宪章》。这份《零八宪章》里的一切我都完全赞同，并签名其上以示支持。如果他没有参与《零八宪章》，也许一样还要捉他，这是坚持的结果。只要你仍在为自由坚持，那就得随时做好为了自由失去自由的准备。

晓波老师一贯给人个性张扬的印象，其实他话并不很多，至少，在我面前，他丝毫也没有传说中那种张扬，而是温和可亲，甚至显得有些笨拙滑稽。他心中有很多愁苦，这些愁苦远远多于如我一般的寻常人士，而他却不能像如我一般的寻常人士一样肆意表达心绪，只能把苦水一个人往肚子里咽，大概是因为声名在外的缘故吧。有时他会点燃一根烟，然后一言不发坐在电脑前，吧嗒吧嗒吸着，就像赵树理之类作家小说里那些吸旱烟的北方老汉，独自坐在炕头上吧嗒吧嗒，若有所思咂个不停一样。有一次我在深圳赵达功先生处，他从网上一耳朵听出我声音来，似乎显得有些忧愁，“呵、呵、呵”地轻轻喘气：“喔……你在达功那里，那我、我、我……就放心了。”然后一言不发。

每当想起那天深夜挥别的瞬间，我就急切地祈祷他能马上回到我们身边来，和我们一道为自由做坚韧不屈的守望。当然，你可以说，他此

时在囹圄中，同样是和我们在一起，一道守望自由。不过他若能早日回来，我们将获得一个短暂的皆大欢喜，年关将至，总要喜庆些，才符合传统。

我有一条香烟，是刘晓波老师送我的，武汉黄鹤楼牌，据说是很好的烟。我抽得很少，因为舍不得。那是缘于某日我去为他修理电脑。一进门，他便送我。我说这烟给我抽可惜了，拿去送别人吧。我们之间推让了许久后，他忽然眼睛一亮，向我凑过来，压低声音，好像要告知我一个天大的秘密：“你把它拿到下面小铺，一条能换好、好、好几条呢……”

冬天很冷，经济危机中的冬天则更冷，许多人交不起暖气费，甚至有人买不起棉衣，冬天的看守所呢？这都是源于专制那比冬天冷酷万倍的心肠，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叫人性，一切为了政治生存而你死我活。我会像过去几天一样，在每个野望入睡前，期待着明朝一觉醒来，有人告诉我：“晓波回家了！”

让晓波回家，那是我们的宪章，那是人民的宪章。

<http://zyzg.us/archiver/tid-191427.html>

写给为宪章受难的晓波

小 乔

12月28日，是晓波的生日。

这个生日，晓波无缘收到亲友们的蛋糕、鲜花和礼物，也无法亲耳聆听亲友们的祝福了，因为他正被关押在北京某处不为人知的黑牢——据说是为了一份在“国际人权日”发表、现已有数千中国公民共同签署的呼吁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

我尝试拨打晓波家的电话，与以往的数次一样，信号显示无人接听。不知道刘霞姐此时在做什么？是外出与亲友们在一起，还是独自在家中思念着此时不知关押何处被剥夺了自由的晓波？（本文发稿之前我获悉，当天北京朋友原定为晓波的生日与刘霞一起晚餐，也被国保丧失人性地破坏，多名北京朋友还因此遭到传讯和软禁。）听北京的朋友说，晓波被带走以后，他家里的电话也被“和谐”了，时常“罢工”不能正常接听电话。转念又一想，即便接通了电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在电话里面对被数十壮汉围堵家门、精神濒于崩溃的袁伟静的泣诉，曾面对张青为孩子读书奔波交涉的身心交瘁，也曾面对曾金燕的叹息和无奈——每逢这样的时刻，我都感受到难以言说的歉疚和羞耻，仿佛不是这个据说“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国家和它的警察们强加于这些无辜弱女子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而是我该对这一切悲剧负责！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情她们，更无力给予任何安慰，我只能把深切的痛苦和忧伤压抑埋藏在心底。

今夜，我在遥远的异国，再次为自己无力做任何事以减轻刘霞正在承受的痛苦而抱愧！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祝福身陷囹圄的晓波，

我也想起以往晓波曾给予我的许多鼓励、关心和帮助。

最早知道“刘晓波”这个名字，还是 80 年代我读大学时，当时作为文坛“黑马”的北师大年轻讲师刘晓波横空出世，他的关于美学和文艺评论的激情四溢的系列雄文令人耳目一新，尤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鞭辟入里的剖析与批判，对正陷于迷茫中的我恰似醍醐灌顶！我从中领悟到千年古国坎坷际遇背后的深层根源。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八九学运，正在国外讲学的刘晓波闻讯毅然中断访学，回国参与民主运动，站在第一线与争民主、自由的学生、市民同命运、共呼吸。在“六四”那个血色黎明，晓波从容辗转于刀枪丛中，冒死与戒严部队谈判，最终与侯德健等人带领广场数千学生撤离，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就此，作为特立独行的文坛“黑马”和钦定“六四黑手”的刘晓波，成为我青春期的偶像和精神导师，对于我个人的思想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六四”劫难以后大学毕业的我，带着深深的幻灭、绝望感步入社会，此后忙于为生存奔波，“刘晓波”这个名字渐渐隐藏于记忆深处，直到 2000 年后我开始上网，才重又读到晓波发表于海外、在国内多年来无处寻觅的文字。

2003 年春，正是 SARS 骚得举国人心惶惶之际，一日杭州的温克坚兄开车载着晓波和刘霞伉俪从杭州赶来上海，克坚打电话约我一起见面聊聊。据说当天他们一路有官车“护送”，在沪杭交界还办理了“交接”，杭州“护送”的专车打道回府，改由上海的换防。当晚我们一行七、八人在衡山路一茶室饮茶聊天，一直尾随我们的“公务人员”就坐在茶室紧挨我们的外面一桌。当时我尚缺乏与这些国保人员打交道的经验，对这些寸步不离跟踪我们的人好奇且紧张，对他们如此侵犯公民隐私、浪费纳税人的血汗于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不以为然，而据晓波解释这已是他的生活常态。记得中途有朋友离席去洗手间，回来时告诉我们，刚才路过外面一桌盯梢的国保身边，听他们正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不禁失笑，我打趣不如邀请他们过来同桌探讨。

此后与晓波有了 email 通信和电话联系，但因不想过多打扰他，平日联系不多，只不时会从网上读到他的最新时评文章，笔锋犀利不减当年，而经岁月磨砺的晓波，比当年更多了一份沉稳、练达与平和、宽容。

2005 年 1 月，我因试图发起上海网友悼念赵紫阳先生的一次追思会，活动被国保破坏，我被国保搜查电脑并勒令不得对外联系。连续一周，每天下午我要到市局国保指定的宾馆“报到”并“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对朋友戏称破格享受了一把党国的“双规”待遇。当时外面的朋友无法联系上我，传闻我被上海公安抓捕。当我终于有机会上网时，在一个内部论坛，我读到晓波老师的殷殷关切之情，并称“向侠女小乔致敬”，令我感动且愧疚。出于对晓波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此后不久我冒昧请求他和刚缓刑出狱数月的杜导斌兄作为我申请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的推荐人。在我加入笔会之后，我才偶然从别的会友处听闻，为了尽量不影响到各位理事的独立意见，身为会长的晓波很少直接做新会员推荐人，我为自己可能无意间给晓波添了麻烦而感不安。

由于受到上海国保的干扰，我不得不尝试离开上海去外地谋生，但国保们很是“尽责”，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们都如同鬼影附体般纠缠不休，令我无法在外地工作安生，只得重又返回上海。这期间，晓波经常给予我关怀和鼓励。大约是 2006 年上半年，一次晓波让我提交一份英文简历，说根据我的情况，笔会打算推荐我作为一个国际救援项目候选人，如果入选将有机会到西方国家的一个城市访问一到两年，专心创作、学习一段时间。数月后，笔会秘书长张裕通知我已通过审核，成为“国际城市救助网络” ICORN 的救助候选人。ICORN 是以城市为单位加入的一个救援机构，旨在促进全球范围的言论和文学创作自由，为至今尚无言论自由的国度受政治迫害的作家提供帮助，参与该网络的欧美民主国家城市可以为受助作家提供基本的写作、生活条件，邀请他们在国外安心创作一到两年。一年多以后的 2008 年初，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希望邀请一位女作家来访，我有幸被选中，该市文化部于 1 月底向我发出邀请函。由于我所有的通联方式均受到监控，上海国保很快上门“关心”，并收缴了

我的护照，说他们并不是要阻拦我回国，但能否成行取决于我本人是否“配合”，他们希望全程了解我的进展情况，且必须在他们知情和陪同下我才能去使馆办理相关手续。当我将相关情况通报晓波后，他劝我要隐忍、冷静、克制，尽量争取成行就是胜利，否则许多朋友前期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在与国保艰难谈判两个多月后，今年4月底，我终于在国保两辆警车“护送”并不准许任何朋友送行情况下在浦东机场登机离境，来到北欧明珠斯德哥尔摩市访问写作一年。得知我平安抵达瑞典后，晓波松了口气。在我们通过网络skype聊天时，他告诉我说，他很担心我继续在上海待下去，那边的警察迟早不放过我，弄出什么严重的状况毁了我的后半生，他希望我能在海外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有机会学习提高并安心创作一段时间，也希望我有机缘安排好自己的个人生活。言辞间透出绅士关怀与一腔豪气，我明白晓波未曾言明的言外之意：坐牢这样的事情应由我们男人来承担，监狱让女人走开。自身常常处于困境中的晓波，总是尽力给予朋友和同道充满人道情怀的爱心和帮助，许多良心犯的难属都在困难中得到过晓波无私仗义的援助。

如今，为了争取我们每一个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晓波再一次毅然踏进了监狱之门。从北京的朋友处获悉，《零八宪章》问世之前，晓波已经做好了再次入狱的心理准备，他的知己伴侣刘霞也已经有准备再次踏上漫漫探监之旅，这令我感动不已，也令我对自己怀有割不断的复杂情感的故国的羞愤之情难以言喻！因为就在晓波被捕的第二天，12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对比晓波因《零八宪章》而被捕，至今对“宪章”签署人的骚扰持续不断的事，真不啻为莫大的讽刺！《零八宪章》在我看来，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良知，为了国家前途和苍生福祉，向中华民族、向亿万中国公民提交的一份迟到的答卷，也是旨在宣示公民权利、推动健康的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份“中国公民权利宣言”，何罪之有？正如我和部分“宪章”签署人在声援晓波的一份后续

声明里宣示的：“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也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写下对晓波的敬重、思念和愧疚，并郑重承诺：若晓波居然会因《零八宪章》而判“罪”，我将回国，承担我作为联署人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

2008年12月28日写于晓波生日之际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812/20081230095736.shtml>

致公民刘晓波

康 波

此刻，我泪流满面，无所害羞
为自己蝼蚁一样的肉体，感到无能为力
我厌恶人类轻浮的抒情，但我依然要念颂一个高贵的名字
整整十九年啊，由懵懂少年到早过而立之年
见证我稀薄多年的爱情血液在昼夜走向欢腾
让嫩芽走向怒放
也曾幻想或许放下这笔心债
头也不回就能在世俗的洪流中坦然航行
但当灵魂的泪水逐日枯竭
在灾民遍野的 2008 年岁末，今夜，南中国一个平常的冬夜
我瞬间倾塌：你在哪里，我的兄弟
生命是如此神奇，未曾谋面竟也有心灵不死的向往
时刻都能缅想那个风云际会的命运当口
多少贤士慷慨激昂后握手言和，多少俊杰恰识时务手就坐看云起
唯有你做出“虽千万人，我独往”的蠢举
一个只要蜷伏在猪圈就能活着都不知道的人，不是傻瓜才是奇谈
不幸你却偏偏转身走向风雨如晦的街头
领略了血光的战栗，再饱受石头和口水的关怀
从此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你歌唱，即使在你最寂寞的瞬间
但谁能否认你是这个动荡尘世里最幸福的行者
你一生的爱恋，你的霞妹，一个流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高贵血

液的女孩

已使你今生蒙福，也必永遭世人的妒忌
就这样，一个贫血千年的民族，在 12 月 8 日夜里
因你享受伟大的颠覆罪得以悄悄回升了些许荣光
圣经说：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此刻，南方大地寒风
据说北方更将风雪漫天
即使世界只剩下一个义人在为你昼夜祷告
但你的平静、微笑和光荣早已掀动这片被暴君挟制的海洋
今夜，我请求万能的主接受一个卑微生命的祷告
为世间罪恶等身的太保，更为所有身陷囹圄的义人

2008.12.21 夜草就

http://crd-net.org/Article/lingbaxianzhang/200812/20081222163613_12571.html

我也拒绝漂浮

——春节前给刘霞的诗

张鹤慈

手里的《刘晓波刘霞诗选》上，是晓波在06年底写给我的：“刘霞的诗比我的好！这是公论。”

在今天，钢铁和水泥控制了人类的空间，点钞机和报表，文件控制了人类的时间；诗真的就像沙漠中的一朵小花；生命反而没有非生命显得真实了。

旧文人喜欢用唐诗宋词集句，多只能算是文字游戏。不知道有没有人用新诗来集句。

春节即将到了，我把晓波和刘霞的诗中的一些诗句，集成了一首新的诗。希望能够在刘霞经常失眠的夜晚，给她一些小小的慰藉。

雨中

下雨了
雨滴穿透太阳
我被推向世界的边缘……………晓波

你没有带伞的那天
突然一场大雨

可你全不在意
像个忘乎所以的孩子
一心一意进行这场游戏.....刘霞

独自走在雨夜
没有影子可以交谈
谎言装饰着阳光
一切都明晃晃地腐烂
白天比夜晚更凶残.....晓波

一个人走在雨中
没有人知道
她为什么独自哭泣
雨水打在冰凉的脸上
在心灵深处发出回响.....刘霞

你对着灯自言自语
抚摸墙上的影子流泪

至今不知下落的失踪者
是否被更深的黑暗吞没.....晓波

夜晚雨中哭泣的人
你应该回家了.....刘霞

你一无所有。只能
和家里的灰尘一起等我.....晓波

我坐在这里
看天色由明到暗
倾听最后一缕阳光
发出的呻吟
等待第一滴雨
敲响敞开的窗户玻璃.....刘霞

你背着很沉的书和疲倦
走进黄昏走出黎明
一直把脚印留在囚犯的梦里.....晓波

不要敲我的门
不要再敲
不要.....刘霞

给我一滴雨.....晓波

她为什么独自哭泣
没有人知道
一个人走在雨中.....刘霞

雨中的色彩令人疑惑
所有的伞都像微弱的呐喊
消失在被雨浸湿的时间中.....晓波

就是给我地球上所有的海水
我也拒绝漂浮.....刘霞

原来诗的结尾，我用的是：

只是为了使平凡的开始
有一个稍稍异常的结局.....晓波

赶快站起来
你们这些沉默的人
再次上路的时刻
已经到了
如果你们身上还有最后一根骨头
就站起来.....刘霞

可能会有人更喜欢这个结尾，但我还是采用了新的结尾。
我非常喜欢：“我也拒绝漂浮”这句话。

2009-01-21 墨尔本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901/20090120182132.html>

在中国，谁支持《零八宪章》？

施 化

由中国大陆 303 名体制内外的知名人士联名发出的《零八宪章》，10 天以后，已经征集到超过 6000 人的签名。不过，6000 人对于 7000 万中共党员，对于 13 亿中国人口，还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用数字来取胜的想法，在专制的国家机器面前不灵。

对专制唯一起作用的是人心，人心的向背决定专制政权的存亡。胡锦涛先生也告诫党内，政权不是一成不变，这取决于民心。历史上有一个“道路以目”的故事。周厉王时，由于残暴统治，民怨沸腾。有人当面指责周厉王，邵公也说民不堪命。周厉王大怒，派卫巫去监视那些说他坏话的人，发现就立即杀头。后来百姓慑于暴政的威力，在路上相见不敢交谈，只敢交换眼色（道路以目），国内各项矛盾加速尖锐。公元前 841 年，发生了国人暴动，人民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他仓皇而逃，死于他乡。

一般来说，专制政权用来争取人心的办法很原始，无非是收买，欺骗和恫吓。看来似乎武装镇压更有用，但镇压也只能用来恫吓，不可能把一块土地上的居民全杀光。到了收买不生效，欺骗被揭穿，恫吓也无人怕的时候，人心的向背决定统治权的轮替。

现在的中国正是财富快速聚敛，不满加剧，人们想言而不能言的时候。20 年来，虽然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给中共机会，希望他一改过去的恶名，回头是岸，但百姓们一直没有等到想要的东西：幸福，只有口头承诺。在这个背景下，一个不同于中共宪法纲领的《零八宪章》出现了。

《零八宪章》不是宪法，只是一个基本政治主张。但是可以作为制定或修改宪法的依据。政治主张人人都有，比如有人主张共产党立即下台，有人主张杀光贪官。也有人主张共产党再执政 100 年，把反共的人都关进监狱。但是这些作为纲领都过于简陋，不适合当宪法依据。只有一种充分考虑各种不同人的利益，可以把敌对立场调和起来的纲领，才有可能派生出一部宪法。宪法一定要降福于国家境内的每一个人，一个都不能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坚持一部分人领导某些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这不叫宪法，叫斗争宣言。

尽管《零八宪章》是一份不可执行的文告，还是引起极大的恐惧和反对。仅仅是几页白纸黑字的建议，有必要那么恐慌吗？是的。恐惧的应该不是这个宪章的建议内容，而是很多人读了宪章以后的思考觉醒。觉醒的人心才是一个强大政权最害怕，最难对付的东西。

要了解中国人的人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口多，而是因为政府不鼓励任何可以了解民意的调查。中国没有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新闻媒体本身不独立，偶尔的问卷并不反映民心民意。至于外国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准确度就更难讲了。人家不了解咱们的国情。如果问题敏感一点，被调查的谁敢实话实说？不过有个办法能了解《零八宪章》的有哪些人支持，只要简单分类一下，到底有哪些人害怕和反对，把他们排除掉，就可以知道谁支持。

当然，把反对的排除掉，不一定都是支持的，也许还有不表态的。但是反对的人为什么那么惊慌失措地严密封锁，布下天罗地网来清除影响呢？至少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断，他们内心知道，多数人一旦读了《宪章》，将会支持。正因为预计支持的人太多，将对他们不利，所以要严密封锁。如果预计反对宪章的多，对他有利，又害怕什么？要是有人打算证明我的说法错误，不用反驳，把封锁解除就知道了。谅他们不敢。

反对宪章的首推中共当局。宪章签名者之一余杰向德国之声记者说：“第一批签名者中，据我所知，已经有多位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骚扰。有的被禁止出境，有的被正式传讯，有一些被正式约谈，包括我自己

在内。”用大陆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搜索《零八宪章》一词，尽管有一万多个词条，但凡是服务器在大陆境内的，一律是页面错误或找不到标题。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反应冷淡，可是连一个字也见不到，冷淡从何说起？

其次反对宪章的是毛派。国内毛派网站“乌有之乡”有一篇题为“揭批《零八宪章》，反对颜色革命”的文章，不过偏偏不附上被揭批文件的哪怕一个字。文章说：“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60 周年前夕，内地 300 多位作家、律师、学者等各界人士，签署《零八宪章》，提出修改宪法、立法民主、司法独立等 19 项建议。这是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打响了颜色革命的枪声。”作者可能连帝国主义的定义也搞不懂，随便就把立法民主和司法独立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这种概念混乱的自言自语，大概只得到糊涂者的支持。

第三种反对力量来自海外民运的少数。坦白地说，我不认为宪章是海外民运的产品。有一些老资格的民运大佬，是看不上宪章的“为共产党好”的。他们自己拿不出纲领，就说葡萄是酸的。有一个“老实承认到现在俺也没细读”，“就扫了一眼”的民运人士说：“（宪章）不外是跟共产党要自由民主人权”，言下之意，宪章不反共，所以不作数。至于为什么我认为是少数，因为主要有影响的民运领袖们，都公开表示了支持。

第四种反对力量，顺理成章，应该是中国大陆的贪官和黑社会。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经过 30 多年发展，现在已形成气候。这个集团不仅控制了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还左右着中南海的政令。有些最高领导人决心查处的腐败案件，一个都无法查到底。被抛出来的替罪羊除外。那个最基本的官员财产申报规章制度，这么多年了也通不过。官方《中国日报》援引一位公安部官员的话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无恶不作，威胁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腐败官员为这些为犯罪团伙提供庇护。我以为，无论是腐败官员或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都不会欢迎主张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的《零八宪章》，这断他们的财路。

把反对的人排除，还剩哪些人呢？这就是超过十几亿想成为公民的

中国人。这些人中间，有共产党人，有民主党派，也有无党派人士。他们或者是国家公务员，或者是专业人士，如工商界人士，科技教育界人士，法律界人士，还有更多的是工人，农民，城镇居民。如果有人怀疑：你确定有这么多人支持《零八宪章》吗？我倾向于确定。这个信心来自于北京当局，因为他那么确定：不能让所有的人知道，知道了就要支持，而不是反对。从这一点判断，超过百人之九十的中国人将支持《零八宪章》，如果他们看到的话。（格丘山）

有人说，《零八宪章》没什么用，那是与虎谋皮。但我看到的是，即便只是与它商量一下，老虎也已经坐不住了。北京当局以最快的速度，最无法服人的理由逮捕了《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好像掐住刘的脖子，《宪章》就会被他吞回去似的。这说明，与虎谋皮也会对虎产生作用。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现在就来分析一下。

《零八宪章》问世不到一周，就激起了世界范围的反响。许多国家的本地报纸，发布了新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性事件，更关心刘晓波的被捕。海外中文互联网，展开唇枪舌剑的各方交锋。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集会讨论《宪章》，世界各地新闻媒体连同《人民日报》均有参加。中国国内虽然严密封锁，不让《宪章》的一个字漏进去，但是挡不住网民的好奇。网民们的强烈愿望是，在大批判的同时，找一份原文来看看。

《宪章》的第一个作用，是把虚拟分散的许多有益的思想，凝聚和固化为一个可以操作的平台。《宪章》不会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出现，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思想启蒙还没有成熟，前半个世纪的惯性思维还在继续。中国人真正地开始认识民主，是在 89 以后。刘晓波，胡平等人都是先驱者。

不要小看这个平台，有一个平台和没有平台大不一样，平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过去不同观点的人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争论，仅仅是对空放箭，谁也碰不到谁。现在的不同观点交会，都自然而然落在《零八宪章》这个靶心上。这些碰撞产生的火花，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

在《宪章》出现以前，各种分散的，孤立的，企图自为中心的变革方案，不下千百种。即使是最大的异议团体内部，也不停地为方案争论，互相把对方驳斥得一无可取，空耗了大量人财物力。自从《宪章》出现以后，很明显地看到，有很多人已经准备在这个基础上求同存异了。一些民主先行者开始现身，有针对性地和民众对话，而不像过去那样隐居。至少到目前为止，《宪章》是一个反对派的共识，也是反对派的主流。

北京当局最害怕的，并不是《宪章》提出的务实方案，而是这个方案的无形凝聚力。自《宪章》问世，现政权的各个击破的设想，或将成为泡影。抓捕刘晓波，显示出北京政权的手足无措。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还不敢大规模抓捕人。这很矛盾，如果只抓一个人，如何显示威吓力？303个签名都是公开的真名实姓，抓起来易如反掌。他要考虑，如果抓第一批签名的303个，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抓不抓？即便3600个都抓，新出来的36000个抓不抓？很简单的道理，抓一个，就扩大几倍影响，抓得越多，影响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究竟。如果影响到数千万失业的回乡农民工，中国的监狱就不够用了。

《宪章》的第二个作用，是启动了温和的一群。人群当中，有激进的，有保守的，还有顽固的。然而，到最后关键时刻真正产生作用的，是中间阶层。为什么？他们人数最多，主张最折衷，为不同的人所接受。刘晓波一定不是激进分子，要不然早被消声了。尽管有主张一夜变天的人看不上刘晓波的婆婆妈妈，但是对刘有好感的知识界占多数。

《宪章》出台的时机，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前夜。当中国的经济衰退冲击到农民工的时候，当局还不算紧张。毕竟农民工苦惯了，回到家乡只要还有一口吃的就能对付。但是当衰退冲击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都市的就业市场，真正麻烦就来了。城市中产阶级曾是北京政权的坚定支持者。89以后，当局用无形的赎买政策，笼络了城市中产阶级。所谓的繁荣盛世，主要是靠城市支撑的。那么他们也会不满吗？哪怕再穷，日子也比农民好过呀。

有一个原理，人的痛苦指数不仅仅是根据某种过低物质标准，更是

根据和过去的对比来确定的。农民虽然穷，但是只要比过去稍好一点，就不痛苦。城市的中产阶级就不同。他们现在已经富了，生活标准如果降低倒退，哪怕银行还有几十万，照样不满。当拥有的第一栋楼房开始贬值，当子女在大学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当的全部财产被股票套牢，他们就开始对现行政治表示怀疑，就要开始考虑另外的出路。一位资深房地产业者说：“那些城里人的抗议，也许才是政府最为担心的，银行职员，医生，教授，这些人有影响力。”

也许我夸大了危机。但中国靠出口带动的经济结构，本身是脆弱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1929年的美国也处于类似处境。“20年代的美国有庞大的贸易盈余，而且拥有当时历史上最庞大的储备。美国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了吗？没有。它是最遭殃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恰似今天的中国。”一旦时局发生动荡，过去认为“谈论或者参与政治毫无意义”中间阶层，将开始新的思考。这时候，《宪章》将像雪里送炭一样，进入他们的选择范围。

虽然有人希望《宪章》有越来越多的真实签名，企图给当局造成压力，我认为还是顺其自然为好，没有必要特别地去造势。人的认识，应当主动自觉地出现，才有真正的力量。靠一时的鼓动，热起来快，冷起来也快。对当局当然要有压力，这个压力必须适度。适度的意思是，压迫他向某一个方向走，而不要压迫他反跳。当然，对于有智慧的人，这些都是废话。

总之，《宪章》的作用还是启蒙，更广泛更深入的启蒙。估计在短期之内，《宪章》的设想不会进入实质的行动，这也好。只要人们看到一个和过去全然不同的东西，开始换一种方向进行思考，《宪章》的作用也就起到了。瓜熟蒂落，改变一个旧时代，需要充足的时间。不过，是准备，不是等待。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1/200901030304.shtml>

第四卷

《零八宪章》与当局的反应

《零八宪章》何罪？

——不得不说的话

鲍 彤

三百多位公民联署，发起公布了“《零八宪章》。”宪章“还没有上网，就有两位联署人被当局抄家，传讯和拘留。他们是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我也是当事人，也是这三百多人中的一个。在认真准备和主动等待被抄家，被传讯，被拘留，被判刑的时刻，有几句不得不说的话。

一，我要求当局回答：《零八宪章》“有什么罪？”宪章“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请公仆让十三亿主人明白：自由何罪！人权何罪！平等何罪！共和何罪！民主何罪！宪政何罪！”

《零八宪章》提出了十九条主张。这些主张，没有一条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发明出来的，都是现代文明国家所已经实行了，并且已经起了好作用的好制度。请当局一条一条审查，拿出放大镜，拿出显微镜，拿出哈哈镜来审查。请问，这些主张，哪一条，犯了什么罪？

“宪章”的宗旨，是呼吁所有具有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实现国人百年的追求与梦想。这算什么罪！

二，我，既做过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又当过前总理李鹏非法诬陷而坐牢的刑事犯，根据我的知识和阅历，我愿意明明白白告诉当局：《零八宪章》没有罪。它的理念，主张和呼吁都没有罪。我们的国家不是中华帝国，中华官国，也不是中华党国。它叫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章的理念，主张和呼吁，无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宪法”的本义和延伸，套用毛泽东的语言，就是叫做“题中应有之义”。即使其中有一百处不完美不准确的缺陷，也丝毫无损于“宪章”的合法性。幸好我们活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它的宪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是禁止公仆践踏民权的宪法。因此，《零八宪章》联署人被抄家，被传讯，被拘留的消息不能不使人们震惊，与其说是某些官员在向公民挑战，不如说他们是在向共和国挑战，向宪法挑战。

三，抄家，传讯和拘留是当局干出来的。这个当局是谁，我不知道。如果事情出在基层，上层有责任纠正他；如果出在上层，最高层有责任纠正他；如果出在最高层，人民有责任纠正他。共和国应该有纠正错误的机制，将错就错错上加错的共和国，一定不是实符其名的共和国。

四，在静待抄家，传讯和拘留的同时，我也在静待当局的回音。我吁请已经参加联署和将要参加联署的各位同仁：让我们大家继续保持冷静和理智，乐观和坚强。我向已经回家的张祖桦先生和他的夫人田园女士致意。我向尚在拘留中的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夫人刘霞女士致意。敬祝大家平安健康。

<http://www.asianews.it/index.php?l=zh&art=14031>

北京开动镇压机器扼杀《零八宪章》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记者 MICHAEL WINES 北京报道，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华子冈编译) 刘晓波的家在京西一幢住宅楼的五楼。就在这座楼的后边，北京国保新近建起了一座保安室，二十四小时有人站岗放哨。他们这样做可不是为了保护刘霞，刘霞也从来不指望他们来保护她。保安室是让国保警察来监视刘霞的。

刘霞平日里进进出出警察们都一笔一划地记下来。每当她要出门，看守的警察就抄起电话，一眨眼的功夫一辆茶色玻璃的轿车就尾随而来，车里头有警察手持远程摄像机拍录下刘霞的一举一动。

只因嫁给了刘晓波

记者最近在附近的一个茶馆里和刘霞进行了一次谈话。刘霞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惹得政府这样大惊小怪，还给她配备了保安。她对政治没有兴趣，连电脑都不会用。“我喜欢摄影，绘画，写诗，读书，做饭。”她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还喜欢喝酒。”

刘霞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她嫁给了刘晓波，这位著名作家、哲学家



刘霞近照

和民主活动人士。去年 12 月 10 日，刘晓波和其他 302 位中国人发表了《零八宪章》，呼吁中国共产党放弃一党专制，建立多党制政府。

《零八宪章》公布前两天，警方逮捕了刘先生。此后便把他关押在北郊的一座小屋里，连个窗子也没有，离市区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不让见律师，不让用纸笔。快半年了，只让刘霞和他短短地见了两次面。

书倒是可以读。最近他要的是卡夫卡的作品。没准儿刘先生从《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让人锁在屋子里，希望眼不见，心不烦。

不光是刘先生的遭遇有点儿超现实意味，连镇压《零八宪章》的中共当局也发现自己陷入了超现实困境。《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有知名知识分子，其中不乏跟中共高层联系颇多的“要人”。

《零八宪章》是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政治宣言。随着宪章的影响日益扩大，刘晓波不再是一位普通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成了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子。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刘先生和他的妻子进行压制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在处理公共关系时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零八宪章》要的是演变，不是革命

跟刘霞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是有政治理论家张祖桦。张先生也有贴身警察，也有一辆轿车四处尾随。当局警告他说，他的案子仍在调查之中，切不可再兴风作浪。刘霞和张祖桦每周打一次羽毛球，这时尾随双方的轿车都静静地停在场外等待。直等到他们打完，再分头尾随他们回家。

“如果他们不实行压制，《零八宪章》的影响力会继续增长。”张祖桦说。张祖桦曾经帮助刘先生和其他起草人修订宪章草案。“但越压制，影响力会越大。”

在全球 20 个最大的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零八宪章》的一些基本主张让中共领导人如坐针毡。比如：民选政府、分

权制衡、军队国家化等。

《零八宪章》明确指出：“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三年多前，刘先生和张先生以及其他七八个朋友草拟了这些主张。张先生说，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1789年人权宣言，还有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运动。

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演变，而不是革命。宪章的大多数签署者都亲眼见证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很多人当年都是这一运动的参加者。“20年后，”张先生说，“我们都认为，中国将最终走向自由民主。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再采用这种牺牲性的手段。因此，如何找到一种让中国走向民主的更合适的方式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拿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就是《零八宪章》问世的根本动因。”他说。

压制政策把支持者从网上逼到街头

30年前的民主墙运动曾经遭到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首要人物被判15年徒刑。30年之后，面对《零八宪章》，当局维护权力的决心依然如铁似钢，只不过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较为小心翼翼了。

网络审查人员从互联网和聊天室清理有关《零八宪章》的内容，涉及宪章内容的博客勒令关闭。中共高层协力出手，反击多党制和分权制衡的思潮，不过他们通常并不提及《零八宪章》的名字，只是通称为西方国家的“腐朽思想的干扰”。

《零八宪章》的许多原始签名者都遭到审问。一些人被撤了职，还有一位签署者被逐出北京，赶到边远的西部去。

刘晓波先生是唯一一位因签署宪章而被拘留的，官方的名称是“监

视居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过按照他的律师的说法，这完全是非法羁押，秘密监禁，有关方面连一纸书面说明都拿不出，程序上已经在违法了。

张先生说，当局这样做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扼杀《零八宪章》。“他们做过非常精确的计算，”他说。“假如抓了刘晓波就可以消弭宪章的影响，那么就不会再兴师动众地抓更多的人。”

然而，《零八宪章》并没有被扼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倒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张先生说，签署者已经远远超过了 8000 人，人员构成也远远超出了异议人群的界限。新的一批签署者名单很快就会推出。

在北京，警察最近抄了一名男子的家，原因是他印制了一批 T 恤衫，正面是刘先生的头像，背面是“《零八宪章》”。在河南省的南阳市，一位叫刘沙沙（刘琳娜）的炼油厂工人自己印制了 100 份宪章上街发放，结果被警方抓获。

“看到网上四处封堵《零八宪章》，我实在受不了了。”刘沙沙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不让我在网上谈，我就干脆上街去谈。”

英文原载《纽约时报》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59075>

尊重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 停止打压《零八宪章》公民运动

《维权网》了解到，中国当局整一个月来持续对依法践行公民《宪法》权利而参与《零八宪章》签署的人进行任意羁押、传唤、约谈与威胁恐吓，一些联署人被当局要求公开声明退出《零八宪章》签名，这虽然普遍遭到签署人的严词拒绝，但当局放出“《宪章》非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已被“定性”为“反动政治纲领”等威胁性言词，给签署人制造社会和心理压力；一些体制内的学者被单位出面约谈，施加政治压力。《维权网》对此提出严正抗议，并强烈呼吁中国当局尊重公民间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停止打压《零八宪章》签署人！

《零八宪章》是由国内一批理性、和平、富有责任心的良知人士共同联署发布，她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反映了民心民意与民愿，是一份温和、理性、同时极具建设性的公民表达意见书。从《宪章》文本的内容而言，她没有任何违背法律、颠覆政权的言词，从文本的表达形式而言，签署人完全是践行《中国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所以《零八宪章》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宪法》原则，是公民依法践行自己的《宪法》权利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

然而如此一份集合现代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文本，在还未出世之日，就遭到了当局的打压。2008年12月8日晚上，北京宪政学者张祖桦与异议作家刘晓波就被北京警方带走并抄家，张祖桦先生被传唤了12个小时，而刘晓波先生则被非法羁押在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监视居住，每天提审、禁止看书报看电视与外界信息隔绝，仍然面临被起诉的可能。12月26日，北京国保警察又对张祖桦先生进行了第二次传唤、直接对

其人身自由和安全进行了露骨的威胁。

从 12 月 9 日《零八宪章》发布后，中国当局动用大批警力对全国各地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进行了传唤、讯问、约谈与恐吓。据《维权网》12 月 19 日发布的《抗议官方继续传讯、威胁〈《零八宪章》〉联署人》，部分统计到全国共有 13 个省市的 58 人因签署《零八宪章》先后被当局传唤、讯问与威胁恐吓或工作单位领导约谈警告。据我们近期跟踪搜集到的信息（可以肯定还有更多的受到传唤讯问、约谈及恐吓的联署人，因为各种原因而不为外界所知；有的联署人因受到警方威胁不愿对外披露），特此在《零八宪章》发布一个月之际公布以下补充情况。12 月 19 日以来，各地被传唤、讯问、约谈或恐吓的人士包括：

（北京） 于浩成、夏业良、徐友渔、崔卫平、栗宪庭、莫之许、李智英、周鸿陵、陈永苗、王俊秀、刘军宁、贺卫方、梁晓燕、徐晓、朱久虎、郭玉闪、江天勇

（湖南） 万凤芝、刘建安、陈作勇

（江西） 徐高金

（江苏） 陆文

（广东） 艾晓明

（河北） 李金芳

（上海） 马亚莲、张君令

（山东） 李昌玉

（广西） 黎小龙

（陕西） 张鉴康、杜义龙、吴起、杨海

（云南） 魏文英、刘正善、王玉文

（贵州） 申有连、汉心

（四川） 刘正有、刘贤斌、陈卫

（重庆） 杨远宏

（黑龙江） 赵景洲、陈惠娟

部分《宪章》联署人的传唤情况如下：

这些被传唤、审讯的人，一般都被警方反复追问是如何看到《零八宪章》的？是怎么签署《零八宪章》的？对《零八宪章》有什么看法？谁是《零八宪章》的撰稿人与组织者？在一些地区，警方还要求签署人公开发表声明退出《零八宪章》。在得到签署人断然拒绝后，国保警察就宣称：《零八宪章》攻击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涉嫌非法结社；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严重；《零八宪章》中有关联邦制的条款，性质很严重等等；进行威胁恐吓，制造恐怖气氛。

湖南湘潭的万凤芝，《零八宪章》第三批签署人，被湘潭国保警察两次传唤：于12月24日傍晚至25日下午、12月26日傍晚至27日晚上，先后每次达20多个小时的传唤、审讯。

12月29日上午，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育才路派出所通知刘贤斌于当天下午3点到育才路派出所，说国保大队有事找他。下午3点，刘贤斌准时赶到派出所，国保大队的有关人员在出示证件后，开始了对刘贤斌的询问。首先，国保警员问了《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的情况。刘贤斌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接着，国保人员问刘贤斌怎样参加了《零八宪章》的签名。刘贤斌说是朋友在电话上告知《零八宪章》的大概内容后，认为《零八宪章》代表了自己的一贯理念，就同意签名，并表示《零八宪章》的内容非常理性温和，不应该受到当局的打压。国保人员就说，《零八宪章》攻击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涉嫌非法结社。刘贤斌对此进行了反驳。之后，国保人员要求刘贤斌退出《零八宪章》的签名，刘贤斌当场表示拒绝。最后，国保人员向刘贤斌宣读了“剥权期”的八条规定，要求刘贤斌在“剥权期”不得发表言论、接受采访和随便离开当地。整个询问持续了一个小时。

12月29日下午3点半，湖北潜江国保大队警察对姚立法先生进行了“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事传唤。国保出具的传唤证是“潜公国保刑传字00002号”，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一款。传唤内容就是围绕《零八宪章》的签名。国保警察主要追问了签名活动谁是

组织者？《宪章》是谁起草的？姚立法自己签名没有？是怎么看到的？以及问到姚立法对《宪章》怎么看？国保警员特别提到《零八宪章》中有关联邦制的条款，说性质很严重。而姚立法先生认为《宪章》与《中国宪法》落实公民权利是相符的，与中央提倡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致的。所以自己将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继续工作。

12月30日上午9点40分，遂宁市公安局传唤民运人士陈卫到镇江寺派出所，并出示了传唤通知书。现场有遂宁市国保的李波、刘崇超、姜姓女警官以及两个民警。他们首先询问了有关邓永固的事情。当他们提出主要是为《零八宪章》而来时，陈卫当即表示这是公民正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对《零八宪章》的内容完全赞成，警察对公民的正当行为进行盘查是滥用职权维护专制，对不起广大人民，是非常可耻的。对警察询问从何种渠道知道并签署《零八宪章》时，陈卫只是简单回答通过网络，至于具体情况则不予回答，因为这是一件正当的事情，正如一个人有权不告诉别人他吃什么饭穿什么衣一样。国保负责人随后宣布《零八宪章》是违法的，是不满和攻击党和政府，要求陈卫退出签名，停止有关《零八宪章》的活动。陈卫马上要求他们出示证明《零八宪章》违法的正式法律文件，而国保拿不出任何法律文件证明《零八宪章》是违法的，也许就算有也见不得天日。他们只是推说去比照《宪法》。陈卫表示这只是他们个人观点，不足为依据，《零八宪章》温和、理性，阐述的是世界人民公认的普世价值，作为首批签署者非常自豪，广大人民非常欢迎它，只有专制者惶恐不可终日。国保大队的队长李波最后警告陈卫，已打了招呼，如仍从事有关活动将承担法律后果。对此赤裸裸的威胁，陈卫立刻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说了八个字：不言而明，一以贯之！表达自己不怕打击的意思。传唤在上午11时结束。

2009年元旦当天，上海黄浦区公安分局警察到上访维权人士马亚莲家中讯问《零八宪章》的事。当警察问及：“你觉得《零八宪章》过于激进吗？对因参加《零八宪章》签名有人被抓怎么看？希望你要按照正常的渠道反映情况，而不要干过激的事，签名的人可能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并且这个后果会很严重的，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马亚莲回答：“相比当前官商勾结对百姓大规模、大幅度的严重侵权，相比中国司法腐败的恶劣状况和地方政府为所谓‘政绩’对民众采用的法西斯、黑社会手段，我认为《零八宪章》是很温和的，且太温和了。《零八宪章》讲出了民众的心声，才会得到大家的呼应。任何谏言都只会对国家有帮助，真正会颠覆国家政权的是那些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腐败官员而非《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作为执政当局应该从中吸取好的方面。何况言论自由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现竟然抓捕谏言人，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备感执政当局的愚蠢。我既然签名，当然愿意承担责任，包括任何风险与后果。”

1月6日晚上7点左右，西安维权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法律工作者张鉴康与历史学家吴起及贵州前往西安走访的作家汉心一块在家中聊天时，忽然十多个西安市的国保（包括区国保和市国保）冲入张鉴康家中，并对电脑上的《零八宪章》内容拍照，抄走了他的电脑，并在没有出示法律文件时将他们全部带到一宾馆中审问，吴起先生在当晚10点多释放回家，张鉴康直到次日凌晨2点才回到家中，这是因《宪章》他第二次没传讯。但查抄的电脑没有归还。陕西宝鸡市另一维权人士杜义龙原本准备赶到西安与张鉴康他们聚聚，结果在6日还没有动身时，就被宝鸡国保带到警局一直审问到7号下午才释放。张鉴康、汉心、吴起与杜义龙他们被传唤也重点是追问《零八宪章》的事。

1月7日上午将近11点时，西安《零八宪章》签署人杨海在公司办公室被前来的两个国保带走。国保将他拉到了西安市的一个宾馆，西安国保大队一处的八、九名国保对杨海轮番进行了六小时审讯。国保主要审问杨海关于《零八宪章》的主使者是谁？是否知道撰稿人是谁？谁参与了修改？谁在修改中修改了哪一条？《零八宪章》主要组织者是谁？刘晓波是否是主使？稿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给派活没有？在杨海拒绝回答后，国保明确指称杨海是《零八宪章》五个关键人之一。杨海对这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表示气愤，明确说自己完全赞同《零八宪

章》中的每句话，认为《零八宪章》温和、理性而富有建设性，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难得的战略性贡献，也是公民践行《宪法》赋予的自由表达权利，所以根本不存在任何违法的地方。但是国保无理纠缠，硬是想将公民意见表达的文本弄成一个什么团伙来打压。杨海对国保说：“像《零八宪章》这种历史性的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我被认定为参与其中的重要人物，我觉得有些害羞。当然你们若一定要将这种荣耀加于我身上，那我只是觉得对不起那些真正的起草人。如果你们一定要为《零八宪章》而关押我，那我将感到荣幸，并且我准备着被褥铺盖，现在就不放我回去也行。”杨海指出警方这种行为是“反应过度，误读误判，不懂得通过正常途径来与民间沟通。”杨海给国保宣讲了一通《零八宪章》的内容。国保强调说杨海的回答太粗线条，但还是在傍晚结束传唤，放他回家。

与上面这些出动警力传唤、威胁《零八宪章》签署人的作法相应的，还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遭到所在单位领导的讯问，给这些学者工作与生活带来压力。这种通过单位领导出面来给公民表达自由施压的作法，事实上也是一种典型的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零八宪章》签署人徐友渔先生叙说：“12月29日下午，我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谈《零八宪章》的事。他首先问我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在上面签名，我回答说，我看了《宪章》的内

容，觉得不错，符合现行《宪法》精神，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公约一致，我签名是在履行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他说，《零八宪章》违反了现行《宪法》和法律，我直截了当地呵斥：‘胡说八道！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人辩论这个问题。’我问他看过这个《宪章》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应该先看看再作自己的判断，不要跟着上面瞎说。’他要求，不能在《宪章》上签名，如果已经签了，要声明退出，我说绝无可能退出。”

12月29日，山东大学附中教师李昌玉接到学校党总支书记的电话。书记开门见山问他是否在一个叫《零八宪章》的文件上签名了。李昌玉

说：“是的。我不但签名了，而且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横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表明我签名的原因。”在李昌玉熟悉的语气之中，感到书记是对他参与这些活动表示遗憾和劝阻。

12月最后一周，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先生被学校有关部门领导找去谈话，对方态度虽然很客气，说明是了解情况，但意思明确，那就是对夏教授提出警告：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严重。

中国政府在传唤、约谈与威胁《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时候，还加紧对网络的封锁。从12月26日晚上开始，中国大陆网站在Google、百度、雅虎等搜索引擎上再也找不到《零八宪章》的词条。

中国当局针对《零八宪章》签署人如此广泛动用警力来传唤、讯问、约谈、威胁恐吓，同时调动各有关单位领导来对本单位签署人谈话、提出警告与要求，动用纳税人的税钱来打压、封锁《零八宪章》，这种动用公权力设法阻止公民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是与中国政府业已承认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违背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赋予了人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官方的打压也与中国领导一再提倡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同时也违反中国现行《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规定。

为此《维权网》再次强烈要求：

1、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刘晓波仅仅因为使用和平的方式表达对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的诉求，就被秘密“监视居住”，这是因言惩罚、严重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人权。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款和第22款以及《中国宪法》第35条都有保护该权利的明文规定。《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组”采用的衡量“任意羁押”的充分条件之一：因为行使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而被关押，即属于任意羁

押。) 所以，警方继续秘密羁押刘晓波先生，已达一个月之久，并以没起诉进入程序为由不让律师介入，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

2、立即停止警方对《零八宪章》联署签名者的传唤、抄家、没收私人财产、威胁与恐吓，停止通过单位行政权力来阻止公民践行《宪法》权利。

3、解除网络及其他媒体对《零八宪章》的封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让中国公民自由地讨论和评议《零八宪章》。

《维权网》

2009-01-08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901/20090108084701_12943.html

执政当局应该开放讨论《零八宪章》

文尧山

《零八宪章》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之一。显然，发生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的《零八宪章》事件，是对当局执政能力的最现实、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沿袭陈旧的政治思维，以敌视的态度对待《零八宪章》及其发起人，还是正视《零八宪章》的积极意义，理解发起人和签名者的拳拳之心，是考验当局执政能力和决策者政治远见的试金石。从《零八宪章》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来看，当局对待《零八宪章》的态度也影响到社会各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继续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推进的信心。

一、不应遏制公民社会发育

就其内容来看，《零八宪章》显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未来走向的一种民间关注，表达了一种民间立场。关注的内容暂且不论，当局首先应该看到，这种关注本身代表了一种趋势，反映了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潮流。

我们注意到，就在《零八宪章》问世前不久，中外媒体广泛报道了发生在北京的这一件事情：在京工作6年，今年36岁的施孟奇产生了办“山寨版春晚”的想法，他租借的车身上印有“山寨版春晚”的面包车出现在北京街头后，迅速引起热烈反响。施孟奇的想法获得许多中国网民的支持，更有趣的是，不少公司已表示愿提供赞助。公布“山寨版春

晚”想法仅几天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表演，还有更多人表示愿意担任义工。

《中国青年报》的读者调查表明，“山寨版春晚”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目前走红的“山寨”文化现象。由此我们想到，最先出现在电脑资讯产业里的“山寨”一词，迅速成为一个新颖的文化概念，它表达的是中国民间社会依托于现代网络技术的一种自主表达，表现的是民间文化对主流社会的强烈的参与意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参与不仅在技术上无法遏制，在价值层面更具有无法替代的正面意义。多年来，央视主导的“春晚”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山寨版春晚”，与其把它看成对央视春晚的挑战，不如说是公众满足春节文化消费习惯的一种新的有价值的探索。

“山寨”文化异军突起的社会现象告诉人们，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民间表达，在技术上是不可遏制的。领悟“山寨版春晚”蕴涵的道理，就不难理解，面对《零八宪章》及其激发起来的社会关注和国际关注，当局与其感到紧张，耗费大量国家财力，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不如冷静面对，认真体会《零八宪章》的价值，审视、分析当局同民间意见出现隔阂的原因，寻找和谐处置之道。

二、“六四”的惨痛教训应该吸取

《零八宪章》的问世以及当局的激烈反映，可能都同即将到来的“六四”二十周年有关。评价“六四”不是本文的意图，不过，就笔者的观察，面对《零八宪章》这一当前最大的公共事件，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有关章节是有益的。

笔者注意到，1989年上旬，激化当局同学生矛盾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那篇发表于四月二十六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事实上，这篇社论发表的时候，北京并未发生任何成规模的暴力冲突。史料证明，社论中首次使用的“动乱”这个词，是最高决策者

邓小平当时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游行集会定性的。

社论发表一个多月后，6月3日晚以及以后几天，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城区的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由军队动用重型武器镇压引发的大规模流血惨案。

6月9日，北京大规模流血惨案发生没几天，邓小平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在谈话中，他把刚刚发生在北京的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称为“风波”。

和平请愿时被斥为“动乱”，血洒北京城之后却成了“风波”？这是否是一个微妙的变化？一向不苟言笑，寡言少语，用词严谨的强人邓小平，内心是否为他基于错误判断的鲁莽决策悔悟，外人不得而知，但是，由于“六四”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局面一度急剧逆转，使得邓小平内心深感不安，却通过他两年多以后的“南巡”得到证实。

从多种角度看，中共中央政府当时完全可以找到比由中央军委调兵“勤王”更好的处理办法。事后的严密调查表明，整个“六四”的过程决不是有预谋的，也没有什么“境外敌对势力”插手，当局中也没有谁去策动兵变。更为重要的是，军队戒严之前，学生整个行动主要是针对北京市政府。这就意味着，在学生市民同一个地方政府的冲突中，中央政府完全站在地方政府一边，从而激化矛盾。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种方法十分低能愚蠢。

当局处置“六四”的手法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开创了公开动用国家武装力量处置平民百姓同地方行政当局纠纷的恶劣先例。可以说，整个九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国家暴力机器公开介入并镇压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其他维权群体的纠纷，国家执法工具堕落成为所属地方行政当局看家护院的“家丁”和“警犬”，都是因为有邓小平关于“六四”的错误决策消除了地方官员的心理障碍和政治顾虑，为他们滥用国家暴力提供了“合法性”，甚至“合道德性”依据。邓小平本人——虽然由于倡导中国改革开放而获得荣誉，由于他在“六四”事件中的错误而低能的决策，不可避免跻身于二十世纪全球最愚蠢、最残

暴的政治屠夫之列。

近几年，当局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目前，当局在努力督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不可避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正当利益。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已深深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困扰，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仅以近几天围绕《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引起的热烈讨论为例。这项最初来自“海南模式”的启发的改革，于1994年就提出设想，但由于涉及到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寡头以及交通部等国家部委的部门利益，直到十四年以后的今天才进入启动程序。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事实证明，是真的像胡锦涛先生所说的那样“发展依靠人民”——吸收、汇集民间智慧以谋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是回到由权贵集团主宰发展的局面，是一个严肃的选择。当局如果因袭陈旧的政治思维，以敌对镇压的方式对待《零八宪章》，无疑是在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设置思想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杀《零八宪章》就是在终止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三、中国社会需要一张蓝图： 当局应该正视《零八宪章》的思想和道义价值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周年之际问世的《零八宪章》，在思想层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属于“危机启动”模式。她是在公众生存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启动的。从理论和历史上看，任何一种“危机启动”型改革都带有明显的应急性，以解决面临的最紧迫迫切的任务。正因为如此，这种改革模式也潜伏着严重的危险，即因为全力应对当前危机而忽视了对一个转型社会的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和长期设计，甚至阻断改革之路或者扭转了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十年来，当局以“放权让利”为主导的改革模式，在改善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客观上也纵容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崛起。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垄断权力，侵吞公共利益。他们利用逐步发育的市场化工具谋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拒绝让市场调节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把理应惠及百姓的改革偷换成设租寻租的手段。这是造成当代中国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显然，没有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那样，公众对改革和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没有公众对改革和发展过程的监督，改革和发展就将会是一个不断积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严峻背景下问世的《零八宪章》切中时弊，具有鲜明的思想和道义价值。因为，理论和历史事实均雄辩证明，市场经济的缺陷只能由政治民主来弥补，对于一个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如此，对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更是如此。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不少公众无法正确辨别当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怀疑社会主义失常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构成一个严重的隐患。

《零八宪章》最鲜明的思想特色是弘扬普世价值，这对中国社会平稳转型是十分必要且及时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在成功冲击长期桎梏中国人民精神的“专制神学”之后（对“专制神学”的分析批判见拙文《重建“道统”不如保障人权——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沉思并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而作》），已经无法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和谐的未来，因为，那个基于功利主义理念的发展模式，忽视了改革伦理和发展伦理，忽视了改革发展的道德意义，致使本应惠及全体人民的改革发展，蜕变成积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的权贵资本游戏。这就是说，在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迫切需要丰富完善引导改革开放发展的价值观念；建设中国的未来，需要一张蓝图！这张蓝图当然不是空洞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但也不应是价值模糊的“小康社会”。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华民族艰难困苦的近现代历史证明，能够引领中国

人民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只能是普世价值。这不仅有血缘同宗、文化同源的中华民国为例，也有曾经同中国一样建立过阶级专政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成功平稳转型为例。一个表示要让人民富裕、幸福、和谐，一个要融入国际社会，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大国形象的政治集团，行动上却拒绝承认普世价值，这在逻辑上不可想象。

前不久，官方的一些意识形态官员曾经发起了一场对普世价值的讨伐。那场讨伐在理性上多么苍白无力，在政治上多么孤立，恐怕那几个始作俑者自己也感到汗颜。

拒绝和平共处、反对发展生产力、抵制全球化、拒绝市场经济……陈奎德和他的先生们一路走来，扮演了多少中国当代历史上这类丑陋滑稽的角色，还要到几时呢？中国社会无法认真清理“文革”灾难，无法实事求是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以至无法吸取诸多历史教训等，均同拒绝认同普世价值有关。

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谁会怀疑，今天拒绝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就像前天鼓吹“输出革命”、昨天“反和平演变”、“拒绝市场经济”一样荒唐！

《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以其卓越的胆识和勇气，在中国改革开放处于重要关头之时，重申普世价值，这种表达至少是进一步完善改革发展理念的有益探索。一个稍有自信的政治集团，不妨参与民间的自由讨论，因此抓人，既无道理，又无品格。

四、正确把握历史趋势，及时把“民生主义”推向“民权主义”

胡温当局“奉命于危难之际”，励精图治，扭转了中国改革开放向权贵资本主义迅速滑行的方向，开启了大陆中国“民生主义”新局面；同时，也显示出了一些新的政治思维，如用“民生”这种国际通用、规范的词汇表达思想等等，这些都获得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扬。

然而，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亚洲其他国家从统制经济和极权社会向

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转型的经验均表明，“民生主义”只是“极权主义”向“民权主义”的一个过渡。

道理不必多讲。因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仅是一个利益主体，而且是一个权利主体，并且，他的利益是通过各种权利来体现的，只有个人权利得到切实保护才有公民利益——民生改善可言，离开个人权利保护谈“民生”无异于缘木求鱼。比如，农民没有土地承包的权利，或者这项权利得不到切实保护，农民的耕地不是可以随意被侵占吗？

希望中共当局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顺应历史潮流，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启时期的中共领导集团那样，展示新的政治思维，把《零八宪章》作为一个开启民间智慧、整合社会舆论的契机，共图改革，共谋发展，创造一个民主文明、民生和谐，并为国际社会增添安全感的未来。

《零八宪章》宣称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访签名者戴晴

《亚洲周刊》纪硕鸣专访

戴晴表示，《零八宪章》宣称的公民权利太基本了，不能当作社会变革纲领来看。中国已完成权贵资本主义转化，但连“最基本东西都没有，算什么现代社会”？她认为中国的希望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人。

用了八年时间，戴晴追踪“张东苏叛国案”的新书在香港出版，这是知名作家、记者戴晴近年倾力关注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她要搞清楚，为什么这个案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最高决策的错案，但直到最近高层仍不平反？希望携这本数十万字的纪实巨著，和读者一起找到原因。戴晴倾力关注的还有中国主办奥运，她一直持反对态度，原因是“中国还没到可以大宴宾客、广泛作秀的阶段”。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戴晴直言直语：“大宴宾客，要家里每个人都很富裕，很幸福，打开大门，大家痛快的吃一顿。问题是背后都是灾民，恨不得把你给宰了。你折腾什么呀？赶紧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吧。”

戴晴注定要和时代脉动共同起伏，在“六四”后曾入狱。近年在环境保护等事件和领域，她过问中国发展状况被当局关注。

最近，戴晴作为《零八宪章》签名者而又被关注。中国一批学者、社会活动家联名签署《零八宪章》，令当局大为紧张，并将发起者之一的刘晓波拘捕。戴晴也是签名者之一，只要是为中国发出正义声音的机会，她都不会缺席。

访问是在香港铜锣湾一家“老北京”饭馆，戴晴入“乡”随俗，讲一口很溜的北京话。批评当政者“忽悠”咱老百姓，拿反映一个人最基本生存权益的“《零八宪章》”说事。戴晴表示：“签字时并非激动万分，没有一定要，死了也要干的感觉。”刘晓波打电话给戴晴，问看了电邮没有？戴晴把邮箱打开看了后说，“好吧，算我一个”，就签上了。戴晴指出，“宪章”“太基本了，咱们也得说上几句呀。说得肉麻点，因为我爱国，因为我在意你这个执政党，这几句话我得跟你说说，否则的话我理你？我玩我的呗。就是这么个道理。”以下是访问摘要：

《零八宪章》的发起签名者中很少有经济学家，这和三十年前“真理标准讨论”的时代变革背景是否相像？

我觉得发动的力量不一样，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执政党觉得要变，用权力、有限的智慧让中国有了一个较好的八十年代，发展到了1989年“六四”阶段，被打断了。很多人把胡耀邦和赵紫阳并列，其实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胡耀邦是党内改革派，赵紫阳要颠覆共产党的很多东西的，要从整个经济制度来发生变革，将来如何，是否要共产党的领导呀？再说。这不一样。但是，发动的力量都曾经是共产党的干部，有权力，有话语权，有决策事务权，掌握了一定资源的。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误区，评定邓小平，说他只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做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以不做的，他们一直在做着，现在已经趋于完成，是完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权贵资本主义里面的核心人物，就是他的设计者——经济学家，如厉以宁等人。以前都是我的朋友、采访对象，他们一直走的都是这个路子。他们有什么要变革的，这是他们的理想，实现了。签名中没有他们，这是很自然的。不少经济学家代表了权贵阶层，他们是统治者的鹰犬，签名的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经济学家非常不幸，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良心放第一位，是把自己得到的利益放第一位，不够经济学家的名字，只是当权者出台政策的诠释者，只会用一些名词而已。

这个社会是否到了要变革的时候？

没有，看上去社会矛盾很尖锐，贫富悬殊大，当局除了动用警察之外，拿不出其他的招来了，好像要发生变革了。但我要问的是，变革的动力是什么？能使变革成功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看不到，灾民、移民、杨佳，或者其他什么的，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零八宪章》不能当作一个社会变革的纲领来看。大家从心底发出：中国太他妈的不像话了，怎么办呢，会发生什么事？但没有人把下一步看得很清楚，并不能看成是纲领，看不到变革要来临的前夜。

你怎么评价《零八宪章》的意义？

只能说有一批人，觉得中国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这算什么现代社会？除了有些人有点钱以外，而且他们的钱哪来的呀？还不是牺牲了弱势群体？最弱的就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河流，接着是矿山，再接着的是森林，然后是那些劳工。这是一个启蒙式、口号式、一个远景式的理想，而不是一个行动纲领。看起来很简单，都是一些人、社会存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实践中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但还没有找到通向这个方向的路。

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心声？

说这是老百姓的愿望，可以。《零八宪章》的起草者把它理性化、专业化了。其实老百姓非常简单，把贪官都宰了。北京有一个卖白薯的，他把白薯贴一个贪官牌的，大家兴奋。哥们都去买，扒它的皮，抽它的筋。吃了它，高兴啊。民众还是一种情绪，把它理性化。把愤懑的声音变成清醒的声音，让它纳入到普世价值观里去，做的是这种很普及的工作。

为什么只是把老百姓的心声，把书本的理论整理成一个文字，当局要这么担惊受怕？

是呀。当局就笨成这样。我只能理解为一代代武大郎开店，都找比自己更笨的。我要是当局，一定表示欢迎嘛，太好了，粉饰一下，表示喜欢。然后，想干什么继续干。现在，法国人见一下达赖也不行啦，2008

年出手的，一件比一件笨，这已经不是坏的问题，而是笨。把宪章弄成这个样子，给了大家说话的机会，就是因为他太笨了。

你签名了，有没有公安来找你？

没有。不是别的，我告诉你，是他们警力不够，顾不上我了。我这行将就木的，上街也没法呼口号，也不能给军车扔个燃烧弹，反正就算了。还有一个，我这人特别公开，透明化，有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电邮地址都告诉你们，我都不在乎。

有一次，我的书过海关时被没收，我气得就说：“你回去好好看。”但这不意味着我在思想上妥协了，思想是不能妥协的。什么都可以妥协，穿黑的还是白的，头发长一些还是短一些，什么都可以妥协，唯独思想不妥协。

零八年一开始，就有人批普世价值，有背景吗？

没什么新鲜的。这些人，在我的眼里，就如克林顿到中国北京的大学演讲，有一个女生问一些挑战性的问题，那时大家兴奋，我们还真有斗士。后来一转身，这女生出国留学去了，再一变，嫁了洋人了。她有什么价值，我也不知道了。现在中国，这些人都在找位置，都在为自己找弄钱的机会。有没有死心眼的左派？有，北京大学（为市场经济）跳楼的经济学家，这我佩服他，他的理想、他的梦都破碎了，就跳楼了。在北京，一些经济学院的教授，恨不得我杀了你，你杀了我。计较的就是拿什么位置？拿多少钱？会钻营的把位置都占了，那咱哥们玩点别的。我理解是这样，年轻，回来晚了，别人把位置都占了，那我们玩中宣部的。

批普世价值，是否意味着倒退？

他们居然敢这么干了。我觉得，八十年代以来，当局更看重的是外商来投资啦等等，你说的自由人权，只要没有大碍也就算了。但是，到了今天，你又说普世价值，北京话是说，你又拿这来说事了，一说事了就有别的目标，马上就想到，你是否想公民选举？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不满意，你才拿这说事来了。

他们才在普世价值上争起来了，如果普世价值仅是一个无害的一个神像挂在这儿，无所谓。他感觉到对执政者的既得利益有伤害。有了“宪章”，好像有人会认为，哟，他们把这说成事了，立一规矩了。问题是，规矩谁立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立的，你要立规矩了，影响到他的集权、他的特权、他的垄断市场，当然不行。

中国的希望会在哪里呢？

希望在中国实际上并不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人，唯一的希望就在这。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到了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时，可能中国的河也干了，资源和环境可能都完了。中国成为了世上最大的灾难，我是非常悲观的，最后看到的是时间来不及了，当政者太强大了，我们觉醒得太晚了。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c&Path=2184216972/51ae3.cfm

为《零八宪章》坐牢感到自豪

刘正有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约9点钟，笔者刚起床就有人急促敲门声，自己起身在门内猫眼一看有3名警察，其中有是我认识的汇东公安分局2名警察。我忙向门外警察说，等我把裤子穿起来开门，其中一位警察很客气的说，好！我急忙穿好裤子开门，请他们3位警察进屋内座，我看一名警察手中拿看一张“刑事传唤通知书”，我说，我什么老案又翻了？警察说，公安分局传你去问点事。我说，走嘛？这样我从自己家中被3名警察用警车押送到自贡市汇东公安分局，行事审讯室，主审讯由分局法制科科长刘亚非，副审讯由行警大队队长陈劲等2人负责，用摄像机对准我进行行事违法审讯，经本人整理发表如下：

问：你前次因为什么取保候审？

答：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问：是什么时间？

答：忘记了具体时间了，哦，今年6月18日。

问：你在6月18日取保候审后做了什么？

答：为上访人写了几篇文章，为上访人维权。

问：写了那些文章，在哪些网上发表的？

答：在国内，外网站都发表了。

问：国内哪些网上发的？

答：自贡盐都杂谈，凯迪网，四川新闻网群众呼声栏目。

问：转载了哪些在自贡盐都杂谈？

答：很多文章，你们具体指是哪篇嘛？

问：是哪篇，你自己好好的想！

答：具体是指哪篇却是想不起来，我请你们别挠弯子直说吧？

问：最近发生的事你就忘记了？

答：哦，是我北京的朋友刘晓波，张祖桦《零八宪章》签名活动吧？

问：你是怎么知道《零八宪章》为什么签名，用什么签的名，其中的内容你知道吗？

答：是在网上知道的，《零八宪章》是1至19条，我认为《零八宪章》是建议政府兑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也维护我自己的利益，符合国家《宪法》法律框架内的，是在签名邮箱签的名。

问：你是怎样签的？

答：刘正有（四川自贡捍卫人权者）

问：《零八宪章》不是建议是主张，主张和建议都是一样的，《零八宪章》的祥细内容，有些主张你知道吗？

答：我记得有言论自由，符合十七大胡主席指出，尊重公民表达权。监督公权力滥用，滥用公权力造成连续发生群体事件。

问：你给海外记者刘逸明说，向行政和司法机关送去了，是哪些人送的，跟哪些机关送去了。你还把刘逸明写的文章转帖在自贡西秦会馆“盐都杂谈”，网上。

答：给市委组织部，市中级法院，还有其它机关，是自贡上访人送的，姓名我不告诉你，把刘逸明写的文章转帖在自贡西秦会馆“盐都杂谈”网上。主要是宣传《零八宪章》理念。

问：你不但签了名，还传播了，你知道自己的违法是很严重吗？宣读《零八宪章》其中条款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律条款。国家法律是维护统治者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都要打击。

答：你错了，国家法律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你们认为《零八宪章》违法，我认为不违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连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居委会组代表都无法颠覆，连自己长期举报，控告的腐败官员一个都没有被颠覆掉，更不用说“颠覆国家政权罪”，了，我们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的，你们认为我有罪，我为《零八宪章》坐牢感到自豪！

问：我说错了，国家法律是维护统治者的，我负责。刘正有我们接触多次了，你今天的这种态度很恶劣，你别认为我们拿你就没有办法，对待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侦察期间采取刑事拘留，补充侦察都是合法地！

答：你们是执法者，我是被执法者，国家法律掌控在你们手中，我私有房屋被炸毁9年了不解决，反而多次故意罗织罪名构陷我，我自己也清楚有许多人都想加害我。你们去向局长汇报，刘正有今天的态度很恶劣，为《零八宪章》坐牢感到自豪！

问：谁在害你？我们公安机关是在执法。

答：我请求，我的律师来回答你们，我是否违法？否则从现起我拒绝回答。我再次请你们去向局长汇报，刘正有今天的态度很恶劣，为《零八宪章》坐牢感到自豪！

问：找你的律师是不准许的。

答：沉默。

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公安分局行事审讯警官仍不断审问，我一直保持沉默权，在下午约1点钟，2名审讯警官去向局长汇报审讯情况。另一名警官揣着一个盒饭叫我一面吃，一面好好的想。下午约2点钟，审讯再次继续：

问：刘正有继续说嘛？

答：我要说的上午已经说完了，表态也很肯定我没有违法，为《零八宪章》坐牢感到自豪！我被坐牢早就有思想准备，只是时间问题。

问：你说开发区管委会害你，今天我们传唤你，副市长，管委会书记曹俊杰，主任龙腾鑫，代利平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主要是你走到

了犯罪的边沿去了，我们是在挽救你，到时候谁也救不到你，你为了民主能够拯救国家吗？

答：你们真的是在挽救我？《零八宪章》10月8日签名，今天是12月24日了，凡是有大脑的人都知道。我不能拯救国家，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拯救不了国家，我更不得行，我只是维护国家和自己的利益。我不只是认为开发区管委会在害我，还有许多人站着坐着都想害我，我早就把自己这条命交给你们了！

问：今天只要你认识到我们是再次制止，挽救你就行了，但下次就不是对你不会这么客气了，我们随时传唤你，你随时必须来。

答：签名我都签了，下次我再签名，你们审问都不审了就立即逮捕？

2008年12月24日下午3.30分，在刑事审讯纪录上签名盖手印走人。我刚从分局楼上走下大厅内，突然发觉上访人就在分局内来打探我的消息，才好通知自贡各各上访人，前来汇东分局要求释放人，还有许多自贡上访人在分局外等消息，我本人见到热心的人民群众，自己止不住流着泪对他（她）们表示，谢谢！

2008年12月25日于四川自贡租住屋

http://boxun.com/hero/200812/liuzhy/3_1.shtml

论《零八宪章》的签署风险

王仲夏

首先破题：如果你不是资深大陆民主活动人士，签署只能涉及到风险，无法涉及危险。

大多数网民对于08年12月上旬发端的《零八宪章》网络签名运动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相当危险。

两个多月过去了，这种氛围大概没有改变。公民对于正常的政见表达的忌惮，与专制的多年驯化与调教关系密切。这种值得遗憾的局面，当然罪魁祸首在专制政权，但不意味着，公民就此可以逃避责任。尤其在存在选择空间的前提下，这种责任表现的更加刺眼，让你无处躲藏。

从国内安全事务方面来看，这场网络签名运动发展至今，除刘晓波外，无一签署者因此被羁押或判刑。部分签署者被强制问话或传讯。时间有短有长，次数有多有少。几乎所有签署者的日常生活没有因为签名而受到实质影响。

从隐性影响来看，有传闻，体制内学者或著名媒体人文化人，因此在出版图书或在报章发表作品方面受到制约，但无法证实其真实性（这里面不少学者的名字早已成为大陆报章的禁忌，由《零八宪章》引发的制约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

8000多签署者中，有能力撰写并出版图书者、能够在报章撰写专栏者皆属少数派。大部分签署者从事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等工作，在公共言论方面没有地位和影响力。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言论人士和普通人士之间，哪个群体的签署风险更大。笔者的观点是，前者风险更大，而且二者所承担的都是有限

风险。让笔者不解的是，很多网民甚至有知名言论人士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认为名气越大的人，签署风险越小。下面细分几类人做个不完全归纳法意义上的比较，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大学教授或讲师：执政当局可以责令开除之，如果当局愿意这样做的话。

知名媒体人：当局可以责令开除之，如果他愿意的话。

有能力出书的人（作家）：当局可以责令封杀之，如果他愿意的话。

知名专栏作家：当局可以责令封杀之，如果他愿意的话。

工厂职工、公司职员等：当局可以责令开除之，但他不可能愿意或者说他不屑如此。因为这类人多如牛毛，开不过来。或者说，在几千名白领（蓝领）签署者中，凭什么单单开除你，给个理由先。若几千人同时开除，这个成本有多大，防范这几千人再就业的成本又有多大。若只开除几十人，那不开除另外那些人的理由是什么。区别对待的依据何在，谁负责制定这个依据，依据的贯彻前景如何。这些都是问题。

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当局拿你无可奈何。不管他愿不愿意。并且当局没有能力跟踪监视无业人员，以让其永远找不到工作为目的。根本原因还是这种人多如牛毛，导致搜寻成本过大。

如此看来，连岳老师那种“我比你安全，我做个替补”的论调，虚张声势、矫揉造作。你的专栏可能被封杀，我没专栏，封我啥呢（总不能先在人民日报给我开个栏，然后再封我吧）？你有经济可损失，我没的可损失（没准儿还有茶喝）。这个意义上讲，到底谁更安全呢（经济安全也是安全的一部分）？这里暗含一个前提：我不相信一个成年人无法承受与秘密警察一起吃顿饭喝杯茶（这何尝不是多彩人生的组成部分呢）。

如果你不属于以上几种人，那么恭喜你，你就是传说中的资深民主斗士，你面对的不是风险，而是危险，入狱的危险。刘晓波就正在承受这种危险。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就是所谓选择的空间的出现。遇罗克的时代

没的选择，林昭的时代没的选择，秦永敏的时代没的选择，甚至陈光诚的时代都没的选择。那些个年代，如果非要强行制造选择空间的话，只能在生与死之间作选择。几十年间的几十亿人中间，有的可选的人屈指可数。大多数人看不到选择的可能。

如我一样的普通人士，最多只能混碗茶喝，然后继续自己无聊的生活：失业、就业、恋爱、失恋、旅行、宅。因为我写不出能够让专制者恐惧的政论文章，也没有为人权案子辩护的资格。除了喝茶，我什么也不会。

于北京卧草堂 2009年2月25日凌晨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wq/200903/20090315071530.shtml>

应对警方打压 保卫《零八宪章》

刘沙沙

签名之后，本人在等待喝茶，这是设想的“和警方对话”。

进入警方办公室后，开场白：

“开始之前，我讲两件事，两个原则：

一，我还是把共产党当做可以交流、可以说服的对象的，并且民主就要讲诚信和公开化，所以今天你询问我本人的行动、观点、设想等，我答你的将全是实话，是真实意思。我在你们跟前怎么说，出去还是怎么说、怎么做，会一以贯之。而，另一方面，贵党和现政府还是有许多落后于时代的地方、不能很好保护人权的地方，并且存在着侵犯人权的可能性，所以——我的第二条：

二，事涉他人，一字不提！

我的朋友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是属于人家的言论行为自由。公民不曾明确授权给政府的权利，推定由公民保留。所以，我的朋友们不曾明确授权向政府发布的言行，推定属于人家的个人自由，我无权向你们发布。“

.....

警：你签了零八宪章吗？

我：签了。

警：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宪章的？

我：根据原则二，我不回答你。

警：“在什么地方看到的”都不能回答？

我：对，我不回答你。

警：零八宪章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

我：什么是反党？我本人是唯物主义者，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世界观上和共产党并无不同，不同的是方法论。我反对的是那个一党专政之专政，是那个通过宪法规定的一党专政之地位。

我不是逢共必反，我心中的民主框架里，宪章的民主框架里，共产党仍然要作为一个合法政党而存在。如果共产党在民主竞选中能说服民众、能拿到足够选票，仍然有资格上岗执政。这样的民主设想如果也被你们看成是反党，那么，反了就反了！一个拒绝民主改革的共产党，一部分拒绝民主改革的共产党人，我反了就反了，（调侃）打倒共产党反动派！

其次，什么是反社会主义？又什么是社会主义？如果是马列毛泽东所定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那么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声称“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才是反社会主义呢。或者2002年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修改党章，允许私营企业入党，那才是反社会主义呢，你去找他们算账去！（笑）

如果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定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那么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它统治世界的一百年时间里呼唤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并且至今还在呼唤，源源不断地呼唤，呼唤出来的新生产力，眼花缭乱、层出不穷——资本主义才是邓小平所定义的社会主义，你们啊，先去给“邓走资”把这账掰清了再说。（笑）

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民主框架下适当的经济调控+累进税+福利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恩格斯晚年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正是我所赞同的，也正是体现在了宪章中的，这时你说宪章“反社会主义”，又从何说起？

警：宪章的本身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它是由谁提的！

我：太对了！宪章本身很普通，重要的是，它是谁提的！如果宪章的这些原则，“民主、公正、福利”这些话是共产党提的，那我会哈欠连天“哎呀老生常谈了又，应付民众了又！”，而，现在是由刘晓波王丹来提，由另外的一群人来提，有另外的一群人站出来和中共争夺这“民主公正”的话语权，在民众跟前，有另外一群人来竞标，太好了，太对了！就该这样！就不能只让中共一家竞标！老百姓有货比三家的权利！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在牺牲的前几天，曾经跟当地农民讲过：“当我们走了，资产阶级政府会来到这里，会给你们带来医院、公路、小学。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来过了。”

而现在，在中国风雨飘摇的经济形势下，官僚资产阶级的中共政府，能关注就业、维护劳工，能拿出九十亿来慰问贫困群众，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斗争过了。

警：搞宪章的人是一群里通外国别有用心的人！——

我（正色，热血上涌！）：对不起，说到这里，一步不退，誓死保卫！

一，所谓里通外国。一个新思潮、新运动，当它不是在本国先兴起，而是在外国先兴起的时候，后发国家的新运动，肯定要在思想、人员、组织甚至资金各方面接受先进国家同志的帮助。俄国十九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接受西欧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接受第二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的斗争中，一直在思想、人员、物资、党建各方面接受苏联的帮助。鲍罗廷到中国来干什么的？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是为了接受苏联援助的武器，一九四六年东北，大批的苏联物资都给了林彪！（对警察）你别急！——这没错，这没什么不对，工人无祖国，革命无国界，共运史的跨国界行动，并不损害它的“历史的正义和正当”。那么民主运动的跨国界行动，也并不损害它的正义和正当。我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也请你们承认民主主义的普遍原理，或者说，我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也请你们承认民主主义的普世价值。否则，凭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而民主主义就不是？凭什么？你说了算？中共说了算？

二，所谓“别有用心的人”，你是指刘晓波王丹他们吧？那么——（热血沸腾热泪上涌！）——事涉刘晓波王丹，你不要和我讲任何道理！因为共产党在他们的身上，在陆四的事情上伤了天害了理！至今还在伤天害理！是共产党把一场运动变成了悲剧，把一群凡人逼成了英雄，把广场，用鲜血，变成了图腾！在陆四不能公开讨论，不能交由人民讨论的情况下，现在，在这个办公室里，你说他们任何坏话我都不信，你说下大天来，奈何我不信！刘晓波和王丹，他

们事前理智，事后负责，是条汉子，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愿意热血追随的领袖！提起陆四，我是摆明了要跟共产党打这个擂台！我知道这话的严重性，我害怕，我害怕得浑身直哆嗦，但是——我想起先烈，我就不怕了！——

警：陆四是反革命暴乱——

我：好啊，有理你拿出去讲啊？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么理直气壮的事情，你们拿出去说啊？讲啊？宣传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日一个接着一个，电影拍了一部又一部，而陆四，好，平息暴乱，保卫共和国，这么光彩的事情，你们怎么不说啊？不提啊？如果说“平反陆四”这说法太难为你们，太先入为主，那么换个说法，公开，公开行不行？允许你们批判，允许你们表功，允许人民讨论，行不行？党报军报上讨论，你们不愿意，那么允许民营媒体讨论，允许网友讨论？行不行？新浪、搜狐、网易发个新闻大家讨论行不行？天涯凯迪、铁血强国、腾讯西祠六大论坛，允许关于陆四发出主贴，哪怕是你们发出镇压有理的主贴，下边不封不删，允许民众讨论，行不行？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咱们掐着表看看讨论陆四的主贴，哪怕是骂王丹的主贴，能生存几分钟？！我在各大网站上蹲了四年，四年的调查取样证明，你们没这个胆量！那么好，陆四一天不公开，我追随刘晓波王丹一天，陆四一天不公开，刘晓波走到哪一步，我跟到哪一步，王丹走到哪一步，我跟到哪一步！

警：他俩也不代表绝对真理啊？

我：我知道。陆四澄清之后，民主改革成功之后，我会反思的，我也会骂他们的。但，不是现在，不是共产党还伤着天、害着理的现在。

警：你会骂他们？

我（疲倦地笑笑）：当然啊。民主改革成功之后，当他们能站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时候，我会骂他们的。会比骂共产党更厉害，会比共产党骂得更厉害。所有你们现在骂刘晓波的话，刘黑手什么的（笑），我都会扣在他头上，就试试他的胸襟和成色！我现在拼命支持刘晓波，就为了一个将来能在论坛上骂刘晓波的权利。就为了一个将来能在论坛上骂刘晓波而不掉线不敏感字不封 I D 的权利！

警：不谈刘晓波了，谈宪章本身吧。宪章第十八条是分裂祖国，你这样走

下去会很危险的！会犯“分裂祖国罪”的！

我：你是指联邦制？第一，联邦制不是分裂祖国。美国是联邦制，分裂了吗？没有。俄罗斯是联邦制，分裂了吗？没有！联邦制不是分裂祖国，相反地，在某种意义上说，联邦制是一个可行的统一祖国的方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中央给台湾的政策，保留军队什么的，那都甚至不是联邦制了，那比邦联还松散了。如果联邦制就是分裂祖国，那你去跟中央抗议去！（笑）

第二，关于联邦制，我签名的时候就声明保留了。前边我说了联邦制的利，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联邦制的弊端：联邦制不是分裂祖国，但是，联邦制的效率较低。联邦制不是分裂祖国，但是，联邦制增加了分裂祖国的风险。这些意见，签名的时候我就声明了，并且在国内，在多个场合，在我的博克里，多次表示异议。可惜我的博克被你们删了又删，这就不能怪我了！我反对分裂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文章都要被你们删除，这个账，得算到你们头上！ ~~~

警：你现在能不能写个声明，声明反对宪章，反对宪章第十八条？

我：不行。

我要批评宪章，必须得在外边，在自由讨论的环境下。在外边我已经批评过了，我批评了又批评，可都被你们删了！而现在，在你们这个办公室里，不管你怎么说是交流啊讨论啊，警察办公室，无论如何都构成一种压力和胁迫。在这里，我不会写下任何批评宪章的文字，一个字都不会写。

要我批评宪章，在网上批评宪章，可以——你得允许我张贴宪章全文，然后我发出对宪章的三条保留意见。你得允许宪章的写作者反驳讨论，然后我会发表批评意见。像现在这样，你们把刘晓波给扣了，不让宪章作者们发言，封了人家的口，捆了人家的手，然后组织我，刘沙，来搞批判，打瞎子骂哑巴，这种缺德事儿，我干不出来。你们忍心，你们去干！

警：你认为宪章会成功吗？

我：目前，不会。二十年之内都不会。也许尽我一生都不能看到宪章成功。但是，正因为尽我一生都看不到宪章的成功，它才值得我去奋斗。这才是站在黑夜里的火把，站在时代前沿那一份先驱的自豪感！——我不喜欢太容易得到的幸福。（笑）

如果宪章现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已经成了群众运动，眼看就要成功了，那我只会乐呵呵地站在一边看着。甚至我要出来批评宪章，要往群众头上浇冷水了——为的是防止这群众运动走向另一个极端，简单民主化的极端。

警：你也承认宪章没有群众基础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推行这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宪章？你这岂不是不民主了？

我：大清国的子民还普遍认为“这大清国的天下不是我们大家的。”那怎么办？秋瑾孙中山他们就不革命了？

何况，中国老百姓目前普遍的民主素质不高，你觉得这是谁的错？建国至今六十年了，改革开放也三十年了，普遍义务教育也十几年了，中国老百姓的政治素养，如贵党所说，仍然低下得连个普选都搞不好，这是谁的错？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思品课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毛邓三，拼命往学生脑子塞的同时，对学生有过起码的民主教育吗？多党竞选这类民主原则，在学校课本里，哪次不是被批判的对象？如果说，对于民主宣传，你们不愿意去做，那你别拦着别人做，好不好？放松媒体管制，让别人宣传好不好？至今中国老百姓听不到另一种声音，这是谁的错？对另一种声音，对零八宪章，封杀得如此严厉，这是谁的错？执政六十年到如今，中国百姓的民主素质、中国民主状况还是如此落后，难道不是党和政府的耻辱？

警：你能退出宪章吗？

我：宪章是一份文件，一份倡议书。不存在所谓“退出”。你这是一个谓语和宾语不搭配的病句。

你是不是指围绕宪章形成的组织？那样的组织，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如果有——（认真地盯住警察的眼睛，郑重地，坚决地）——如果有，我会参加的。

警：你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宣传宪章？

我：（苦笑）：我多想欺骗你一下啊，欺骗你一下让你能完成手续，大家都好过得去。可是，对不起，正因为我还把你们当朋友，正因为我还把中共做一个可以说服交流的对象，所以，我对你们坦诚，我不欺骗你们——（坚决地）我不放弃。

我不放弃宪章，不放弃宣传宪章，不放弃宣传宪章的权利。对不起。

警：你不怕因此连累父母？你父母都那么大年纪了让他们为你担惊受怕？

我：我当然害怕。但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爱国者随时要准备，为了忠于国家而反对政府。”如果你们因此惊动我父母的话，那就是当局在人权上又后退了一步，这个账，仍然要算到你们头上。

警：你态度这么差，你是要承担后果的！

我：我不会主动去和共产党寻衅，但，某些权利，某些底线，不放弃，不后退！我等着你们的“后果”，我本来是凡人，我等着你们制造英雄。

.....

以上，是我设想的“与警方对话态度”。面对警方，刘沙将按本文去做，去坚持态度，坚持气节。但，本人不强求其它“签友”——战俘是没有所谓背叛的，战俘在胁迫之下发表的言论，不受追究。民主主义首先要关注人道，关注每一个人的人权。当“签友”们面对当局的人身财产威胁时，民主主义允许大家首先保护自己。“国旗保护她的每一个公民，包括那些蔑视她的人。”“宪章保护她的每一个公民，包括那些‘背叛’她的人！”

1月27日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wq/200904/20090404132917.shtml>

我万分拥护“社会主义民主”

——坚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

李昌玉

29日，我所在的山东大学附中党总支书记打电话给我。我是一名退休赋闲在家、却不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老人。我知道我和书记之间隔着一道屏障。他大概认为我是一个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老不死的“分子”，不会无事找我说闲话。没有上级指示，他并不愿意听我的胡言乱语疯言狂语。

书记开门见山问我是否在一个叫《零八宪章》的文件上签名了。我说：“是的。我不但签名了，而且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横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表明我签名的原因。”我问他，是否读过《零八宪章》？他说没有读过。既然没有读过，那问我干什么呢？他说，只是听说我签名了，表示关心，随便问问而已。假若真是无足轻重的小事，随便问问，却又不是通风报信，私下传递小道消息，书记同志为什么要专门打电话呢？其实，在我熟悉的语气之中，是对我参与这些活动表示遗憾和劝阻。整个电话中，他一再说明是“听说”我签名的事，似乎不是奉命来做我的什么工作，只是为了证实一下“听说”有其事，仅此而已。

其实，我写《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横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发表在《观察》网站），开宗明义就说明“听说《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被捕了，其罪名就是提出了‘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犯了‘煽动颠覆国家罪’，而且据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因此要严肃处理签名的人。我作

为签名者之一，不得不自我表白一番。”我以为，监控我的当局，读了此文，已经知道了我的动机和态度，不会再“追查”我了，哪里知道，还是要来“落实”一下，让我承认签过名，似乎也仅此而已。

但是以我阴暗的心理揣度君子之腹，书记在其上级的布置下，打电话询问我，其动机其目的说穿了就是以朋友般的文明的善意的好意的不动声色的不动警察的威胁，恐吓，警告：我们掌握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今后务必识相一点，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这是一次心理战，叫你随时不要忘了你的处境，你的自由度。否则有什么必要专门打电话询问我呢？明明知道我的态度，还要“落实”一下，岂不是多此一举？至于是否定下“叛国罪”，真有“严肃处理”在后，那就以观后效了。

而且这种朋友般的文明的善意的好意的不动声色的不动警察的威胁，恐吓，警告，不但是针对签名者，更是针对那些没有签名者，所以，听说我签名了的朋友捏了一把汗为我担心，轻声细语地叫我务必“小心”，因为“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对于这种文明的善意的好意的不动声色的不动警察的威胁，恐吓，警告，我们这些当过 22 年“反面教员”的老右派，对于这种手法太熟悉了，不过在手段上现在也的确是文明了一万倍，仅仅花样翻新，与时俱进，越来越时尚，新潮，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听说，官方有的人，还提溜了大礼包上门，不过也只是“询问”一下而已。有的还说几句热乎乎的话，叫你感到关怀备至，情意绵绵。

我对书记说，既然你没有读过《零八宪章》，那说明你是奉命行事，因此我请你转告向你下达指示的领导，请他们今后不要通过你下达指示，有话直接找我说，免得把你夹在中间，难以说话。我又不可能向你承诺保证今后不签名，不写文章，你却老是劝说我，一片苦口婆心，但我却不领情，叫你为难。

我李昌玉到底做了哪些违背宪法的事情请明里说明。既然共产党要依法治国，那么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我犯了法就依法惩处。比如，抄走我自费印刷的准备赠送朋友的个人著作《历史大视野》第一集第二集，已

经一年半以上了。当初说是“非法出版物”，可是为什么长达一年半不结案处理呢？你们有法在手，有权在手，书籍查封在公安局，结案处理还不是小事一桩，还有抄走的电脑、护照凭什么不发还给我呢？这叫做依法治国吗？制定法律、践踏法律的都是政府自己。

为了进一步表明我的态度，现在我再次写一篇文章《我万分拥护“社会主义民主”——竖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在公诸于世的同时，请书记转达给你的上级。我揣想，向我们附中书记下达指示的应该是山东大学的领导人。山东大学新近调来一位校长徐显明，是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任上调来的，是一位法律专家。徐校长可能刚刚履新，下车伊始，未必知道治下有这么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李昌玉其人其事，但是在下涉案的是“政治案件”，“政治案件”无小事，对于学校里涉及“政治”的人物和案件，校长不能不闻不顾，因此我恳请徐显明校长读读《零八宪章》，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和平的理性的诉求，看看它是不是违背了共产党制定的宪法所承诺的公民权利？看看它是否有“煽动颠覆政府”的内容？看看它是否违背了联合国制定的中国政府签字了的“世界人权宣言”？然后请明示：在《零八宪章》上签字是否违法？是否有必要“追查”签署者？

《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有的人并不完全地毫无疑义地赞成它的每一个观点，但是它却是至今为止得到了民间最广泛认同的一个全面阐述社会改革方针的文件。我特别支持的是它表述了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而执政党高举的“社会主义民主”，并不认同普世民主。其实，假如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可以容许异议人士的合法存在，可以容许反对派合法存在，请立即释放刘晓波，请发还抄家抄走的我的书籍、电脑、护照，请撤除对我以及其他“分子”的监控，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一定万分拥护，额手称庆。

胡锦涛总书记最新主张“不折腾”，其实，对异议人士、反对派人士动用庞大的专政工具，严密监控、威胁、骚扰、打压、警告、恫吓、窃听、跟踪、站岗、抄家、逮捕、判刑以及收买拉拢就是一种无端的“折

腾”。一个执政了 60 年，拥有领导一切的权威，垄断了包括军队、警察、法院以及全部媒体亦即枪杆子和笔杆子，全世界最庞大最严密的政党，对于“一小撮”仅仅表达一点异议的知识分子，却极尽“折腾”之能事。请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共执政 60 年，河东河西各 30 年，其承前启后的转捩点就是胡耀邦主持平反毛泽东时代制造的冤假错案。没有这个转捩点，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成就。但是，后来的 30 年已经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往后的岁月，还要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呢？

一位主流学者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以为民主之所以是个好东西，就是在于它大肚能容，百川能纳，喜鹊、鹦鹉之和鸣不以为是，乌鸦、麻雀之噪聒不以为非。这里不存在“民主”的属性是什么“主义”。

中国政府不是宣布要制定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吗？很好，那么，请体现在对待《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上。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千万不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变成忽悠外国人的《国家人权宣传计划》。

明天就进入了 2009 年，祝愿我们的祖国看到自由的希望，民主的曙光，宪政的桅檣！

2008 年除夕于山东大学附中

今天国安找我谈话

陆 文

今天下午三点，我在方塔公园读电子书籍《1984》时，接到户籍警“汤司令”电话，说有人有事找你。我说没空，隔一会还要接孙子。他说，这时有空的话见个面，我说，好吧，你们到我家里。“汤司令”答应了，大概晓得我宁可绳捆索绑招摇过市，也不会接受他们所谓的传讯。老实说，1974年那次传讯，随之而来的十多小时的扁担绑把我整怕了，迄今心有余悸。

到家，他们来了。来了三个，一个汤司令，一个上次过年时来慰问的市局领导，还有一个姓孙的先生。后来我一直称他为小孙。小孙四十左右年纪，比较精悍，眼睛还似乎有股杀气，一看就不是个等闲之辈。

这次他们来，手里没拿慰问的春联，我起先以为他们想搬电脑，因为他们搬孙文广教授的电脑，比较频繁，至少搬了不止一台，我担心他们惯性运行，搬滑了手。不过心里想，搬就搬吧，反正一台破电脑，值几个钱，要搬就搬吧。连续搬三次，价值也不过相当于一次嫖娼的罚款，只够他们吃一顿金海华的酒水。

这次小孙唱主角，寒暄几句，马上进入主题。问《零八宪章》的事，还问有没有签名，通过什么渠道。我说，什么《零八宪章》啊，签什么名啊，你讲个来龙去脉，最好给我看一下，这样能唤起我的回忆。74年，城东派出所所长顾根生将我扁担绑，我的左手至今发伤，脑子也不好使，有些事没法记住。恐怕你也不能记住前几天吃的食吧。再者，我的签名太多了，也不知哪次签名。我还说，你们要中立啊，不要一头加入党派的纷争，卷入政治的旋涡。

小孙说上面有你的名字啊。我说，你能证明那名字是我吗？你说话要有证据，我可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陆文的名字没有专利，任何人都可以用。上次，某网站有篇文章叫《剥开中共的画皮》，难道你也可以说是我写的。他哑口无言，不过我晓得他们其中一个身上的录音机肯定在转动。想到这个，我呵呵笑了。我说，调查时最好带个证据或者文本，不要空口说话，要是上门讨债，不带欠条你说行吗？小孙叫我回忆，我说，也不能肯定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签名，你按照我说的，说陆文记不清了，跟上面汇报。多大的事，值得这么紧张，又没人有能力抢夺你们的江山。我 58 岁的年纪，更对你们的政权没有兴趣，我要紧写我的小说呢。小孙蛮尴尬，市局领导在旁边陪笑，汤司令完成了向导的任务，不说话。

我原以为，他们也像其它地方的国安传讯网友那样，给我笔录、拍照，所以打算他们这么做时也掏出手机帮他们三个拍照，并录音。他们不这么做，让我大失所望，使我的手机处于闲置状态。我只好掏出手机，做了个拍照的姿势，对他们讲，你们不这么做，我也不能这么做。不瞒你们，我原打算叫你们填会客单，写明来访的事由呢。

他们三个态度极其平和，一无敌对情绪，有点像例行公事的样子，反而我极其冲动，我想，这大概是文革的后遗症。一有事，就激动，扁担绑时更激动，还破口大骂。我担心冲动时，被高血压病夺了性命，于是当众服下了降压片。他们其中一个说，服药要有时间，我说，一激动我就吃，就像吃炒黄豆。汤司令关切地问我上下压，我说上压 150，下压 95。他说，他也有高血压，一副同病相怜的样子。我说，父母死于高血压，弟弟死于高血压，我也说不定死于高血压。死于高血压，或许是陆家的宿命。除非今天跟你们去，死于谢桥宾馆（当地拘留所），才能逃脱这个注定的命运。他们要紧说，哪里，事情没这么严重。

四点钟接孙子，时间还早，他们一时不想离去，为避免冷场，我又继续像以往那样诉苦，重点当然仍然是扁担绑。我说文革至今，政权没更迭，政府理应为过去的错误买单，向我道歉，给予赔偿。他们呵呵笑，

• 第四卷 《零八宪章》与当局的反应

稍微安慰了几句。接孩子还早，我继续诉苦，我家苦大仇深，父亲拖黄鱼车的，母亲拖板车的，按理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你们不让我入团，不让我入党，让我一直徘徊在革命的外围。我多么想参加你们的队伍啊！你们为什么当初不让我革命呢？

三点四十分他们离去，看来凭录音可以向上面交差了。在此，我祝愿他们三个好运！全家幸福！

今天顺便声明一下，交流沟通是必须的，但不要贼头贼脑。天知道鹿死谁手，当心政治清算！要是贼头贼脑，我要告诉胡锦涛：死于高血压，不如死在拘留所。反正命一条，啥时候要，啥时候拿去！

在此，再一次强烈要求释放刘晓波！释放我的兄弟、我的同道！《零八宪章》万岁！

2008年12月23 勿笔

《零八宪章》构筑共同政治话语平台的努力

杨宽兴

因为利益、喜好、认知的不同，凡有人群社会，便有观点分歧，即使残暴如斯大林、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未能“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一般政治生态下，对应社会思想的两端，会以党派的形式，形成代表两极思想的政党，如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托立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民进党，尽管现代政党制度的架构是多党制，但由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多党制竞争的结果，一般是形成观点分歧的主要两党，吸纳中间人群的利益和需要，从而形成有效的张力，以对立与合作的交叉，分别代表各种基本的社会思潮和利益取向。

一些当代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分别对应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实际政治运作当然会复杂得多），两党的竞争与合作，使社会在稳定中求变革，变革中求稳定，兼顾各种人群的需要，形成一种稳妥而有活力的社会结构。

两党制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党结构，并非来自政治哲学发展的有意设计，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考察非两党制国家，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对这种张力的需要，比如日本的自民党，自 1955 年以来，可谓一党独大，但在其党内，有公开存在的派系，分别代表不同观点和利益，形同于两党制，在德、法等欧洲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一个时期内，各政党的联合与分歧，也往往是两种观点或利益驱动的结果，即使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中，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力量，往往也会体现出两种主要政治势力共存的情形，如文革前的毛刘、文革中的林江、文革结束初期的华邓以及此后的邓陈。

但是，六四之后，在官方权力体系中，要清楚地划分出两派政治力量变得困难起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了整个权力阶层的共识，原有开明派被彻底清洗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早已成为陈旧的标准，与此对应的，则是民间与官方的关系破裂和紧张，在政治领域，权力者自始至终是一种保守的面目，而民间对于改革的需要和呼声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现实。

八九民运以六四屠杀画上句号，这一结局表明中国的两极政治力量尚不具备对立中妥协的能力，在二十年前的那两个月中，政府始终不肯给学生和市民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台阶，甚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故意刺激民意，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则被李鹏等顽固派激怒，提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口号，最后，学生提出的否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平等对话的合理要求，未被接纳，反而被血腥镇压，成为一场罕见的悲剧。六四之后，私有化迅速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社会的利益和观点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但宏观而言，以权力为代表的稳定派沦为犬儒主义，要求变革的民间力量因屡屡遇挫，而形成极度绝望和焦灼的心理。六四之后，越来越多的针对政府权力的维权行为绝大多数以不了了之终局，显示社会两端仍然缺少共同的沟通平台和基本价值认同。两极思维中对立过多而妥协太少。

《零八宪章》自去年底发表以来，至今仍有海内外人士继续参加签名。按照我的个人理解，《零八宪章》不是宣扬对立和分裂，恰恰相反，它是在试图寻找权力者与民间沟通的最大政治公约数。《零八宪章》当然不是跪地上书，但其表述的对象除了民间力量之外，同样也包括权力者，希望与他们建立共同的话语基础。《零八宪章》的六条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对于一般现代国家来讲，是再基本不过的常识，并无独特的创造与发挥。因此，我们可以说，《零八宪章》是一块试金石，试探中国社会和权力者是否具有接纳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对这个概念存有争议）的意愿和行动。

应该看到，在政治稳定的背后，自六四起，国人对于权力体系和中

国未来走向的判断与所使用的语言，都形成了惊人的分裂，官员越来越漠视民众利益，在信仰、土地、拆迁、教育、医疗和工作权等问题上，几乎是肆无忌惮地侵害民众而基本无须承担责任，腐败成为普遍而公开的事实，弱势民众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则对政府采取了完全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针对权力者的暴力行为开始出现，这使中国社会陷入长期无法沟通与合作的危险之中，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一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景，利益、观点的分歧和长期斗争哲学的影响，使中国的一潭死水之下，实际是全社会沟通和妥协能力的低下，因为在利益与观点的对立之外，社会分裂的结果是社会成员缺少基本的共同价值观。

《零八宪章》试图超越现实政治与焦躁的理想主义诉求，以有可能被广泛接受的表达，确立未来中国的基本价值体系。在传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破产后，无论民族主义、犬儒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都不符合时代精神或存在太大争议，唯独《零八宪章》系统表述的理念，有可能被广泛接纳，比如说，即使在传讯和约谈宪章签署人的过程中，国保警察也没有对《零八宪章》本身的内容予以批判，而只是以起草人的敏感身份和"险恶用心"来做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以其没有"创新"的最大被接受程度，对每一个接触到文本的人产生影响。事实上，《零八宪章》的许多表述文字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只是，宪章的文字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公民表达，使这些文字具有了真正的宪政含义，由于签署者的勇敢和真诚，这些宪法性文字不再显得苍白虚伪。《零八宪章》是关于政治的表达，但这不是令人讨厌的政治，也不是空泛而虚伪的政治，当全社会因多年的虚假政治话语而对政治麻木的时候，《零八宪章》试图建立一种真实的政治话语。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政治变革的艰巨性我们应有充分估计，幻想走捷径是不现实的，不从无可争议的基本理念以及对这些理念的传播出发，任何急迫的心理可能都只会事倍功半。《零八宪章》并不以激进地反政府为己任，或许，为取得民主进程的实际效果，条件具备时，它甚至需要与权力者的沟通与妥协。但有人说《零八宪章》是跪地上书，是

向政府祈求和解，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宪章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发言，既不单独针对权力者，也不只是针对民间人士，民主宪政体制下，社会成员是既拥有权利也承担责任的公民，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是推进和完善民主体制的参与者，我们没有特定的敌人。

《零八宪章》没有任何组织，它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随着签署和关注人数的增加，它会形成滚雪球效应，每一次的滚动都因其外表面的增加，而粘附更多的重量。《零八宪章》不是暴烈的革命行动，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取巧行为，它应该是包容性的持续的思想启蒙和公民行动。

就其条文而言，除“联邦共和国”因内涵较少被国人理解而引起一些争议，可以说是获得了阅读者广泛的认同，就连来自官方的批评都只是针对起草人背景的诛心之论，而没有看到对其有说服力的逐句批评。而且，零八宪章没有针对政府和现实政治的具体要求，它寻求理念的认同，而不提出政治操作的方案与设计，也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试图首先确立社会基本共同价值。

今年是“六四”悲剧二十周年，在我看来，《零八宪章》恰是解决因六四导致的社会分裂的良药，我们应该学会用对立双方（乃至多方）能够听懂的话进行交流与沟通（至少是内心认同的话语）。作为共同生活的社会成员，对立之外需要有基本的价值认同与合作，在任何正常社会内，观点的差异应寻求理解与理性解决之道，而不是在过度对立中玉石俱焚。

不能否认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进步，但这绝不是阻挡民主、自由思潮的理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亦如此，人既是经济动物，又是精神存在，对很多人来说，物质富足的今天，未来却成了不去想，也不敢想的问题，麻木与沉沦中，我们是否还有自省与自救的能力？

《零八宪章》用平实、温和、坚定的语言提出了我们的价值愿景，而且在政治高压之下获得了难得的社会认同，这正是民族自救能力的体现，作为形而上的文本，它会以我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方式传播并

形成影响，而它也将持续性地，因签署者、传播者和关注者的努力，不断增添新的历史内容，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由于《零八宪章》不诉诸于权力的恩赐，因此，无论权力者如何对待宪章签署人，都不影响《零八宪章》的传播，由于没有设定有计划有预谋的操作方案，蕴含在民众中的智慧与力量才是宪章真正的精彩之笔。每一次签署，每一次传播，都必定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而为中国未来政治话语奠定基础。

这种具有最大政治公约数的鲜活的公民表达和行动，应该是扎实推进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可依靠方式。时间不会消磨良心者的意志，只会使人们更加乐观，并逐渐看到《零八宪章》的表述从理念到现实的政治变迁。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29083504.shtml>

答国保有关《零八宪章》签名问

曾伯炎

单位通知我到离退休工作部，去了，见有自称成都锦江区公安局者3人，向我了解《零八宪章》签名缘由，说了从网上见到，很合心意，很温和，很理性，便签了。他问：这宪章是否定党的领导呵，我说，文本中无一字号召暴力推翻你们这党，同上访者维权一样，这也是公民上书建言，同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与举子们公车上书近似，如果，有一天，上访者，失去访的兴趣，上书者也没了建言的信心，你们会看到就不是刘晓波这种书生清议，乃是满地杨佳这种豪客出场了。还有你们要的安定与和谐吗？

他们没想到这退休老头，竟然这么理直气壮，话锋不藏。便问：你77岁了吧？答曰：再有一月就满了。并以自己经历两个朝代的经历与感受，告诉他们自己签名的缘起：

一，百年前，我父亲在广汉上中学，就是康梁宪政维新的拥护者，且在保路运动中受清政府缉捕，获信后跳广汉城墙逃亡，家庭中有此渴望行宪种子，现在家中第四代已成长，民主还由党主，宪政还被专政代替，能不是心病，认为《零八宪章》是良药吗？

二，1940年代我还是学生时，中共打民主旗帜，就吸引我在旗下，他们的《新华日报》天天在抗日战争中和战后高唱反对独裁的民主高调，也引我共鸣，谁知，推翻国民党那半专制半民主的政权，换来的是绝对专制的政权，说是打的人民的江山，竟是中共一党的江山，文化大革命还企图再变成毛家的江山这与洪秀全、朱元彰这些起于草莽的打江山坐江山，有区别吗？《零八宪章》正是以和平方式改革这中国老戏为现代

新政，满足了我 60 年前的青春期的民主梦，我能不签吗？

三，由邓小平的只改毛泽东的经济制度，不改政治制度，已改出一个怪胎叫权力资本集团，改出的市场也是官商垄断的权力市场，不要监督的权力成了贪腐疯长的发酵所，公权私受，公款私用，公款吃喝、坐车、出国旅游甚嫖娼，《零八宪章》正是反对集权专权，提倡监督已如虎狼的权力，才是根除这些恶瘤，使社会和谐安定的治本，我能不签吗？

四，《零八宪章》有关人权那一条中，有废除非法的劳教制度，我正是这劳教制度的受迫害者，不经调查、立案、审判就拘捕失去自由，不仅我这 1957 年以右派送劳教者要拥护废除这劳教制度，当年死在劳教营里四川数千右派冤魂，也在呼喊我签名呵！

五，为了我的子孙们能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成长与发展，使他们从臣民社会进入真正的公民社会，我更要签名。

我告诉国保，你们的职务行为，很理解，我们这种老头心中，有一部更真实的史记，历史在心中提炼的理性，也请理解。多些理解，少些猜疑，就少些误判，也少些失误。

对话多数时间是我侃侃而谈，他们不正面回答，只说《零八宪章》否定党的领导就违法。谈话时间有半小时，时间在 2009 年 1 月 6 日上午 9 时。

成都天涯石东街川报锦苑

小昭“喝茶”第一回

——被警察约谈《零八宪章》的经历

作者：波斯小昭

2009年2月5日下午。上海。

我出了地铁八号线大世界站，沿金陵东路向东走。心里非常平静，就跟平时朋友约我喝茶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朋友约我喝茶，我可以不去，警察要我“喝茶”，我就不能不去了。

自从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我就一直等待这一天。许多人都喝过了，没理由我不喝。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黄浦区公安分局已在眼前。穿皮夹克的警察正站在门卫室旁边等候，看到我，他远远问道：“是不是小唐？”

“是。”我走过去。

小唐，这称呼真亲切。怎么，你们没把我当成“阶级敌人”？当然，我本来就不不是敌人。

他把我带到门口左边的房间。里面已经坐了一个人，脸色严肃，面前摊开了几张纸，那是准备作笔录的。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

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房间约二十多平方，一个巨大的警徽挂墙上。这警徽让我有些伤感。它本该是我的保护神，护卫在我身畔；但如今，它成了对我的威压，从头顶沉沉压下来。

我在记录者对面坐下。皮夹克打横而坐。但皮夹克比较活跃，经常站起来走动几步，不像记录者那么沉静。

他俩面前都有茶杯，却没人给我倒水。我想，“喝茶”怎么没茶呢？不过我来此不是作客的，就低调一点吧。说了几句话之后，我口渴，想到这谈话不是三两句可结束的，于是主动问：“有没有杯子？我想喝水。”记录者这才站起来拿杯子给我倒水，客气地问我要不要茶，我说：“不用，我喝白开水。”

“你不用紧张，我们只是找你谈谈，了解一下情况。”皮夹克说。

上午的电话中我已经主动提到宪章，所以他们没必要绕圈子了。

“我不紧张。”我笑道，“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自从在 08 宪章上签了名，我就等着你们来找我，都等了一个半月了。”

皮夹克也笑了。“你的名字在第六批名单上一出现我们就知道了。起初没有来找你，因为你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在重庆，重庆市××区，对不对？”

哈，他们连我身份证上的地址都清楚。春节之前与朋友吃饭，我还困惑地说：“怎么到现在还没人找我喝茶呀？”朋友说：“可能他们找不到你。好像他们是根据户口来查的，你的户口不在上海，所以找不到。”我不信：“你别天真了！他们要找我，哪有找不到的，我这种人最好找了。肯定不会根据户口来查，而是根据网上的线索来查。”警察神通广大，谁能躲得过去？何况我并没有躲。

他们起初没来找我，我想并非因为我户口在重庆，而是因为我不重要。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名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

“被侵权群体”，如拆迁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记录者提起笔，铺开笔录纸，先问我姓名，出生年月等。我如实回答。又问：“工作单位？”我说：“我签 08 跟工作单位没关系，这是我私人的事情。不过反正你们能查到我单位的，我就告诉你们吧。”他们对我的单位不熟悉，还要我写给他们看。

皮夹克听说我在一家公益机构，慢悠悠地说：“做公益挺好的，我就认识过很多做公益的人，他们很热心的……”

分明诱供来了。我咧齿一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有些公益组织也是很‘敏感’的，比如艾滋病、环保什么的。不过我们这个机构一点不敏感。”好歹我也在上海公益圈里混过几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我知道有些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也是经常“被喝茶”的。但我从没参加过任何“敏感”的活动。

“没有没有，我就很支持公益，做慈善嘛，对社会是有益的。上次有个什么什么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他们很热心地发了很多传单……”
(我忘了他的原话。)

我瞠目以对。“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啊！”

我猜想他提到的公益活动是被官方密切注意的，如果我有参与，我的“敏感度”会被加一颗星。但我实实在在不知道。上海的公益组织多如牛毛，我哪有那么好精力都去关心。

皮夹克继续提起人民广场的公益活动，还说：“后来我跟他们谈了谈，了解了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也很支持的。”

我茫然地听着，不再开口。我想这是他设下的一个陷阱，只要我对他说的公益活动有一点点知情，他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挖出我更多的“敏感材料”。但我是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不知道。

“你们开展公益活动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要向社会筹款的吧？”

“对呀，公益组织都这样，有私人捐款，也有向企业或者慈善基金会申请项目资助。”

“有些公益组织也接受境外资金的。”他说。

哈，来了来了，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嘛。我又咧齿一笑：“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接受境外资助也是很‘敏感’的！”

他笑了笑，直接问道：“你们也向境外申请资助吗？”

“我们这个机构没有什么敏感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查。市领导都知道我们机构的。”上个月我还跟老板一起到市政府去开会呢。

工作单位的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又问我文化程度，大学名称。“我们学校不出名的，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我把大学名称告诉他们。他们果然没听过，要我写下来。我写了校名，又要我写“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写了。

“你在哪里上的高中？”我写了。“哪一年到哪一年？”我把初中高中的时间都写了，并解释：“我初中和高中是在同一个学校读的。”

我写下的年份中有一个让他们立刻注目，并念了出来：“1989年？”我满不在乎：“你们别紧张，当年的事情我没有参与过，连见都没见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呢？”皮夹克不相信。

是啊，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就算没参与，至少也会看看热闹。可我真是连热闹都没看过。为了解释清楚这一点，我总得告诉别人我们中学的地理位置：“我们中学不是在城里的，是在郊区。这里是我们学校，”我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周围都是农村，”我用手在圈子外边比划了一下，“离最近的镇也有几公里，信息很闭塞的。我们读住校，在学校里可以看看报纸，周末回家才能看看电视，报纸和电视上说的都是官方想让我们看的。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最近两年才从网上了解了当年发生的事情。”

还好，他没问我“当年发生了什么？”就算他问，我也不回答。这

种问题，不应该由我一个被蒙蔽整整十八年的局外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当年的亲历者来现身说法。

学校问过了，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工作单位？”

我一听便来火。“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家里人没有关系！总不能因为我签了《零八宪章》，你们就要查问我祖宗十八代吧？”

记录者解释：“我们不是要去重庆找你父母，这只是一个程序。每个人都要回答的。”

“那我不回答可以吗？如果你们查到了，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签名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家里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说着，泪水忍不住流下来了。桌子上有一盒面巾纸，赶快扯一张来擦脸。

我相信他们什么都可以查到，但不要指望我告诉你们。我最恨搞株连！这是 21 世纪，不是封建社会。一人做事一人当，怎能牵涉我的父母家人？我不配合！

见我哭了，记录者赶快说：“好好好，不问不问。”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骂自己。怎么这点小事也要哭？真丢脸。

我喝茶之前唯一的担心是：我会不会哭？当初是“大哭一场，签上我名”；后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也哭了，所以照片里的我是眼睛肿肿、鼻子红红。我一直担心喝茶时也会哭，那就太破坏形象了，在警察面前，咱得英勇一点不是？可我完全没有把握能够控制住情绪。女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若到伤心处，我就会忍不住珠泪滚滚。

警察的询问继续进行。后来我也几次落泪。真是一路哭到底，丢脸丢到家。八千多个签名者中，“最爱哭鼻子奖”非我莫属。

个人情况问完了，轮到正题。

“你什么时候在《零八宪章》上签的名？”

“15 号。”

“1 月 15 号？”

“哦，不是。是去年 12 月 15 号。”

“在哪儿看到《零八宪章》的？是别人发到你邮箱里的吧？”

“不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华盛顿邮报说你是从邮箱看到的。”

“他们写错了。通过翻译的采访，有时不是那么准确的。”

“那你是在哪个网站上看到的？”

“我不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呢？”

“当然不记得。我在网上看文章，从来不会注意哪个网站的呀。”

“那你是怎么知道《零八宪章》的？”

“也是在网上。先是看到有人说晓波被抓了，后来又有人说晓波被抓是因为《零八宪章》，我就好奇：《零八宪章》是什么东东？就去搜索。那时候很多网页都被删了，但还是有很多漏网之鱼，我一搜就搜到了。”

“那你看到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看了之后，同意它的主张。但起初并没打算在上面签名，因为……”我有点不满，“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签这种名是要冒风险的。”

今天我被警察传唤，便是“风险”之一。

“那后来为什么又签了呢？”

“我在博客上转贴了《零八宪章》。过了两天，我转贴的就被删了。我很生气，连转贴一下都不可以！又想到晓波被抓的事情，感到很悲哀。我不幸生在这样的国家，有很多权利我们享受不到，也就罢了，可是，连说都不可以说！我不喜欢这种局面，我希望改变，所以我就签了名。”

“你对《零八宪章》是怎么评价的？”

“哈，没什么好说的。它对我而言太简单了，很多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网上很多人说过的，而且有些内容我们宪法里面本来就有的。总之我觉得，《零八宪章》的内容是陈旧的，都是大家讨论过无数遍的；但它把这些内容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倡导性的文件公开发布，无论是谁，只要你同意它的主张，都可

以签名，这种形式是新的。”

“其实，”我补充，“宪章的那些条款，我也并不是每一条都赞成，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的话，有一些我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问我，那我就完全同意。”

“哪些是你同意的，哪些是你不同意的呢？”皮夹克问。

“这个，我可说不出来。宪章上面那么多条，我记不住。你们有没有打印稿？要是有的话我可以看着说。”

我相信他们肯定有打印稿，但他们说“没有”。大概是不想让我拿着稿子口若悬河。

在网上看过很多签名者的喝茶故事，有的人抓住机会向警察宣传《零八宪章》，把这作为“战术”之一。我没打算那么做。第一，我不相信警察没看过；第二，宪章内容一看就懂，无需讲解；第三，我没本事说服警察，懒得费口舌。

桌子上有个大信封，旁边散着的七八张打印纸便是警方掌握的我的“材料”。皮夹克一边问，一边不时拿起材料来看看。我很好奇：纸上写着什么内容？当然他们是不肯给我看的。

嗯，从此我也有“黑档案”了。光荣光荣。

想起一个网友的话：“小昭，你 blog 上写那些东西还是让我有些担心，要是被当局盯上就麻烦了。到时你会背上一辈子都卸不下的烙印，想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限制。某校一位老师，当年曾经参加过六四事件，当时如果不是一位老先生力保，就会锒铛入狱，虽然被保了下来，但是此后他的人生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这是一个水平极高的老师，校长助理干了多年，早就该提为副校长的，可是数次都是在政审的关键时刻被拿下，档案上那一笔永远存在，年龄越来越大，估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不郁闷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网友不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外”，从小就决定，永远不进入这个体制。我不需要它给我评职称，不需要它给我分房子，不需要它给我升官，不需要它给我发财。我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我，两相隔

绝。所以我对于档案上给我记一笔，才不在乎呢。

你以为“永远”是这种局面、中国人“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恐惧中吗？靠，休想！——我们等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了。

我在“零八”上签名，在博客上写文章，都是合法合理又合情，没什么好惭愧的；相反，这是我小昭有勇气、有正义感的表现，我该骄傲才是。希望警方把我的“材料”好好保存，切勿失落。将来我白发苍苍，坐在葡萄架下对小孙女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中国人还处于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奶奶克服了恐惧之心，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那时我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向小孙女展示，免得她以为奶奶吹牛呢。

我正神游物外，皮夹克把我拉了回来：“你是怎么签名的？”

“发邮件去签的。宪章上有签名邮箱的，那两个邮箱都很好记，我看一遍就记住了。”

“你签名之前好好看过宪章吗？”

“看过啊。最初知道宪章的时候就看过一遍，后来决定签名了，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在任何文件上签名都会起码先看两遍的。”

“你肯定没有好好看过！”皮夹克一口断定，“如果你看了你就不会签名了。这个宪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看出来了吗？”

我摇摇头。“我没看出来。”

“你呢，是个很感性的人，有时候会冲动，也没看清楚宪章是什么，就签名了……”

真要命，只因我爱流泪，总被别人说成感性。“我觉得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当然也有感性的一面，但总体说来是很冷静的。签名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作出的决定。”

“你最初决定不签名，这是很理性的，是正确的决定。但后来又签了名，像你说的，因为转贴的文章被删了才签的，这就是冲动，不理智的行为。”

“我签名，首先是因为我赞同它的主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因为转贴宪章被删了，还有晓波被抓的事情，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

我被激怒了，所以签了名。这是一种反弹，对你们打压的强烈反弹。”

常言道“请将不如激将”。如果没有被激怒，就不会有第六批名单上的唐小昭了。相信还有其他人跟我一样，签名的直接原因是“反弹”。官方对言论的强力打压，固然吓住了一些人，却也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反弹。

“你这样做是很幼稚的，签个名就能改变什么吗？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看来你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皮夹克说。

“政治上不成熟”，这个句子我从小在小说里看惯了，没想过有一天会放到我自己身上。嗯，按照党国的标准，我确实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永远不会成熟。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谁“政治上成熟”了，基本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台冷血机器。

“政治，”我说，“中国人把政治看得很肮脏，以为政治就是阴谋诡计，充满了欺骗和权谋，什么事情一和政治联系上就觉得很可怕。其实不是这样的。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既然是大家的事情，政治就应该是阳光的、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谈论，都可以参与。”

我还没打算“参与”呢，我只是喜欢“谈论”一下，就这也冒风险。所以我才签名的。

“我希望我能够行使宪法保障的那些权利。你想想，我都××岁了，还没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呢！”

“怎么会没见过选票呢？”皮夹克不解，“选票都有的呀！”

“我到哪里去选啊？回重庆去选吗，我又不住在重庆，重庆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在上海选吗？我又没有上海的户口。”我撇了撇嘴，“再说，你们那些人大代表，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真的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啊？不都是走过场嘛，做个样子罢了。”

皮夹克笑了笑，没有反驳。

我想起我有个朋友，上海人，已经移民，他说过他从来不投票，“居委会把选票送上门来，我每次都把它撕掉”。他为什么要撕掉选票？因为

他不认为手里这张纸片是真正的选票，没有公正的选举程序作保证，就不可能有公正的选举结果，民意既然被强奸，他宁可弃权。最后他的移民，就是更为彻底的弃权。

“我就想要选票，真正的选票。”我接着说，“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我们有权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意或反驳别人的观点。政府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公权应该来自民授。”

“这些话都没有错，我也赞同民主的呀。但是我们不能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现在中国的现实不是那样，你既然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就要遵守现实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对你没有好处。”

我漠然。“我知道，我是握在你们手掌心里的。”我用手划了一个圈，“中国就是一个大笼子。它囚禁着我们。”

我对你们的“现实”毫无兴趣。我不喜欢这种公权力毫无制约、民众被关在笼子里、公民生活在恐惧中的“现实”，我不为这种“现实”背书。我只为自由背书、为人权背书、为民主背书、为子孙后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背书。

“我没违反你们的游戏规则。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两大原则，第一不违反国家法律，第二不违反社会公德。我以在 08 上签名的形式来表达对某种观点的同意，这是我的权利。”

皮夹克耐心劝导：“你是有这个权利。但是《零八宪章》的事情很严重，不是你想像的只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政府已经定性了，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的政治事件。”

起码一个月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关于“定性”的传言。这“定性”貌似十分严厉，但我看了漠然置之，半点没感到害怕，只感到滑稽。都什么时代了，解决问题还要靠几个人关起门来“定性”？呵，莫非我不是身在 2009 年，而是公元前 221 年嬴政那会儿？但，流光如水永向前，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事儿照我看很简单，如果“08”是个法律问题，那就交给法律去

审判（当然是公正公开、程序合法的审判，不是杨佳案式的暗箱操作）；如果是个道德问题，那就交给大众舆论去评价。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心里继续想着：你们“定性”以后，打算怎么办？把这几千人抓起来、关几年？随便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怜这些自封为“公民”、却无法享有公民权利的中国人，既然无力保护自己，也就只好逆来顺受、泰然处之了。

皮夹克继续说：“你知道四项基本原则吧？坚持……”

我漠然点头：“我知道。”这些东东放在宪法里，真是莫名其妙。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承认现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流观点……”

我纠正他：“是官方观点。”

如果说“主流”的话，须得全国最多人赞同的观点才是主流观点。依我看，民主才是主流。

他继续说：“好吧，是官方主流观点。现在这个《零八宪章》要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主义制度……”

“我没看出它要推翻谁。”

“你没看出来？”他很惊讶，“《零八宪章》说要实行多党制，这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它要实行三权分立，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我叹了一口气。“我对这样‘主义’那样‘主义’的不感兴趣，不想跟你争论。可能是从小被灌输了太多的‘主义’，有了点儿逆反心理，听到‘主义’这个词我就头疼。”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只有两种“主义”的国家：民主和专制。显而易见我喜欢民主。其它的免谈。

由于我经常打断他的话，皮夹克有点不满意：“你听我说完！”

“好，你请说。”

他说了一通属于官方主流观点的话，我一句也没记住。在他停顿的时候，因为无法判断他是讲完了轮到我说了，还是他仅仅要换口气接着说，我还鼓励道：“你继续说，没关系，我听着。”

他讲完了他的道理，见我明显缺乏兴趣，连反驳都懒得开口，他又说：“中国的宪法上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零八宪章》要代替宪法，要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违宪的！”

“个体的公民不可能违宪，只有国家机关才能违宪。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小昭后注：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违宪主体”的文章，忘记是不是徐友渔写的了。）

“而且，”我补充道，“《零八宪章》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仅仅是一种倡导，提出一些主张。它不是宪法。宪法的修改是有一定程序的，要经过全国人大超过 2/3 的代表同意才可以修改的。”

谁要是把《零八宪章》当成了宪法，那肯定脑子进水了，我深表同情。

皮夹克问我：“你知道《零八宪章》是谁起草的吗？”

“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们不是把晓波抓起来了吗，你们不是说是他起草的吗？”

“谁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是刘晓波起草的！”

这个就不关我的事啦。反正不是我起草的。

“你知道刘晓波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以前不知道这个人，最近两年在网上看了他很多文章，了解个大概。”

“刘晓波在“六四”的时候……”他对晓波作了一番“官方介绍”，我不记得原话，大意是说晓波当年是幕后主使之一，这些年一直和海外势力有联系，背景很复杂，像你（指我）这种单纯冲动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你是被他们利用了……

我嘟哝了几句：“没有人来利用我。是我自己要在宪章上签名的，又没人逼我。”然后我好奇地问：“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刘晓波是中国第一号敏感人物。是不是啊？”

“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很敏感的嘛，至于是第几号就不一定了。”

嗯，官方不喜欢晓波。但在民间评价系统中，晓波是条好汉！我就

欣赏这种有胆有识有担当的男人。

他们接着问：“你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吗？”

我心里想，你们都知道了，用得着问嘛。不过还是回答：“接受过。”

“什么媒体？”

“华盛顿邮报。”

“什么时候采访的？”

“1月19号。晚上。”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我没找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把邮箱放在博客上，他们看到了，就给我发邮件。”

“那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约的采访时间？”

“这个倒不是。是通过电话约的。”

“是怎么采访的？电话采访吗？”

“不是。是当面采访。”

“你为什么要接受采访呢？”

“为什么？”我睁大了眼睛，“我有接受采访的权利啊！”

公权是“法无明文规定皆不可为”，私权是“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
我可太清楚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了。再说，我从没接受过外媒的采访，人家好奇嘛。

“在哪里采访的？”

“一家饭店里，一边吃饭一边采访。”

“哪个饭店？”

“在黄河路上，具体哪家饭店我就知道了。黄河路上很多饭店的嘛，一条街都是，我跟着她们进去、跟着她们出来，没注意过饭店的名字。”

“几个人采访你的？”

“两个。”

“男的还是女的？”

“两个都是女的。”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一个中国人。另一个是美国人，不过是韩国裔的。”

记录者边听边记录，问道：“那就写‘韩裔美人’了？”我觉得“韩裔美人”这个词太滑稽了，两个人讨论了一下记录用词。最后他好像记录为“韩裔美国人”。

“那个中国人是做翻译的吧？”

“对。”

“那个美国人长得跟中国人一样吗？那你怎么知道她是美国人？”

“我本来以为她是中国，可她一开口说的是英文，我就问她的助理她是哪里人，助理说是美国人，父母都是韩国裔的。”

“是怎么采访的？录音采访吗？”

“就是当面采访呀。”

“她们问了你哪些问题？”

“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呀。就是那篇报道上写的呀。”

“你看过她们写的报道吗？”

“看过。”

“你看得懂英语？”

“哈，这还不简单？用 google 自动翻译系统，就可以勉强看了。”

我解释：“主要是看看关于我的部分有没有失实的地方。基本属实吧，有些小小的误解，但不重要，所以我也无所谓了。”

比如报道上说我最初是从信箱里看到《零八宪章》的，这就是个误解。

“不过，“我补充，”我不满意她们那个大标题，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过于严重了……”

“就是——”皮夹克拿起打印纸念道：“《一个中国草根的反抗》？”

我猜，警察看到的是万维网那个中文版，是以第三者的语气介绍华

盛顿邮报这篇报道，主要是关于我的部分。警察不知道我博客上有个全文翻译的中文版。

“对。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激烈，这个题目用在我身上有些……有些……严重……”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

还是记录者帮我想到了：“有些‘过激’了？”

“对。”我赶快点头。

华盛顿邮报的原文，大标题为《In China,a Grass-Roots Rebellion》，这 Rebellion 的意思有“叛乱、暴动、暴乱、变、谋反、意见不合、异议”，无论中文用哪个词，对我都极为不利，所以我当初翻译此文时干脆回避了大标题。但万维网和其它网站转贴时，题目被译为“一个中国草根的反抗”、“在中国，基层反抗”、“中国草根造反”等等，吓出我一身冷汗。

其实，无论人家用什么标题，我都无所谓的。可我是“In China”，这个 China 对我来说不是温暖如母亲怀抱，而是冷酷无情的铁笼子，随时可以伸出铁爪子来把我抓住撕成碎片。你们要是用太严厉的词语，伟光正先生会把帐算到我的头上，我一条小命儿又要死翘翘。

——所以我拒不认可那个大标题。

“你看，外媒是在利用你！你被人家利用了都不知道！”皮夹克抓住机会教育我。

我没觉得华盛顿邮报是在利用我。再说，他们利用我，我不也利用他们吗？他们利用我来观察中国的普通签名者，我利用他们把我的观点撒向世界。在“零八”上，中国媒体全体噤声，战战兢兢；唯一能发出声音的只有外媒。

皮夹克对采访内容特别感兴趣，问了好几次。我都回答：“就是报道上的那些呀。”过了这么久，我哪里记得？我又不是记者，没做笔记的。

“你了解华盛顿邮报吗？”

“不了解。以前从来没看过他们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是一家很大的媒体，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皮夹克特别强调这一点，仔细观察我的反应。

我无动于衷。“不知道。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媒体的名字而已。”心里想，你们修建了柏林墙把我们囚禁，不准我们看外面的世界，我哪晓得那么多啊？

（几天后，有个朋友告诉我，华盛顿邮报是著名的反华媒体，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喝茶时警察那么注意看我的反应呢。偏偏我就是被愚民愚成了白痴，压根儿就不知道哪些媒体“反华”哪些媒体“亲华”。不过，就算事先知道，对我也无影响。我不认为美国的媒体敢“反华”，因为这涉嫌种族歧视，而种族歧视在美国绝对是个敏感雷区；“反共”还差不多，这属于政治观点不同，在美国是正常的。基本上，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都不会亲近伟光正的。）

“你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采访？”皮夹克又一次问这个问题。

我睁大眼睛：“我不能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吗？”

他只好说：“你有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权利。”

OK，你承认就好。

皮夹克恳切地说：“你以后不要再接受外媒的采访了。”

我说：“我不做任何承诺。”

“什么？你还要接受外媒的采访啊？”皮夹克相当惊讶。

“我没说还要接受外媒的采访。我只是说我不做任何承诺。这个决定应该由我来做。”

本人的逆反心理比较强，最烦人家威胁我，如果威胁，肯定反弹。其实他们根本不用担心，不会再有多少外媒来采访我了。我啥也没做呀，跟别人一样，就签了个名而已，这点小破事儿，没多大新闻价值，不值得采访。

“其实，我也不希望因为《零八宪章》而出名。”我说。

他赶快赞同：“这个出名对你没有好处的！”

好处与否，见仁见智。我想的不是这个。“我觉得，要出名的话，应该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可是《零八宪章》吧，这个事情也不是我做的，这篇文件也不是我写的，它不是我自身能力的体现，所以我不

想因为它而出名。”

警察还要我答应：“以后不要继续参与《零八宪章》了。”

我回答：“谈不上参与不参与了。我所能做的就是签个名，表示我同意它的主张。我的名早就签过了，对我来说这事儿已经结束了。”

喝茶喝了两小时左右，虽谈不上“亲切”，但气氛还算和平友善。

后来他们把谈话笔录给我看，我仔细地看了两遍，改了两个词，最后签字认可。很高兴记录者把我那句“公权应该出自民授”也写上去了。

这个笔录很简单。但我想，等我走了之后，他们还会写一份对我的“鉴定报告”，就跟班主任对学生的期末鉴定一样。他们一直在观察我、忖度我，不知他们最后会怎样给我“定性”。

大家站起身来，准备离开这间屋子。皮夹克告诫我：“今天的事情，你不要说出去，也不要放到你的博客上。”

“我不做任何承诺。”

“什么？你要把今天的事情也放到博客上啊？”皮夹克瞪大了眼睛。

“我没说要放到博客上，我只是说我不做任何承诺。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做决定。我不喜欢被人家强迫着做决定。”

“你要是把今天的事情公开出去，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转头问他：“请问一下，我需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当然要负法律责任的喽！”

啐，答非所问。如果要负法律责任，首先得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拿出来衡量，我是否违了法；其次呢，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我真的不明白，才向你请教的嘛。

我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喝茶内容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别给我扣个“泄露国家机密罪”，我不认的。

09年2月21日后记

为了让关注小昭命运的朋友们放心，也为了践行我的“站在阳光下”原则，我当然会公开我的喝茶经历。这可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呀，如此有趣的经历，岂能不与朋友们分享。

我说过，我不做躲在阴沟里的小老鼠。哪怕死，我也要死在阳光下，死在众目睽睽之中！

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小昭还没死，至少目前一切平安。但未来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只要晓波一天没有恢复自由，其他几千个签名者的命运就处于“未卜”N状态。既然不幸生中国，只好以一副肉身坦然去承受。

上帝保佑我们，阿门！

晚期威权的序幕：从《七七宪章》到《零八宪章》

吴 强

2008 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零八宪章》就是这一系列偶然事件当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当前社会政治的边界、结构和性质通过这一事件展现无遗。虽然不至马上改变历史进程，但是《零八宪章》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一次单纯的联署公开信，而是一个连续的社会运动。其中进程向世人呈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可能，使我们能够认识社会结构的性质和变化，把握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空间。本着客观、中立的学术价值观，本文以结构政治视角提出一个认识威权政治下社会运动空间的框架，并在这一框架内将《零八宪章》与 32 年前的《七七宪章》运动比较，试图探寻《零八宪章》所包含的时代意义。

一、《零八宪章》是维权运动的结果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民间和知识界的公开信和联署从未停止，充满了各种主张和诉求。不同的是，1998 年是个分水岭。此前的整个 90 年代，大部分公开信以政治诉求为主，集中于对 1989 事件处理的平反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参与联署者局限在明确的政治异议人士和为数不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信的实际影响也相当有限，通常只见于海外媒体，表达市场经济时代严酷政治控制下幸存的政治异议者的微弱声音。但是 1997-1998 年，值中国政府申请加入联合国框架内最重要的经济组织 WTO 的关键阶段，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从此，人权这个概念正当地和迅速地进入中国抗争政治的核心，以具体的权利诉求为核心

的社会运动开始成形。在此后的十年里，包含具体的人权诉求、呼吁合法抗争的公开信大大增加，并借着九零年代末同期迅猛普及的互联网向社会生活的扩展，演成一场由各式公开信串接、大量分散的街头抗争云涌、各类维权组织兴起的维权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并不仅仅是为提醒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已经十年，但该公约仍未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成为有效法律——而是在证明，过去十年以来的一场新社会运动即维权运动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重塑了威权政治的形态。

具体来说，从《零八宪章》的起草与发起人、诉求和参与、传播方式和影响力、当局的镇压和反制等四个方面来看，《零八宪章》可以被理解为维权运动的一个具体产出和行动，是维权运动连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有关各方对《零八宪章》的不同态度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维权运动的性质和结构。这四个方面，分别对应维权运动的四个结构要素：

- 1) 运动活动家；
- 2) 运动框架；
- 3) 行动与网络；
- 4) 环境与反运动。

1. 《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共 303 位。这些名字经常、反复出现在历次公开信的发起人名单中，可被称作“社会运动活动家”或“社会运动企业家”。他们的职业以高校教师、记者、律师、撰稿人为主，也有其他专业人员、企业主和经营者。他们长期参与公开信以及相关的维权活动，富有企业家一般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已经转变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代言人，故称“社运活动家”。与以往的公开信不同，发起人规模通常在双位数，此番三百余位的共同发起人，基本包括了过去十年社会运动所形成的主要运动企业家。值得注意的，近年来曾受到平面媒体广泛关注的“新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南方周末 2004 年评选的“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其中有相当部分可在这一名单中找到，这些与社会运动部分

重合的公共知识分子实为“运动知识分子”(Cf. Rutten and Baud, 2004:197)。他们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运提供新的创意、担当社运共同体的意见领袖和媒体发言人。对比 20 世纪八零年代的体制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其主体，他们在受到 1989 运动失败的惊慑后 (Fewsmith, 2001: 21)，随即被九零年代的非政治化学术体制扩张所吸收，这些社运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缺乏学术背景、年纪多在 30 到 40 岁，通过参与社会运动即社运活动家的塑造，重新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堪称一代“新知识分子”。

2. 《零八宪章》选择《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周年即 2008 年 12 月 10 日前夕发布，人权是其纲领核心，代表了过去十年维权运动最重要的权利框架，即“人权宪章”。正是这一权利框架区隔开九零年代末兴起的社会运动与八零年代的民主运动。贯穿早期民主运动的诉求是抽象的民主价值和激进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这一运动框架甚至包含了儒家主义的理念，可谓激进与保守并存，反映了当时的民主理论资源贫乏，也造成动员过程中运动精英与大众的脱节，最后引致失败(Vittoz, 1993; Goldman et al., 2002;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九零年代末兴起的社会运动，则由一次次抗争行动组成，每次抗争几乎都基于具体的个案、然后主张非常具体的权利诉求。十年来，这些维权活动几乎涉及吉登斯所定义的欧洲社运的全部四个权利组成，即 T.H. 马歇尔所划分的基本人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再加上生态权利(Jary 1995)，也是两个人权公约所强制规定的人权保障的基本方面。

尽管大多数行动并未取得胜利结果，但是每一次行动都培养了行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从中发现了对权利的认同、相互间能够进行经验分享并形成网络，许多重大行动又因为组织和参与者的努力扩散到全社会，将权利意识和斗争经验也传播开去，连结起更多偶发性的抗争行动个案。这一扩散模式可以解释近年来集体抗争事件的大幅增加，规模远远超过文革结束时期更为分散的个人申诉案，后者直接催生中共在七零年代末展开“平反”工作。

更为关键的，权利诉求作为社运工作者和草根民众的重要纽带，极大拓展了社运的政治空间：一方面各类非政府组织和社运(维权)组织/网络在过去十年明显增加，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官办社会组织之外的新社会组织部门；另一方面，权利诉求的政治正当性也因权利认知的扩展而迅速增加，在局部和若干个案可与统治当局威慑性相抗衡的水平，正是如此连续的政治正当性积累最终产生《零八宪章》，并可能在宪章宣言中从人权扩展至呼吁全面的民主政治改革。

3. 在行动主义方面，诚然，公开信是最常见的抗争方式，相比几乎不可能获得批准的街头行动，以公开信方式请愿和抗议相对平和，也取得一定效果。比如，从 1998 至今，每年均有数个影响较大的公开信，其中以 2003 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封公开信影响最为深远，创造了新公共空间也主导了公共舆论，成功地引发政策与制度的改变，为维权运动埋下了一个里程碑。

在公开信的背后或者间歇，根据笔者调查，社运的行动主要表现为网络鼓动，也就是社运活动家们的主要日常工作。他们利用九零年代末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从 1998 年“思想的境界”网站开始计，利用网站、BBS、邮件组、博客群等赛博空间的多对多的交流模式，通过建站、发言等组织和讨论的方式形成了数量巨大的虚拟共同体和讨论空间。而发言本身的持续就可能如卢曼所说制造共同、差异与抗议(Luhmann, 1984:149,148,173)，事实上，通过社会活动家的密集发言和组织，一个在中国社会几乎唯一的自由讨论空间被建立起来，而对权利的诉求和社会运动样式的抗争模式也逐渐在开放的发言（发贴与跟贴）的习惯化参与行为中形成互联网的主导潮流。

这一过程中，社运活动家们直接获得网络声望然后转为意见领袖，开放的互联网舆论和认同也迅速扩散至真实社会。在任何一个发贴(发言)都可能成为一次基于互联网的表达性抗议后，公开信的生发频率就因此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草根人物也可能因此成为互联网活动家然后社运活动家或者社运知识分子。发展到 21 世纪初，这一虚拟共同体

形态逐渐演化为网下聚会，同期更为迅猛普及的手机和固话的通讯网络则加强了这些网络活动家的互相联系，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出现大量松散联系的社运组织和网络。他们当中有部分最终转为更为正规的非政府组织实体(即专业维权组织)，而随时间和历次抗争活动/事件的整合，一个社运的完整网络也初步形成。通过《零八宪章》的起草和发起过程，一个与中文作家笔会成员网络(一个社运知识分子群体)高度重合的社运中心网络发挥了关键的组织和动员作用。

简言之，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社会网络在现有威权体制内最大限度地承载了社运的动员与扩散机制，有助于权利诉求在全社会的认同以及抗争行动样式的传播和抗争的政治正当性累积，这一“网络过程就是一系列事件创造、持续并分解社会结构”(Doreian, 1997:3)，可以解释当前全国范围内普通民众如何间接地和自发地融入社运网络，产生抗争意识，导致集体抗争街头行动激增。

在这些街头行动中，既有冲击政府机关、堵塞公路和铁路、大规模静坐的传统方式，也有瓮安事件中的“冰棺”长时示威和厦门反PX“散步”的新形式。行动主义的创新能够把偶然性事件变为关键性事件，扩大未来行动空间。08年的瓮安事件就是自孙志刚事件以来社运的一个转折点，结束了县/镇层次集体抗争屡屡失败的历史。07年厦门反PX和08年初上海反磁悬浮的集体“散步”，突破了各地《游行示威条例》的限制，为大中城市市民集体抗争行动开创了一个成功的非暴力街头集体行动主义先例，改变了这些政府对市民高度控制下的发达城市内市民难以组织和行动的“弱结构”，显示了环保/生态权利诉求可以进一步加强的行动空间。但是，在县/镇以下的乡村，是目前自发性集体抗争最为频繁却分散的区域，也是警方反暴乱战术使用相对密集、更为充分的区域，还没有找到可持续的抗争行动样式，无法有效破解警方的强力战术。稍早的广东太石村反腐败和浙江东阳反污染的抗争最后都以失败结束。

4. 当局对维权运动的态度和手法渐趋成熟，体现为“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两手并用的策略。一方面，随着1998年开始建设的“金盾工程”

(公安信息化)于 2005 年完成，警方对人口流动、公共场所和互联网的监控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社会控制手段的物质条件和网络化程度等方面达到了建政以来对同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充分利用。对社运的监控可观察到两条线路，分属不同部门。一是由安全局、公安的国保保持对非政府组织和社运活动家的连续监控，公安的网监部门、基层派出所、各单位的保卫部门和居委会配合。比如中国发展简报长期被电话监听，最后被勒令停止运作。二是针对城乡大规模集体抗争行动，公安防暴、武警加强对突发事件处理的资源、训练和协调。在拉萨 3.14 事件中，成都军区快反部队(装甲步兵团)被紧急调动远程机动后到达暴乱现场，弥补当地武警警力和警械不足，显示当局高度重视对大规模抗争事件的应急处理，自《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2006)下发后，各地方反应和协调指挥能力有明显改善。

另一方面，当局对社运的态度也呈现出相当灵活性或弹性。警方虽然加紧对社运活动家和组织的监控，越来越慎于采取行动，地域的这种控制宽松差异也让社运有更多的生长空间。同时，官办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吸收社会运动的口号、理念和行动主义，比如志愿主义、市民社会、维权等。特别是共青团借鉴和发展了“志愿社会主义”模式的北京奥运会志愿组织工作。类似的，妇联组织也大力吸收自发成立的妇女维权团体，纳入统一的妇女维权网络中。值得观察的，在 09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口头表示接受独立工会的建议。《零八宪章》公布、联署行动展开后，警方已投入巨大力量调查、约谈了绝大部分签署人，但迄今为止仍对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只是采取监视居住的变相拘捕，似乎亦踌躇于是否正式逮捕并起诉。有迹象表明，胡佳案给当局带来预判之外的巨大国际压力，迫使当局在未放弃严控社运的同时，开始更多注意观察国内外的社会反应。社运的十年发展开始对威权当局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效果。

二、从《七七宪章》到《零八宪章》：晚期威权下的修宪运动

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零八宪章》是过去十年新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结果。但按宪章发起人的原意，则可追溯至 1977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从三十二年前“后极权主义”阵营内发生的这起标志性事件，《零八宪章》企图为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赋予新的象征意义。

历史本来就由无数的偶然事件构成。尽管在这些偶然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极其相似的历史情境，这种相似性并不因为时间序列上的差别而减弱，不过，没有这些插曲性事件的呈现，人们又何以知道这种历史相似性甚或表面相似而背后的巨大差异呢？从上述四维框架比较《七七宪章》和《零八宪章》，我们可以看出时隔三十多年后两者间高度的传承性以及相互微小却极有意义的差异。

1. 后极权下的《七七宪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苏联和东欧集团，常常被当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象征的摇滚乐几乎是唯一的一种公开表达抗议的方式。1976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支名为“宇宙塑料人”的迷幻乐队在组织了一次“非法”地下摇滚音乐会后，乐队成员被捕并被判处 8 到 18 个月不等的徒刑。哈维尔与一些文艺界朋友发起了一份公开信，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判决，要求当局遵守宪法第 25 条、并落实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1975 年签署赫尔辛基条约所承诺的人权保障。这封公开信最初得到了捷克知识界主流 240 位知识分子的签名，发表在 1977 年 1 月 7 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的世界报上。

这次行动完全是自发的、几乎没有组织，完全不是一个政党或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样子。宪章文本主要在布拉格的知识分子圈内传递，签名以简陋的签名卡方式附在打印的文本后面(参见旁附哈维尔的签名卡)。宪章号召党不要超越法律、落实宪法、保障赫尔辛基条约所规定的公民

社会权利、政治与公民权利，但完全没有提及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也没有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尽管如此，宪章的三位发言人随后都遭到逮捕。其中，著名的哲学教授 Jan Patocka 会见了荷兰外长之后，在被内政部警察进行的长达 11 小时的审问过程中突发脑溢血，几天后死于医院。

Patocka 教授去世前说，七七宪章不是一次政治运动，而是一个道德运动。自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就进入了一个后极权主义状态，极权主义已经开始丧失了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在这么一个如 Linz 和 Stepan(1996)所说的“冻结的”后极权主义过渡阶段，道德运动的力量超过一切极权主义的恐怖和威慑。到 1977 年的六月份，签名人数达到 700。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人民”关系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Skilling 1978: 200)。

1979 年，哈维尔在“无能者的力量”一文中写道，尽管后极权触及人民的每一步，但这都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手套。《七七宪章》的道德力量汇聚成一个与后极权主义政权意识形态白手套平行的“平行文化”，或者反抗文化。尽管宪章无意组织一个反对政党，但是宪章就像 Patocka 教授所说的，“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并“将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希望生活在真相中人们聚集在‘平行文化’的伞下”(Havel, 1984)。

在 1975 年集体签署了赫尔辛基条约之后的整个苏联、东欧集团，都因此面临来自“人道社会主义”或者“真正社会主义”的拷问。在威权的罗马尼亚和更为宽松的南斯拉夫，人们陷入更大程度的人权问题的困扰。而作为反抗象征的摇滚音乐文化则席卷东欧，在年轻人当中颠覆着意识形态的文化操纵。到 1981 年，一千万波兰人加入了团结工会。

尽管许多签名人受到调查、逮捕和关押，《七七宪章》的签名仍然持续，到八零年代中期，累计超过 1200 人签署了这份宪章。1968 年之后的坚冰被打破，公众普遍的政治冷漠被唤醒，人们开始拒绝通过政治妥协换得的经济满足和个人安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苦心经营的表面上的社会“团结”破碎了。公开的声明和签署也大大加强了每个签署人承担

政治风险的意愿。在整个七、八十年代，只有一位签署人最后撤回了签名。

《七七宪章》宣告了后极权政权从内部衰败的开始，并一直延续到1989年。那一刻，流血已无必要，和平的天鹅绒革命最终实现了“无能者的力量”。大部分《七七宪章》的发起者后来都成为新政权的精英，主导着民主转型，却因为执政能力的笨拙而未能坚持到现在。

2. 《零八宪章》与晚期威权

与32年前相比，《零八宪章》面临的环境已经大为宽松。哈维尔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中国不是1977年的捷克。在很多方面，中国都要比30年前的捷克更自由、开放。”但是，他也指出，“在对待签名者方面，逮捕和骚扰如出一辙，压过了对话和争论”。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运动在过去十年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开放度和自组织程度不仅大大超出了30年前的捷克，而且，较20年前的参照时代也有了质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和通讯的发展，不仅大大改善了宪章的传播方式、路径和影响，最新的研究显示：在最近的几年，曾经被“数据鸿沟”隔离在社运信息主流之外的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利用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等方式建立起内部的组织和运动网络，与维权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Qiu, 2009)。

这样，基于第一部分所分析的中国社运组织及其网络的成长，我们可以理解，不到三个月，《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迅速就超过了八千。与《七七宪章》的重大区别之一也在此：《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主要限于布拉格的知识分子主流，而《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中，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参与极其有限，主要签署人为维权运动活动分子和同情者，也就是新知识分子群体与社会各阶层的追随者。相比《七七宪章》发表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通民众所知，他们后来通过当局的反运动宣传而知晓，《零八宪章》在公众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已经超出威权体制的控制能力；而知识分子主流的拒绝，也表明此运动的功能不在于唤醒，而

是将过去十年累积的社运基础转化为有更清晰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诉求的宪章运动，并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今年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宪法诞生一百周年。借联合国人权宣言六十周年以及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十周年的纪念日发表《零八宪章》，其中心诉求正是要求执政党尽早行宪、全面贯彻宪法中对人权和法治的承诺，并从宪政这一具现代社会普世性的政治架构开始，吸收更多的普世价值，改革现有政治体制。这样的吁求的确难以按现有法律定罪，所颠覆的只是现行意识形态对若干基本普世价值的拒绝。换言之，通过诉诸普世的权利正当性，《零八宪章》刺透了在威权政权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白手套之间存在的鸿沟。

吊诡的是，《零八宪章》之后，中国政府在对若干发起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吴邦国、贾庆林等领导人先后亲自发表文章，重申反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模式的政改底线，试图阻击宪章运动，防止其发展为《零八宪章》前五条主张所可能产生的修宪运动；房宁等官方智库成员也针对性地撰文，批评《零八宪章》的政治企图；以吴邦国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人大常委会上的“学习、尊重、遵守宪法”的讲话为标志，反《零八宪章》运动正在成形为一场“护宪运动”。

相形之下，《七七宪章》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仅仅使用媒体发起了一场反宪章运动，包括组织了一些政府操纵的官方协会如作家联盟执委会、作曲家联盟执委会、视觉艺术联盟执委会、建筑师联盟中央委员会等等，在 1977 年 1 月 29 日发表了一份“反宪章宣言”，强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威胁。而面对这一 68 年之后最激烈的异端举动，以胡萨克为核心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似乎采取了鸵鸟政策，避免直接抨击《七七宪章》，也没有证据表明捷克政权内部曾经有人试图在宪章之后做出一些改善。媒体中的反宪章运动虽然没有公布宪章文本，却让普通人了解到了七七宪章事件的发生，扩大了公众的同情。

这样的对比可以看出，《零八宪章》指向了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本身，

其政权已难以使用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白手套来为统治的正当性脱困。当宪法议题进入这场不对称争论的焦点，也就意味着在权利诉求之后，中国威权当局再次落入了社运即民间抗争政治所设定的议程。修宪运动一直是过去十年维权运动中的一个支流，并主导了《零八宪章》的文本和目标。当局的反应则显现了维权运动的上限以及当局对维权运动本质的提防，并主动发酵将《零八宪章》向相对于“护宪运动”的反面即“修宪运动”转化。

这一态势充分表明了过去十年社运对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宪章运动已经不止是一场道德运动——以刘晓波、胡佳和王怡等为代表的社运知识分子在过去的社运实践中早已着手“道德资源的积累”，社运十年所累积的政治正当性已经为社运向修宪运动的转变提供了路径和可能。这样一种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揭开了晚期威权主义的序幕。

通过 20 余年市场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扩张，威权政权已经取得自建政以来对同期科学技术之于社会控制方面最为充分的利用，建立了貌似极权主义的、空前强大和威慑的威权体制；但是维权运动的兴起却改变了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改变了双方的合法性结构，并从《零八宪章》开始，全面质疑政权向普世标准靠拢、改善人权的决心、能力和限度。其 19 条目标实则包含了一个从权利诉求向民主诉求转换的次序，这一次序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们向政权提出了一个类似过去 20 年威权赖以存在的民生发展换取威权承认的政治交换：

如果现有威权体制无法充分保证普遍人权的改善，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威权政权已经认可的基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那么，是否应当迅速、适度地开放民主改革，满足新社会(运动)的急迫民主要求？

从世界上各类威权政权的经验来看，如果这样的改革要求以对话、合作的方式得到吸收，并通过有限的改革承认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合法性，那么，威权政权势必重新获得新的合法性基础和增量支持，公民社会得以在有限空间里得到发展和稳定，威权可能保持对公民社会的压迫与合作并存，社会运动的发展不至于威胁到威权体制本身，而威权将

继续巩固下去；反之，若失去改革空间，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将时时刻刻遭受着社会运动所支持的频发偶然性事件的挑战，日益退守，并在退守过程中强化暴力威慑从而暴露政权的脆弱性，同时，生成中的公民社会走向溃败(不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权溃败)，社会运动网络也将在高压下分崩离析，走向暴力化，出现类似 68 革命的红军派的激进组织。无论以上何种分岔，民主化的前景都不明朗，晚期威权还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Doreian, Patrick, 1997: The Dynamics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 Patrick Doreian and Frans N. Stokman (eds.): Evolution of Social Networks, Amsterdam, Gordon & Breach Publishers.

Fewsmith, Joseph, 2001: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man, Merle, and Perry, Elizabeth J. eds.), 2002: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ir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vel, Vaclav, 1984: “Six Asides about Culture”, in Jan Vladislav (ed.); Va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p.12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Jary, David, 1991: “‘Society as time-traveller’: Giddens on historical chang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nation-state in world society”. In Christopher G.A. Bryant and David Jary eds.):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pp.116-5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Linz, Juan and Stepan, Alfred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c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uhmann, Niklas, [1984] 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Jr. with Dirk Baecker, originally as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McAdam, Doug, and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iu, Jack Linchuan,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Rutten, Rosanne, and Michael Baud, 2004: Concluding Remarks: Framing Protest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Supplement, pp.197-217.

Skilling, H. Gordon, 1978: "Socialism and Human Rights, Charter 77 and the Prague Spring", in Hannelore Horn (ed.), Sozialismus in Theorie und Praxis. Festschrift für Richard Loewenthal zum 70. Geburtstag am 15. April 1978 Berlin, pp.195-216, New York, de Gruyter.

Vittoz, Stanley, 1993: Confucianism a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in China: The Beijing Uprising of 198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7 (2): 329-65.

原载：<http://www.bullogger.com/blogs/mozhixu/archives/284771.aspx>

在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重申宪政理想

——论《零八宪章》的意义

许允仁

对一个民族来说，那些它无法离弃的最重要的理念都具有“不死鸟”的特征。尽管这个民族在应对各种紧迫的现实事务时，会不断地将其摒弃或者遗忘，但是，这些理念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育”，以新的形式和途径，重新进入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

宪政理念对于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就是如此。一百年前，中华民族曾经以巨大的热情去拥抱宪政理想，为此，不惜彻底抛弃了自己传承二千年的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传统，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当中国人发现在新的体制下，难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在当时全球殖民主义的狂潮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宪政理想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又变得黯然和模糊了，人们转而信奉现代极权主义。在 20 世纪的 30 至 40 年代，富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一代“新青年”，纷纷投身于左翼的或右翼的极权主义政党，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才能在一个动荡和危险的世界中得以自保。

在共产党跟国民党的生死决战中取得胜利，并热切地用共产主义理念彻底改造中国的那些岁月里，宪政理想被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完全铲除和遗忘了。只是在酿成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之后，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反思自己以往的政治理念时，“自由”和“人权”这些概念才再次渐渐地进入中国人的话语之中。但是，“六·四”镇压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度十分热闹的宪政话语再次归于沉寂，时代精神的主流转移到了积累资本和发财致富上面。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学理上对“宪政民主”的理念进行了梳理和传播，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自由民主主义日渐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但是，近年来，在新极权主义思潮的挤压之下，宪政民主的理念又一次变得模糊与沉寂。《零八宪章》的发布，是一批中国公民，在传统的改革经过 30 年已走到尽头，中国再次面临制度变迁方向选择的重要历史时刻，冲破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重申了宪政民主主义的价值理想。

—

所谓新极权主义是最近五、六年间，在执政党内形成，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一股政治思潮。在《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一文中，笔者将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司法领域的以党代法；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对思想和舆论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而新极权主义最核心的特质就是将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权力看作是解决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法宝。

新极权主义在执政党内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所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一方面在经济上逐渐引入私人资本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虽然改变了执政党的目标，但依然维持着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专政。（即党直接垄断全部暴力工具，并且为了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使用权力时，除了受自己的心志理论的约束之外，不受任何外部的强制性规则的约束。）

对一个缺乏人权和民主传统，经济基础又相当薄弱的亚洲大国来说，这一改革从经济上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公民的部分权利也得到了承认和保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党本身的政治合法性也遭到了日益严峻的拷问：既然共产主义的理想实际上已被抛弃，那么，共产党依凭什么理由还要继续对中国社会实行专政呢？

而新极权主义则是执政党的部分新生代领袖，对这一拷问的回答。新极权主义将30年的经济成就，不是归因于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市场体制的引入，归因于个体的创造力的发挥，而是归因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对全社会的坚强统治。因此，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发的各种日趋剧烈的矛盾，新极权主义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所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是：一方面通过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在八个民主党派的内部，在私企和外企中，甚至在拾荒流浪人员里面……总之，通过在直至中国社会的每个边缘角落里都构建党组织的方式，来强化党对整个社会的无处不在的组织控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和监视，来强化党的领袖集团对全体党员和国民的精神控制。

新极权主义者告诉全体国民，社会的发展不是每个个体自由选择和独立创造的非预期合力的结果，而是遵循着某种决定论的历史规律。只有具有“先进性”的党和党的领袖，才可能洞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以总体主义的方式“统筹”社会的发展[1]。而每个国民的任务，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新极权主义者相信，只要全体党员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虔诚地接受党的领袖对其进行的思想教育，就可以保持道德上的纯洁和无私，这样党就具有了可以永远保持其不受制衡的极权权力的理由，即永远保有某种内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先进性”。全体国民只要按照党已画好的蓝图埋头施工，一个被称作“和谐社会”的“美丽新世界”将会自然而然地降临。

新极权主义者构建的这一意识形态，在被其控制的党国的所有媒体上不断重复，变成了目前党国体制下惟一具有政治正当性的霸权话语。中国社会中每一个有价值的事物的出现，都被说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被天经地义地看作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终极方法。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勇敢地冲破了新极权主义者刻意营造

的思想禁锢，表达了自己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应该朝什么方向演进的愿望。《零八宪章》通过系统地重申在人类数百年来的政治实践中，被反复证明具有普遍性的那些基本价值，以及为了捍卫这些价值所必须的制度安排，告诉我们，新极权主义者所刻意打造的那个无所不管而又不受制约的总体主义的党权，非但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法宝，反而是导致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重大的人权灾难的核心根源。

《零八宪章》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么一个明确的愿景：希望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从党国体制转变为宪政民主政体。《宪章》的十九条主张的核心内容：如用公民教育替代党化教育；军队国家化；开放党禁、报禁；公职选举；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等等，都在致力于促成这种转型。

新极权主义和《零八宪章》分别表达了目前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政治制度应该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不同愿景。新极权主义者认为，中国30年来的历程证明改革后的党国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目前这个动荡不安和危机四伏的世界上，只有通过不断强化一个帮会式的极权主义政党对整个社会无微不至的总体主义的“统筹”，才能继续保证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而《零八宪章》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的信奉者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冲突和矛盾，恰恰是由于公民们对一个建立在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前宪政国家的认同危机造成的。^[2] 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想要通过强化党对全社会的极权控制的方式来寻求稳定，无异于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只有通过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进行宪政化改造，才可能真正地塑造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将整个共和国建筑在磐石之上。

《零八宪章》刚一发布，它的一些主要的签署者就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刑拘和传唤。在笔者看来，假如《宪章》真的颠覆了什么的话，那么，它颠覆的不是现实的国家，（对政治改革的现实路径，《宪章》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是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在被新极权主义蛮横、乏味的霸权话语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中国当代思想界的屋顶上，

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人们能够呼吸到一丝新鲜的空气，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对生活在现有体制下的中国民众来说，还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二

《零八宪章》诞生伊始，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给予了它极大的关注，热烈的支持者称其是一份将会“载入史册的光辉文献”，而各式各样的反对者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批评。对这些不同的赞美和批评进行梳理，犹如观察《宪章》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和社会思潮的成见塑成的镜子中的不同影象，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零八宪章》在他人的眼里是什么？

《宪章》公布后，立刻得到余英时等海外华人知识精英的赞赏和支持，西方的一些大报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报道。而美国政府和欧盟议会对中国政府打压《宪章》签署者的抗议和批评，更使《零八宪章》的发布一下子就成为全球性的新闻事件。《宪章》在海外华人知识精英、流亡的异议人士和美、欧政府那儿获得如此迅速、热切的关注和支持，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宪章》的内容在海外知识精英看来，在学理上完全符合作为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的理念，而在一些美、欧的政治家、人权工作者和流亡的议异人士看来，这更是中国大陆的各界知识精英和公民试图摆脱极权统治的英勇的集体性努力。它就像在沉闷的中国大陆突然响起的“一声春雷”，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在受到高度赞扬的同时，《宪章》也无可避免地迎来了形形色色的反对和批评。首先值得关注的，自然是政府对《宪章》的态度，在坚守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当权者看来，《宪章》无疑是一份宣称其统治非法的“反动宣言”，甚至看作是最激进的自由派试图颠覆其统治的行动纲领，为此，政府对《宪章》的签署者加以打压，在国内所有的媒体上对其严密封锁。除了对《宪章》进行这样的“武器的批判”之外，胡锦涛在 12

月 18 日的讲话中，用“不折腾”和“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其进行了间接的回应。

新极权主义者对《零八宪章》的回应，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他们将探讨一个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才合乎正义，这样一个严肃的思想和学术问题，看作是一个如何“争夺话语权”的问题。^[3] 也就是说，新极权主义者不相信在政治领域存在着什么普遍的真理和法则，不相信有可能达成非强制的共识，而深信在这一领域中惟一可能起作用的，只能是基于暴力强制的政治权威。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屑和《宪章》的签署者们进行什么对话，而是认为对《宪章》采取的最佳应对策略就是，运用娴熟的舆论控制技术，在引起最小反弹的情况下，将其彻底消音。

不过，他们也考虑到在一个网络时代，《宪章》的主张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所以，必须作一个间接的回应来表明态度。这一回应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认为《宪章》的主张是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二是宣称这些主张（如开放党禁、报禁，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等）一旦实施，必会导致大的“折腾”；三是表明执政党绝不放弃“共产党”的名号和“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决绝态度。有意思的是，在将用“自由民主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改旗易帜称为“邪路”时，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新极权主义者身上的非理性的激情。他们事实上想表明的是：“我们对一个领导一切的总体主义政党和作为这样的政党的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的信念，是超验的和非理性的，任何人举出任何经验中的反例和采用一切理性批判的方法，都绝不可能动摇我们这一信念。”

假如说政府对《宪章》的策略主要是想通过消音的方式，将其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话，那么，社会中的极左派则对《宪章》展开了大张旗鼓的猛烈攻击。他们称《宪章》吹响了“颜色革命”的号角，并以《宪章》中有“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为由，称所有的《宪章》签署者都已犯了叛国罪。^[4]

而就在极左派指控《宪章》签署者是要彻底颠覆现存国家，犯了叛

国罪的同时，一种来自部分海外异议者的批评却相反地认为，《零八宪章》只是跪着造反，温和到了软弱、投降的地步，甚至还有一些人怀疑，所谓的《宪章》运动，只是政府幕后操控下的一场政治戏剧，它一方面是要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引蛇出洞。

还有一些评论者，虽然，对《宪章》主张的理念，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同，但是，有的认为《宪章》只是照搬了一些现存的文献，没有自己的新东西；有的认为《宪章》没有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途径；有的认为《宪章》发布的时机不对，是“早产”了；有的认为《宪章》的某些提法不够策略……总之，这些批评者认为，由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所以，虽然抽象地看，《宪章》宣扬的那些理念并不错，但是，此时此刻，《零八宪章》以这种方式发布出来，并不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现实进程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甚至还有可能产生各种负作用。

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会引发各方面的评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宪章》在短时间内激起的巨大反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一些《宪章》签署者原先的预期。他者的目光不仅仅是看这么简单，他者眼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维度。当各种政治集团和社会势力纷纷对《宪章》加以评价和“定性”时，那么，这些评价和“定性”无疑对刚刚诞生尚未定型的《宪章》运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乃至塑造作用。幼嫩的《宪章》运动能否健康地成长，乃至能否真正存活的关键在于，看它是否能够在创造性地应对种种巨大的压力和诱惑的过程中，完成对“我是什么”的自主诠释和本真表达。

三

《零八宪章》的诞生已成为全球性的新闻事件，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一定会开启一个载入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富有成果的《宪章》运动。相反，我们看到，这个婴儿在诞生时就有着一些先天的不足，而后天的

生存环境也是十分严峻和险恶的，它随时可能夭折于各种陷阱之中。[5]

众所周知，《零八宪章》的灵感，来源于捷克的《七七宪章》，因而将其和《七七宪章》加以对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零八宪章》的理解。

《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不仅仅表达了相同的诉求：对以尊重和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为目的的政治生活的追求，而且，这种诉求所针对的对象的性质：信奉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当权者，也是相似的，并且，它们同样都诞生于一个革命热情已经衰退的后极权社会之中。

然而，尽管如此，二个《宪章》不管是从文本内容，还是产生背景来看，都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从内容上看，《七七宪章》着力于指出，政府在其正式签署的国际《公约》[6]中承诺保护的基本权利，与现实生活中这些权利遭到政府自己的全面践踏之间的巨大反差，它督促政府尊重自己承诺过的东西，它的结束语是：“我们坚信，七七宪章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全体公民，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工作和生活。”《零八宪章》则在宣扬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六大价值理念后，着重阐述了19项基本主张，这些主张主要表达了签署者关于政治制度应该如何变革的愿景。

《七七宪章》将其主要笔墨用在对《公约》的条款中主张的各项权利，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遭到践踏，进行全面和仔细的描述上，对政治制度的具体构架未置一词，而《零八宪章》则将主要的篇幅用在对政治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差异呢？哈维尔先生在《中国维权人士需要支持-“零八宪章”面对国家之怒》（2008年12月19日《华尔街日报》）一文中，曾客气地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认识到和提出了更多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差异简单地理解为，《零八宪章》是在发展《七七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完整和全面的人权要求呢？

问题显然远不是如此地简单，在笔者看来，《七七宪章》将其诉求集中在最基本的权利上，即合乎正义的权力大厦得以构建的最初的地基

上，正是体现了对政治本质的深邃洞察，同时，这也使宪章运动能够得以和对每个公民的个性和尊严的捍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重温哈维尔对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描述，对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人依然是极富启发性的，哈维尔写道：“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正因为如此，《七七宪章》合乎逻辑地从一块前政治的，又是作为一切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基础的低地出发，来恢复公民对一种健康的真正有价值的政治的信心和追求。

那么，是否目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基础的部分已经恢复了健康，所以我们可以此上面放心构建各种制度性的大厦了呢？显然，这不是事实。从被称作“洗澡”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文革”……，一直到目前无处不在的新极权主义的道德说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的最根基的东西，被摧残和扭曲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人们对政治的普遍的厌恶、冷漠和不信任，不仅仅只是针对官方的政治，同样也蔓延到自称“民运”的反对派政治。可以说，我们不仅仅只是对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信心和追求的勇气，而是从根本上失去了对什么是真正健康的政治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在这样的情形下，相比《七七宪章》，《零八宪章》还不能轻言超越，真实的问题是，后者如何才能从前者那儿，学习到那种基于对政治本质的深邃洞察而产生的道德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可能使宪章运动在各种巨大的压力和误解下，依然存活下来，并且获得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话，作用于一个个个体的心灵的深处，逐渐恢复公民们对一种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本真的理解和追求的信心。[7]

另外，从对两个《宪章》的发起缘由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并非无关紧要的差异，《零八宪章》开篇即云：“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民主墙’诞生 30 周年，……”等，这在口吻上让我们想到“六四”，“六四”事件发动的缘由是：“今年是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建国 40 周年……”而《七七宪章》发起的缘由则是当时捷克政府审判了一批青年音乐家。《七七宪章》选择这一事件作为发起的缘由绝非偶然，因为审判音乐人这一事件，集中地反映出了极权权力的狂妄、僭越，和对个人权利与社会生活的粗暴践踏。

这两种不同的缘起方式，一种更多地是缘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缘起于对一些重要的政治文献的敬仰和认同，缘起于一种想要分享神圣性，想要参与历史和创造历史的激情；另一种则缘起于对权利受到伤害的公民的素朴的恻隐之心，同时，也在这种援救中保卫着自身的权利。我们看到，前者的行为中更多地关切的是政治的象征意义，而后者的行为则更深深地植根于政治之为政治的最本源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追求宪政理想的行为，只有深深地植根于政治的本真的价值，而不仅仅只是其象征性价值，宪章运动只有表达出中国公民们本真的政治需要，而不仅仅让人觉得只是对外来的观念的简单模仿，才可能真正地获得自己的生命力。

四

和《零八宪章》刚一发布就全球瞩目相比，《七七宪章》则是在坚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受到外界的关注。从签署者的人数来看，《七七宪章》最初是 200 多人，最终也只有 1000 多人。但是，《七七宪章》却不仅仅在捷克社会，乃至在当时整个东欧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都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存在，围绕着宪章运动，人们构建起了和官方的“党文化”相平行的第二种文化。而就《零八宪章》来说，它对国内一般民众的精神影响力目前还是微弱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还有许多背景性的因素。对当时的捷克和整个东欧来说，共产主义制度是通过坦克从外部强加的，因此，异议者的精神感召力不仅仅来源于为了捍卫个人自由对极权主义的反抗，而且，来源于为了捍卫民族的独立而对异族入侵者的反抗。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对捷克来说是本土性的，而极权制度是外族人强加的。《零八宪章》面临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则刚好相反，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中国人在长期内战中自我选择的，是大批的左翼青年英勇牺牲，浴血奋战的结果，而个人自由和权利观念则是从外部学习而获得的。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某种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不仅仅和《七七宪章》时期的捷克和东欧相比，而且和清末以及 1980 年代的中国社会相比，目前提出宪政理想，和当时也有着相当不同的现实背景，在清末宪政理想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是因为将宪政和强国联系在一起，康有为向光绪上书时，举俄国与日本为例，要他学习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变法立宪被看作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在 19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被自身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所震撼，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中，同时也包含着对富裕生活的期盼，人们设想只要引入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我们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富裕。

然而，现在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情势之下，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从清末民初立宪的失败到现代极权主义崛起的中国现代政治史似乎向我们昭示了这么一个真理：纯粹从“救亡图存”的目的来看，极权主义比宪政民主主义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8]；而 1978 以来，特别是 1992 年以来的经济政治实践则似乎又证明了，一党专政下的市场体制，可以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事实上，近 30 年来，中国取得的 GDP 年均 9.7% 的增长速度，不仅仅在 20 多个前计划经济的转轨国家中是最快的，而且和同时期所有采取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最快的，这一事实使得认为只有引入宪政民主制度才会使经济高速增长的看法，被动摇了；特别是在最近发源于美国和欧洲的全球金

金融危机中，中国现有的半开放的金融制度似乎表现出了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整个经济体也显示出了相当强的增长能力。

因此，所有《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和支持者，所有想在当下的政治情势下，再次重申宪政理想的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次和清末和1980年代完全不同，宪政理想不可能再借助民族主义和人们渴望摆脱贫困、寻求富裕这些最易被激发起来的激情，轻易地获得一呼百应的力量。

但是，这对宪政理念的真正实现来说，又绝不是坏事。目前的政治情势，恰恰有利于将宪政的本真价值和长期以来与宪政的价值混淆在一起的富国强兵等价值明晰地分离开来。长久以来，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个人主义的传统，因此，宪政理念的倡导者，往往用宪政可以强国，宪政可以致富等口号来推销宪政，这虽然常常可以在一时间使宪政理想作为某种象征性的价值，受到人们的狂热信奉和追捧，但是，当人们一旦冷静下来，发现宪政中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自己通过想象所附加的象征性价值，一旦发现可以找到更快捷的方式来实现强国、富裕的目标，发现宪政的实施在一定的阶段和条件下，甚至还可能不利于强国、致富这些价值的快速实现，这时，人们对宪政的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就会自认为已经超越宪政找到了更高的政治真理。^[9]这也正是百年来宪政理想几度被中国人抛弃的原因之所在。

在目前的语境下，所有的宪章运动的支持者，都必须坦诚地面对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按照新极权主义的原则构建起来的党国体制有着强大的动员社会资源快速应对危机的能力，以及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新极权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好？而学习分权制衡和民主选举，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冒管治秩序失范和经济衰退的风险，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勇敢和坚定不移地学习宪政？

极权主义的罪恶在于，它毁灭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价值，毁灭了每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当新极权主义者将一个无处不在的党组织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法宝，用党的指令替代法律，替代各个文化领域的自由创造。让亿万人民机械地去重复那些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党八股时，

它彻底摧毁了每个个体的个性成长所必须依赖的奠基性的价值。

当个人的尊严和个性得以维系的奠基性价值被摧毁之后，这时，他即便获得财富，获得权力，都无助于他人格的成长，对他来说，生存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极权体制或威权体制下哪怕取得再快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证明这种体制的正当性，相反，当人们获得了部分的经济自由和更多的物质资源之后，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的呼声也必然会变得更加强烈。而推行政治体制的宪政化改革，虽然可能面临某些风险，但是，只有按照宪政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构建起来的政治体制，才可能提供一种使每个个体的个性得以健康生长的制度环境，因此，它是每个公民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所不得不克服一切困难去加以追求的一种基本制度。而且，长久地看，也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可能最终促成一个社会的长期繁荣和高度发达。^[10]

所以，在没有其他价值可以依傍的情况下，宪章运动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要想彰显宪政的本真价值，就必须首先发展成为一场深刻的精神运动和文化运动，让每个公民在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个性和尊严受极权制度的磨损和伤害过程中，领会到对宪政制度的本真的需要。当大部分公民真正地认知到宪政的本真价值，（而不仅仅只是在宪政的口号下，激动地表达各种非理性的个人化诉求），并且为了追求这种价值，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时，政治体制的宪政化改革将会水到渠成地来临。

五

宪章运动目前面临着众多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政府的打压；还来自于各方面的精英和大众出于恐惧和它刻意保持的距离；来自于由于忌妒和误解而对它进行的种种抹黑。政府的封杀使宪章的影响在国内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而缺乏公共的交流平台使宪章运动难以通过公开的和理性的讨论发展自己，这同时也使得各种误解变得更为

严重。

然而，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宪章运动的真正的危险还不在于这些外部的压力，（这些压力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运动，比如《七七宪章》运动，都必然会面临的），而在于这一运动本身是否真正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在前面，我们曾分析过，由于宪章运动本身还如此弱小，同时，又身处在各种影响巨大的政治力量之间，它随时可能由于缺乏足够丰富的内在精神力量，而“沉沦”于各种强大的他者的目光之下。

宪章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陷阱中，首先就是被政府的目光所塑造和对象化。当政府将其定性为试图颠覆国家的“反动力量”时，由于政府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这一定性不仅仅影响着旁观者对宪章运动的看法，甚至也可能会影响宪章运动的参与者对自身的看法，即将自己定义为现行权力的反叛者。这样宪章运动就有可能不是将其核心精力用在建设性地去揭示一种政治生活中更高的可能性上，而是用在和现行权力捣蛋上。这时，宪章运动的参与者会不断地故意做出一些挑战现行权力的行为，来引发权力的打压和迫害，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引起他者的关注和同情，同时，损耗执政者的道德资源。

确实，在新极权主义的政治氛围下，表达宪政理想，首先需要一种不怕权力打压的勇气，但是，真正可能赋予宪章运动以价值的是，它必须具有这么一种精神力量，即不为打压所动，始终保持自己在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建设性。西方人有一句谚语叫做：“反叛也是一种模仿。”希望通过自己的被迫害来损耗对方的道德资源的做法本质上是卑贱的，按照传统儒学的理念，真正高贵的做法是，既成就自己又成就他人。有权者与无权者，权力的主体与权力的客体是一个铜板的二面，宪政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生成，需要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共同的成长。因此，一个真正对宪政文明的生成抱有责任心的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逆转自己所抱有的和权力一起成长的期许。

和中国政府一样强大的，还有由美欧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媒体所构成的西方舆论的目光。宪章运动可能面临的另一个危险就是“沉

论"于这种目光之下，完全被这种目光所塑造和对象化。这种西方舆论的目光，有自己的看待中国问题的模式，它需要故事，需要戏剧性的事件和人物，需要英雄。宪章运动的一个可能的危险就是完全按照这种舆论的目光来进行自我塑造，结果使得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很容易被这种外部舆论的目光所关注和报道，但是却缺乏和国内的公民产生广泛的精神共鸣的能力。

极左派将发布和签署宪章称之为卖国行为，无疑是一种不着边际的诬陷和抹黑。宪章运动面临的真实危险是可能陷入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后殖民语境之中。仔细想想，踏入这一陷阱的危险是很大的。宪章运动由于和国内政府处在某种紧张状态之中，因此，就很希望通过国外舆论的支持来增加自己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权利观念和宪政理念对中国文化来说不是本土性的，而是从外部习得的，再加上政府对言论的钳制，使得就宪政理念和一般公民进行对话变得十分困难。

这一切都有可能使得宪章运动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的核心精力用在如何面对理解它和支持它的国外舆论上，而不是用在难以展开的和国内公民之间艰辛的精神对话上。宪章运动还可能面临的陷阱就是，某些宪章的签署者急于鼓动更多的人参与宪章的签署，便试图给尚未签署的人施加某种道德上的压力。这只能使大多数公民和宪章签署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大，使宪章运动变得更为孤立。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假如宪章运动最后在国内大多数公民的观感中，只被看作是一小部分异议者，为了追求西方的人权奖项（比如诺贝尔和平奖）而作出的政治行为艺术的话，那么，宪章运动可以说就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

不管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运动，由起草者和签署者们所发起的这场宪章运动究竟会有怎样的走向，《零八宪章》通过自己的文本，向全体中国公民提出了这么一个长期以来，被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所遮蔽的真实问题：为了每一个公民的个性与尊严，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宪政民主化改革，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无法逃避的。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币的升值，使 2008 年中国人均 GDP 已

达到 3000 美元以上，随着基本物质需要的逐渐满足，中国人对于人性的尊严和政治权利的需要将变得愈益敏感和迫切，《零八宪章》的出现，正是这一趋势的一种反映。我们认为，在中国即将来临时的时代里，政治问题将变为时代精神所关注的首要问题，《零八宪章》正是对这一时代的到来的召唤。

《零八宪章》文本中所宣扬的宪政民主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精神领域的核心矛盾之所在，这一冲突的结果，将决定着中国的制度变迁究竟是朝着法治和宪政的方向，还是进一步强化党国体制的方向发展；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究竟是将其基本秩序建立在一套基于法理的强制性规则之上，还是建立在一个总体主义政党不受任何外部规则约束的“统筹”性权力之上；这一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将决定着每一个中国人的个性和尊严能否得以保全，从而影响着个人的人格发展的方向。

就如我们在本文开篇就言及的那样，百年来，宪政理念对中华民族来说，就像“不死鸟”一样，不断地“死而复育”，所以，我们相信不管《零八宪章》作为现实的政治运动的命运究竟怎样，它所提倡的宪政理想终究会在社会中找到实现自己的恰当的道路。这也就是《零八宪章》的最大的意义之所在。

本文初稿完成于 2009 年 1 月

2009 年 2 月 28 日修改定稿

注释：

[1] 有意思的是，新极权主义者不相信在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中存在着永恒的法理，认为党可以根据自己事业的需要，不受任何规则约束地使用暴力，却坚信丰富复杂的社会的变动中，存在着某种总体主义的规律。

相信历史决定论，相信社会的发展必须由一个权力中心来统一计划，是一

切类型的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而相信自己已掌握了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因此，必须由党的领袖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总体主义的"统筹"的新极权主义者，为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提供了一个愚妄和可笑得近乎荒诞的最新版本。

[2] 杨佳事件后的社会舆论说明，部分公民对这个国家的不认同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3] 中宣部长刘云山近日在《求是》2009年第1期上撰文称："新闻舆论的竞争说到底是话语权的争夺"，要求党的舆论工作者"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4] 将"联邦制"看作是分裂国家的人，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学常识。美国就是联邦制国家，美国的五十个州哪有分裂出去的危险？！联邦制只是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通过宪法加以明确的区分罢了，只要国防、外交的权限在中央政府手中，就不会导致分裂。更何况《宪章》是在考虑如何解决两岸问题时，提出联邦制构想的。它非但不是要分裂国家，反而是在寻求在更大的地域内和更坚固的法理基础上统一国家的有效制度。

极左派对《宪章》签署者的一片"卖国"、"走狗"、"洋奴"的攻击，代表了一种相当恶劣的论战方法，他们在鼓励，甚至逼迫政府对自己的论敌进行人身迫害，这不仅增加了《宪章》签署者的处境的危险性，同时，也使整个中国思想和舆论界的氛围严重劣化。

认为《宪章》的要害问题是主张"联邦制"的说法，也可能是党内主张对《宪章》运动进行严厉镇压的新极权主义者故意放出来的舆论。谁都知道，《宪章》的真正要害在于，在理论上否定了一党专政。但是，新极权主义者知道，假如以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要求分权制衡和民主选举的名义，对《宪章》运动进行镇压，必然导致民众的巨大的反弹，而以分裂国家的罪名对其进行打压，则比较容易消除民众对被迫害者的同情。于是，就不顾常识，牵强附会地硬将联邦制和分裂国家、叛国联系在了一起。

[5] 在一个婴儿刚刚满月的时候，就去探究它有哪些可能的死法，和各种恭贺和赞美的声音相比，可能显得太过唐突，但这或许更有助于它的存活和生长。

[6] 《公约》在此文中指捷克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7] 根据王阳明知行合一和知难行易的学说，一种对什么是健康的政治的本真的理解，必然会召唤出追求它的行动意志；反之，一种勇气和行动意志假如不是基于平等保护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的纯正的道德意志，就无法产生疗救性的精神感召力。一种勇敢的政治行为的产生可以基于许多不同的内在动因：它可以基于对一种压迫性权力的愤怒和仇恨；也可以基于控制他人的权力欲；或者吸引他人注意的表现欲和成名欲；也可能像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源于为自己主观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献身的热情；它甚至可以源于无价值感或绝望感。基于这些动因的政治行为，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宪政框架的政治共同体中，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变为建设性行为。但是，一种前宪政的环境，则对一种政治行为能否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有着高得多的道德要求。只有一种源于对公民的个性的健康生长所需的制度环境，有着真实关切的纯正的道德意志的政治行为，才会具有一种为宪政建设奠基的作用，而其他的政治行为，在前宪政的环境下，往往只能加剧纷争、动荡或专制。

[8]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现代极权主义政党，表现出了比以往的任何政治势力更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战斗力。而共产党由于极权程度更高，所以在国共决战中显示出了更高战斗力。所以，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现实，彻底颠覆了康有为的立宪能够强国的判断，而确立了越极权越有力量的政治共识。我们看到，孙中山的改组国民党，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模式将国民党极权化，而蒋介石也多次表达了对共产党组织高度极权化的羡慕。

[9] 民国初年，中国学习西方式的议会政治，无法快速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秩序，结果，经由国民党到共产党，通过建立严密的总动员式的党国体制，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在殖民主义的政治情势下，从事总体战的战斗力。由于“强国”的目的达到了，中国人就自以为找到了超越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真理：共产主义。近 30 年，中国在现有的一党专政的市场体制下，取得了比其它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于是，一部分新极权主义者就认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比宪政民主制度更为优越。

[10] 从经济史上看，虽然有过许多采取极权体制（如 1930 年代的苏联和德国）和威权体制（如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的国家和地区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先例：一个国家不采取宪政民主制度，而能成为人均 20000 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

* 原载 <http://www.donews.us/show/350.html>

紧张的对峙和躁动的期待

蒋宣文

从年初的雪灾到“5.12”大地震，2008年频发的天灾一次次把人的生命置于天地间孤立与脆弱乃至绝望的状态。由于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所具备的同步效应和现场效应，让所有人都以极为直观的方式面对了这一切，当人们亲眼目睹同类的生命在绝境中消亡和他们的家园在霎那间崩溃，人性中本能的悲悯之情也被一次次地激发了出来，并以最快的速度弥漫成举国性的哀伤。

2008年是国家计划中的盛典之年，用来向世界显示国力昌盛的奥运会和夸耀执政党业绩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都已精心预备呼之欲出，华丽的抒情和足够丰富的赞美也早已酝酿成熟亟待张扬。国家需要盛典来鼓舞人心，需要营造盛世的繁华来掩盖社会矛盾的积累，公众也需要盛典来获得刺激和安慰，需要在大国崛起的幻象中完成与世界文明的同构。然而，突如其来的大雪却无情地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大雪中依然只有回家一条路可走的农民，他们艰难的挪动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以牺牲社会公平换来的；地震时最先垮塌的大多是校舍而最不容易倒掉的往往是政府大楼，幼小的生命显然葬送于无耻的贪腐；雪灾发生时还饱受诟病的国家应急机制，在短短几个月后却能做到迅速集结，而同样应该成长起来的民间自发的救助体系却始终受制于种种局限，则再一次表明集权体制容不下任何形式的公民自主行为。

由于我们的国家有一个最喜欢把坏事变好事的政府，这个政府也最善于在民众中间调动同仇敌忾的情绪，因此灾后的废墟很快就变成了“多难兴邦”的政治图腾，哀悼同类死亡的悲情也在“雄起”的嘶吼声中完

成了最后的渲泄。天灾的本质是大自然的一次意外，后果是让无辜的生灵经历一场生与死的劫难，由于生命的价值只能以个数来体现，所以天灾所危及的也只能是个体意义上的每一个个人，而谈不上是对一个民族的挑战，更无关于国家的尊严和前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原本属于自然界的无意之恶中故意引入“多难兴邦”的政治阐述和政治鼓动，其效果就是成功地回避了国人对天灾中相伴生的各种人为罪责的追究，“雄起”之声既喊出了人不屈从于大自然的自尊和自傲，还同样可以被解读为某一个族群籍此向外界的示威。

2008年，中国政府成功的利用天灾调动了民族主义狂潮，转移了国民对改革三十年后种种现实困境的关注，也再一次引导公众把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指责视为恐惧中国崛起的敌意。然而，雪灾和地震尚属不可防范的天灾，“毒奶”和矿难却明显是因制度而衍生的人祸，难辞其咎的当局便只有依靠专制的高压来严防真相的暴露。

于是，2008年突发的天灾和因天灾而裸露在苍穹之下的累累尸骨，丝毫未损这个国家对盛典的期待和渴求狂欢的欲望，因人祸而导致的死亡与伤害则被“封口”被屏蔽被消失，更莫提“问责”二字。在一个只愿意彰显国家形象而轻视个人存在的国度，国家的盛典显然不会因为有太多的死亡而减色，唯独能令某些人感到不快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华美庄严的盛典竟然始于火炬传递途中引发的抗议浪潮，自恃泱泱大国以为普天之下都会与己同庆的愿望顿时沦为笑柄，几近于围剿的追逐把官方设想的狂欢变成了一场紧张的对峙。

紧张的对峙，贯穿了2008年的始终。在天灾与人祸相交的背景下，国家的盛典与狂欢竭尽奢华；在大肆张扬三十年改革辉煌成就的礼赞声中，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缺陷和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日益增加着社会动荡的因素；在堂皇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下，却总是有一些人民在艰难而又绝望的上访，总有一些冤情不是得到了声张反而还在不断加剧。如果说天灾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对峙，那么一系列同样带有灾难性质的人为形成的冲突，则凸显了党权与人权、官意与民

意的对峙。

从瓮安到孟连再到陇南，甚至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从一个人单身杀警到数以万计人的群起围攻，民间抗暴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意味着在制度性压制下被压制者对这个制度的反抗已经趋于普遍和激烈。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肆无忌惮的官权欺民，无疑都是直接引发矛盾的根源，而以溅血的暴力来收场，最终又往往会成为官民对峙惯有的结局，和谐社会的谎言因此不攻自破。无论一个人的杀戮还是上万人的群体抗争，几乎无一不是因为绝望于依靠官方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才会使“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原始正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仿效，这无异于是给了这个自我标榜的法治社会一个最残酷的讽刺。

而紧张的对峙之所以成为一种常态，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官方的恃强凌弱逼出了民众的以暴易暴，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民间长期坚持的理性呼吁始终未能获得官方善意的响应，甚至还会常常招致更加严厉的整肃和更加强势的压制，其结果却证明了越在重压之下出现的反弹越会呈现出强劲的爆发之势。

中国的 2008 年，就是以这样一种充满矛盾、并且总是用最极端的方式来呈现矛盾的特征进入了人类的编年史。紧随其后的 2009 年则在刚刚开始之际，便已经有了两大悬疑，其一是经济的衰退是否会更加激发对制度的反思，其二是制度性的变革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的诚意，而这两大悬疑也就注定了 2009 年中必然会充满躁动的期待。

今天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中国经济，无法再有独善其身的侥幸，以投资拉动和外贸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也再难维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与 2009 年结伴同行的持续低迷的股市、陷于僵滞的楼市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在贬损财富的价值，更在挫伤民众对未来预期的信心，以致无论出台多少利好政策，也迄今未见市场的复苏，而这一切又都在预示着远比经济危机更令当局难堪的政治危机正在临近。

假如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当局还可以通过炫耀高速增长的GDP来转移民众的不满和缓解社会的焦虑，那么与经济衰退相伴生的民生困境，则必定会引领民众逼问制度困境的由来和催生制度变革的共识。2008年底公布的《零八宪章》，显然就是一份集合了多种人群共识的文本。遗憾的是，随着当局拘捕《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宪章》签署人进行施压，民间寻求制度变革的尝试再次遭到蛮横的拒绝，当局传递出的信号明显的就是仍将继续固守现行的体制。

可以预见的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争取仍然会主导2009年的官民冲突，经过三十年改革而越来越无法回避的体制性障碍，其本身就证明缺乏政治制度保障的经济改革难以造就全民共有之福，因此权益之争的实质还是在于对体制的固守和对体制变革的期待。而问题则在于，如果体制的变革是早晚之必然，那么这一变革的起始究竟是靠什么力量来推动？如果说《零八宪章》的发布是促进公民自觉表达的一次契机，那么在2009年的诸多期待中，官方与民间对其各自会有怎样进一步的反应，无疑又是最值得期待的。

2008年12月30日初稿

2009年1月5日定稿写于上海

<http://chinainperspective.net/ArtShow.aspx?AID=304>

第五卷

《零八宪章》的争论与前景

后极权中国的转型选择与刘晓波的坚守意义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彭小凯

一

刘晓波博士此次因《零八宪章》的签署被拘，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似乎并没有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因为他早已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正因如此，他和他妻子的坦然面对，才更令人肃然起敬。

但我没想到的是，此次的拘捕从头到尾采取的竟是黑社会化的方式，先是秘而不宣，后是人间蒸发。这既暴露出当局在正义、公理上的日渐虚弱，也显示出刘晓波作为“中国异见人士”中一个标志性符号的分量之重。因为当局不得不掂量公开拘捕他所带来的国家面子和政治形象。

刘晓波作为一个注定会在中国后极权时代非暴力抗争史上留下一笔的民间道义领袖，至少可向世界证明，中国在八九“64”之后长达 20 年的歌舞升平年代，民间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依然留存着一束燃烧不息的顽强火种……

中共当局这次以这种极其秘密的拘捕方式把刘晓波悄悄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说明现在的中共统治集团在处理异见分子的方式上多少还是有了一点点改进，不敢轻易动粗或想判就判了。尽管这是为避免国际影响下的被动举措。当局在今年这个非常敏感的年头把刘晓波深藏起来，也许是基于这种看似精明的算计：他们以

为把这样重量级的"动乱因素"给管制起来，国内今年就没多大事了。其实可能恰恰事与愿违：刘晓波的被拘，反而使当年那场"动乱"的亲历者强化了许多挥之不去的悲愤记忆。随着"64"20周年纪念日的日益迫近，为刘晓波呼吁的正义之声必将由外而内此起彼伏并日益高涨。如果当局愚蠢到要把对刘晓波的打压持续下去，那么，中国式的哈维尔或索尔仁尼琴就必将被中共自己给生生逼将出国际舞台。到那时，中共当局也许会后悔不已他们现在对刘晓波所做的一切。

刘晓波这么多年来的和平理性抗争，总使我不期然地联想到达赖喇嘛的诉求，当然他们两人在许多背景上不能类比，但在非暴力、不合作、坚持和平理性抗争的主张上却有着相当一致的共通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刘晓波这20年来一直坚守国内，矢志不渝的抗争以及对时局极具前瞻的分析和批评，不但影响了八九一代人，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不少与89“六四”情结不深的年轻人。这也许是刘晓波在大陆这种恶劣政治空间中坚守至今的最大意义吧。

二

通过刚刚结束的北京"两会"的"重要讲话"，细心的人都不难窥见到因《零八宪章》所产生的冲击波效应。贾庆林、吴邦国等政治局要人通过"两会"特意强调"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这实际上就是对《零八宪章》的隐晦回应。这与前不久胡锦涛发誓"不折腾"的口号一样，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公开呼应。一言以概之，胡的"不折腾"就是他在政治改革上不愿有所作为的任期目标。胡某人不仅不想对内有所作为，而且对外也不愿作出应有的折腾。最近东海、南海那边的一些小国不断试图在我祖先海疆上折腾中国一下，胡都一概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实际反应。任你洪水滔天，我自岿然不动。应该客观地说，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上，大独裁者毛泽东在这方面都不至于像胡温如此窝囊可欺。而现在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胡大人，还能有多少理由自圆其说呢？此议姑且不论。

中国的民主化之路为何如此难行？当局通过高压手段乃至暴力镇压使国家处于恐怖稳定状态，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海内外反对阵营自身各自为阵，山头林立，猜忌成风，文人相轻等自乱阵脚也难辞其咎。只要随意打开一个异议阵营云集的论坛就会看到，哪个论坛上没有醉心于人身攻击，叫骂之声不绝于耳的场面？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尚且不必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成功匆忙作出过于乐观的预测。

而且近年来，在中国某些异见人士的眼中，对国际上施与中共政府的压力有过于依赖的倾向。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统治者换了好几代，然而在应对国际压力面前，一代似乎更比一代“牛”。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内地民众的体制认同是民主转型中一种潜在的阻力。不可否认，这30年的单一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的确让普通老百姓在内的绝大多数城乡人口都尝到了程度不同的甜头。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老百姓在生活质素上的普遍改善，当然为共产党继续推行一党执政提供了唯一的信心支撑。因此，包括平民在内的体制认同自然就成为转型之路上的天然阻力。诚然，我们在否定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它在某些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于百姓获利的好事。尽管它在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但是，当局因经济改革上的得分而增添了对付不同声音的底气。如果他们认为你是一块啃不烂的石头，就会有意识地把你驱逐出自己的家国。他们知道，一旦你远离家园文化的根基和社会资源，其作用和影响力往往就会随之消弭于无形。正因如此，刘晓波早几年就在北京警方的多次苦劝和动员之下，仍然不为所动，坚守国内。事实上，有许多去国经年的民运斗士们，除了一开始的短暂新闻效应之后，许多便慢慢消失在公共领域的注意力之外了。

三

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最可能出现的先兆很可能将会以对“64”的重

新评价为标志性的起点，但其前提是，必须在李鹏等屠夫全死光之后才有可能。在他们那一帮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仍位居要津的前提下，这种希望几无可能。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基于以下的判断：一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不可能没有来自共产党阵营本身包括“既得利益阶层”的良知力量推动；二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无一例外地掌握在“我党”手中；三是共产党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成功地俘获了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在内的中间民众；四是中国民众的大多数的确不希望社会出现失序的动乱。这也是共产党迎合老百姓心态的精明算计之一。

但无论如何，民主已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必然由一党独大演变为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体制。这是中国未来政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经历怎么曲折怎么艰难的发展途径，中国始终都会走向民主之路。这一点，连中共体制内如赵紫阳等清醒之人也早已有所觉察。那种至今仍在公然发出“中国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的叫嚣者，只不过是中共特权阶层的末日狂犬罢了。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这个概念，有必要厘清一下它的宽泛涵义。“既得利益阶层”与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并不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所谓“既得利益阶层”，往往被狭义地、错误地理解为也是共产党的统治官僚阶层。实际上，如果把“既得利益阶层”比喻为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包括许多普通市民在内的老百姓，其实也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这棵树上的枝丫或末梢部分，他们或多或少也与“既得利益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中间很难有一个明晰的交界线。正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在操作上的举步维艰。

那种一味幻想由下至上另起炉灶如陈胜、吴广似地揭竿而起，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的设想，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理想。在如今中共的暴力机器如此强大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果谁愿意深入底层、用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亲身接触一下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安心躲在自设的民主理论象牙塔里构筑理想王国的话，你就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快改变那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

中国的民主化不可能排除与共产党体制内良心力量的良性互动和耐心推动。因为中共体制内部并非像外界常常误判的那样是铁板一块。何况现在海内外自由派民主人士也开始“困厄与尴尬”地看到，他们所主张启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才能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有的事实上正被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一点点地加以解决，或正在准备解决，如官员的贪腐败问题，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拆迁以及下岗再就业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排除，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仍然有赖于体制内外的共同推动。

刘晓波由于长期根植于国内的人文和民间土壤，他当然明白现在中共专制力量与民间自由主义相互博弈时的此消彼长。他看到民间的自由基因在日益觉醒，同时也看到统治集团原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已彻底淡化。中共这个最大的执政党实际上现已经整体堕落为富豪权贵利益党，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党员来说，并非全部一团漆黑，党员普遍已沦为实用主义者倒是不争的事实。而知识分子群体早已演变为沉默的大多数。那么这大多数为什么宁愿保持沉默？其一是因为明哲保身，其二是因为恐惧如影随形，其三实际利益的驱使。从民间生态到执政当局，双方都在悄然变化之中。而在这种变化中能随时敏锐捕捉到皇城根下政情脉动的刘晓波，自然明白在中国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如果想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达成民主化，无异于海市蜃楼般的空想。不仅如此，任何激进极端的高调对抗方式，势必都会失去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由此，他在许多场合下都力主中国应该避免历代政体“以暴易暴”的血腥循环。

四

近年来，底层民间的维权力量正在日益觉醒，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放大维权力量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的局限作用。必须看到，在许多欠发达地区包括落后农村所发生的维权活动，并不都是以推翻共产党领

导为直接目标的诉求。许多维权事件仅仅止于“在政府的主导下”谋求单一事件的相对公平解决。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贵州“6.28”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虽然规模不小，但中共当局也只是采取对自己的爪牙与老百姓各打 50 大棒的手段，由此便使动乱因素迅速消泯于萌芽的状态之中。

在中国这种后极权主义时代，有时专制统治者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通过整个官僚体系来推行自己那些维护统治合法性目标和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适当抑止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膨胀趋势，以维护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不遗余力地维持自己一党之私的长远“稳定”。

在复杂多变的恶劣政治环境之下，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仍然需要我们每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富有耐心地做些启蒙推动的善小之事，需要我们传承刘晓波的坚守精神，前仆后继，勇毅地跋涉……

转眼又是“六四”，而且这是一个由不同政治意义的符号交缠较劲的纪念之年。今年，注定将不同寻常。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当局正倾注全力力保虚假无比的“政治稳定”，而反对派也将持续发出不愿忘却的声音。在这一场公开和秘密的生死博弈中，“我党”耗费的是国家的公共资源，而民间付出的将是泪水和勇气。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3/20090326084046.shtml>

关于《零八宪章》的忧思

萧 潺

1. 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传唤了推动此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祖桦先生，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起草人也好，其他签名者也罢，都没有用任何不正当手段去做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只是呼吁现政权下定决心进行宪政改革，与颠覆国家政权完全不沾边。

2. 为此，我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归还从刘、张两位先生家里抄走的物品，并且借此机会广开言路，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共商国事的讨论中来。

3. 《零八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宏观愿景，相对于以前的任何一份重要倡议书，它都显示出更为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是事关未来中国大局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此谨向倡议者、执笔人以及每一位参与签名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4. 《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5.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联署签名《零八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既然是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

6. 可以想见，居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包括我在内，都会赞成《零八宪章》的理念和所有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

7. 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

8. 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9.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这次宪政转型，只是在辛亥革命基础上实现共和国理想的最后努力，从中华民国到中共建政，这只是未完成或者说被强行改变了航道的辛亥革命的继续，而现在我们要将这被改变的航道改回到它该驶向的方向。

10. 辛亥革命的主要国父是两位，一位是孙中山，还有一位是袁世凯，以前人们总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剥夺他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之一的身份，这是一种道德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公允之论。如果没有孙袁双方互有妥协的谈判及其成功，请告诉我中华民国自何而来？就靠南方革命党的国库里那几块钱，能打赢政府军？即使筹集到银两巨万，革命党打赢了这场战争，那又得死多少人？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孙袁两位为基本和平的宪政破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不得而死，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 1911 年，他是新国家的创立者之一。

11. 中国未来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无论名义上，还是具体措施的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其措施如果全部实行，那么共产党必然就成为了中国全体国民的敌人（虽然宪章本无此意）。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

12. 极权政治存在的一大基础就是它需要敌人，无时无刻地需要敌人，而目前这份宪章的具体建议等于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敌人，这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削弱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而是暂时地增强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虽然从长远看当然是削弱他们力量的。

13. 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是一种仁者无敌——仁爱者没有敌人——的政治，政治就是事关公共生活，于内政是增进全体国民共同利益，于外交则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制度以及治理方法。

14. 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么？

15. 凭三条，第一条，再这样治理下去，共产党统治会导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会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处在绝对对立的死胡同里；第二条，只有结束这样的治理方式才能挽救中国、挽救中国共产党；第三条，结束这一过程，需要给共产党及其重要成员一些基本承诺。

16. 清帝退位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对清王室的连哄带吓，第二个原因是民国政府给出的《优待清室条例》——和平新建政权是要代价的。

17. 过了将近一百年，中国人的政治眼光应该高于清末，而不是连清末都不如，但这份《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却不及清末孙袁。

18. 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

19.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将近 60 年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权，如果宪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给他们起码的制度性宽恕方案，要让共产党来革自己的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20. 要使得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须要有一批“污点国父”——他们可能在这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照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及其家族的一切安全，使得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辜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们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以后卸任了也绝不秋后算账。上述政策应该也是针对其他一切共产党官员的做法。

21. 没有上述制度性宽恕政策，将会导致共产党与人民斗个鱼死网破，而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将又是暴力、血腥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不知后果是什么、却是谁都不想要的过程吗？

22. 要平稳走向宪政深水，首先得试水，如何试水？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1 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2 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正常发挥议会、行政和司法保护公民权的功能；3 允许结社自由，因此而成立的政党，除了在过渡期不能进行执政竞选，其他一切符合良法的活动都可以开展；4 全面保护原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5 增补并保护原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6 军队国家化，不得介入内政；7 拟定对将近 60 年来共产党过往问题的调查、审判、赦免程序与制度性宽恕方案，并且保证过渡期之后将来的其他执政党绝不出尔反尔；8 过渡期结束之后如果多党竞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应该由议会讨论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年限。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23. 上述只是我的一个简要思考，具体方案，一定得社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至少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公开、和平与理性的讨论阶段。

2008 年 12 月 13 日于追远堂

《零八宪章》与中共角色

——和萧瀚商榷

徐世明

集合诸多自由派基本共识的政治性文本《零八宪章》公布以来，在网络上开始爆炸式的传播，笔者信箱里也收到了这个文本，笔者和一些老年朋友交谈的时候，得知他们也从各种渠道得到了这个文本，并且在公园晨练的时候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看来，《零八宪章》从推出到现在，短短几天，就传递到了许多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中间。当然，这种快速传播既有现代传播技术的辅助，也有来自中共的辅助。中共抓捕刘晓波，传唤许多签名者的过度反应，增加了这个事件的新闻效应。中共之机械僵化，由此可见一斑。

也正是因为对中共特征的理解，我对萧瀚先生就《零八宪章》而发出的一篇文章有些不同看法，特意写出来，就教于萧瀚先生以及各位方家。

萧瀚先生对《零八宪章》有极高的评价，认为《零八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宏观愿景，相对于以前的任何一份重要倡议书，它都显示出更为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是事关未来中国大局的一份重要文件。但是他认为“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萧瀚先生无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零八宪章》如

何对待现实的政治力量-中共集团？既然《零八宪章》没有给予中共一个适当的位置，那么是否就决定了中共不可能接受这份宪章所代表的政治愿景，从而堵住了现实操作性？

我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应该从更细致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哪怕《零八宪章》中给中共做出了必要的妥协，包括萧瀚先生文中提到的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比如承诺接受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等等。但是又有哪种力量可以来保证这种方案的实施呢？共产党又凭什么接受这种方案呢？这种理想化的意愿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基础。

在我看来，《零八宪章》的推出更多的是一种愿景的重申，是提供一场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原动力，通过这种精神力量的激发和聚合去催化更多的社会变化。《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了一次共同行动，而不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共同行动。事实上，签署者中很多的学者几乎从来没有现实政治中行动的经验和意愿。既然是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达，那么自然不必太多考虑现实政治运作的技巧，对于现实政治不必有太多的妥协。

《零八宪章》既然是重申一个未来正当社会的愿景，那么的确可以不必站在谏言或者陈情表的立场上，继续对中共苦口婆心的劝慰或者劝诱。反过来说，如果《零八宪章》顾忌太多，或者希望给目前的中共预留一个位置，那就破坏了愿景本身的高度和吸引力，而容易变成另外一个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请愿书。并不是说这种请愿书就没有价值，但是这种先矮人一截的做法只是在有限的时间段有必要，但是只有这种站在平等立场，毫不隐晦的说出一个正当社会的制度构建的宣言，才能经历时间的磨练，才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才能真正激发人性中那些本真的力量。

站在这个高度来看《零八宪章》的话，那么《零八宪章》对于现实的政治力量-不管是中共或者其他各种反对力量，都不必直接进行对话和发言，她只是宣示理念，宣示价值，鼓励美和善，进而直接对公民们呼

吁，因为最终只有公民们才能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势。因此，说到底，宪章运动是一场公民运动，而不仅仅是政治运动。

那么，怎么样来回答萧瀚先生的那个质问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应该由中共本身来提供，那就是如何在《零八宪章》的框架下，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中共自身的选择将决定中共未来的命运。不过选择不外乎两种，一是漠视民意，拒绝变革，这样将激化社会冲突，中共将被逼入历史的死角，因为一个正当社会的制度架构，不可能完全容纳今日中共的臃肿身段，中共不进行瘦身和整容，是过不了历史的窄门的。二是正视历史演变的潮流，展现出必要的远见，魄力，责任感，对自身进行重大的改革，和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对接，最终在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找到合适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零八宪章》类似于提供了一个“转换法则”，是身患重症的中共急需服用的药方。

当然，行文至此，我觉得我们都在一个过度简单的意义上使用中共这个词汇。

事实上，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机体，它的内部错综复杂，各个政治派别交织丛生，机会主义的行为方式和相互冲突的目标体系注定了内部行为的复杂性。面对民间社会日益蓬勃的公民力量，面对《零八宪章》所宣示的精神力量，我倾向于相信未来的演变轨迹并不是萧瀚先生所担心的“共产党与人民斗个鱼死网破…。又是暴力、血腥的过程”，而是中共内部健康的，理性的力量终将脱颖而出，成为推动宪章运动的重要力量。过去30年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为这种转型留下了注脚，而一个开放社会下，人性力量的合流终将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对此，我一直充满乐观，而《零八宪章》本身得到社会的热烈回应让我确信，我不是盲目乐观。

2008年12月15日晚草就于南京一隅

《零八宪章》的技术细节

王容芬

病入膏肓的极权政府往往以文字狱为强心针，苟延残喘。北京当局对《零八宪章》人士实施国家暴力，是冤杀杨佳后又一起践踏人权的公开案例。百姓杨佳从道德上质询滥施暴力的国家机器，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零八宪章》的精英们看到了“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试图从政治上修理这个国家机器。两者立意无可指摘，但是从法律角度看，做法都有值得讨论之处。本文探讨《零八宪章》的形式、内容与运作。

一、何为宪章

宪章是一种多边国际条约，具体指国家间关于某一重要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规定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组织机构、职权范围、议事程序以及成员国的权利义务等，《例如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奥林匹克宪章等，也有以签署地命名的，例如现代建筑国际会议 1933 年通过的雅典宪章、1977 年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等。

《零八宪章》不具备宪章的属性，不是多边国际条约，不能称之为宪章。签署者中有资深法律界人士称：“我觉得知识界搞这么一个《宪章》，本身是值得支持的。这应该说是大家对宪政的一种盼望吧。”把宪章与宪政并提，确是对宪章的新解。近代西人选择了希腊词 $\chi \alpha \rho \tau \alpha$ （英

语 Charta) 作为多边国际条约的符号，滤尽了这个词历史上的其它含义。中国人把这个符号译成“宪章”，造出一个专指多边国际条约的单义词。两者都已成为固定的法律术语，歧义解读和使用会引起混乱，是忌。

二、《七七宪章》

《零八宪章》起草人坦承借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用发表年代命名。《七七宪章》不是多边国际条约，解释这份历史文献的命名，要先看《七七宪章》产生的历史背景。1968 年 8 月 20 日，苏军率领《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扑灭了捷克人民持续 8 个月之久的追求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支持“布拉格之春”的外长基瑞·哈耶克 (Jiri Hajek) 被罢免并开除党籍。以后的 10 年是捷共专制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表达的自由被剥夺殆尽。唯有音乐尚未被禁，4 个青年音乐家在苏军铁蹄下成立“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演唱 50 年代征服过美国人心的英文歌曲。那种三和弦加上强硬持续的鼓点和朗朗上口的旋律，迅速被广大民众接受，成为一种人生的态度和哲学，支撑着生命和希望。“宇宙塑料人”的演出屡遭政府破坏，1976 年 2 月，终于被禁，乐器被没收，成员被政府指控、审判，许多听众被传唤。这个案件引起普遍关注，8 年铁蹄下的沉默被打破了，各行各业群起声援这些青年音乐家追求自由表达的权利，抗议政府钳制思想和言论。剧作家哈维尔认为镇压“宇宙塑料人”是极权制度对生命和人的自由与整体的侵犯，是一个必须阻止的先例。他与朋友们组织公民上书，哲学家简·巴托卡 (Jan Patocka) 教授起草，征得 242 人签名，于 1977 年元旦以《《七七宪章》宣言》之名发表。宣言敦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宪章，简称为《《七七宪章》》。巴托卡、哈维尔和前外长哈耶克成为这个维权群体的发言人。后来《七七宪章》成为《七七宪章宣言》、签署人群体和长达十年的抗议运动的统称。

《七七宪章宣言》不是修宪建议，而是一份关于违背人权宪章的捷克人权状况报告。援引上述宪章条例，指出捷克政府的违章行为，例如违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保证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剥夺异见者甚至他们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违背该条第 2 节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离开国家的保障，在保护国家机密的借口下强加各种不合法規的条件；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言和第 19 条保证的自由表达的权利，歧视、困扰、刁难异见公民，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违背该条第 2 节规定“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采取的艺术形式”，肆意指控、审判艺术家，特别是对“宇宙塑料人”“乐队”的审判；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所着重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被系统化地侵犯，捷克官方可以随时起诉和干涉教徒活动，教徒经常受到威胁要吊销他们履行教务的许可，经济的或其他的手段也被用来对付在言论上，或在行动上表达宗教信仰的人士；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1 条、22 条提供的结社自由并禁止对履行这种自由的限制、第 25 条参与公众事务的平等权利的规定、第 26 条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的规定以及违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8 条第 2 节关于公民享有自由罢工权利的规定等等。

《七七宪章》认定捷克现存的体制就是一种侵犯和剥夺公民权的工具，按照这个体制，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实际上只接受来自执政党当局的政治指令，和大权在握的个人的决定。宪法、法律和其他法制规则无法制约这些决定的形式和内容，及其发布和实施。这些指令高于法律，通常仅仅由口头发出，公众基本上无法获悉也无权利去审核。发布指令的人，只对他们自己以及所代表的统治阶层负责。然而这些指令却对制定法律，对政府、司法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当某些组织或个体公民在解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时，只要与这些指令发生冲突，他们便无法求助于任何非党派的权威机构，因为这种机构根本不存在。

《七七宪章》用国际人权标准来检验捷克政府的所做所为，把违反

人权的执政党及其机构置于被告的地位上，唤醒 68 年苏军入侵后被摧残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认识到自己的人权。人权是宪法和国际公约承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剥夺公民人权是违背普世价值和违宪的。《七七宪章》的宗旨在于唤起已经麻木了的捷克人的人权意识，极权制度中，实质上一切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成为整个统治架构中的一个零件，发挥各自的功能。要求公民有自己的意识，行使独立的权利，正是在专制制度最脆弱处下刀。哈维尔在阐释《七七宪章》的宗旨时指出：“它不试图从政治方面着手解决社会危机。在民主的国家，或在政治或多或少有些开明的社会里，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不失为良策。然而，对于‘宪章’来说，采取这种方法，只能说明它脱离实际，自不量力。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三、《零八宪章》

与《七七宪章》的区别是，《零八宪章》从道德和政治两个方面入手，开篇立意：“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 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是《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宪政则是其基本主张。

“基本理念”

有关于自由、平等、人权的理念，但自由、平等、人权本身不是理

念，既不是思想的理念，也不是客观的理念。在《零八宪章》之前，只有中共宣传胡锦涛十七大的报告时有过类似提法：“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把人生而有之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正义等手段变成遥远的“理想信念”（胡锦涛语）。

共和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国体，与君主制相对；后者是政体，与专制相对。当今世界有民主的王国，也不乏独裁的共和国，中国是后者的典型。阻碍中国民主的是极权制度，而不是消失了近一个世纪的帝制。

“基本主张”及其运作

《零八宪章》的基本主张是修宪，第一条说得很好，很明确：“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修宪是立法机关的任务，依照程序，《零八宪章》应当先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再由该代表在会议期间作为议案提出，辩论、表决、通过。

但是，《零八宪章》修宪的关键是废除一党专制，在宪法保障一党专制的前提下，要废除一党专制，只能找党内有话语权和表决权的人物，由他在党内决策机构提出，讨论、表决、通过。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权力。

第三种程序是建立合法政党，通过大选进入国会，提交修宪议案，讨论、表决、通过。如果该党拥有议会多数，那就大功告成了。否则，只能争取其他代表的支持，组成联合多数，才有望通过。

第四种程序是通过人民革命，推翻一党专政，选举合法议会，按上述程序修宪。

《零八宪章》的组织者选择了第五种独到的程序：征集精英签名，扩大影响。因为避开了合法与非法的修宪程序，修宪已不是目的。目的

是扩大影响，启蒙。这样做的代价是一批人被传讯和关押。为了营救，掀起新的签名运动，目前的运作是将签名救援信递交外国议会，敦促外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压，达到放人的目的。原来的修宪运动变成了紧急维权活动。

四、细节探讨

探讨 1：公职选举

《零八宪章》第 7 条提出“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公职人员是行政管理专业人员，只能通过考核竞争选拔出来，古代的吏，今天的公务员，都是选拔出来的。

国家各级行政长官属于政治家，通常由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候选人也是民选代表。美国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统，总统选举需要经过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候选人提名，各政党由各州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上提名总统候选人，在全部州都提出候选人之后，就由大会代表通过个别投票方式选举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得到多数票的候选人将最终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第二阶段是竞选，由获得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选，这种全国性的竞选是总统选举过程中关键性的环节；第三阶段由各州选举它们的总统选举人，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不是由国会选举，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选民选派的选举人选举。每个州的选举人数同该州在国会两院中的议员总数相等；第四阶段，由总统选举人在总统候选人之间投票正式选出总统，当各州选出其总统选举人之后，这些人便组成选举团，在各州首府所在地分别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法国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总统，备受争议的法国总统是直选，但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来自法国至少 30% 以上省份的 500 名民

选代表的连署支持，就是说，是筛选后的直选。宪法委员会负责审核候选人资格并正式公布候选人名单。德国最高行政长官是联邦总理，由联邦议会选举产生。

探讨 2：财产保护

《零八宪章》第 14 条提出“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

鉴于影响中国国计民生的私有财产拥有者基本上是鲸吞国有资产的中共高官，确立和保护这部分人的财产权利，使鲸吞合法化，违背大众利益。

探讨 3：联邦共和

《零八宪章》第 18 条提出“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联邦制不失为正确选择。消减中央集权，地方相对自治，有利于竞争和人才流动。联邦制的优势不仅有美、德等国的实践正面证明，也有大一统的中国 2230 年的社会经济停滞反证，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但是，把一个 59 年前就独立于中共政权之外的台湾拉进中华联邦共和国，有悖历史，仍是大一统思想作怪。中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放弃一党专政，就不存在两岸问题了，1989 年以来欧洲的发展证明，消灭了极权制度，原来的两大营垒就不复存在，德国也犯不上要回战后划归波兰和苏俄的领土。

五、结语

《零八宪章》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设想，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零八宪章》没有宣传暴力革命、造反有理，其运作真诚、和平，没有触犯中国现行法律。当局传讯、捕人侵犯了公民基本人权，是严重违宪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对《零八宪章》人士的一切迫害，释放在押的刘晓波先生，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零八宪章》：一份迟到的历史文献

李 勘

相信任何一个因《零八宪章》而感到振奋的读者，不是因为其内容的新奇，而是缘自这份文献终于公之于众的欣喜。这份文献的基本精神，早在二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就已经确立。这份文献的主要内容甚至命名方式，则见诸上个世纪东欧异见知识分子的《七七宪章》。这份文献绝对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异想天开，而是当今整个人类毋庸置疑的普世共识。

假如说，中华民族无法跟充满活力的美利坚相比，也无法跟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相比，那么比之于自己的近邻日本民族，我们这个民族也是相当老迈的。要不是那样的老迈，要不是几千年的专制重荷，这份文献早在将近一百年前清室逊位之际，就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可惜的是，由孙中山引进的那场列宁主义加上秦始皇大一统争霸的战争，中断了曾经发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民主联邦进程。

这份文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也曾有过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中华民族又一次与民主联邦中国失之交臂。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刘邦和项羽那样的逐鹿，一场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的争霸。结果是，中华民族一跤跌入经由乌托邦包装的历史黑暗里，匍匐在由斯大林和秦始皇杂交而成的那个叫做毛泽东的独裁者脚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专制而难以解脱。在那样的黑暗里，不要说平民百姓，即便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都被毛式专制话语的蒙汗药放倒在地。唯有基督般的圣女林昭及其《星火》同仁们，以其生命的代价，划亮过自由的火柴。在阴暗的牢房里，林昭曾经以自己的鲜血，一笔一划地写就过这份文献的基本精神。

在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六四民主运动中，这份文献再度与中华民族失之交臂。那次机遇的丧失，与其归咎专制的因袭过于沉重，不如反省改革精英自身的心理准备，过于欠缺。假如知识精英具有林昭那样的彻底和绝决，假如改革领袖具有杨佳那样的大无畏气概，历史也许不会停格在一个政治老人的屠刀底下。改革是和平的，理性的，但历史的紧要关头，却需要领袖人物拿出一往无前的气概。可是，领袖太沉重。领袖不像杨佳那样一无所有。领袖有身家性命的拖累。于是领袖后退一步，于是，历史停滞了二十年。

经过二十年的磨难，中华民族终于获得了这份历史文献。比起二十年前的空洞口号，这份文献无疑相当成熟。中国一批良知良心尚存的知识分子，在杨佳气概的激励之下，终于向专制当局摊牌。这不是灵感突发，而是这个民族憋了几十年、乃至可说憋了一百多年的心里话。这些话在清末民初之际，曾经见诸当时的报章。这些话在四十年代，曾经由当今已执政、当年却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人亲口说出亲笔写出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话不过是将当年共产党向当政的国民党所言，向当今执政的共产党重复一遍罢了。假如共产党记忆尚存，那么执政者不会感到突兀。只消把当年的报纸拿出来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全都是你们当年讲过的。

这份历史文献虽然迟到，却依然激动人心。大好的国运当头，唯一的缺憾就是迟迟不见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当政者只消有点政治智慧，就可以将这份文献的公开，看作一个天赐良机。既可以籍这份文献推动裹足不前的改革事业，又可以借此平息一下由一系列天灾人祸造成的民众怨气。经由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联邦的历史前景，从而官府民众获得双赢，这样的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再度错失的可能，也同样存在。

1989年的历史，留给中国人一个重大教训，即是凡事都不能不给对方留余地。这份文献的公开，给当政者留足了进退的余地。除非当政者死心塌地学习古巴朝鲜。这份文献的公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相当温和，相当理性的。正是这样的理性特征，能够吸引数百名知

识分子签署。他们当中有老年共产党人，有年轻的自由写作者。年龄跨度很大，职业范围甚广。这样的理性表明，虽然官府硬生生逼出了一个杨佳，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全都杨佳了。至少知识分子还不想成为杨佳，一如鲜有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林昭。林昭般的圣人是罕见的，但被逼上杨佳式的反抗之路，却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份文献的温和理性，还见诸其既没有将矛头指向任何一个当政者，也没有涉及中国民众具体的当下的切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文献具有一种向当政者建言的传统品质。只是比起当年康有为式的公车上书，这份文献立足于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其中的签署者有不少依然在体制内谋生。这种立场，是当政者理当尊重的。就算以前不懂得尊重，那么看了这份文献后，也应该学会尊重。一旦当朝的执政者和在野的异议者之间，彼此产生尊重，那么改革的涵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可是，当政者假如连这一步都跨不出去，那样的落伍就可能引发谁都不想看到的灾难。将会是什么样的灾难？难以预料。但也并非没有前车之鉴。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应该是面镜子。

1989年以后的二十年来，整个民族被全体推入物欲相逐的泥潭。这个民族已经习惯了对任何具有精神涵义的事情置若罔闻。这样的现实，不是这份迟到的历史文献所能改变的。不涉任何人切身利益，既是这份文献所长，也是这份文献所短。政治通常是因为利益诉求而得以推动。没有具体的利益诉求，在操作层面上就等同于一纸空文。这给当政者装聋作哑，留足了余地。大不了以后再也不说普世价值。

这份文献展示的图景，不要说在欧洲在美国，即便在日本，在韩国，包括在印度，都已成为历史。但这在中国，却还只是前景。中国的落后，不是落后在有没有原子弹，不是落后在卫星能不能上天，而是落后在制度的专制，落后在人心的黑暗。正是这种制度和人心的双重黑暗，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劫难。就此而言，《零八宪章》既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出这种黑暗的努力，也应该成为包括当政者在内的整个民族，走出这种双重黑暗的历史机遇。

谈《零八宪章》

秦 晖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清华大学有关方面几次给我打电话说，“保卫部门”要找我谈话。到今年一月九日，人文学院的书记、副书记与我约定后来到寒舍，对我说：上面知道我签署了“零八宪章”，因此让他们来调查情况。

我对他们说：我并未签署“零八宪章”。说我签了那是误传。但是“宪章”的主要精神和诉求我是赞同的。签署者中也有我的很多朋友。很久以来只要有机会，议论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应当如何启动就是常有的话题，也包括讨论各种各样的文本。在人们思想交流如此活跃、交流手段也如此多样的信息社会，郑重其事地查问谁在什么时间同你第几次讨论某个文章，这不是很无聊吗？既不涉及国家机密，也不涉及刑事案件，调查这些是要干什么呢？

我表示：由於对文本内容等方面有些看法，我没有签署这个文件。但我不能承诺以后也不会签署类似文件。要求公民只能表政府喜欢的态度，这在文明发达的今天是很丢脸的事儿。不要说我对“宪章”的主要精神是赞成的，就是不赞成，我也持“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立场，反对因“宪章”之事抓人。我没有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但如果有人发动签名要求释放因“宪章”被捕的刘晓波先生，我很可能签名。因为如果今天因言论可以抓刘晓波，明天也可能因言论而抓我。捍卫刘晓波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包括那些不赞成刘观点的人的言论自由。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签署《零八宪章》？我想《零八宪章》意在仿效

当年捷克的《七七宪章》，其意向很好。但两者面临的局势有很大不同，两者的文本性质也大有区别。以不同性质的文本在迥异的背景下发动类似的签名运动，效果未必好。原因在於：

第一，民主化在捷克本来就比在中国有更深厚的土壤：捷克在二战前已是中东欧最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中国自晚清以来宪政民主却迄未成功。捷克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在自由民主诉求下又加上因苏军侵佔引起的民族情感，其全民参与的深度广度也是我国 1989 年民主运动无法比的。而我国却没有任何一个守旧派因八九年运动而失势，倒是赵紫阳系统全军覆没，镇压者甚至用不着在其中寻找叛徒。

第二，1968 年后的捷克回到铁幕状态，到《七七宪章》时并无任何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同样僵化。人民的普遍不满和思变就如文革结束时的中国，因此当时妨碍人们支持《七七宪章》的基本上就只是对镇压的恐惧。而中国在八九年后虽然政治上停止了改革，经济上却出现了明显转轨，市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奇蹟造成的社会不公早已使民间社会“共识破裂”，并形成深刻的分化。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得利者嚐到了弄权致富的甜头，他们并不希望民主，而改革中的一些受损者却出现了反改革的原教旨主义情绪，他们希望的“民主”是文革式的，与零八宪章的自由取向南辕北辙。因此可以说，今天妨碍中国人支持《零八宪章》的已经不止是恐惧，对不少人来说甚至可能主要不是恐惧。今天在中国提出宪政民主的主张是需要论证的，并不是一批勇敢者的表态就可以激励起民主运动的士气。可以说，今天中国之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论战，远过於需要一场签名。

第三，七七年时捷克和整个苏东阵营处於“停滞时期”，计划经济名声扫地。而西方已经走出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危机的阴影，处在经济繁荣期的起点，并且由於此前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受挫，经济自由主义势头渐兴，七七年后不久就进入了“撒切尔一列根繁荣”。在西方这与民主发展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是要民主的），但在东欧，由於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大潮也

利於他们政治上民主潮的推进。

但是 2008 年恰恰相反，世界陷入了华尔街引爆的严重经济危机，形势有如 1929 年后的大萧条时代。尽管今天危机的发生机制与 1929 年完全不同，但“1929 年心态”仍有严重影响，这种心态往往倾向於呼唤铁腕救世，导致民主自由退潮、极左极右两种专制得势。大萧条时代欧洲不但一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民主国家，除了捷克全部都“重返专制”，就连一战前宪政已有长足进步的德意两国也法西斯化、纳粹化了。

警惕 1929 心态

我并不认为 2008 等于 1929，但今天除了国家干预成为时髦、经济自由饱受非议外，为危机所困扰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主要是反危机政策的配合，而不是民主化。因此近期中国的民主力量实际處於守势，当务之急是应对危机挑战，以民主人权思想来解释危机现象并指出正确的反危机方向，防止出现法西斯化。此时照搬捷克七七年的经验，重複常态下的民主口号并以此摆出攻势姿态，效果将不会好。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危机时期人们的认识混乱，已经民主了的国家都会选出希特勒，何况在不民主的国家开创民主？

因此，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发动类似於捷克七七宪章那样的行动未必适宜。当然从另一方面讲，越是不利民主进程的形势下，越应有人出来大声疾呼，抵制犬儒主义，振奋民主精神。应该说“零八宪章”公布后的的确在这方面显示出作用，刘晓波先生等人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与担当精神也令人钦佩。

但是从这方面来考虑，宪章的文本就特别重要。宪章公布后很多人称讚它体现了温和、理性和改良的精神，这没错，这是它与捷克《七七宪章》的共同优点。但中国的民主运动有自己的特点，即便在共同底线方面也是这样。

例如，捷克《七七宪章》以实行联合国人权公约为诉求，但实际文

本中大量提及的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在捷克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捷克作为老牌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把计划经济用作原始积累的手段，她在旧体制下已经有比较高的全民福利水平。而如果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高福利状态反而会成为引起争议的话题。

但中国则不然，毛泽东时代的命令经济主要是一种剥夺农民的原始积累机制，它既非高福利也非低福利、而是“负福利”体制，即福利与特权挂？u，不仅不覆盖最大弱势群体即农民，甚至也极少覆盖国家雇员之外的弱势市民，“二次分配”不但不缩小、而且还扩大了不平等。而中国的改革长期以来只着重於引进盈利竞争（甚至政府也唯利是图），社会保障建设却严重滞后。对於中国底层大众而言，其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不如北欧式的高福利国家，也不如美国这样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国家，甚至比号称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都差得远。而在号称同样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种“负福利”也与捷克的福利制度相差悬殊。

中国民众既受害於统治者权力太大，也受害於统治者责任太小。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对民主的诉求如果不与大众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结合，很难指望他们的参与。而这些“最基本的”保障并不是什么高福利，它是最自由放任的民主国家也必须有的。零八宪章如果只谈政治权利不谈经济问题倒也罢了（前面说过，这可以理解为回避歧见），既然谈了，除了经济自由（如土地私有制）诉求外也应该有福利与公共服务诉求。后一诉求如果太高调（比如要求北欧式高福利）那就和极端经济自由一样会引起争议，但基本福利与基本自由一样，属於共同底线性质，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议的。宪章文本不涉及这些，就是一个遗憾了。

总之，零八宪章文本上的缺点在於它涉及了太多民主支持者中可能存在争议的问题，同时却回避了一些民主支持者中不应有争议的问题。

当然，以上分析只是供参与宪章签名的朋友们商榷。我在宪章公布前的讨论中就已表示，我认为现在不是时候；要做，这个文本也应该适当修改。后来有的朋友说：他们签名是基於对朋友的信任，甚至没看文本就签了。我其实也相信这些朋友的为人，但对文本的态度却没有这么

潇洒，这种事毕竟不只是“友情派对”，所谓“宪章”从字面上讲，签了就是要遵守的。因此我没有参加签名。

一些所谓左派的朋友不同意零八宪章的观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本人也并不完全同意这个文本。但是像“乌有之乡”网站那样呼籲镇压宪章参与者，我觉得简直不可理喻：这些以文革派自诩的朋友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主张也不符合“主旋律”吗？他们号召起来“造反”，号召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他们认为刘晓波就是这样的“当权派”？今天假如真有所谓毛派，他们如果不搞“武装斗争”，不也只有寄希望於言论自由吗？这大概也是“马列主义毛思想”承认的大道理吧？

这些朋友还说零八宪章参与者想搞“颜色革命”，可怜他们对所谓“颜色革命”的见解还远不如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颜色革命”时，俄罗斯《真理报》网站曾发布《俄罗斯人看“颜色革命”》的民意调查，在回答“革命”原因时选择“前政权不称职与腐败”的佔百分之四十，选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的只有百分之十六。而在白俄罗斯，反对卢卡申科的白俄共产党乾脆就是当地“颜色革命”的主力。

对颜色革命的误解

其实，这就像零三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正是曾遭到萨达姆残酷屠杀的伊拉克共产党成为首先出来与美军合作的派别之一（伊共总书记第一时间就参加了与美方合作的“六人委员会”）、以及当年国民党统治下中共呼籲美国向蒋介石施压，甚至要求“每个在华美军士兵都成为民主的宣传员”一样，很容易理解：这些共产党人既谈不上“亲西方”更说不上喜欢“资本主义”，但他们在别人的专制下都感到受威胁，都知道人权的重要，都懂得首先争取自由，然后再讲其他。但推己及人，别人这么想为什么就不行？

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国也发生所谓“颜色革命”，更不想让别人插手

中国的事，那么就让我们自己来推动民主化吧。正如谭嗣同当年说的：“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原载：亚洲周刊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

——《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余 杰

《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博士被拘，上百名签署者先后被传讯或约谈。当局认为采取此种高压策略便能让宪章“无疾而终”，却没想到签署者们勇敢地站出来，发表名为《我们与刘晓波在一起》的公开信，声明大家愿意与刘晓波一起坐牢。更出乎当局意料的是，几十名被传讯或约谈的对象，将约谈的过程详细地记载下来和公布出来，真是“君子坦坦荡荡，小人遮遮掩掩”。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掌握了数百万军警宪特的执政党，却变成偷偷摸摸的地下党——许多与当事人谈话的警察自称没有阅读过《零八宪章》的文本，且他们也不愿或不敢阅读；而被约谈者虽然只是一些孤立的、无权无势的个人，但他们已经不再像原来遇到类似事件那样，有诸多顾虑和犹豫、尽量保持“低调”，这一次他们战胜了恐惧和怯懦，让一切都呈现在阳光之下。

当局不敢像八十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样，在官方喉舌上连篇累牍地批判《零八宪章》及其签署者，并为之扣上各种吓人的帽子。当年，官方还有相当的自信，认为自己是纯洁的、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并有能力制造出让民众乐意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及让民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那时，官方确实“自以为是”，才会将不同的意见统统打上“精神污染”的烙印、将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全都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堆中。那时，中共当局手上掌握着许多才华一流的御用文人，可以写出气势汹汹的大批判文章。

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和对文化资源的掌控，使得他们有必胜的把握，在思想文化领域放手展开“暴风骤雨式”的斗争——虽然实际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

如今，二十年之后，当局连这点信心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不敢与被批判对象公开对峙，干脆选择“缩头乌龟”的角色，以一种黑社会的模式来治理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重新回到当年的地下党时代——甚至连地下党时代都比不上，他们甚至没有力量和颜面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了，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他们自身已经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在官方控制的任何媒体上，无一不敢提及《零八宪章》，甚至连一篇“旗帜鲜明”的批判文章都看不到。同时，官方控制的御用文人的水准亦直线下降，那些不得不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御用文人们，根本写不出有力的批判《零八宪章》的文章来。今天官方的御用文人，哪一个有当年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的才华呢？这一细节已经充分地说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极权主义政权衰退的标志之一便是——“它不再努力让人民爱戴，而只是企图让人民害怕”。但愈来愈多的人已然不再害怕。

《零八宪章》的发布以及广泛流传，让我想起了十年前发布的亚洲人权宪章。亚洲人权宪章是1998年5月17日在韩国光州发表的，这一日期和地点都颇有纪念意义：五月十七日是南韩军政权屠杀光州追求民主的民众和学生的日子，光州惨案的直接遇难人数为166人。这份宪章的公布，乃是对死难者最好的纪念。而《零八宪章》在六四屠杀二十周年前夕公布，也可以看作是对死难者的纪念以及幸存者的赎罪之举——这二十年来，我们所做的太少太少了，面对死难者的墓碑，面对天安门母亲的泪水，谁不感到愧疚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迟到十年的《零八宪章》也是对亚洲人权宪章的一次并不遥远的回应，是对当时在亚洲人权宪章的起草过程中中国大陆的社团和人士缺席的一次弥补。亚洲人权宪章从起草到定稿经历了三年时间，先后召开多次区域性的会议，征集了两百个团体和数千名个人的意见。参与起草和修改文本的团体及人士，

来自韩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若干亚洲国家和地区，却唯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据我查看名单发现，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士，唯有当时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工作的萧强。忽略中国大陆的声音，这是宪章的组织者的一个欠缺，也表明中国大陆的人权活动人士疏于参与国际人权活动的弱点。

亚洲人权宪章是一份民间的宪章，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但极具象征意义。它的起草正是源于占世界面积和人口最多的亚洲，却是惟一的一个没有以政府为主体签署一份洲际人权宪章的大洲，正像宪章所指出的那样：“亚洲是惟一一个主要地区还没有保障人权自由的地区性官方宪章及相关机制。”经济决定论不足以解释此空缺，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比亚洲经济落后得多的非洲国家早已签署了非洲人权宪章。实际果效如何是另一回事，但他们毕竟有了一份可以操作的、对独裁者有一定制约的洲际宪章。而亚洲人权宪章的空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亚洲缺乏人权价值的文化传统有关——无论是东亚的儒家文化圈，还是南亚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圈，都没有尊重人权的文化传统；其次，与若干率先实现了民主自由的先进国家的自私自利及民族主义的考量有关，比如日本便未能承担责任、成为在亚洲推广人权和民主价值的领头羊，曾经主张价值外交的麻生外长一旦当上首相便忘记了前言；第三，与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抵制和反对人权价值有关，在中国周围便集结了一大批独裁国家，如缅甸、北韩、老挝、越南等等。所以，亚洲人权宪章的起草人的思路是，与其恳求政府“良心发现”，不如动员民间力量，先于政府行动起来，并由此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政府迈开步伐。

讨论亚洲的人权状况，不能回避亚洲的文化处境。亚洲人权宪章的发起人声称：“本宪章的发表是为了深化在亚洲有关人权的辩论，表达人民对人权的看法，并提倡区内各国人民的人权。然而，当我们在区内的文化泉源提取养分的时候，同时需要纯净这些数千年来被偏见、歧视、

不平等及暴力所污染的泉源。”换言之，这份宪章是在对亚洲的文化传统有深切反省的前提下起草的，而不是建立在夜郎自大的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省是必要的，比如，中国人若不反省“儒道禅”互补的文化传统，反倒试图从中找出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民主自由思想的“萌芽”来，此做法如同缘木求鱼。亚洲固然应当是以亚洲人为主体的亚洲，亚洲不应当成为欧美的殖民地；但亚洲更应当是践行普世价值的亚洲，是与整个人类享有共同的人性尊严的亚洲。所以，亚洲人权宪章指出：“虽然文化传统影响一个社会如何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但是这无损于人权的普世性。”它又强调说：“亚洲人民必须消除文化中与普世原则相互矛盾的部分，我们必须超越传统家庭观念中的父权主义，在我们各种文化传统中恢复家庭规范的多元性，以保障妇女的人权。”在“背景”一节中，宪章直接批驳了那些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反对民主自由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在许多国家，独裁主义已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被任意剥夺，人权自由等价值被指斥为不合于亚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外来价值观念。一些政府还鼓吹所谓‘亚洲价值’的谬误理论，作为掩饰他们独裁主义的幌子。”其代表人物显然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以及对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感到“心有戚戚焉”的中共当局。亚洲人权宪章深入反思亚洲文化传统，比《零八宪章》仅仅是回顾中国百年立宪的失败历史尤其是六十年中共统治史来，更是追本溯源。《零八宪章》其实可以补充上这一笔，因为中共之为中共，中国人之选择中共，与中国文化传统实在有莫大之关系。我们今天不是简单地通过驱逐马列之“外来邪教”便可拯救中国，中共既来自外来思想之成分，更有对中国内在传统延续之部分，所以毛主义比马列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之上。中国自身的反人权、反自由的毒素不加以清除，中国这一肌体便不能获得健康与生计。

人权具有不同的层面，但各个层面的权利又是息息相关的。亚洲人权宪章强调了人权之不可分割性：“我们相信人权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其他权利的名义压抑另一些权利，这是一种谬误。人在

社会、文化、经济方面有各样需求和渴求，它们是互相依赖的，不能够被割裂或分隔。公民、政治、文化的权利，除非获得经济资源去行使这些权利，否则它们便没有多大的意义。同样地，如果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机会发展和表达个性，没有机会参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讨论，物质财富的追求和获取最终也是徒然的。”这一观点恰好与中共所宣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针锋相对。中共大言不惭地将人权贬低到“猪权”的地步，并沾沾自喜地认为是他们给了十三亿中国人“吃饱饭”的好处，炫耀“用最少的耕地养活了最多的人民”是当今世界最了不起的成就。其实，他们不敢正视的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存在，中国人完全可以活得更好。即便在刀耕火种、自生自灭的原始社会，中国也没有发生过毛泽东时代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绝人寰的惨剧。人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一样，人具有上帝的气息和形象，人具有不能被他人剥夺之尊严。所以，人权绝对不是猪权，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将人民当作《动物庄园》里的动物来管制和“饲养”。

亚洲人权宪章在原则的部分，论及了“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生命权利”（其中提及了生命权是“天赋”的，《零八宪章》中却未有类似的表达）、“和平权利”、“民主权利”、“文化身份权利和良心自由”（其中特别指出：“在亚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权利”等等。与之相比，《零八宪章》在原则部分的阐述过于简略，《零八宪章》的初稿名之曰“政治文本”，由此可知它侧重于政治制度的建构，而非集中对人权原则作阐述。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批评《零八宪章》过于“务虚”，“不具有操作性”——中国人太喜欢那些所谓“可以操作”的、具体的政治方案了。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反倒认为《零八宪章》仍然太“实在”了，具体的政治方案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而抽象的价值有更为清晰的阐释，并尽早达成共识。如果没有核心价值的认同，仅仅靠有一个反对的对象（中共），根本不可能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的“统一战线”，终归会分裂的。就像当年国共之间三心二意的合作一样。不同的党派、阶层和人群很容易就某些具体的政

治方案达成共识，即便他们在基本价值理念上并不一致，因为他们可以将许多具体的方案当作手段和权宜之计。昔日奉若珍宝，改日便弃之如履。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价值的共识而只有政治方案的共识，这种共识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共识。历史的发展路径从来就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用共产党的方式、用谎言和暴力的方式，根本就不能造就一个自由民主的、保障人权的中国。某些高调反对共产党的力量，一边不择手段地反共，一边营造教主崇拜和党魁崇拜，他们并不比共产党更“好”——他们没有比共产党更“坏”，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共产党那样掌握了权力而已。

亚洲人权宪章在所针对的具体人群这一部分，论及弱势群体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不同能力的人士的权利（如残障人士和艾滋病患者等）、工人权利、学生权利、囚犯及被政治拘留的人士的权利等等。与之相比，《零八宪章》在具体人群的权益上关注不够，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更为充分的表达，则可以吸引更多民众的支持。关于“囚犯及被政治拘留的人士的权利”这一部分，宪章明确指出：“亚洲政府经常行使行政权力，不经审讯便作出拘留。它们利用国家安全拘捕和拘留政治对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犯法”的行径，包括劳改和劳教制度等。在《零八宪章》中，有专门的条款提出废除劳改和劳教制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局拘禁宪章的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博士，使用的便是非法的手段。迄今为止，刘晓波的家人尚未收到正式的法律文件，律师去公安局递交律师函的时候，对方却声称，必须提供带走刘晓波的警察的资料方能证明刘被带走、方能接受律师函。一个政府可以无耻到这样的地步，执法机关可以公然蔑视法律的尊严，他们以为这是对刘晓波家人的羞辱和捉弄，并能让律师知难而退。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乃是自掘坟：当宪法不能保护包括异议人士在内的普通人的基本人权的时候，也不能保护特权阶级——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那些被他整肃的对象死得更加凄惨。

我颇感兴趣的是权利的实施部分，这是亚洲人权宪章与《零八宪章》

中重合最多的部分。政治既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和政府管理的机制，同时又是人权的实践和保障。亚洲人权宪章在加强维护人权的架构方面提出了如下之建议：确保一个维护人权的法律架构是必要的；所有国家应该批准各项国际人权公约；提高普罗大众、国家机构及民间社会内各组织有关人权的知识及意识；鼓励非政府组织熟悉并使用国内及国际上监察和检视人权的机制；警察、监狱人员及武装部队应接受有关人权规范的训练等等。尤其是最后一点，对今日中国军队的现状可谓一针见血。而《零八宪章》中更是详尽地对军队由“党化”变为“国家化”作出了若干“改制”的设想。以我1992年作为北大新生在自诩为“中国的西点”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的经验，中国军队中不仅屏蔽公民品格和人权意识的教育，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地推行反人道的、反独立思考的、对党“绝对服从”的洗脑术，由此将国防军打造成“党军”。正是因为此种“愚兵教育”，让那么多蒙昧的“解放军”官兵变成六四屠杀中的刽子手，而且在二十年之后仍然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开枪杀人的士兵公布真相、公开忏悔。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经谈到公民课的普及问题，而我认为公民课首先便应当进入军营。如果不对军队的官兵进行人权教育和公民教育，中国的军队永远是一支威胁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负面力量，永远是中共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特殊地位的“枪杆子”，永远是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支“党卫军”。此一问题若不解决，六四屠杀的惨剧则随时有可能重演。

亚洲人权宪章在“执行人权的机制”部分，更是列出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司法机关是保障人权的主要手段，应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其任职应当由一个司法人事委员会负责，并受宪法的保障。第二，法律专业应享有独立的地位。第三，所有国家应设立人权委员会及保障人权的专职机构。第四，民间社会机构可以通过组织人民法庭去帮助人权的实施，其审判结果虽然不能施行，却能触动政府和公众的良知。这几点建议对中国都极具启发性。亚洲人权宪章在结尾部分还提出了设立保障人权的地区性机构，并制定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人权公约的建议。比起欧

洲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来，亚洲已经迟到得太久、太久了。我一直期盼着一份亚洲版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的问世，如果可能的话，它可以扩展为一种更为广泛的“亚太版”——这样，便可以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熟的民主国家涵盖进来，让这些国家在推动亚洲大陆的民主化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今日之中国，盲人骑瞎马，危机重重。晚近读史每每叹息燎原之忧、覆舟之惧，日夜滋大，而窃国之盗，吞舟之漏，不可胜计。不是没有“救命的稻草”，外部的亚洲人权宪章与内部的《零八宪章》，堪称是推动中国“和平演变”的两根拐杖——而“和平演变”，无论对中共而言，还是对中国民众而言，都是一条最好的路径。这两份文件所彰显的都是“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我们相信尊重人权是一个公平的、人道的、充满关怀的社会之根基。一个尊重人权的制度，其大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并有权活得有尊严。我们有权通过制定政策和管理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个保障人权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繁荣、稳定和强大的中国。可惜的是，病入膏肓的胡温当局以及斥责西方“多管闲事”的接班人习近平，已经连挪动拐杖的力气和智力都没有了。

2009年2月19日
大雪，于北京家中

台湾反对运动从“党外”到建党的两个经验 ——兼议《零八宪章》

吴仁华

台湾和平转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外民运界曾经盛行一句话：“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独台（李登辉）和台独势力（民进党）崛起后，统独之争掩盖了台海两岸的价值观之争，中共当局也乘机利用统独问题抹杀台湾民主化的价值，连海外民运界的一些人也迷失焦点，只盯着统独问题，看不到台湾民主化的价值。

我个人一直认为，国民党曾经与共产党一样，都是列宁似的革命政党，属于难兄难弟，对反对派所采取的镇压方式都是相同的；台海两岸又都是华人世界，因此，时至今日，台湾的民主化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995年，我陪同王军涛访问台湾，当时还是国民党执政，王军涛刚刚从中国狱中来到美国不久。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安排我们去见在野的民进党，民进党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不愿意会见中国大陆民运人士。但是，王军涛非常重视台湾的民主化经验，通过私人关系约见民进党重要人士，表明不对外公开、不谈统独问题，只是请教反对运动的经验教训。后来见到了几位民进党和“党外运动”时期的“大佬”级人物。

关于台湾反对运动从“党外”到建党的经验，有两条是很重要的：

第一，在尚未开放党禁的情况下，争取建立一个没有党名的党。

台湾反对人士在1987年开放党禁之前，创办了《美丽岛》杂志，

三位党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分别担任社长、总编辑和总经理，也就是“党”的中央领导人。《美丽岛》杂志社在各县市设立记者站，也就是各县市“党部”。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不可能有民办的杂志社存在。杂志社只是一个参照。

第二，参加地方选举，集结和累积支持力量。

选举期间，言论空间相对扩大，台湾反对人士称之为“选举假期”。1980年，北京高校学生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胡平、王军涛等人都说了许多平常不能说的政治言论。

台湾党外人士并不认同国民党体制，但为了集结和累积支持力量，不放过任何一次合法参选的机会。在选举期间，各地参选的党外人士相互站台助选，逐渐形成一个事实存在的“选举联盟”，为后来的组党奠定了基础。

参选是精英与草根结合的最好桥梁。没有这一座桥梁，精英的见解、主张再好，草根也不知道，更不会予以接受和支持。

参选可以检验自己的主张有多大的支持度，每一张选票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支持者。没有经过选票检验，你自以为的支持者都是“空气票”而已。

台湾1000名各界党外人士于1987年9月18日签署创建民进党的宣言，其中绝大多数签署者是从乡镇到中央的各级民意代表，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支持选民，总数大概占了百分之十几（没有查具体资料）的选票。如果没有背后选民的支持，1000名签署者是很容易被镇压的。因此，蒋经国陷入长考，国民党高层分为两派，争论不休，最后蒋经国决定顺势开放党禁报禁，避免了社会动荡。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不在本帖的探讨范围。

《零八宪章》运动也一样，每一个以真实姓名签署者，就是实实在在的支持者。至少目前已经有了6600多个支持者，6600多张“选票”。

如果签名持续下去，签名者风险减少，当局者压力加大，情况会如何？实实在在的签名者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做下一步的事情。目前有的朋友对《零八宪章》运动的批评，可以说是“超前意识”，脱离现实。包括我在内，谁不想中国民主化一步到位，问题是，欲速则不达。没有反对力量的集结和累积，上街也罢，组党也罢，什么都做不成。

恕我直言，目前有些关于《零八宪章》的争论没有必要，只有集中精力，努力打破中共当局的封杀，将签名运动持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零八宪章》缺住民自决

林保华

今年不但是中国立宪百年，12月10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300名中国社会菁英推出《零八宪章》，逼迫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这300人中，有好几个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近60年来中国人民要求改革所推出的最全面的纲领，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生存环境等等方面。

今年正好也是中国在文革结束后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30周年，中共本来准备大事庆祝，但是今年以来中国天灾人祸不断，暴力抗争此起彼伏，经济危机浮现，表明改革开放走到瓶颈，未来怎么走？《零八宪章》也试图给予解答。

《零八宪章》出台前夕，中国政府立即逮捕其中的重要人物刘晓波，并对其他一些异议人士进行骚扰，中宣部也立即为宪章与联署人设立禁区禁止报导。但是《宪章》出台几天就得到五千名海内外华人的签名支持，并且联署要求释放刘晓波；美国总统布希立即接见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表示关心，欧盟、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体制内的主张太温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应该进行暴力革命。

中国政府虽然未作正式回应，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12月18日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中国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看来他把三权分立与自由、民主、宪政的主张都列为“邪路”了。

台湾有人权组织声援《零八宪章》，民进党也表示关注。但是我没

有参与联署支持，主要原因是因为第 18 条主张“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却没有指出人权宪章中住民自决的原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首先应该肯定住民自决，才可以决定是否愿意加入“中华联邦共和国”。但是我也理解他们为何没有提出这一点，一方面会有人反对，即使赞成的，也可能立刻被政府以违反《反分裂国家法》而逮捕。但是在海外的，必须“旗帜鲜明”的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也只有我们的旗帜鲜明，才有他们“温和”的空间。

马英九总统最近表示，立法院 40 年来迟未能通过联合国的两项世界人权公约，担心的是其中“人民有自决的权利”怕和“台独”扯上关系。台湾是民主国家，难道因此就要匍匐在共产党脚下，连东帝汶、科索沃都不如？马英九既然尊重住民自决的权利，就应该邀请在野党讨论如何运用公投等手段来落实这些人权，而不是以个人独裁来决定台湾前途。

1908 年满清立宪起步太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共产党如果拒绝改革，后果也一样。目前马英九政府因为国共合作而拒绝支持中国的改革，还为共产党输血与唱赞歌，不但为迎合中共而使台湾人权倒退，也成为共产党镇压中国人民的帮凶！

我为诗人辩护，诗人为谁辩护？

——写在《零八宪章》发表与《今天》30年纪念之间

孟 浪

国际人权日前一天，12月9日，《零八宪章》在签署人之一、作家刘晓波被突然拘押的不得已情势下提前於互联网发佈，公告世界。《零八宪章》的签署得到了中国国内及海外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和积极的联署声援。

国际人权日后两日，12月12日，《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晚会经数个月的精心筹备在香港如期举行，北岛、芒克、舒婷等13位当代重要的中国诗人登台朗诵，以纪念这份三十年前当大陆开始走出历史误区在"解冻"潮流中顽强诞生的非官方文学杂志。会后有热心的听众因没有听到舞台上的诗人们直接对正成为政治热点的《零八宪章》事态发表意见表示遗憾，我也能深切感受到这些听众热忱的期待之情。

《零八宪章》的发表与《今天》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没有。

有关联的只是这次《今天》纪念活动的若干参与者，比如徐晓（《今天三十年》主编），比如笔者本人（今天三十年纪念晚会朗诵者之一），也参加了《零八宪章》的先后签署。因此12月11日晚间，当睽违十数年、久别重逢的部分诗人、作家和长年以来为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默默奉献的文学义工相聚在一起，听到《零八宪章》的发表甚为鼓舞的同时，得知作家刘晓波被拘捕的消息，也甚为震惊。在场的一位诗人也接到了来自大陆的文化工作者提请与会诗人关注《零八宪章》、关注《零八宪章》签署人被捕命运的短讯。

《零八宪章》的发表与《今天》的活动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关联吗？否也。

12月12日晚，“今天的昨天与明天”诗歌音乐晚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利希慎音乐厅揭幕，300多名嘉宾和听众出席聆赏。这是一场文学晚会，这是一场纪念自由文学之精神历程的晚会，参加朗诵的诗人芒克、北岛、严力等，都用自己的作品说话、发出声音。对期待听到不同声音的听众来说，诗人们高低不一、调性各异的音量当然应该是也汇入了那一刻中国未必缤纷绚烂、但却纷纭异常的凝重夜空。笔者作为受邀朗诵的诗人，在“6.4”二十周年正向我们逼近之际，献给听众的是本人写于1989年夏秋之后到1990年期间的三首作品，我在台上告诉听众“把这几首诗献给大家，是为了记住昨天，让我们站在今天，去争取明天”。一位香港诗人在朗诵前向场内听众公佈了来自大陆的声音，呼籲大家关注：“请不要忘记，刘晓波正代替大家在北京的囚禁中”。应该说，为冲破黑暗、迈向民主，三十年以来甚至远溯至“文革”的苦难岁月，中国诗人和其他良心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公民一样，从未曾缺席。也因此，《今天》三十周年的创刊纪念活动把参加晚会的很多观众带回了当年的激情年代。

“啊，天空！/把你的疾病/从共和国的土地上扫除乾净。”当诗人芒克在香港之夜、在寂静的音乐大厅高声朗诵起他三十多年前写下的名句，为整个晚会拉开诗人亮相的序幕时，全场观众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今天》是三十年前随着中国大陆“民主墙”运动崛起的地下刊物，由北岛、芒克主编，1978年12月23日创刊，1980年秋至年末被当局勒令取缔，直到十年之后，1990年夏在北欧复刊，迄今总共出刊83期；其三十年的崎岖历程，也是中国大陆一部民间争取自由写作、自由表达之奋斗史的缩影。当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城市涌现过一大批由投身人权、民主事业的年轻人创办的民刊，如还有《四五论坛》、《探索》、《海燕》、《民主之声》、《人民之声》、《学习通讯》等等。尽管这些刊物的创办人徐文立、魏京生、傅申奇、王希哲等作为人权、政治活动人士至今继续在“民运”道路艰难前行，其精神令人感佩，但毕竟——

如我在为《今天》三十年写的感言中所述——"在当年各地蓬勃的民刊中，竟只有文学杂志的《今天》倖存至今，这是中国政治现实造成的不幸，却也是中国政治现实导致的'奇迹'。——诗人们有幸了。“竭尽青春发出异议声音的”政治人物“为一个公平、公正和公义的公民舞台的奠基与屹立，付出了不间断的牺牲，也所以“文学人物”幸运了，——至少，今天来自大陆的诗人们可以在香港这一块“共和国”的土地上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相聚在一起，同样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也同样有满含异议的不同声音；也所以可以期待一切的人们最终都将得到此种幸运。这是美丽的。

但任何人都有权利声称发不发声这是他（她）自己的个人之事；但，任何人更没有权利阻碍人们去争取发出声音，无论这声音是屬於仅仅他（她）个人一己，还是屬於整个公共社会的。诗人应该、也已经愈来愈是一个个互不隶属、互不纠集的独立“个人”，而早已挣脱、早已拒绝成为类似极权主义语境中常常不得不成为的灾难性的、受奴役的“集体”。

在本文中，似乎描述的是，一个现场的当事人，我为诗人辩护，但，诗人为谁辩护？——他们没有吗？

答案不言自明。

写于 12 月 15 日，《零八宪章》发表第七日

左翼也应该践行《零八宪章》

刘逸明

此次《零八宪章》事件，“毛左”们站在当局一边，对之围剿，着实显出堕落。

随着一代暴君毛泽东的去世，改革开放的时代得以开启，中国的左翼力量很快就失去了先前的影响力，到如今即使有新左派的出现，他们依然难扭颓势。虽然像郎咸平这样的新左派尚能赢得一些民众的支持，但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毛泽东虽然已经死亡了30余年，但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毛泽东崇拜者，这种毛泽东原教旨主义者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毛左”。

如果说新左派还有一定支持率的话，“毛左”则是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在现实中，有“毛左”倾向的人大多是毛时期的红卫兵。但如今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属于“毛左”，但他们往往不会随便表露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们对“毛左”的处境不乏自知之明。

不过，“毛左”在网络上却异常活跃，毛泽东旗帜网、祖国网、乌有之乡等网站都是“毛左”的阵地。中华网更是人气鼎盛，被称之为是中国左翼和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一旦中国与其它国家发生纠葛的时候，民族情绪升温，这些网站便成了“毛左”们的乐园。在今年西藏骚乱发生后，中华网论坛刊发的一篇长平的文章点击率竟然高达百万。“毛左”的思想核心既包括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包括根深蒂固的反改革意识。

“毛左”们不仅仅热衷于对其它国家喊打喊杀，而且自由知识分子也毫不留情，很多“毛左”对自由派的攻击可谓是充满了暴戾之气，一旦毛泽东时代卷土重来，这些人肯定又是当年的红卫兵。“毛左”们从来

都不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这也是他们无法取得民众支持的原因。“毛左”们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但他们却永远不甘于落伍，总是在关键时刻对自由派落井下石。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更多时候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考量，往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毛左”们所做的却多是为了争夺公共话语权。几年前的“反日”活动有“毛左”的影子，今年的“反法”活动同样也和他们脱不了干系。中国社会有太多的不公，但他们往往视而不见，只有在中国与它国发生矛盾时他们才“勇敢”地站了出来，你相信他们是真的爱国者吗？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 30 个年头，跛足的改革已经使得中国社会产生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当中国的经济状况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显得前景黯淡时，各种社会矛盾便越发地凸显出来，从 2008 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来看，中国已经临近了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的临界点。

在 2008 年这个特殊年头即将走完的 12 月，也就是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 60 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零八宪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开展纪念世界人权日之际，中国政府竟然动用警力于 12 月 8 日将著名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先生抓捕，因为他参与了起草《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刚一发布，就引起了海外媒体和国内民众的强烈关注，签名者与日俱增。然而，左派网站又开始了对《零八宪章》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攻击。他们给《零八宪章》扣上了企图“分裂国家”和“推翻共产党”的大帽子，对逮捕刘晓波幸灾乐祸，并要求中共对签署者绳之以法。他们实在缺少人性，要置人于死地。

逮捕刘晓波先生没能阻止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反而激发了民间签署《零八宪章》的热情。作家和学者们也纷纷撰文声援刘晓波和要求践行《零八宪章》。短短的几天，海内外论坛有关《零八宪章》的议论铺天盖地，网警删不胜删。左翼也乘势批判《零八宪章》。乌有之乡网站特别设立了“《零八宪章》与颜色革命”专题，大量散布围剿《零八宪章》

的言论。司马南在一篇文章中信誓旦旦地说，如果《零八宪章》签名人数超过两千，他就吃屎。截止 12 月 15 日，签名人数已超过 3600 人，司马南将如何兑现自己的诺言？

正如《零八宪章》中所言，中国“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然而，民主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所有有良知、有责任感、有勇气的民众主动地去寻求和推动。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中华民族也许永远都无法真正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零八宪章》是民权运动的纲领，需要更多的中国民众去践行。左翼人士对《零八宪章》的表现让人深感失望。记得几年前，个别左翼网站遭到中共的封杀，当时左翼和自由派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但在反对监控言论拓展自由空间方面还是有共识。但此次《零八宪章》事件，“毛左”们却站在当局一边，对之围剿，着实显出堕落。

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

——我看《零八宪章》

刘 荻

不久前，本人读到与本人同为《零八宪章》发起人的余杰先生在其大作中提到“《零八宪章》是改良主义的”这一观点。本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故撰本文与余杰先生商榷。

余杰先生认为，《零八宪章》的主张是在承认现行宪法的前提下要求修宪。固然，《零八宪章》中使用了“修宪”的字眼，但《零八宪章》的主张究竟是修宪还是制宪，在签署者中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有些人认为《零八宪章》名为修宪，但提出的十九条主张实际上是对现行宪法的根本否定，是制宪而不是修宪。《零八宪章》签署者中，主张制宪者也大有人在，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以“修宪”为由说《零八宪章》是改良主义，恐怕许多签署者不会同意。

余杰先生在文中还提到，《零八宪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择，对此我并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排除暴力革命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改良，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零八宪章》的主张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改良。那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请大家回到五年前由崔卫平教授主持翻译的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我们的主张是“新演进”。

“演进”与“改良”有什么区别呢？“改良”是眼睛向上，把目光放在当权者身上，希望当权者进行改革；而“演进”是眼睛向下，把目光对准社会和公众，我们是要告诉公众如何行动，而不是告诉政府如何改革，我

们的目的是为了凝聚公民的共识，促进社会的觉醒、发育和团结，而不是为了“上书劝进”，乞求政府接受我们的改革方案。

“演进”的主张中包含哪些具体行动？例如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牛博网友不通过政府和官方的红十字会，自行募捐数百万元并亲自购买救灾物资送往灾区。汶川大地震中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上百之多，多家民间组织还共同组建了成都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以便协调民间救援工作。地震发生之后，大批媒体记者纷纷自行前往灾区进行报导并参与救灾工作，部分记者从灾区返回后还在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举行了面对网友和民间人士的新闻发布会。地震发生十个月之后，艺术家艾未未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亲自调查出来的地震遇难学生的姓名、年龄、学校、班级。这些行动都是“演进”的一部分。

类似的民间行动还有许多。北京网友就曾经组织过多起以公民身份成功营救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中的上访者的行动。为防止对方使用暴力，每次行动前都会事先召集围观群众和“打酱油”者。网友们以公民身份与“黑监狱”交涉，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访民。如果对方使用暴力，网友们就通过自己“人多势众”，用拉架的方式阻止对方使用暴力。通过这种方法，网友们成功营救了多名被非法关押的访民。

北京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就是一个致力于从事公民行动的 NGO。他们每周六下午举办的公民转型论坛不仅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就各种理论问题发表演讲，也邀请从事实际工作的律师、记者、维权者等来就大家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演讲，如前面提到的汶川大地震新闻发布会，以及维权律师就毒奶粉事件发表的演讲等等。除了讲座之外，传知行还制作《2008 公民税权手册》等小册子，并且经营了一个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从事类似活动的 NGO 还有许多。

这就是“演进”：我们既不主张暴力革命，也不企求当权者的改良，我们要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和平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认为这才是《零八宪章》的主张。

2003 年以来，由异议人士和广大网友组织的网络联名活动每年都有

几起甚至几十起，《零八宪章》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政府如此大动干戈呢？我认为，《零八宪章》的意义就在于其发起人和签署者有效地突破了原有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圈子。《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和签署者中有各种职业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其中不乏所谓的“新社会阶层”，甚至还包括了中共党员、军人和公务员等被认为再“正统”不过的人。《零八宪章》已经不再是“一小撮”的事了，用某些人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有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说《零八宪章》的主张是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那么《零八宪章》的“群众基础”就可以说是在权贵与民粹之间。我们既不寄希望于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突发奇想，也不像另一些政治力量那样把底层的苦难当作自己的大旗。固然，底层的苦难是值得同情的，也是需要我们关心和帮助的，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除了社会中最底层和最边缘化的人们之外，我们还需要得到社会主流支持。学者、法律工作者、媒体人士、企业家、专业人士、白领、“新社会阶层”……他们具有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上文中提到的公民行动，许多都是由他们完成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底层的运动很难成功。一场运动如果仅仅诉诸于底层的苦难，虽然能够得到同情，却很难得到社会中更多人的支持。社会的中间阶层本来是社会的稳定力量，只有当他们也对现状感到不满，希望变革的时候，我们的运动才能真正取得成功。《零八宪章》在动员更多主流人士的参与方面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无视底层的苦难，我们所要做的是动员中间阶层，帮助底层，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成功的希望。

此外，本人还注意到有论者谈到海外民运的“群众基础”问题。本人想请该论者注意：海外民运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而不是在海外竞选公职，因此海外民运的“群众基础”也应该在中国国内；海外人士可以成为中国民运的促进者和拉拉队，但是民运到海外去寻找什么“群众基础”，无异于南辕北辙。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20075903.shtml>

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福音单张

王 怡

温家宝总理：

我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我为《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被您的政府拘捕，以非法的方式秘密羁押至今一事，写信给你。

4个月来，从国内到国际，有许多我尊敬的知识分子为此事发表声明，提出抗议。我也认为您和您的政府在这件事上犯的错，实在配得这样的抗议。但我写这封信，不是为着继续抗议。我一直不太确定作为一个传道人，要向一个非法关押异见人士、因着内心的怯懦而勇于践踏人权的政府，如何来说我当说的话。

我对这件事本身，充满愤怒，因为抓捕并秘密囚禁刘晓波，法律上是非法的，道德上也无耻，在一位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面前，则是罪孽深重、无法站立的。但对您和您手下的公务员，我并不怨恨。或许你不相信，我对您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轻视。因为我虽然不曾担任过您的公共职位，不曾拥有过您的公共权力，但许多时候我在家人、亲友面前对未来的恐惧；和您在您的人民面前所怀的恐惧，本质上是一样的。我在一两个人的场合，因着内心深刻的罪性，常常有刚硬冷酷的举动；这和您在向您和政府提出意见的人们面前，常常利用和背叛您手中的公共权力，做出刚硬冷酷的决定，其实也是一样的。

成为基督徒之前，我是一个以批评政府、监督公共权力为志业的知识分子，也曾出现在您的政府的黑名单上，被禁止署名、发表文章、在学校授课，或被跟踪、收到骚扰和恐吓信。但有一天，我成为基督徒。

意思就是，有一天，我终于开始承认我的道德人品，我对公义的追求，其实并不比温家宝、胡锦涛更好。我在道德上一点不比我批评的人更高尚。我心里隐藏的罪性、欲望、骄傲、软弱和恐惧；我内心对他人的冷漠，和对我所爱的人的刚硬；温总理，请容我说一句，这一切和您的内心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并不将您看作刘晓波先生的敌人。据我对刘先生的了解，他也不会将您看为他的敌人。尽管作为政府首脑，您的职位决定了，您应当对这件事负完全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但我和你真正的敌人，乃是我们内心的罪。是使我们陷在自己肉身的处境、欲望和利益中，无力克服、更无力自拔的那一切。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当我看到广场上你站在赵紫阳先生身边那张照片时，那张脸上曾有过的年轻、忠心、良知和理想，以及一颗尚且不愿被政治和环境所辖制的、挣扎中的灵魂，如今哪里去了。我对您的怜悯和哀伤，更胜过了我对刘晓波先生的担忧。因为 20 年前，您和他都曾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今天，是您逮捕了他，看上去，你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但我却知道，这 20 年来，您所失去的，远远超过了刘先生所失去的。即使现在，他蹲在黑屋子里，您坐在中南海明亮的办公厅；但我却知道，您内心和周围的黑暗，也远远胜过了那间黑屋子。

魏恩波是罗马尼亚家庭教会的一位牧师，1989 年前曾入狱 14 年，受过残酷的迫害。他在回忆录中说，大约 1985 年，几个基督徒遇见了从总理府出来的罗马尼亚总理德乔治。两个弟兄，不顾一切冲出人群，向德乔治传讲基督的话语，高声地呼召他悔改，停止对人民的迫害，并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赦免。你一定知道，这件事若发生在新华门前，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两个基督徒被捕、判刑，倍受折磨。几年之后，德乔治身患疾病，想起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悔改信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共产党的前总理，参与了教会的服事。

而中国基督徒的方式，常常是更温和的。在去年四川 512 地震之后，您到了灾区。有一位女基督徒在广州，心中有强烈的感动，希望为您的

悔改得救祷告。她买了机票回都江堰，经过各种努力，进入了您身边数米之内，在您身后举手为您祷告。也许您永远都不会认识她，也不会知道她是如何为您祷告的。但我写这封信给你，我不愿意您不知道，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在为您和您的政治局同僚们祷告。因为圣经告诉他们，“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甚至我很遗憾、很难过的一点，是中国的基督徒中，常为您祷告的人，远远多于为刘晓波先生祷告的人，也多于为其他被关押在您的正式或正式的监狱中的异议人士祷告的信徒总和。但我想，这不是因为您是一个统治者，或一个迫害者。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上帝仍然容许您站在这个管理中国的职位上。您虽然和我一样是罪人，但您所占据的那个位置，本身是崇高的，是一个仆人式领袖的位置。基督徒愿意为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些人祷告，包括您。所以，尽管我不认同今天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是公平、自由和合宪的，但我依然承认您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就如麦凯恩竞选失败后，在演讲中宣称，“奥巴马是我的总统”。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我也愿意说，尽管胡锦涛先生不是我的总书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温家宝却是我的总理。不是因为你的总理职位在民主政体下具有合法性，而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掌管着这个世界，也掌管着你的职位。您手中的权柄，在本质上不是人民授予的，不是窃取来的，不是私相授受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那一位设立权柄的上帝，为着这个世界的益处，也出于对人堕落本性的怜悯，而设立的。

若有一天，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您终将在生命的尽头失声痛哭，您曾经在内心为自己辩护的一切理由，都将如草枯干，被风吹散。

今天，我凭着公民的良心，向您提出要求，请您尽一切努力释放刘晓波先生，还他以人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我知道，这一仅仅基于公民权利的要求，是不会被您接受的。就算您心里闪过这样的想法，但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你，胜过内心罪恶、政治压力、家族利益的可耻的权衡，进而做出一个忠于宪法、并在道德上无亏的、仅仅是尽到您

自己的本分的正确决定。所以，我更凭着一个基督徒和基督耶稣的传道人的身份，向您这位中国政府的首脑，发出恳切的呼召：温家宝先生，你当悔改，信福音。

因为这个世界上，惟独只有那一位来到地球上、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又和我们一样经历了各种罪的试探诱惑，最后保持祂的圣洁，作为无辜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你、也为我而死，在一场宇宙性的审判中承担了我们一切罪孽的刑罚；又为着我们能有永远的生命，而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就是那位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弥撒亚），才能帮助您抗拒身陷在政治中的一切罪孽，也将您和您的家族从身陷在金钱、肉体、欲望和对安全感的恐惧中，拯救出来，活在灵魂的自由当中。

也唯有当你认识这一切，相信上帝和祂美善、圣洁的属性，从而因着祂的恩典，真正悔改认罪；基督说，你就必经历灵魂的重生，有勇气、信心和盼望，去做正确的选择。无论您的年龄多大，地位多高；基督说，除非你愿意顺服下来，谦卑下来，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否则你将永远不能从这样的罪恶和虚空中，脱离出来。否则，一切美好的词语，自由、和平、公义、圣洁、美善，仁爱，都将与您无份，对您的一生而言，这些不过是一堆随时可以被您舍弃、并且一旦舍弃之后，您就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去接近的形容词而已。

您曾写下“仰望星空”的诗作。你一定知道康德著名的话，唯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使他敬畏。温总理，您心中的道德律在哪里呢。若没有上帝，星空就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仰望不仰望，不过是自欺欺人。如果星空之上，时空之外，的确有中国古人称之为的“昊天上帝”，就是在圣经中启示祂自己的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我们的心中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律。因为道德并不是从我们里面产生的。就如圣经《诗篇》第8篇，这是一首真正仰望星空的伟大诗篇，您可以读读，思想和您的诗作之间的差别：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对您、对我，对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果我们在内心宣告了上帝之死，我们心中的道德也必将随之而死。我们只剩下一点点可怜的道德感。若没有上帝，仰望星空，不过使我们更加骄傲而已。连仰望本身，都使我们在不仰望的人面前，获得了貌似高贵的满足。温总理，如果您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没有察觉到自己内心道德律的死亡与沉睡，没有面向浩瀚无穷的星空，对自己一生的所思所为，生出痛悔忧伤的心来。那您的这首诗，不过是在世人面前假冒为善罢了。我是一个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在不信基督之前，我也一样曾以写作假冒为善。但圣经却如此说——

“你们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我知道，向您抗议是没有用的，向您请求也是没有用。因为你的良心，也和我以往一般，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除非，我真诚地向你指出你的罪来；除非，我奉着基督耶稣的命令，怀着爱心而不是怀着愤怒或骄傲，向你发出悔改的呼召，并告诉你基督赦免的福音——因为在圣经里，基督将呼召世人悔改信主的权柄和使命，交给了每一个相信祂、愿意跟随祂的人。所以，我若在这件事上，不向你传讲福音，发出悔改信主的呼召；你的罪有大多，我的罪也一样大。我若不因着爱惜你的灵魂，如同我爱惜刘先生的身体和精神，而为您在上帝面前祈求，求祂怜悯恩待您和您家，就如怜悯恩待我和我家一样，并使您生出悔改的心，重新去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认识永远的真理，也忏悔一生的罪孽。否则，我的抗议和呼吁，不一定能帮得到刘先生，但却一定帮不到您和您家，及您的同事们。

温总理，在我的信仰里，没有一种对人类道德律的描述，胜过了旧约中所记载的“十诫”：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请您再一次仰望星空，当您在总理的职位上，命令、参与、同意、容许逮捕一个异议知识分子（以及之前对持不同思想、言论的公民更多的迫害），并对此保持沉默与不作为；您将如何为自己悖逆了这永恒的道德律来辩护呢。您若不真心悔改，求告十架上那位为你承受了鞭伤的救主。那个被永远关在黑屋子里、切齿痛哭的灵魂，就会是你。而连你那首仰望星空的诗，也将是你在永恒而至高的那位法官面前，悖逆、刚硬而不悔改的呈堂证据。

什么是你行事为人的最高原则，什么就是你的神。所以温总理，请你看清自己心中所敬拜的那些虚假的神。

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国家政权，无论是家族利益，个人名声，还是历史评价，你为什么而活，你就在跪拜什么，侍奉什么。所以温总理，请你反思，你的一生难道不都是在为自己雕刻和跪拜偶像吗。

你手中握有权力，你和你的政党，以人民的名义、伟大光荣正确的名义，以历史的普遍规律的名义，来施行统治。也在这样的名义下，毫不犹豫地剥夺刘晓波先生的自由。所以温总理，你心里害怕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你为着自私的利益想要对付他；因此你和你的政府假冒和妄

称了上帝、真理和美善的名义。

安息日是为着将七天中的一天，归给上帝，使我们的灵魂可以在对上帝的思想、敬畏和敬拜中，得着安息。但是温总理，你的心里没有安息。你的一生迄今为止，只有星期天，没有安息日。

你口中以仆人自居，以人民为您的父老，以百姓为你的乡亲。你却不尊敬他们，随时以傲慢、亵渎和对权力的滥用来对待他们。就像悖逆的儿子，虐待他年迈无养的父亲。所以温总理，你难道不是这个民族的不肖子孙吗。用中国人的话说，逮捕不同意见的公民，真的可以使你无愧地面对这个民族的祖先和子孙吗。

这世上又有谁何德何能，配得拥有生杀予夺的权柄呢。但你却被放在了一个大国领袖的位置上，不是因着你是中国人中最高尚、最智慧、最有爱心的人。你将何等地谨慎、敬畏你手中的权柄啊——这权柄随时可以用来伤害、减损、侮辱和杀害你的人民。所以温总理，基督说，凡心中咒骂弟兄是魔鬼的，就是杀人了。何况你将这样的同胞和公民，捆绑起来，送往囚牢。你的手在签署文件的时候，没有过一次颤抖吗？你在夜里做梦，没有过一次被惊醒、而需要借助安眠药物才能重新入睡吗？

温总理，你曾利用手中的权利，偷窃那属于公民的一切吗？

温总理，你将刘晓波带离他的家庭，离开他的房屋、妻子、财物和他除了灵魂以外、几乎所有的一切，你内心的贪恋达到何等的地步呢。为了你和你的同僚的政治利益，将他人的一切都可以随时牺牲。牺牲的意思是付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先将别人的东西抢过来，然后牺牲。

温总理，你真的希望这个国家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吗。难道你不知道，仰望星空的人，往往就是批评地上事物的人吗。如果连不同思想与政见的知识分子都可以随意逮捕、判刑、软禁，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不敢贪污，不敢为你一己之利而葬送的呢。

温总理，当你发表任何公开演讲、提到任何高贵而美好的词语，对你的官员和人民像一个道德的长者语重心长时，你就不曾为自己虚假的见证、为自己一生活在道貌岸然的谎言中而羞愧过吗。

几年前，我和妻子，及我的弟兄余杰夫妇一起，给刘晓波先生唱了一首圣诗，名叫《一百只羊，有九十九》。这是福音书中，耶稣讲过的寓言。祂说，人子（指祂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着拯救失丧的人，愿意悔改的人。中国人有句古话，说“人有病，天知否”。但事实是，人有病，人自己知否？耶稣说，我来就是为病人来的。意思是：你若认为自己没有病，十字架的救赎，福音的好消息，就和你没关系。到底什么是我对你说的福音呢。就是温总理，你悔改吧，如今悔改可得白白的赦免。

若不是上帝爱我和你这样不配爱的人，甚至献上圣子耶稣，也就是上帝自己，来替我们赎罪，在这个宇宙中付出公义而完全的代价，以致于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爱，可以在受苦的基督耶稣身上，显出完美的统一。这就是福音，是一个能使你的生命，在本质上和上帝和好，然后你和刘晓波先生和好，和一切你所统治、管理、命令、伤害、恐惧、提防和怨恨的人和好的好消息。

温总理，您是一个政治家，您知道这样的统一在人间，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您为之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共产主义理想。无法在公义与爱之间，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也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得到和解与安息，最终不得不血流成河，不得不反目成仇，不得不背信弃义。甚至 20 年前，在你亲身参与的那场悲剧中，政府开枪杀死自己的孩子。

所以耶稣用比喻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基督为信祂的人流血，叫我们彼此之间不用再流血。基督为信祂的人死了，叫我们的灵魂活过来，不用再死。温总理，你觉得这是一个童话呢，还是这宇宙人生中最真实、最伟大的故事？你若觉得这是童话，你就继续活在你的罪孽、怨恨、恐惧，活在泯灭了道德、并且面对永恒时心如死灰的人生里面吧。这样的人生对你的后代来说，可能还方兴未艾；对你自己来说，也没有多少地上的光阴了。您若真有勇气面对自己，

生出忧伤痛悔的心来，你必有一天，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去相信，也可以去悔改。那么您的生命中哪怕最后一秒，都将如同呱呱落地时的第一秒一样，充满了盼望。

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来为迷失的那一只羊去死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而且祂说，天父赐给我的羊，我一只也不会丢失。

温总理，当时我们唱了这首歌，对刘晓波先生说，你就是九十九只之外的那只迷羊。牧人愿意撇下圈中的九十九只，去找你。并为着你能回永恒的家，而甘心受难。刘先生当时一无所求地说，“那哪能呢”。因为对他来说，苦难过于沉重。他为着自己的良心，承受过和将要承受的都太多了。基督的爱，令人感动，但也往往令人却步。使伤痕累累、也罪孽累累的我们，无法决心去信靠，去盼望，去接受。

但是，温总理，假如当时我知道几年之后，您的政府还会再一次地关押刘晓波。我还是一样会对刘先生说，上帝爱你，祂在找你。因为这样的恩典与盼望，实在与您的政府抓不抓他，或者与他这辈子还要经历多少迫害，没有关系。基督徒寻求和盼望的，乃是爱与公义的真理和生命，不是为了天堂的门票，今生的好处，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的保障。尽管我们常常也因着上帝的怜悯，而得着这一切。

温总理，今天我也对您说，你就是九十九只之外的那只迷羊。牧人已经撇下圈中的九十九只，来找你。并为着你能回永恒的家，而甘心受难。尽管你所做的事，和刘晓波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眼里，刘先生是这个民族的良心，是我尊敬的知识分子。而你是一个虽有抱负却陷在罪恶和贪婪中无力自拔的、可怜的政治家。您在电视上向人民流露的那一点道德良知，与刘先生相比，不过是更加残缺、污秽且无耻的。我虽是一个传道人，我愿意以基督的爱来饶恕你、为您代祷。但我也承认，我实在很难去爱您，如同我爱刘先生一样多。但是，我却要诚实地对你说，基督耶稣爱你的灵魂，和爱刘先生的灵魂，是一样多的。刘先生是一个受害者，他因为受过的伤害太多，而难以相信恩典。你是一个加害者，

你是因为伤害过的人太多，而难以相信恩典。但在基督那里，温总理，上帝愿意同时将你们抱在祂的怀里。上帝为此付出了祂自己。

这就是我的信仰。基于这一信仰，温总理，我请求您尽自己在上帝、宪法和人民面前不可推脱的责任，释放刘晓波先生。在未释放的时候，也尽您一切的努力给他有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我也奉基督耶稣的名，呼召你悔改，停止在你的职权上伤害和剥夺你的人民的思想、言论、信仰和一切人格的权利与尊严。唯有真正的悔改，将使您得着真正的福音。就是在无亏的良心和真理的仁义中的、永远的生命。如同马丁·路德·金半个世纪前的演讲，有一天，您和您的同事们的后代，和刘晓波们的后代，将一起在黄河边跳舞赞美，弟兄和睦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温总理，难道您就不曾和我一样，盼望、祈祷过在中国也有这样一天吗。时日无多，为什么还不悔改？

王怡，写于主后 2009 年复活节前

香港团体闹市宣传《零八宪章》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 心语

《零八宪章》各地签署人继续遭警方传唤，香港有团体在 4 月 26 号当天发起在街头派发关于《零八宪章》单张。他们希望透过在闹市派发单张，让香港人更了解《零八宪章》及明白民主对中国的重要。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香港民间团体，中国民主党香港分部及南方民主同盟于 4 月 26 号星期天下午发起了闹市派发《零八宪章》单张活动。主办单位表示 1989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导致后来的六四屠城。廿年后的今天，各地的零八宪章签署人被传唤及骚扰，发起人之一刘晓波仍被监视居住。

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纬纹向本台表示，他们希望透过在闹市派发《零八宪章》活动，让香港人更了解及明白民主对中国的重要：“因为零八宪章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去年十二月这文件出来之后就很多朋友都签了他们的名字，却也很多人都被当局拉去问话。二十年前的 4 月 26 号，当局说学生的运动是动乱，二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因为零八宪章被公安拉去问话，所以我们想派发这单张是很有意义的。”

龙纬纹表示，香港的团体可以在街头派发单张，但在大陆，零八宪章签署者仍然不断遭到警方传讯及骚扰，刊登零八宪章的网站或个人博客也一一遭打压及关闭。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浙江自由撰稿人温克坚星期一告诉记者，自从牵署了宪章之后遭到许多压力：“我现在就是不能出国了，本来我是经常要出去的，他们虽然没有

说要限制我到什么时候，但我想总和六四等有关系的。”

据大陆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上星期六的报导，湖北荆州的《零八宪章》联署人宋翔峰遭到警方传唤，警方主要询问他签署《零八宪章》及参与中国幸福社会党的情况。当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和他电话联系时，国保人员将宋翔峰的电话夺去。本台记者星期一多次尝试致电宋翔峰，但电话一直处关机状态。和他通过话的刘飞跃推测，宋翔峰可能遭当局拘留，他向本台表示：“现在电话打不通应该就是被拘留了，零八宪章的签署群体应该说他们是用一种公开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国家的一些看法及建议。他们用如此公开方式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中国宪法所容许的，我想对他们这群体不断进行传唤及打压的这种方式是十分不明智的。”

《零八宪章》在中国虽不断遭当局打压，但在国际上却持续受关注及重视。美国笔会日前把 2009 年度表彰言论自由的自由写作奖颁发给了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所作出的努力；零八宪章签名者群体 303 人也入围了《时代》杂志百大影响力人物。

劳改基金会出版书目

《黑色文库》系列

《一滴雪山之水》	2009年	岗拉嫫 著
《沉思录》	2009年	杨子立 著
《阳谋下的人生》	2008年	胡显中 著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	2008年	赵 旭 著
《最后的地主》（上下册）	2008年	廖亦武 著
《花旗梦别神州泪》	2007年	唐彼得 著
《燕园风雨铸人生》	2007年	王书瑶 著
《从列宁格勒到新肇监狱》	2007年	张铁东 著
《中国巴士底》	2007年	李贵仁 著
《中国第一罪》	2006年	秦 耕 著
《记忆的声音》	2006年	阿妈阿德 著/ 杨莉黎 译
《赤海漂零记》	2006年	曾石荣 著
《中国冤案录》第2卷（2003-05）	2006年	廖亦武 著
《梦断未名湖》	2005年	陈奉孝 著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2005年	闵和顺 著
《中国冤案录》第1卷（2001-03）	2005年	廖亦武 著
《红尘白浪》	2004年	叶少华 著
《从诗人到囚徒》	2004年	尚建国 著
《永远的北大荒》	2004年	黄 湛 著
一个人的两个故事：（上册）		
《昨夜雨骤风狂》	2003年	吴弘达 著
《苦难的历程》	2003年	文彻赫恩 著
《雪山下的火焰》	2003年	班丹加措 著/ 廖天琪 译
《凄风苦雨四十年》	2002年	成中和 著
《沧桑岁月》	2002年	陈文立 著
《我以我血荐轩辕》	2001年	徐文立 著

人权书目（中、英文）

- 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中国信息中心 2009 年
-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余 杰 著 2008 年
- 《劳改手册》2007-2008 2008 年
- 《劳改手册》2005-2006 2006 年
- 《劳改手册》2003-2004 2004 年
-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刘晓波 著 2005 年
- **Better Ten Graves Than One Extra Birth** 2004 年
—China's Systemic Use of Coercion to Meet Population Quotas
- 《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 2004 年
- 《国策下的国难》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评析 2003 年
- 《共产党的慈善事业》
——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报告 2001 年
- **Communist Charity** 2000 年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the Executed Prison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订购请联络: laogai@laogai.org

网上浏览地址: www.laogai.org



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刘晓波妻子刘霞

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

——前捷克总统、“七七宪章”主要发起人哈维尔

此宪章的签署者涵盖中国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自由人士、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和草根维权人士，是近年来罕见的民间政见之集合性表达，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之觉醒、勇气之提升和力量之壮大。

——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外人士

中国政府的举动正好为《零八宪章》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宪章里面的陈词句句都是不可反驳的真理，不能动摇的现实。北京政权的愚蠢再一次为晓波先生载上了文章道德的桂冠，为《零八宪章》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史上奠定了至尊的地位。

——作家 廖天琪

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中国信息中心 编

劳改基金会 出版

华盛顿 2009

Charter 08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China Information Center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9

www.observechina.net

www.laogai.org

ISBN-10: 1-931550-29-8

ISBN-13: 978-1-931550-29-1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美元32 港币80

ISBN 978-1-931550-29-1

53200 >



9 781931 550291